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



## 总 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样少不了要利用工具书，因为，一个人即使读书很多，而且非常专心致志，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和材料都记在脑子里。因此，对于青年同志来说，就更有必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认真钻研专业的同时，了解各类工具书的历史、现状及其使用方法，培养自己利用工具书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以便在学习或从事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力求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书即为适应上述需要而编写。

在分别论述各章之前，兹将工具书的名称和作用、我国工具书发展的简况、工具书的种类和本书的介绍方式、怎样使用工具书等问题，作一个概括的说明。

### 一、工具书的名称和作用

所谓工具书，顾名思义，是指在学习或工作时可以作为工具使用的特定类型的图书。倘若一定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可简略地这样说：凡用一定的观点收集某种资料并按一定的方法编排起来供人查考的图书，即可称之为工具书。

一般图书是工具书的原始材料，工具书是在一般图书的基础上进行选材和重新组织编排的加工品。一般图书主要是供人阅读用的，工具书则是供质疑解惑时查考用的。二者之间有区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又并非绝对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象《四库全书总目》这样典型的工具书，它既可供人翻检，又可供人阅读。类书、政书是查找古代事物和典章制度的工具，但也可部分供人阅读。与此相反，一些供人阅读的图书，即如《史记》、《汉书》这样的史学名著，其本纪、列传可供查考人物之用，书（志）、表部分更明显的具有工具书的性能，除供人阅读之外当然也可供人查考。有鉴于此，本书编写各章节时，一方面主要是介绍大家公认的重要工具书，另一方面又根据实际需要，对少数从严格意义上说本不是工具书，而查考问题时确有某种实用价值的图书作了附带的介绍。总之，我们认为，工具书与非工具书只是相对而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必过于拘泥于名称或形式上的区别。有人说，凡是从事某种工作需要经常查考的图书，都可以叫做工具书。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古代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图书不如今天这么多、这么复杂，而且那时的读书，强调靠记忆，所以对工具书的需要也远远不如今天这么迫切。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门类的日趋精细和各类图书的急剧增加，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书报杂志，如果没有工具书作为输助，要想广泛收集某种资料进行科学研究，那简直就象大海捞针一样困难。而且正因为要读

的书太多，要研究的问题太多，就更感到时间特别宝贵。一旦在学习或工作中遇到问题即使只需要查考一本书，如果没有检索工具就难以解决问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工具书的编制也日益增多，并且是“日新月异，后出转精”。

讲到工具书的作用，那确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来，它可以指点读书的门径，解决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及时提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斗争经验和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如此等等。也正是由于工具书能够比较迅速地提供学习和科学研究需要的参考材料，或提供这些材料的线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大大节省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它一向被看作“良师益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人们做学问，包括两方面：一是学，一是问。而且学问学问，学总离不开问。学习中遇到了问题问谁好呢？问老师，问同学，问图书馆咨询机构或向社会上知名学者请教，这固然很有必要，但总有一定的不便之处；不象查工具书，往往可以少受时间、地点等等条件的限制。

由此可见，重视工具书的作用，养成勤翻工具书的习惯，无论对于学习还是从事研究工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但是，必须指出，工具书、特别是文史工具书一般都反映了编纂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见解和认识；同时，由于许多工具书编纂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现实和科学水平，所以，这些工具书也存在局限性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再加这些书在编排和印刷出版过程中免不了出现技术性的疏漏或错误，因此，我们在使用工具书的时候，也要加以注意，要有一定的科学分析，尽量做到批判地利用，不要盲目地照抄照搬。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抹杀工具书能够为学习、研究提供极大便利这一特点，持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管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摒弃，那是不对的；反过来，看不到工具书在观点、取材和编排方面的局限，全盘肯定，这也是极为错误的。

为此，我们在这里特地作一个总的声明：希望读者掌握上述原则，在使用工具书、特别是文史工具书的过程中注意这些问题，并且通过实践逐步去了解和辨别。我们在以后各章节一涉及具体问题，可能只讲这本书用处很大，那本书极有参考价值，而不再一一作分析批判，这是因为大量的工具书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无论从观点到材料都可能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即使新出的工具书，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假如每种书介绍时都要一一指出其全部糟粕所在，一则水平有限，二则举不胜举，似乎没有此等必要。

## 二、我国工具书发展的简况

我国的工具书，名目繁多，数量丰富，源远流长。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产生了具有检字作用的《史籀篇》。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成为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最为完整的古代字书，在语言文字学史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年表的编制也很早，周代已有记载帝王年代的“牒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进一步创造出比较完整的历史年表体制。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和《七略》，班固因之编成《汉书·艺文志》，总列了此前简策书和帛书的目录。《诗经》是春秋以前平民和贵族诗歌的总集，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此后这类书籍代有选辑，为今天查考古代诗文提供了方便。魏文帝命王象、刘劭等采集群书作《皇览》，“随类相从，凡千余篇”，为我国见诸记载的第一部类书。唐杜佑因刘秩《政典》而撰《通典》，成为第一部专详典章制度名物的政书。先秦古书《世本》和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列女传》等等，开始重视人物的活动，从事于人物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梁元帝的《古今同姓名录》则标志着人名索引或人名辞典的初步产生。此外，据可靠的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已有了地图，春秋战国以降，制图事业日益发达，但这些古地图都已佚失。长期以来传世的地图以南宋时期刘豫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石刻《禹迹图》、《华夷图》为最古；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绘在帛上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乃是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以前的作品，这又把我国现存古地图的时代推前了一千三百多年，为世界地图学史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随着文化科学的发展，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需要，近千年来，特别是清末以来，图书目录、报刊索引、字典、辞典、谱表、舆图、年鉴、手册以及文物图录等等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日益增多。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很大的胜利，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也取得了不少成绩；除编印了一些新的工具书外，对古代遗留下的仍然有一定用处的工具书，有计划有选择地逐步予以改编或重印，并翻译出版了若干国外的工具书。尤为可喜的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已经设立专门机构，着手编纂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的《百科全书》，这将标志着我国工具书出版的新阶段。

当然，人类总得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今天，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进展，有关单位正在试制适应现代科研要求的“电子检索器”，使检索工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以预期，随着检索工具的革新，今后工具书的编制、使用，一定会有大的改进和提高！

回顾以往，瞻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和自豪。但目前，填补缺门，对现

有各种类型的工具书给以研究、总结，使有关人员能充分加以利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仍然是当务之急。

### 三、文史工具书的种类和本书的介绍方式

文史工具书的种类很多，一般都分为书目、索引、字典、辞典、年鉴、手册、年表、图谱、政书、类书和百科全书等类。

书目是图书目录的简称。它是记录图书名称、作者、卷册、版本、定价，间或叙及学术源流、图书流传、内容得失和收藏情况的工具书。其范围不仅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和《全国总书目》这种综合性书目，也包括《中国地方志综录》、《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司马迁著作及其研究资料目录》、《红楼梦书录》等专题性书目。

索引又称通检或引得，它是将书报中的内容编为条目，按一定的方法排列起来专供人们检索的工具。概括而言有书籍索引，如《尚书通检》、《十三经索引》、《廿五史人名索引》；报刊索引，如《全国报刊索引》、《文学论文索引》。

字典和辞典有时并为一类。总的说，它是解释字、词的声音、意义、用法和形体构造，间或叙及源流的工具书。我国古代没有字典、辞典之名，那时把解释字、词的书叫字书，旧的四部分类法中附属于“经部·小学类”。自清初敕编《康熙字典》，始有字典之专称；辞典或词典则更是后起的名词。所以说，字典和辞典可包括古代的《说文解字》、《尔雅》和《广韵》之属；也包括近代的《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和《新华字典》之类；还包括《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地名大辞典》等专科性辞典。

年鉴是系统汇集年度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的连续性出版物。如《中国年鉴》、《世界知识年鉴》。

手册是汇集某一方面经常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或专业知识的工具书，如《汉语方言调查手册》、《译名手册》。

年表是按年代顺序用表格形式编制的查考时间或大事的工具书。其中的纪年表供查考年代，如《中国历史纪年表》；历表可换算不同历法、纪年法的年、月、日，如《中西回史日历》；大事表则为查考大事及其年代的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大事纪年》。

图录是用图象表现事物的工具书，它既包括《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各种地图，也包括《中国历史图谱》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各种文物图录。

政书是文化史专著，它汇编历代或某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方面的资料供人阅读和查考。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

类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有人也称它为百科全书，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类书是辑录群书中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述而

不作，分类排比，以便寻检和征引，是查考古代事物的工具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

百科全书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前者是完备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汇编，搜集各科专门术语、重要名词，而加以详细的、系统的叙述和说明，各条目按字母或分门别类编排。后者所收条目则限于一个学科范围，只是较一般专科辞典为详备。

以往，论述工具书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沿袭以上类别进行介绍的。这种方法当然有它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但这样的分类与读者遇到疑难时所考虑的问题是两码事：它是将工具书分为书目、索引、字典、辞典、年表和图录等，而读者要查考的则是人物、地名、字词、年代、事物或一篇文章和一本书及其内容。两者的口径不同，自然势难吻合，所以往往对读者帮助不大。例如，要查考某个人或某地名，而查考人物或地名的工具书却分属几个类别：书目中既有人物传记和地方性资料，辞典中也有人名和地名辞典，索引中同样有人名和地名索引，乃至方志和地图也是查考人物或地名的资料。因此，假若对工具书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时是弄不清楚哪一类别中有查考某种疑难的工具书的。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不少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工具书介绍”这门课程，编写了一些讲义和参考教材，其中有按上述方式介绍的，也有不约而同地摸索出新的介绍方法，即根据学习和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从实际需要出发，分别介绍查考图书的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查考人名、地名的工具书，等等。实践证明，这种讲授法还是较受欢迎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为了使读者在阅读各章之前对本书有一个初步了解，兹将本书的结构和介绍方式分三点略予说明如下：

(1) 我们打破了前述工具书分类的界线，按查考问题的性质编排。如“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一章虽保存了大部分的字典和辞典，而有关人名、地名、书名的专名辞典，按内容分别归入“查考人物的工具体书”、“查考地名的工具体书”、“查考书籍的工具体书”等章；有的类别如索引，就按内容和性质完全分散于有关章节之中；有的章如“查考地名的工具体书”，则是从书目、辞典、图谱、地方志等类集中了有夫材料而成，为我们所新设。

此外，有少数涉及面较广而又重要的工具体书，我们采用此详彼略的办法，如《辞海》，就归入《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一章，详细介绍，其它各章则间或简略提及。

以上是本书在章节编排和介绍方式上和其它同类著作的第一个不同点，也可以说是本书的编制特点之一。

从查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看，把有关工具体书集中起来加以介绍，读者可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查阅有关部分，省去几处翻检的麻烦，这样，既易读易记，又便于应用，其简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2) 本书约计介绍了八百余种较为重要的中文工具书(日本人用中文或主要用中文编制的工具书,间或收录),其选择是否妥当尚成问题,有待于出版后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加以调整和修订,但估计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的需要。我们的收录原则是:第一,偏重古代部分。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但由于时代久远、社会变化等种种原因,使我们今天阅读古书或研究古代文物的时候,从语言文字到典章制度等各方面都容易碰到不少困难,这就迫切需要借助于各类工具书。第二,凡同类的工具书已被新出工具书所代替了的,一般不予收录介绍,至多在讲源流时简单的提一下;凡没有为新出工具书所代替的,则视其重要与否作不同程度的介绍。今以丛书目录为例,试加具体说明:丛书目录,以顾修编《汇刻书目》为最早。自《汇刻书目》以来,出现过不少收录几千种丛书的大型丛书目录,但从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问世后,基本上都可以废弃不用,所以本书均不予收录;另有《丛书集成初编目录》虽系一种丛书的目录,却因为有一—3999册书的书号,便于索取,有它的可取之处,所以本书仍予简单的介绍。《四部丛刊书录》和《四部备要书目提要》也都是一种丛书的目录,因两种丛书选收得体,前者有简炼的版本说明,后者有书籍的解题,可视为导读书目指点青年以读书门径,故亦加介绍。

以上是本书在收编范围和介绍方式方面与同类著作的第二个不同点,也可以勉强说是本书的编制特点之二。

(3) 本书除《总论》以外,每章都分为“源流”和“使用”两节,节下再标若干细目。“源流”部分较为详细地介绍各类工具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它有助于青年同志了解各类工具书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掌握和更好地运用文史工具书,这也是现有介绍工具书的著作往往缺少或着墨不多的篇章。“使用”部分尽可能做到既有概括性的综合介绍,又分门别类从不同角度介绍查找资料或解答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一般需要介绍的工具书都有简单的解题,涉及较为重要的工具书时,另写略为详细的内容提要或评论,有时还结合具体情况穿插一些实例,以启发思考和提高读者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和兴趣。

上述编制结构或介绍方式,是为本书的特点之三。

以上所谓特点,只是表示与同类著作有所不同而已,并不一定都是优点。总之,现在写成的这个样子,它究竟符合不符合读者的要求,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希望通过实际使用,通过广泛听取意见,今后作进一步的补充修改,使之不断提高和逐步完善。

#### 四、怎样使用工具书

我们在学习或研究工作中,常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不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知道有些成语典故的涵义和出处,对中国历史

上的年月日期不能以公元或回历作换算，看到冷僻的字词与生疏的人名、地名无法辨认和解释，或是刚参加某一问题的探讨，不知首先应读什么书，收集什么材料，也不知学术界过去对这个问题已研究到什么程度，今后该从哪方面多下些功夫，如此等等。为要迅速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要利用工具书，而且要善于使用工具书。

我们的看法，所谓善于使用工具书，大体上需要具备下列三方面的基本知识或技能：

第一，要利用工具书查找资料或解决我们的疑难问题，必须首先了解目前究竟有些什么工具书可以供我们使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平时要关心工具书的出版情况，要熟悉书目和掌握必要的目录学知识，懂得做学问的门径。

第二，要学会使用工具书的具体方法，即注意工具书通常的编排形式，亦即熟悉并掌握工具书的各种排检方法，其中包括“图书分类法”，“部首检字法”，“拼音字母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等，这样就会得心应手，拿起工具书便能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或答案。如果碰到没有接触过的而且是编制较为复杂的大部头工具书，那就要仔细阅读它的凡例和序跋，弄清它的收编时限、取材范围，以及它所使用的符号或省略语的含义，切不可在没有弄清编例之前粗心大意地一翻而过，把本来可以找到的材料或是漏掉一部分，或者根本找不到，还对工具书妄加批评，结果是贻笑大方。

第三，要有的放矢，学会针对问题比较准确地选择工具书的本领，力求少走弯路。

问题是无限的，工具书是有限的。碰到工具书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必须查阅别的非工具书，即查其它专著和论文资料，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最起码的常识，这里不多谈了。就目前而论，最常用的文史工具书约有上百种，较为常用的多达数百种、近千种，而实际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又何止千万种！当你在学习或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在大量工具书中选择恰恰是自己急需检索的工具书，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你要找图书就去翻书目，年代问题查年表，普通字词或人名、地名等等查有关辞典或索引，总之，若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一下就找到答案；说它难，那可实在有些难，一些较为冷僻和复杂的问题，决不可能随便翻查一、二种工具书立即得到解答。

在后一种情况下，有的人要末束手无策，要末病笃乱投医，不管什么工具书拿来乱翻一通，结果花了很多时间还是一无所获；但有经验的人仍然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答案，虽然有时可能也要经过一番周折，可是由于他们脑子里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熟知各种类型的工具书的性能和作用，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合理地试加查找，即使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也终于会找到线索和解决疑难。这中间有一个“经验”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没有“经验”，实际上也就是能否善于使用工具书的一大关键。

然而，经验不是凭空得来的，那是需要同志们在反复使用工具书的过程



中，一点一滴地积累，逐步地加以掌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所以，要达到准确地选择和运用工具书的地步，主要靠实践，靠多接触、多翻检，这样自然会“熟能生巧”。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说，在强调实践的同时，并不排斥间接的知识，更不是不要别人的经验作借鉴。相反，可以而且应该通过阅读有关工具书的介绍文字，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得到必要的基础知识。这也就是本书编写的目的所在。

## 第一章查考书籍的工具书

查考书籍的工具书，主要指各类书目而言。书目即图书目录的简称。它一般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项目，有的兼详图书的流传情况、主要内容与优缺点，以及书籍的真伪和文字的讹误等问题。所以，不论何种形式的书目，除了便于读者查我图书和利用图书以外，也还具有揭示图书内容、宣传图书和指导阅读等重要作用。因此，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目录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是极其鲜明的。那种认为目录学只是提供便利的讲法是不对的，至少是片面的。

现就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以及怎样查找各类书籍的方法，分别介绍如下。

### 第一节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








#### 一、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

要讲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首先得介绍一下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的简单历史。因为书目是随着书籍的发生、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离开书籍发展这个前提，就没有书目和图书分类可言。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代，我国已有了典籍。由于目前尚没有充分的实物作为佐证，夏代的事就暂时不去讲它。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这说明商代已有典籍。商代已有典籍，除了上引资料外，还有没有其它证明？有。甲骨卜辞有“禹册”、“祝册”、“工典”等文字，册作，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简牍为一束的形状；典字作，象两手捧册之形。金文册字与甲骨文略同，典字或作，象简册阁置于上。汉许慎《说文解字》：“……从，在兀上尊阁之也。”又：“，古文典，从竹。”另外，从记载和实物都证明商代已有书写典籍的工具和材料，例如笔和竹帛之类。不过，由于简牍比甲骨更难保存，所以商代的这种典籍至今未能发现。

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近年于周原发现的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主要是商周王室的占卜记录，刻写于龟甲兽骨之上；商周的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初字数很少，至西周逐渐增多，其中如《毛公鼎》铭文近五百字左右，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史料价值很高，但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尚书》，主要记周代的历史，其中有《商书》五篇，据学者考定，仅《盘庚篇》是商代的作品，其余都是后人的追叙。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典籍，据说已日益增多，并且有了专门管理典籍的官吏和藏书的府库。可惜当时的书籍多半已经佚失了。今天见到的《尚书》、《诗经》、《春秋》等等，是经过辗转流传保存至今的少数珍贵著作。

从商代到春秋末年，正处于奴隶社会所谓“学在官府”的时期，文化教育由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所垄断，私人著书立说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发生。所以，当时的所谓书籍，实际上仅是政府的文告等档案资料的汇编而已。从录写材料来说，或甲骨，或青铜器，或石头、竹签、木片等等，也还没有固定。总言之，这是我国书籍的发生时期，在书籍发展史上属于初期阶段。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冶铁事业的发展，铁器工具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又因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发达和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这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就引起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变革。这时候，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平民和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兴地主阶级便利用奴隶暴动、平民斗争等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首先在三晋、齐鲁等国先后建立了地主政权，以后秦楚燕等诸侯国家也普遍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表现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各阶级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各自为本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地位而大造舆论，《墨子·天志上》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对图书发展事业一度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汉初，“广开献书”之路，许多门类的著作物又相继产生。直到东汉时期，基本上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社会的经济、文化继续有所发展，书籍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国至两汉，竹木制的简策，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帛书，在后汉又出现了纸书，但简策一直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这一个时期可以称为书籍发展史上的简策时期。

《墨子》一书常讲“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也讲“先王寄理于竹帛”。甲骨、金、石用以刻字，竹、帛用以书写，正是先秦以来实际情况的反映。古书上说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秦始皇规定每天批阅文书一石（一百二十斤，合今六十斤），都是简牍。我国历史上关于这类文书曾几次大的发现：第一次是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宅，发现战国时代人用古文（所谓“蝌蚪文”）抄写的《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每简二十字到二十五个字，与当时通行的隶书（称今文）不同，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从而引起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第二次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有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发战国魏襄王的坟墓，因而发现十几万根竹简，后经荀勖、束皙、和峤等整理，共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十六部古书。每简长二尺四寸，四十字，墨写，用素丝编连。此后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于新疆、甘肃一带所得汉魏简牍文书“流沙坠简”，193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得前汉中期到后汉初期

近万根木简，称之为“居延汉简”，皆是公文而非书籍。解放后，1952—53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古墓中发见了几十根竹简，都是战国时楚国的遗物。1957年在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又发见了一批，也是战国时楚国的遗物。1959年在武威汉墓发见了五百零四根竹、木简，其中四百六十九根是前汉末年抄写的《仪礼》，计有《乡饮酒》、《丧服》等七篇，每简长二尺四寸。由此证明，古书讲先秦简长二尺四寸，用以写经典、法律和国史，一尺二寸用以写《孝经》等书，八寸写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籍是有一定依据的。秦汉以后，根据王国维的考证，简长有二尺、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的区别。这些简，或用丝绳，或用皮革编连。《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牛皮。孔子晚年反复读《易经》，把穿连竹简的牛皮磨断了三次，这个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古书的面貌和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

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直到汉代还应用。帛是一种丝织品，或称缣、素，价值较为昂贵。近几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过这种帛书（如《老子》、《十大经》等）。

从三国到唐末，这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书籍的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是纸写本盛行的时代。《晋书》记陈寿《三国志》成，时人多爱抄录；左思撰《三都赋》，京师豪贵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就是纸写本盛行以后的一种反映。近年于新疆发现晋写本《三国志》、唐代卜天寿抄《论语郑注》、唐《西州营名籍》等，都是用的帘纹纸，这又提供了新的例证。

起初，纸书同帛书一样，是卷轴式。纸书逐步代替简策和帛书，到隋唐而达到极盛时期。它的生产方法是手写，虽说雕板印刷于唐代已发明，但尚未推广。《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有篇、卷之分，称篇者为简策，称卷者为帛书，纸写本继承了帛书的形式，所以这个时期亦可称为卷轴时期。

我国是首先发明纸的国家。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扩大生产则要到东汉蔡伦改进、推广以后。但东汉一代，甚至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少数贵族、文士尚有贵素贱纸的风气，南北朝以后纸书才普遍推广。

魏晋时期，由于书籍的发展，公私藏书极为丰富。隋文帝时政府向民间搜求异书，校写完毕，原书归还，并每卷赏绢一匹。政府召集全国字写得好的人抄录书籍，凡三万余卷。唐玄宗时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书籍。又佛教自两汉传入，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达到极盛。按照佛教教义，传播佛经功德无量，所以自西晋以来，佛寺和教徒尽力抄写经书，广为流传，而雕板印刷之首先就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这不是偶然的。

从五代至清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属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虽然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但在书籍发展史上却是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印刷术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方法，并且有了辉煌的发展。书籍的形式已定型为册叶，并且经过发展而达到线装的形式。1900年敦煌发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年)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物。印刷术从我国传播到东方国家，已有更早的实物发现，一为 770 年左右的日本刻《陀罗尼经》，一为 704—751 年间新罗刻的《陀罗尼经》。这都足以说明，我国雕板印刷的发明，可以上推到初唐。雕板印刷发明之初，主要印历书和佛经，到五代后唐时宰相冯道建议刻印儒家九经，而于后周时完成，从此各级政府官署都以刻印经史书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对书籍的刊印出版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印刷书籍的盛行，印刷术也不断改进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北宋仁宗时毕昇发明泥活字，元王祜又创造木活字，使我国印刷事业又从雕板印刷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明代除木活字外，还使用铜活字和锡活字。另外，发明于元末而盛行于明中叶以后的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都为我国刻书事业的重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过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但我国书籍出版还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的手工业印刷术逐步为机械化印刷术所代替，册叶制度虽然还保持着，而书籍的形式已由线装变为平装和精装。这样，书籍印刷过程加快了，书籍形式又改变得更便于阅读和收藏，随着科学门类的日益增多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有所提高，出版书籍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增加起来。当然，其中确有大量好书，但反映这段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腐朽性的糟粕之类出版物也不少。

## 二、书目的产生和图书六分法

春秋以前，由于书籍尚处于发生时期，数量有限，当然没有必要编制书目。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学派的崛起，图书的增多，这才使划分学派和依学派而将学术思想或图书进行分类，其中包括编制书目等等工作，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以六艺分科教授学生，可以说是我国进行学术思想分类的开始。《庄子·天下篇》分诸子百家为七派，评论颇有见地。《荀子·正名篇》关于“究名实”、“辨同异”的论述，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等，应是我国较早的分类原理。荀况的《非十二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等篇，都对学派进行了具体分类。而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派之特点和相互关系，论述尤为精到，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学术分类的一个总结。所以梁启超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彙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鹭，自司马谈始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

分类学在科学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能指导研究的途径，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虽有所不同，但就我国古代来

说，二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书目，也是我国目录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即以司马谈所分六家为主类，益以纵横等家，就是很好的证明。

《隋书·经籍志》认为我国目录的体制起源于《诗》、《书》的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见《簿录篇》小序）

《诗》、《书》的序是否孔子所作，这早已成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它和司马迁《史记》、扬雄《法言》的自序一样，分释各篇的旨意，是一种图书的目录，也是我国目录的最早体制之一。

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下法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的意见，这种全国范围的行动，倘若政府没有图书分类目录下达，即没有目录以为纲纪，吏民势将无所适从。所以，仅从这个法令加以分析，也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了图书分类目录的编制。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记·萧何传》：“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与秦代焚书相反，汉初采取重视收藏图书的政策，按理来说，也要对图书编目登记，做一些最必要的目录工作。另据《史记》、《汉书》的记载，高祖时尝令萧何次律令，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对有关图书显然要进行审校和整理，这无疑为西汉初年大规模的官校书籍的一个创举。

自文帝、景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了武帝时候，国力已相当强盛。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文化上推行崇儒术、黜百家的方针，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当时为配合抗击匈奴等军事上的需要，又让杨仆进一步整理兵书，“纪奏《兵录》”。到了成帝时候，“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部书，都由刘向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给成帝等阅览，所谓“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当时曾把这些提要另写一份，汇编成《别录》一书，这便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书目。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受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他在《别录》的基础上，对序录删繁就简，进一步将全国图书详加分类，编成《七略》一书。前面所说《诗》、《书》的序，乃是一书之目录，杨仆之《兵录》，为兵法一类书籍的总目，《七略》则是校理全国图书而编成的综合性的群书目录。

《七略》有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其中集略为后列六略的总序及总目，所以实际上只分六大类。我国古代图书主要有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

刘向、刘歆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写成定本和分类编目等程序，并且写了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工作是艰巨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七略》，它不只是一部目录学的巨制，同时也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以当时政府丰富的藏书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先秦以来有关学术思想分类，校理和序录图书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先秦至西汉中期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时期，那么西汉末年刘氏父子在校书编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就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正式建立，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宋郑樵、清章学诚等对《七略》均有所批评。诚然，《七略》所分类目并非尽善尽美，但初创之际，能有如此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不足的地方，后人自应求得不断的改进，而不能苛求于古人！

《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唐代已佚失。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即删改《别录》、《七略》而编成，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著录式书目，也是第一部史志书目。由于史书体裁和篇幅的限制，班固删掉了刘书大量的叙录，又把《集略》分割开来，属于总论性质的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小序则分别置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增加了刘向、扬雄、杜林等人的著作，在细目和具体归类方面有所变通和改进，特别是注明“出”、“省”、“入”若干篇，以示更动之处，态度较为严谨。唐刘知几批评他“因人成事”，然而《别录》、《七略》以及汉代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均赖班志而可考见其梗概，其功似不可没。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当然不光是对《汉书·艺文志》的推崇，而是对刘向以来所建立的目录学的重视和肯定。

### 三、书目的发展和四部分类法

自《七略》创图书六分法，历东汉、三国基本上沿用不改，可算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的第一个时期，亦即目录学的成立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战乱和政局的波动，地主阶级中间较为普遍的产生一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倾向。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那就是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促成玄学和佛、道二教的兴盛。在史学方面，因受《史记》、《汉书》的影响，私家修史的风气极为盛行，史部著作明显地增多，其中与“门阀制度”多少相联系的人物传记、氏族谱以及地方志书的大量涌现，尤为突出。文学方面，五言诗的兴起，骈体文的发展，诗文集和文艺理论著作的出现，也突破了诗赋的范围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凡此种种，不能不反映到图书分类中来，给编纂目录提出新的课题。

魏秘书郎郑默所制之《中经》，仅仅“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尚未于《七略》之外另创新的分类法。至晋“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甲部即《七略》之六艺略，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等四略，丙部由六艺中《春秋》类目所附史书扩大而成，丁部即诗赋略，增以图赞和汲冢新发现的古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四部区分图书的分类目录，也是在《七略》体制上加以改进、创新的最初尝试。

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的次第，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由此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为东晋以后十余部官修书目所沿用。

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综合《七志》和《文德殿四部目录》撰成《七录》，这是官修书目发展的同时，个别学者探索新分类法的典型。《七录》十二卷，分内外篇：内篇是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五录；外篇是佛录和道录。《七志》、《七录》等书早已失传，但《七录》序被保留下来，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另外，由于佛经的增多，道安尝撰《综理众经目录》，其后僧佑增辑成《出三藏记集》。前书佚失，后书保存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

唐宋时期，文化极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各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也随之发展而演变。

唐魏徵等根据当时政府的藏书，参考了《汉书·艺文志》和《七志》、《七录》等书，把图书删并为四部四十七类，并直接冠以经、史、子、集的名称，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史志书目。它依班志的体裁且有所补阙，首有总叙一篇，四部有后叙四篇，分类有小序四十篇，道、佛叙二篇，末有后叙一篇，合共四十八篇。它是研究唐以前学术源流及其演变，以及刘宋至隋图书概况的重要文献。

魏晋以来至《隋书·经籍志》所完成的图书四分法，直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为历代公私书目所采用，成为目录学史的主要潮流，这便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事业的第二个时期，即目录学的发展时期。

刘知几批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重复”、“汗漫”，认为史书不必撰《艺文志》或《经籍志》，就是撰的话，断代史也不应该兼收前代遗书，所以他的结论是：“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史通·书志篇》）我们今天从查考古代图书的流传和学术的演变来看，当然完全可以责之以“偏激”二字。但从编纂体例包括具体分类来说，无论《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也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刘知几在《六家篇》中，以《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与《左传》、《国语》、



《史记》、《汉书》并列为史，《春秋》与《左传》也各为一家而不分主辅，这种“援经入史”的主张恰好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针锋相对；他在《杂说》、《申左》特别是《疑古》、《惑经》等篇中又对儒家经典多方抨击。凡此种种，使我们多少能领略“必不能去，当变其体”的真意。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意见又不无进步意义。

《隋书·经籍志》以后，唐、宋、明、清诸史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都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而编成，故兼收前代遗书；《明史·艺文志》改为专收一朝之著述，《清史稿·艺文志》仍其旧，这种形式的改变应是受刘知几的影响，但在分类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除史志书目外，唐宋以来还出现不少有名的官私书目。官修书目如唐元行冲、殷践猷、毋斐等编的《群书四部录》，毋斐在此基础上单独改编的《古今书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等，都是极有名著作，有些史志书目即以上述书目为蓝本。今三书并佚。私家书目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是有名的解題书目。明清两代私家书目甚多，张廷玉进呈的《明史·艺文志》实即王鸿绪的《明史·艺文志》，而王书即依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改而成。这些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但随着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许多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在《百川书志》等私家书目中就有所反映。

清乾隆时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一部最大的图书目录，也是沿用《隋书·经籍志》所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一个总结性目录。直到今天一些图书馆关于古籍的分类，仍然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它是配合《四库全书》禁毁、删节、窜改古籍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部官修书目，所以在收编《四库全书》时，凡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书籍谓之曰“违碍书籍”而均予禁毁，不准流传，《总目》也不著录。在《总目》凡例中，又规定了这样一条著录原则：“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掇击必严。”因此，象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的著作倍受诽谤和攻击就不言而喻了。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合共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另有总序和小序，有些子目附有简短的按语。它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古籍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以及著者事迹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图谱二略记载了历代书籍和图谱，校讎略则是一篇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元马端临根据历代官

修目录、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广泛辑录有关图书资料，对各种学术源流和图书的内容得失均有论述，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志》之上。

目录之学，目录之书，虽然很早就有，但正式称目录学并指出它的重要性，却始于清乾隆时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该书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江藩也说：“目录者，本以定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见《师郑堂集》）王鸣盛等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目录学方面并没有具体的建树。介乎王江二氏之间的章学诚，是清代的进步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的《校雠通义》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是他对目录学的总的见解。章学诚关于目录学方面的理论，如提出“互著”、“别裁”之法，以及关于分类方面由《七略》必然发展到四部的进化论，是在我国目录学长期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批判地继承。

#### 四、近代以来的目录学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与此同时，一方面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书报、书目大量发行；另一方面，逆时代潮流的旧学书目继续争夺文化阵地，斗争极其复杂。

值得珍视的是，从1852年起，太平天国革命政府随同《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官书的颁行，在书前附印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向广大官兵宣传指导革命斗争的官书，动员他们学习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政策和革命理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和太平天国官书一起，起到了动员、指导广大官兵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

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时编了一个《书目答问》，这是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历来被看作指导读书门径的有用的导读书目，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它是以封建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抵制近代新学而编制的。1893年袁昶增订重刊了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这是《书目答问》之后继续诱劝青年学生埋头故纸堆和阻碍新学传播的又一代表作。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于1889年编《泰西著述考》，介绍自明末利玛窦起至清初诸来华传教士所著译书籍，目的是为了提倡西学，有一些特色。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使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就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之

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也同时高涨，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改良运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介绍了甲午战争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出版的西书三百多种，并附有《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可作为1895年以前二十余年间翻译的西书总目录。1896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介绍到中国，对翻译日本书籍风气的兴起颇有影响。显然，康梁的书目，都是为宣传维新变法作思想准备。

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苏报》、《民报》上相继开辟了“新书介绍”专栏，着重介绍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图书；《国粹学报》上也设有“介绍遗书栏”，着重介绍有关民族主义思想的旧书。1904年出版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开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先例。它混合新旧图书为一编，分学、政两部，每部各分二十四类，共三三二个子目，这是创造新的图书分类体制的初步尝试。其后在“五四”前后输入了欧美各国的图书分类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杜威完全用号码代替部类的“十进分类法”。

“五四”时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书目发展的同时，胡适抛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引诱青年“尊孔读经”，受到鲁迅先生的严厉批判。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现代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和宣传革命书刊的书目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化出版事业的破坏、摧残进行不懈的斗争得来的。而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与迫害和谋杀革命作家、捣毁进步的出版发行机构、推行出版审查制度等罪恶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和日伪法西斯政权还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书目录，从事文化围剿并妄图以此扼杀革命事业。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学者和出版机构的努力，也还编印了不少综合性书目、专科书目和索引。如平心的《生活全国总书目》，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编的《图书总目》和《现存书目》，以及郑振铎、阿英、孙楷第等的小说、戏曲、文学目录，胡厚宣的甲骨学目录，朱士嘉的地方志目录，何多源的参考工具书目录等等，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另外，我国学者在试用和改进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1927年以前出版的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陈天鸿的《中外一贯图书分类法》，查修的《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1928年后则有商务印书馆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施廷镛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何日章、袁涌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等十余种，都是仿杜、辅杜以至混合中西的分类法。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同样有较大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专著，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讲义》，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

学》，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刘咸炘的《目录学》，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目录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书目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服务的方向，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旧时代的目录事业已不能同日而语。

《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及各大型图书馆的书目或联合目录、各类专科专题目录的编纂出版，历代艺文志和官私书目以及各种目录学专著的重版重印，对杜威等资产阶级学者的分类法的分析批判，和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建立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尝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在从事“目录学”、“专科目录学”课程建设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且用新的观点编出了《目录学讲义》、《普通目录学讲义》等专著，凡此等等，都使我国的目录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全国总书目》是全国综合性的国家登记书目，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把《全国新书目》每年汇编起来的作用。1949—54年本分为分类总目录和专门总目录两部分。分类总目录采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分类法，在子目方面有所调整和补充；专门总目录部分根据图书具体情况进行分类。1955年本将人大分类法扩展为十九大类，以后历年又有所修改，1960年增为二十二大类。《全国总书目》记录和反映每年全国出版及发行图书的基本情况，可供出版发行部门、图书馆采购编目等业务部门作参考，也可供广大读者查考图书之用。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也是一个规模巨大而极有意义的工作，1959—62年已出古籍部分1—3册，对于查找现存古书极为有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诚是新中国目录事业中的一大成就。最近，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制善本书目。今后，如能编制一部完整的、以单行本为主体的现存古籍总目，再编制一部完整的近代平装书的目录，那将对学术研究提供更大的便利和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蔡尚思撰《中国文化史要论》，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该书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若干人物和图书，可视作青年的导读书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出版了两部新的图书分类法，已逐步为一些图书馆和藏书单位所采用，它为今后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编目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部分类法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编辑组编，科学文献出版社1975年6月出版的《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由北京图书馆等三十六个单位参加编纂，于1975年10月正式出版。全书首先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进而分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个基本部类。然后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编制二十二

大类：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B 哲学，C 社会科学总论，D 政治，E 军事，F 经济，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 语言、文字，I 文学，J 艺术，K 历史、地理，N 自然科学总论，O 数理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 医药、卫生，S 农业、林业，T 工业技术，U 交通运输，V 航空、宇宙飞行，X 环境科学，Z 综合性图书。大类下再分小类，共约四万个类目。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只限国内发行）是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科学技术文献资料的需要进行加细和适当修订而成。它可供科技情报单位和图书馆分书、分资料用，同时亦可供科技情报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参考。考虑到全国图书资料统一分类和编目的需要，其编制体系、结构、类目设置和标记符号都与《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的修订稿相一致，即全书分为二十二个大类，共约四万个类目。但为照顾综合与专业的需要和学科交叉重复等问题，该书在编制过程中适当地采用了交替、参见、复分和组配等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亦增加了一些注释，供分编工作者参考，似较《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更为实用。

总之，它们是最新的适用于全国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单位的大型图书分类法，既可供专业人员分书编目作参考，又可供读者熟悉图书分类以利索书之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可以预期，今后图书出版和目录事业更为迅猛的发展，将是毫无疑问的。

## 第二节 怎样查找书籍

查找书籍，一定要利用书目。书目的种类很多。按照编制目的和用途，它可划分为登记书目、通报书目、参考书目、推荐书目四种基本类型。从内容范围划分，可分综合性书目、专科或专题书目。从收藏方面来分，有公藏书目、私家藏书目录。从编排方法来分，有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主题目录等等。有些书目，因为兼具多种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以同时加它几种名称，如《全国总书目》是登记书目，又是综合性书目，也是书名和分类目录。总之，书目很复杂，名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一般读者关心的是怎样查找书籍，重点在各类书目的具体应用，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下面试从六个方面加以介绍。

### 一、按时代顺序查考古今著述

（1）查考先秦至清代著述，了解图书的流传经过，和研究古代学术发展概况等等，可以利用正史和《通志》、《文献通考》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历代其它官私书目。

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并参考了其它官私书目而编成的综合性书目，又叫史志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宋史·艺文志》，它们的编纂方法都是古今典籍一并收录，《明史·艺文志》则开始只记当代人的著述，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汉书·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有叙有论，对于学术思想的演变有所揭示，《隋书·经籍志》仿其体例且有所补阙，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其它史志书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都没有下功夫，遂使学术源流多不可考，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六分法的代表作；《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是四分法的代表作，其共同倾向是尊重儒家经典，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三点。

商务印书馆 1955 年起重新排印《十史艺文经籍志》，已出《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艺文合志》、《补五代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辽金元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七本，因为是新印的平装或精装本，书后有的还附编四角号码书名和著者索引，使用极为方便。现分别介绍如下：

《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商务印书馆 1955 年印，1965 年重版。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目录文献。共分六略，收书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略有总序，每家之后有小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作了简明的叙述。

本书初版，根据《八史经籍志》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原本脱漏甚多，此次改排重印，都已校补，并加新式标点。书末附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其中收集散佚书目有三百一十七部。自先秦至汉末叶止的古代书目，大致已包括在内。最后有书人名索引。

《隋书经籍志》，（唐）长孙无忌等撰，商务印书馆 1955 年重印。本书收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种，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亡佚书目，以夹注方式依类附入。各部、各类之末，仿照《汉书艺文志》体例，附以总序、小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对于唐以前古籍的品类、流变，主要靠本书的记载而略可考见其大概。

本书初版，据《八史经籍志》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此次重印，据乾隆四年校刊的殿版二十四史本，并参考清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校正脱误，全部标点重排。又节录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书目》作为附录，并编有书名和著者索引。

《唐书经籍艺文合志》，（后晋）刘昫、（宋）欧阳修等撰，商务印书馆 1956 年出版。《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撰述的时代有先后，但著录的书有一大部分是相同的，为便于参考检查，商务把两志合为一编；合并时以旧志为主，分上下两栏，互相对照。又根据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刊

本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及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本作了互校。对《新唐书》也据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嘉祐刊本及北京图书馆所藏明补刻宋刊本，校正了不少脱误。同时将罗士琳等撰写的《旧唐书校勘记》中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卷（即经籍志部分）作为附录，以便参阅，末附四角号码书人名人名综合索引。

除汉志、隋志外，它是现存较完整的史志书目；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唐朝的著述和古书概况，以及古籍至唐代散佚的情形。

《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1）元脱脱等修《宋史艺文志》；（2）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订《宋史艺文志补》；（3）宋时官修，清徐松、叶德辉、赵士炜辑考之书目五种，即《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宋国史艺文志》，作为附编。书后附四角号码综合索引。

《辽金元史艺文志》，（清）倪灿、黄虞稷、钱大昕等撰，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出版。

辽金元三史原先都没有纂修艺文志，商务印书馆把清人补撰的三朝史志书目如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十四种，汇为一编，分朝排列，末附索引，甚便检查。

《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清）黄虞稷原稿，王鸿绪、张廷玉等删定；商务印书馆 1955 年出版，分上、下二册。

清初黄虞稷在明史馆撰修艺文志，后因故离馆便将所编艺文志以《千顷堂书目》之名刊行。黄氏书目，在明人书后附录宋辽金元人著作；王鸿绪删去宋辽金元部分及无卷数之著作，把它收入《明史》，张廷玉进呈的《明史》，其艺文志即采用王氏删定本。

删定后的《明史艺文志》，颇多遗漏，故商务印书馆将清傅维麟《明书经籍志》、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乾隆中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补编，又将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和清宋定国、谢星缠合编的《国史经籍志补》作为附编一并收入。这对于我们今天考查明人著作及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留存情况均有一定的帮助。另外，黄氏原著《千顷堂书目》（见《适园丛书》）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由于过去有些史书没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的即使有，收编也不甚完备，后代学者撰写的补志，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考证》等等，都是极精密的好书，值得我们注意。开明书店所辑《二十五史补编》是专收史书的补表、补志的丛书，其中共收录三十二种艺文经籍补志，这是阅读和研究史志书目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所印《十史艺文经籍志》已收录了一部分，但不完备。现将《二十五史补编》所收三十二种书目列名如下：

（1）《汉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

（2）《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

- (3) 《汉书艺文志条例》八卷首一卷，(清)姚振宗。
- (4) 《汉书艺文志举例》一卷，(民国)孙德谦。
- (5) 《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清)刘光蕡。
- (6) 《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清)钱大昭。
- (7) 《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侯康。
- (8) 《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清)顾怀三。
- (9) 《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
- (10) 《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民国)曾朴。
- (11) 《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
- (12) 《三国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
- (13)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刊误一卷，(民国)丁国钧撰，丁辰注并撰刊误。
- (14) 《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
- (15)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清)秦荣光。
- (16) 《补晋书经籍志》四卷，(民国)吴士鉴。
- (17)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黄逢元。
- (18) 《补宋书艺文志》一卷，聂崇岐。
- (19) 《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陈述。
- (20) 《隋书经籍志补》二卷，张鹏一。
- (21) 《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清)章宗源。
- (22) 《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首一卷，(清)姚振宗。
- (23) 《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徐崇。
- (24) 《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怀三。
- (25) 《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录。
- (26) 《西夏艺文志》一卷，(清)王仁俊。
- (27) 《辽艺文志》一卷，(民国)缪荃孙。
- (28) 《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清)王仁俊。
- (29) 《补辽史艺文志》一卷，黄任恒。
- (30) 《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
- (31) 《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清)倪灿撰，卢文弨录。
- (32) 《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

燕大引得编纂处编《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1933年出版，四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精装三册。这是利用史志书目的极有用的工具书。它将十五种艺文志和五部禁毁书目所收先秦至清末四万余种图书按书名和作者编成综合索引，依中国字度撷法排列，并附笔划检字，甚便检查。现将二十种艺文志或书目列名如下：

- (1) 《汉书艺文志》一卷，(汉)班固(八史经籍志本)。
- (2) 《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适园丛书本》。



- (3) 《三国艺文志》四卷，同上。
- (4) 《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长沙铅印本）。
- (5) 《隋书经籍志》四卷，（唐）长孙无忌等（八史经籍志本）。
- (6) 《旧唐书经籍志》二卷，（后晋）刘昫等（同上）。
- (7) 《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欧阳修等（同上）。
- (8) 《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怀三（广雅丛书本）。
- (9) 《宋史艺文志》八卷，（元）托克托等（八史经籍志本）。
- (10) 《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卢文弨（同上）。
- (11) 《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同上。
- (12) 《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同上）。
- (13) 《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同上）。
- (14) 《明史艺文志》四卷，（清）张廷玉等（同上）。
- (15) 《清史稿艺文志》四卷，朱师辙等（清史稿本）。
- (16) — (19) 《禁书总目》、《全毁书目》、《抽毁书目》、《违碍书目》（咫进斋丛书本）。
- (20) 《征访明季遗书目》，（清）刘世瑗（国粹学报七卷八期）。

《通志》、《续通志》、《清朝通志》中的艺文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也是根据历代官私书目、其中包括上述史志书目而编成，可以和《十史经籍志》合看。

此外，历代官私书目也可参考。由于多数官修书目已为史书和《通志》、《文献通考》等采用并已失传，这就更加显出上面两类书目的重要性。北宋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有清人辑本）、清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都是有名的官私书目，可以参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以及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等等，因下面还要专门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贩书偶记》二十卷，初版于1936年，线装八册；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精装一册，末附四角号码书人名索引。著者孙殿起原为北京旧书商，但他是个有心人，凡由他过眼经手的图书，都认真登记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版刻年代等等，日积月累编成此书。它收录的绝大部分是有清一代的著述，兼及辛亥革命以后迄于抗战以前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这个书目有两大特点：第一，凡见于《四库全书》的一律不收，如有收录者必卷数、版本有异，故一向被看成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只是没有提要而已；第二，非单刻本不录，间或有在丛书中者，必定是初刻单行本；而《四库全书》以后新出书，本来就是单刻本居多，故又可与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丛书综录》配合看，对查找现存古籍甚有帮助。《贩书偶记》还收录一部分《四库全书》失收的明代人的著作，如卷六《诏令奏议类》下有：“《张文忠公奏对稿》二卷，明张居正撰，李卓吾评选，无刻书年月，约天启间刊。”此书

不仅《四库》不收，其它各种书目亦未见著录，当为研究张居正、李贽的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之一。又有《贩书偶记续编》，为孙殿起遗稿，所收书有七、八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

(2) 查考民国初年至解放以来的著述，可利用下列书目：

杨家骆《图书年鉴》，图书辞典馆 1933 年出版。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图书事业志；下册是 1912—1933 年间全国新书目录，分为总类、哲学、语文学、文学论著、创作文学、翻译文学、艺术论著、教育、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地理等十四类，部分书目下有作者介绍和内容提要。

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 1935 年版。是书收录了 1911—1935 年间出版的新书约二万种，注明其作者（译者）、定价、出版者。书前有分类目，书后附主题索引、洲别国别索引、外国著者人名索引。其著录原则以当代人的著述、译作和单行本图书且尚在书店发售者为主，因此是一本查考 1935 年以前出版的旧平装书的主要工具书，目前尚无别的书目可以代替此书。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印。前书计正编四十四卷，线装二十四册，1933 年出版；补编十二卷，线装六册，1936 年出版。后书分正续编，正编计上下二册，1948 年出版；续编一册，1951 年出版。江苏国学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创建于清末。上述书目由于该馆藏书丰富，著录完善，分类详细，又将线装、平装、丛书本和单行本图书统一编目等优点，一向受到重视，对于今天查考古籍和近代旧的平装书也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重庆市图书馆编，1957、1958 年出版。此书分两辑，第一辑收书一一七五二种，第二辑收书五四八一种，合共一万七千余种。主要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上海、汉口、长沙、桂林、昆明、永安等地出版的图书，老解放区及沦陷区的出版物极少收录，是了解抗战时期国统区国书出版情况的极有用的工具书。

《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1937.7—1949.10），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1961 年编印。

本书收录的图书，绝大部分是解放区、根据地的出版物，也收录了少数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某些进步书籍。这 对我们查找 1937—1949 年的革命文献提供了很大帮助。

查考解放后出版的新书、修订或重印的古旧书籍，主要利用新华书店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的《全国总书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编的《全国新书目》。

《全国总书目》是具有图书年鉴性质的全国综合性目录。其主要作用是记录和反映每年全国各出版社公开出版和发行图书的基本情况，可供个人或出版发行部门参考，也可供图书馆补充图书和进行分类编目时作参考。《全

《全国新书目》最初按年按季出版，后按月出版，之后又改为旬刊。其特点是可以及时反映和报道我国出版事业的成就，借以全面了解我国文化科学发展的现状和便于对外文化交流。但过了若干年回过头来查考解放后的图书出版情况，不及《全国总书目》便利。已经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有以下各本：1949—54年本、1955年本，由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1956年本、1957年本、1958年本、1959年本（上、下册）、1960年本（开始内部发行）、1961年本、1962年本、1963年本、1964年本、1965年本，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续编，中华书局按年度出版；1970年本、1972年本、1973年本、1974年本，由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编，中华书局出版。这两种书目对于我国出版事业和目录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相辅而行。

## 二、如何查找现存古籍

历代史书和官私书目中记录的藏书和著述，由于战乱、水火灾患和反动统治阶级肆意禁毁或不加重视等原因，佚失甚多。所以从艺文志、经籍志或其它书目中查到的书籍，今天不一定都找得到。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和各大型图书馆的古籍书目（包括善本书目），是查找现存古籍的主要工具书。

自南宋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左圭辑刊《百川学海》开始，一直有人把许多重要或难得的典籍汇集刊印成各种丛书，以便于图书的流通、保存和利用。明清以来，此风大盛。不少有价值的古书，单刻本或传钞本已经散失了，往往赖丛书而保留至今。另外，有些丛书，如《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等，收录的图书极为丰富，有些书又是选择善本加以排印或影印，极便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顾元庆《阳山顾氏文房》、胡维新《两京遗编》、沈节甫《纪录汇编》、程荣《汉魏丛书》、吴琯《古今史》，都是明代的佳品。清代刻书事业进一步发展，丛书的汇集刊行也盛极一时，如卢见曾《雅雨堂丛书》出惠栋手，吴騫《拜经楼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出江声、孙星衍、钱坫之手，孙星衍《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又出顾广圻之手，顾修《读画斋丛书》出鲍廷博之手，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出张文虎手，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出谭莹手，蒋凤藻《铁华馆丛书》出叶昌炽手，黎庶昌《古逸丛书》出杨守敬手，这些丛书或搜罗秘本，或校刻精善，为世所推重。

顾修所辑的《汇刻书目》，是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共收丛书二六 种。以后随着丛书的发展，丛书目录也日益增多。但自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问世，其它目录基本上可被取代了。

《中国丛书综录》已出古籍部分三册。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二册1961年出版，第三册1962年出版。它收编了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二七九七种（不包括“新学”和“佛学”），计子目七万多

条，去其重复，得书三八八九一种，是清代以来最精善最完备的丛书目录，可以说我国古代书籍的极大部分都可由此查到；有些书原来就没有单刻本，或者原刻单行本已佚而只有丛书本，更是非查《综录》不可。

《综录》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分汇编和类编两部分。汇编又分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类；类编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后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具有联合目录的性质，极便读者索书。又有《丛书书名索引》，检索所有丛书书名和各丛书中包括数种著作的子目书名；索引上的号码，正体字是《总目分类目录》的页码，斜体字是《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的顺序号。第二册是根据《总目分类目录》所收二七九七种丛书中七万多条子目编成的《子目分类目录》，它以子目为单位，采用四部分类，部下又析为类、属。熟悉四部分类的人可以直接查检此书。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专供检索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之用。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查第三册，根据查出的页码，再翻到第二册，便知某书卷数、作者和收入何种丛中，然后又查第一册了解此丛书的收藏单位，以便前往借阅。

此书对于我们今天查找古籍实是起到指南针的作用，值得向读者推荐。

随便举一个例：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一部《徐霞客游记》（残本），极为珍贵。上有莫绳孙影山草堂图记。查各种专门查考人名的工具书，都无法知道莫绳孙究系何许人？一翻《中国丛书综录》，便见咸丰时目录学家莫友芝撰《影山草堂六种》，其中有二种书是同治年间莫绳孙所刊。只此便得到一个线索，使我们知道《影山草堂》为莫氏书室名，莫绳孙当是莫友芝的后人（绳孙、绳武等均为莫友芝之子）。这说明《综录》有着多方面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编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编的《四部备要》，是解放前出版的三部规模很大的丛书。这三种丛书都有目录。《四部丛刊书录》、《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是版本记录和解题的书目，留待后面再作介绍。这里讲一讲《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的用处。

商务印书馆早在 1935—37 年间，将一百部较重要的丛书所收四一七种图书，排印或影印成“丛书之丛书”，定名为《丛书集成（初编）》。由于此书一般大型和中型图书馆都收藏，被它所收录的图书，或系难得的秘本，或出名家之手，校刻精善，又印成三九九九册小的平装本，翻阅很方便，所以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如宋代有名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宋刊本国内久佚不存，《四库》著录据浙江汪氏所进钞本，缺江南西道七卷（一一三至一一九），乾嘉间江西万氏、乐氏面刊本更缺河南道第四这一卷。光绪七年（1881 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受杨守敬委托向日本借得宋槧残本影印了《太平寰宇记》六卷（一一三至一一八），收入黎编杨校《古逸丛书》中，《丛书集成（初编）》即予以收录。类似的例子很多，这说明一些不易得到的古书，往往在该丛书中可以找到。而 1960 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重新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可以直接查到三九九九册书的

顺序号，读者应加利用。又《丛书集成》中排印本错字较多，断句也有错误，影印本据善本印制，较排印本优良，读者亦需注意。

前面提到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也可供查找现存古籍之用。《总目》的特点是：（1）既收了单刻本，（2）也收了丛书本，而丛书中的子目是与单刻本混列的。所以它既具有《丛书综录》之长（只是收书不及《综录》齐全），又补了《综录》之缺（《综录》不收单刻本）。但《现存书目》没有把丛书子目混列在内，已失去线装本《总目》之所长。

解放后全国各藏书单位编印了许多书目，对于我们查找和利用现存古籍及其它藏书，是又一种重要而且是更为直接的工具书。仅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1956年至1959年，先后编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初稿》一至六册，1960年又续编《补编》一册，对教学科研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其他图书馆编印的书目，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60年编印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上册（经部、初稿附书名索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57年编印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书目第一种》等等，实在不胜举，读者可根据需要，找就近藏书单位的目录加以利用。

顺便说一下，由于一些大型图书馆的藏书极为丰富，特别是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藏书多达几百万册，不可能全部及时编印书目。已经出版的书目，即使偏重古籍方面，往往也只是藏书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要了解全部古籍（包括平装书流传和收藏情况），还必须查他们编制的目录卡。目录卡一般分书名卡、作者卡、分类卡等类型，读者可从不同角度查找自己需要的图书，这是没有刊印成册的工具书，也叫“卡片式书目”，其特点是完整和及时反映各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应特别加以重视。另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日本荒松雄等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3年版。书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新学部六大类。该所藏书丰富，可供查找日本收藏我国古籍之用。

### 三、查古籍的版本、内容及其评价

有些古书，不管是否准备借来阅读，如果想先了解一下它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著述体例、内容得失和作者生平等等，可查清乾隆时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书目，有些知见书目或关于图书的序跋题记亦可供利用。

“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多种，叫做“著录书”，另有六千多种没有收进去，但列有书目，叫做“存目书”；两类书共计一万余种，每一部书都写一篇提要，合起来就成为两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被收录，因此它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

由于《总目》卷帙浩繁，不便翻检，又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除了不收存目以外，提要也删繁就简，仅占原有篇幅的十分之一。鲁迅先生指出《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对我们辩证地看待《总目》及《简明目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方面，该书的立场、观点，包括治学方法上陷入琐屑的字句考证等缺点，读者使用时应予以注意；另一方面，参加编写提要的人象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他们对于书籍的批评考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因此又很有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 1965 年新印本《四库全书总目》（精装一册），补录了《四库撤燬书提要》，又将阮元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作为附录予以收编，书后且附有四角号码书名及著者索引；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编有索引，极便使用。原燕大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可作为检索大东书局本及其它版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用。

由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阮元撰傅以礼重编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胡玉缙撰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等等，对《总目》或《简明目录》作了补阙、匡谬的工作，杨家骆予以重新编排，使它成为易于查找的辞典形式即《四库全书大辞典》、《四库全书学典》，都可以作为阅读和使用四库目录的重要参考材料。

《四库简明目当标注》二十卷，撰于咸丰时，中华书局 1959 年出增订本，题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书对《四库简明目录》著录的书籍（包括其它书籍）加以批注，标明撰者、卷数和各种版本，并将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诸家有关版的批注，逐条移录于各书之后的附录中，它和莫友芝的《燬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两部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工具书。古书经过辗转传钞翻刻，往往讹误很多，必须取不同版本比勘校订。后出的关于查检版本的书目，多数抄自邵、莫二目；张之洞原著、范希曾补正的《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 1963 年新印，有所补阙，值得参考。

解题书目、知见书目和题跋鉴赏一类书目，都可解决版本方面的问题。除上述已举出的几种重要书目外，他如《遂初堂书目》、《得月楼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述古堂书目》、《天禄琳琅书目》、以及《士礼居题跋记》、《菴圃藏书题识》、《思适斋题跋》、《绛云楼题跋》、《海源阁楹书隅录》、《善本书室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皕宋楼藏书志》等，均可资参证。

胡玉缙撰、王欣夫辑，中华书局 1962 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下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作了不少匡谬补阙的工作，余嘉锡著、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四库提要辨证》（精

装一册，平装分为三册），也对《总目》中的讹误与遗失之处作了辨证与考订，都可供阅读和使用四库目录时参考。

《四库全书总目》为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先出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后出的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书，或撰提要，或写题识和考证，体例大致相近，均是查考古籍版刻、内容等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宋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收入《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三编和《万有文库》二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武英殿聚珍本、江苏书局本、《万有文库》本、《丛书集成》本。这是两部最早的私人藏书题跋。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经籍考》，即以晁、陈二目为主要依据；后世把目录学称为晁陈之学，更足见他们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可惜二书未加整理重印，使用不甚方便。

《郑堂读书记》（附补逸），清周中孚撰，商务印书馆 1940 年初版，1959 年重印时改正了排印的错误，并补刊总目，未又增附书名和著者索引。全书精装三册。它是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而编写，分经、史、子、集四部，约计四十一类，共收书四千余种。其评论著者得失、考辨古书真伪等，均甚邃密。

《越缦堂读书记》，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出版，精装二册。是书所记各书，都是作者真正读过的，非转钞他人以讹传讹者可比，又能考订一些史书讹舛疏失，其中不乏创见，参考价值实在《郑堂读书记》之上。但其中也不乏儒家的陈腐观点，特别是李之日记是立意给后人看的，有很多做作的地方。鲁迅曾指出其缺点：“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吧？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了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见《三闲集·怎么写》）

旧的解题、题跋数量很多，散见各书，检查极难。丁福保等收集晁、陈以来各种读书志、藏书志、题跋及散见各文集中之序跋、书后等达二千余卷，著录之书约二万种，编成一部古籍解题的汇编式书目《四部书目总录》，未刊行。解放后由周云青重新整理，改名《四部总录》，由商务印书馆分编出版，已出医药、天文、算法、艺术四编（线装本），书后有书人名索引。又《四部丛刊书录》是版本记录式的书目，《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是解题式书目，对了解见于《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两种大型丛书中的图书很有帮助。

此外，如王念孙著《读书杂志》，王引之著《经义述闻》，专门考订古书文字之颠倒、夺误，有时亦解释词义，这是考订书目中的代表作。王氏父子是清代有名的学者，治学谨严，精通声韵训诂，上述两书，读古书时宜加参考。

这里简单的再讲一讲善本书的问题。善本之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当时无印本，所以叫“善书”。宋代以来，学者议论“善本”及其界说渐多。清张之洞认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钞）。”张氏关于善本的定义基本上是可取的。钱塘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编辑条例列举构成善本条件有四点，对张氏又有所补充。宋元刻本，今天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善本。明末书坊粗制滥造，所以清代藏书家多以嘉靖为断限，对万历以后则选取极为严格，是有一定道理的。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多半是钞本；清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钞宋元精本。以上各家之书，善本居多。校勘之学，乾嘉达于极盛，凡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尧圃、阳湖孙星衍等人之手，补脱文，正误字，其书尤为精审，当然应是善本。总之，不能单以时间为断；清代精校精刻及抄本之善者，均可列为善本。

读者要想知道传世古书而于普通书目查不到时，应知利用善本书目。

清莫友芝撰、莫绳孙编《宋元旧本经眼录》，同治十二年独山莫氏《影山草堂六种》本，为旧善本书目之最有名者。但旧的读书志、藏书志、善本书目，仅能供研讨图书版本时作参考，对今天要查阅利用善本书则意义不大，因为那里提及的书往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则已经佚失；而传世者又多半已入各公家图书馆，少量流散于私人，亦辗转易手。我们要查阅善本书，主要得查近代以来各大中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例如：《故宫善本书目》，张允亮编，1934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赵万里编，1933年北平图书馆木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卷，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1957年版；《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年编印。

有些图书馆没有编善本目录，或编目后又搜集到新的善本，读者可径向有关单位查阅。

#### 四、查禁书、伪书

（1）查禁书的工具书，有《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以及国民党查禁书目多种。

秦始皇时下令烧毁儒家经典和六国史记，是古代统治阶级禁毁图书的典型事例。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蔡邕要躲在纱帐里读，虽不见明令禁止，亦可见该书不受统治者所欢迎。刘宋、隋、唐、宋、元各代，皆有禁书之令。清雍正时屡兴文字狱，禁书甚多。乾隆时为了遏制反清的民族意识，利用纂修《四库全书》之便，曾下令查禁和销毁一部分图书。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诏



书中说得明白：“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据有人统计，当时在于销毁之列者，竟达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乎与收入四库者相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姚觐元编、邓实补遗，包括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与补遗，它和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同是查考清代禁毁书籍的主要工具书。商务印书馆 1957 年出版二书的合订本，且附书人名索引，使用极为方便。

吴慰祖校订、商务印书馆 1960 年出版的《四库采进书目》（原名《各省进呈书目》），亦可参考。因为《四库采进书目》中所列进呈的书，都在《四库提要》成书以前，所以许多禁毁的书尚能编入目录，关于书名、卷数、本数、作者、籍贯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可以补正清代禁毁书目所未备。

王晓传辑录、作家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因果报应四编，附录几种被禁毁的“淫词小说”书目。这是查考元明清禁毁小说、戏曲的有用工具书。

国民党反动派发布的许多禁书目录（见收于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诸编），这是反动政府实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证，也可因此考见若干革命和进步书刊。但其中也包括一些反革命的国家主义派和托派出版的书刊，应予以注意。

## （2）查伪书的工具书。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这便是最早怀疑古书的一种记载。西汉末年学术界起了今古文之争，使辨伪的风气大为滋长。《汉书·艺文志》依刘氏体例，于一部分书后加注“似伪托也”，这是辨伪工作在目录学上的正式反映。唐刘知几著《疑古》、《惑经》等篇，直接攻击五经和上古之书真伪不分、贻惑后世，是魏晋以来辨伪学衰微已久之后发表的非常大胆的见解。此后柳宗元断定部分子书为伪书，赵匡、啖助对《春秋》的研究已不墨守师法，使辨伪风气继续保持下去。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南宋朱熹、叶适等人，都重视自由研究，对经书和诸子百家大胆怀疑，成绩又超过前代。如王安石否定《春秋》、司马光之怀疑《孟子》，可算是很突出的例子。明宋濂、梅鹗等在辨伪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而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是第一部辨伪专著。胡氏所辨古书意见虽不一定正确，仅可供参考，但在理论分析方面有深刻的见解，确定了许多原理原则，使辨伪学正式成为一种学问。清阎若璩、惠栋之否定《古文尚书》，胡渭之否定宋代《易》学，均很有名。此外，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崔述的《考信录》，直到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张心澂的《伪书通考》等等，都是重要的辨伪书。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开讲古书辨伪问题，其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整理笔记，用语体编写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由中华书局于 1955 年出版，尤便初学。张舜徽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认为该书“所举条例很清晰，而论证很平实，初学

辨识伪书，必由此入门”。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有五章，即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分论则分别讨论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及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的真伪及成书年代，附论子书五种（本草、素问、灵枢、甲乙经、阴符经）。总之，这是一部辨伪学方面的理论性专著，也涉及不少古书的真伪或成书年代问题，又提出伪书不伪论，即伪书的作者和年代虽是伪托的，但伪书是客观存在，也反映了著述当时的社会情况等，见解精辟，值得读者首先加以重视。

张心澂编《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1954年新版，1957年又出修订本，分上下两册，附有四角号码书名索引。这是一部近乎总结性的辨伪书目，把前人关于辨伪的专著和论文，以及一些分散在各方面的考订成果，收集起来，间附编者按语，辨及之书共达一一四部之多，极有参考价值。

顾颉刚编《辨伪丛刊》，北平朴社1933年分册出版，中华书局1955年重版，合订一册，改名《古籍考辨丛刊第一辑》。计收古代辨伪著作十种，分三类：（1）通论四种，即张西堂辑《唐人辨伪集语》、白寿彝辑《朱熹辨伪书语》、明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清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2）经学三种，宋王柏著《诗疑》、顾颉刚辑《书序辨》、清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子学三种，赵贞信辑《论语辨》、宋高似孙著《子略》、明宋濂著《诸子辨》。

又顾颉刚、罗根泽等编著并由朴社分册出版的《古史辨》，收编当代人关于辨伪方面的论文，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谓“此书集疑古之大成。顾氏在考史方面，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见解，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所考证甚多穿凿，而识解颇新颖。学者可参考。”

## 五、查地方文献

查地方文献，可利用地方文献书目。地方文献书目反映一个地区的著述情况，是研究地区文化发展的有用工具书。

此类著作，始于北齐、北周之间。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虽兼具传记、方志之体制，然专录一方人士之著作，实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专撰一书以述一方著作者，始于明万历年间祁承 之《两浙著作考》等，惜无传本。传世者当推明末曹学佺之《蜀中著作记》。曹氏曾任四川按察使，熟于四川文献，其书凡十二卷，见《千顷堂书目》；残本四卷，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

各省通志和府州县志，其中有仿宋高似孙《剡录》之体例，兼收著述，

名为《艺文志》或《经籍志》，读者可根据这个线索，找有关方志查检。（近人李濂堂撰《方志艺文志汇目》，颇便寻检，见《图书馆学季刊》七卷二期）。

清代以来至解放前，私家撰述之地方文献目录，多出当地知名学者之手，收书丰富，著录详实，考订精审，别有特色。如：徐世昌《清畿辅书征》四十一卷，天津徐氏刊本，收清代河北人士著作四千余种；金毓黻《辽海书征》六卷，1942年辽阳金氏石印本；清金武祥《江阴艺文志》二卷，粟香室丛书本；张骥编《清代毗陵书目》，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印，收清代武进、阳湖两县人著作三千种左右；丁祖荫《常熟艺文志》一卷，民国排印本；孙祖基《无锡先哲遗书书目》，1941年无锡孙氏玉鉴堂铅印本；清姚福均《海虞艺文志》六卷，光绪二十三年刊本；清吴庆坻《杭州艺文志》十卷，光绪三十四年长沙刊本；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仿马端临《文献通考》、朱彝尊《经义考》体例，全录各书之序跋，每书之后间加按语考证，1921年浙江书局刊本；项元勋《台州经籍志》四十卷，浙江图书馆活字本，收隋至近代台州人士著作四千余种，取材丰富，考订颇精；胡宗楙《金华经籍志》二十七卷，富于条理，1925年梦选楼刊本；陈准《山左先哲遗书提要》，瑞安仿古印书局排印本；陆惟燾《平湖经籍志》八卷，1938年平湖陆氏求是斋刊本；清郑元庆《湖录经籍考》六卷，1920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吴兴丛书本；李权《钟祥艺文志》二卷，钟祥李氏活字本；清张宗泰《中州集略》六卷，1929年张沅铅印本，收汉至元各代河南人士文学作品四四五部；《中州艺文录》四十二卷，1935年经川图书馆刊本，收河南各县明清两代一八七四人之著作；蒙启鹏《广西近代经籍志》七卷，1934年南宁蒙氏铅印本；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1944年云南大学出版。

解放后一些图书馆所编地方文献目录，因可直接据以找来阅读，尤为重要。如安徽省图书馆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安徽文献书目》，收录安徽历代作者约千七百人的近四千种著述，按时代顺序排列。如欲查考春秋战国时管子学派、汉魏时曹氏父子和清代桐城派方苞、姚鼐以及戴名世、戴震等人的作品，都可参考这个目录。不过，此目虽为安徽省图书馆、博物馆和安庆、桐城、歙县等图书馆五个单位的联合书目，却限于馆藏，收录仍然不够完备，所以应参考其他大型图书馆书目予以增补。此外，青岛市图书馆1956年编印的《馆藏明清两代山东人著作书目》，南京博物院1957年编印的《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藏南京文献目录、南京掌故书目》，甘肃省图书馆等1957年编印的《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书目》，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主编、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1959年出版的《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都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 六、按专科查找书籍

查找文史书籍，除了前面介绍的综合类书目可以利用外，还有不少

专科或专题书目可供利用。这些目录的使用价值很高，对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更能提供直接的帮助。但这些书目，内部编印而尚未正式出版的居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部详细介绍，只能就正式出版的大部头的工具书或少数较重要的自己编印的目录略予提示。冯秉文编、中华书局 1958 年出版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和各图书馆编的参考工具书目，是目录的目录，希望读者根据这种目录按图索骥，找自己需要的专科或专题书目分别加以利用。

#### (1) 哲学社会科学总类图书

有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 1956 年编《社会科学图书目录》（油印二册），沈阳农学院图书馆 1956 年编《馆藏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图书目录》（油印一册），山东省图书馆 1957 年编《馆藏社会科学图书目录（中文平装书目第 6 种）》（铅印一册）和《馆藏社会科学图书目录（中文平装旧书）》（计划出版，铅印），沈阳农学院图书馆 1956 年编《馆藏语文、文学、艺术、史地图书目录》（油印一册）等等。

另有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译、三联书店 1956 年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目录（1946—1955 年）》，共收入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三九九四种。分哲学、宗教、无神类，政治类，经济类，国际问题类，历史类，地理类，其他类等七个类别。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英）汉默顿编，何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每书前有译者所撰作者小传及书籍解题。

#### (2) 哲学和宗教书籍

查哲学书籍：主要有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辑、1958 年出版的《哲学书籍目录（1949.10—1957.12）》。另据冯文秉《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专科性书目“哲学”栏列有目录三十余种，读者可径自参考。

查宗教书籍：晋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正式奠定佛经目录之基础，但已佚。其后僧佑据以增辑《出三藏记集》，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此后佛经目录代有选辑，至唐智昇《开元释教录》最称完备。宋、元以后，《大藏》刊版多依智昇《开元释教录》为部次，部卷纵有出入，无关大体。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于 1933 年出版《佛藏子目引得》三册，是综合日本 1881—1885 年弘教书院刊大藏经、1902—1905 年藏经书院刊大藏经、1905—1912 年藏经书院刊续藏经、1922—1933 年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刊行大藏经而编成（以大正本为主，其他三种为辅）。引得分三种：撰译者引得，梵音引得，经品名引得。

按历代撰译之佛教经典，基本上汇集于《大藏》、《续藏》之中，所以有此引得，极便检索。

又北宋徽宗时释惟白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是一部极为详细的解题书目，所录之书多至一千零四十九种，《大藏》所收，大半已在；另有清原

居士王古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亦为简明之解题书目。明末清初释智旭撰《阅藏知津》，在分类上有所改进。佛学典籍浩繁，译文又甚隐晦，初涉佛学者，宜先读这类解题目录。这方面，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对读者尤有帮助。

我国战国时就有老、庄“清静无为”之说，司马谈谓之道道家。汉初好黄老之学，但尚未成宗教。后缘佛教传入，东汉末年张陵创为五斗米道，晋葛洪又在理论上加以充实，逐渐形成道教；元魏太武帝宠用道士寇谦之，道教因而大盛。此后，刘宋明帝，唐高宗、玄宗、武宗，宋真宗、徽宗等先后加以崇扬，遂使道教之势力，与佛教及中国传统之儒家鼎足而三；汇集道家经典之《道藏》，亦于宋代完成刊版。刘宋陆修静首撰《灵宝经目》，是为我国第一部道经总目。此后不断有人续修。唐开元中，列道教书籍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七四四卷，其后残缺。宋初遣官校定，得七千余卷；徐铉讐校，去其重复，得三七三卷；大中祥符中，命王钦若依照旧目刊补，得洞真部六二卷，洞玄部一一三卷，洞神部一七二卷，太真部一四七卷，太平部一九二卷，太清部五七六卷，正一部三七卷。凡四四一三卷。元代兴佛灭道，焚毁《道藏》经书。明英宗正统年间重辑《道藏》，神宗万历时又辑《续道藏》，存版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为八国联军烧毁。1923 年起商务印书馆据北京白云观藏明本影印《道藏》，凡一千一百二十册，这是道经的总汇。

翁独健编、燕大引得编纂处 1935 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除《道藏》外，兼收《道藏阙经目录》、《道藏辑要》二书，引得分四种：分类，经名，撰人，史传（史传引得乃道藏中仙道传记之引得）。这是查检道经之重要工具书。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下册，中华书局 1963 年出版，也可以参考。天主教传入较晚，明清之际有韩霖、张赓撰《道学家传》，于各教士传后列举其所著译之书名，附刊于《圣教信教》。瞿颖山《清吟阁书目》有《耶稣会士著述目》一书，清末王韬重撰时改名《泰西著述考》，录明末清初西洋来华教士之著述甚详。以上皆早期天主教之目录。此后，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书馆、北平西什库天主堂遣使会印刷馆都曾编制目录。

基督教输入更晚，但亦有译著目录汇刊，如《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1867 年出版）。此后，1907 年季理斐、1918 年雷振华、1939 年李培廷均有续编，可供查考。

除以上宗教专科书目外，各综合性的书目也都收有宗教书籍，希读者注意。

（3）语言文字：这方面的书目很多，这里仅就甲骨、金石文字和其他较重要的几种语文书目开列于下，以见一斑。《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编，中华书局 1952 年出版。是书为纪念甲骨文发现的五十周年而作，辑录自 1899 年至 1949 年这五十年中有关甲骨学的中、日、英、法、德、俄各种文字的专书书目和论文篇目，共计八七六种，分类编纂，详注出版时

期及版本出处。后附著者、篇名、编年三种索引，极便检查。编者是专治甲骨学商代史的著名学者，这本目录搜罗完备，分类详细，是研究甲骨学及古代史、古文字学方面的一本很有用的工具书。

《殷虚卜辞综述》（附录甲骨文论著简目），陈梦家编，科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此书是研究安阳出土殷代卜辞的专著。正文二十章外，有附录共分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便是《甲骨文论著简目》。这个目录分总论、文字、文法、断代、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先公先王、礼制、宗庙、农业、历史社会等类，颇便查检。附录第三部分为《甲骨著录简表》，亦可参考。

又邵子风著、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石印本《甲骨书录解题》五卷，编著时间虽较早，但有解题，值得注意。

《金石书录目》，容媛著，1930 年前中央研究院排印本，1936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全书分十类：总类，金类，钱币类，玺印类，石类，玉类，甲骨类，匋类，竹木类，地志类。原书十卷，附方志中金石志目、金石丛书目各一卷。后有按朝代排列之人名通检和笔划书名通检。

朱彝尊著《经义考》三百卷，是上古到清初的经学著作总目录。其中小学类只收《尔雅》，未收文字、音韵。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十二卷，补正一八八条（二书有《丛书集成》本）。谢启昆又著《小学考》五十卷，嘉庆二十一年树经堂原刻本，咸丰二年重刊本，浙江书局刻本，光绪十五年石印本。《经义考》不收文字、音韵，此书专为补其缺陷而编。

《说文书目》，丁福保编，医学书局 1924 年排印本。此目收书五百余种，注明版本，间附按语。

《语言文字学书目（1—2 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图书资料室编。第一辑 1955 年印，收书一四 种；第二辑 1957 年印，收书一八七 种。

《馆藏文化教育、语文图书目录》（中文平装旧书），山东省图书馆编，1957 年出版，收书三四二种。

（4）文学艺术：关于文学艺术的书目，正式出版的、内部编印的都很多，现择要介绍几种。

《曲海总目提要》四十六卷，清初人著，董康校订，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上海大东书局 1928 年排印线装本重印，精装上、中、下三册，书后附有笔划书名索引。

这是一部解题式书目，共著录六八四个戏曲。提要叙述了这些戏曲的故事情节，有的还考证了有关史实，是研究古典戏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曲海总目提要补编》二卷，北婴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此书从各种不同传本的《传奇汇考》里，辑录了《曲海总目提要》所遗漏的（或文字不同的）提要七十二篇，并对《提要》作了补充和修正，书后附剧目索引，甚便查检。

《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中国戏曲研究院主编，1957 年作家出版社等单位陆续出版。总录计划编印八编：一、宋金元杂剧院本全目；二、宋元戏文

全目；三、元代杂剧全目；四、明代杂剧全目；五、明代传奇全目；六、清代杂剧全目；七、清代传奇全目；八、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书目。已经出版的有傅惜华编《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三种。书后附“引用书籍解题”、“作家名号索引”和“杂剧名目索引”。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孙楷第著，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

此书原版于 1932 年，这次重印作了必要的修订。所收以语体旧小说为主，计已佚未见及现存诸书共八百余种，对各书版本、概要均有叙述。书后有书名索引、著者姓名及别号索引。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六卷，孙楷第著，1932 年初版，1953 年上海杂志公司出新版本，有所删节。

此书是作者东渡日本进行调查搜集后编成的小说书目。各目都有提要，述及版本、题识、序跋、校勘、收藏等，并附录《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晚清戏曲小说目》，阿英编，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此书收录完备，对查考晚清戏曲、小说极为有用。

《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大众日报社 1962 年印。

本书收中国现代作家二八六人，按姓氏笔划为序；其著作（包括翻译的作品）一律以 1960 年以前正式出版者为限，仅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概不著录。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著作联合目录》（1918—1963 年），武汉地区七单位编，1964 年铅印本。

本书为配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及充分利用武汉地区所藏有关书籍而编成。所收作品以中文专集为限，计收从事小说、诗歌、散文、戏曲、说唱文学等写作的作家共二百九十人。七个藏书单位是：华中师院、武汉大学、武汉师院、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及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资料室。

关于一位作家或一部文学名著的研究书目也很多，可根据需要查冯秉文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或各图书馆的参考工具书目录。

《鲁迅研究资料编目》，沈鹏年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这本目录共分三辑：上辑为鲁迅著译及有关书目 623 种；中辑为有关鲁迅著译的一些原始资料目录，包括鲁迅著译最初刊出处的报刊杂志简录，鲁迅的名、号、笔名录，鲁迅的手稿抄本简录等；下辑是关于鲁迅的研究资料系年目录，共收研究鲁迅的专著五五八种、论文二千三百篇。

《红楼梦书录》，一粟编，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这是一部专书的学术书目，收录了《红楼梦》问世以来直到 1954 年 10 月为止的有关作品约九百种，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方便。

此外，虞复编、朝花美术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历代中国画学著述录

目》，中国音乐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 1961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初稿），以及其它有关艺术方面的专题书目，也极为有用。

（5）史地及其它：

《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1949—1973），复旦大学图书馆、历史系合编，1973 年 11 月印。

这是为配合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根据《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和本单位藏书编成。计收编 1949 年 10 月至 1973 年 6 月出版和重印的有关中国古代史图书两千余种，按性质和时间顺序分别排列。

这本书目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 1975 年编印的《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相配合，能够迅速反映关于古代史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水平，极为有用。

《增订晚明史籍考》，谢国桢编著，中华书局 1964 年据北平图书馆 1933 年版增订重印。

此书主要收明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平定三藩事件期间所有野史稗乘，撰为提要。提要首录原书序跋、凡例，按时代排列，后加编者按语。其特点是收罗材料极为丰富，但难免有错误之处。未附读书所收书名、丛书名、著者名、著者别名等四角号码综合索引，极便检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编，科学出版社于 1957 年出版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贺次君著，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出版的《史记书录》；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编，1955 年石印本《司马迁著作及其研究资料目录》；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 1956 年编印的《馆藏史记书目》；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1956 年编印的《有关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参考资料篇目索引》等等，都为我们研究大史学家司马迁及其《史记》提供了方便。

查考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可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 1972 年 8 月编印的《中国近代史书目》（1949—1965.5）。此书根据复旦馆藏并参考《全国总书目》和其它书目而编成，对于了解解放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出版情况，查找这方面的专著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1962 年铅印本《中国近代史参考书目初编》，收录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中外文参考书甚多，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又下列九种书目，也是查找中国近代史方面有关图书资料的重要目录：

齐思和编《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之后）。

张秀民编《太平天国资料目录》（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资料丛刊征引书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洋务运动》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中法战争》一书之前）。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资料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中日战争》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戊戌变法》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义和团》一书之后）。

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征引书目、参考书目》（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辛亥革命》附录）。

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出版，这是查考我国历代有关边疆图书资料的重要工具书。

此书收录我国边疆史地资料及各民族地区的文献记载（包括专著和舆图）近万种，先依地区再以时代先后为序。西夏、契丹、辽、金、元及明代边墙与倭寇史料，皆列为专目，书后有书名、著者索引。

王庸编《中国地理图集丛考》，商务印书馆 1947 年初版，1964 年修订重印，这主要是查明代边疆海防方面有关图书的工具书。

此书分甲乙两编，甲编包括明代总舆图汇考，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明代海防图籍录，都是关于明代的图籍考录。乙编包括中国地理学史订补，中国历史上地图与军政之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疆域图等。最后附录明代倭寇史籍志目。

福建省图书馆 1972 年编印的《台湾、琉球资料联合目录》、1973 年编印的《我国南海诸岛资料联合目录》，福建师范大学 1974 年编印的《东西南沙群岛目录及重要资料选辑》，可供我们查考台湾及南海岛屿资料之用。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 1973 年编印的《东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文献目录》（内部资料），除收录中国、朝鲜、日本和西文文献外，还收编了中、日文报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资料，可供查找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考古、民族、地理方面的图书资料之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等 1961 年编印的《蒙古史研究图书目录（汉籍部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 1962 年编印的《新疆研究参考书目（中文之部）》，方国瑜编、云南大学 1957 年印《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59 年编印的《有关西藏的图书目录》，也都是查考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历史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朱士嘉编、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初版 1958 年增订重印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张国淦编著、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的《中国古方志考》，洪焕椿编著、科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浙江地方志考录》，上海师院图书馆 1963 年编印的《上海方志资料考录》，上海图书馆 1964 年编印的馆藏建国前《上海地方资料中文书名目录》，以及其他图书馆编印的大量方志目录，是供我

们查考方志的重要工具书。

此外，马念祖编、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的《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编纂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杜信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2 年出版的《同书异名通检》，胡文楷著、商务印书馆 1957 年出版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杭州大学图书馆资料组 1962 年编印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国务院法制局编、法律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军事出版部军事图书馆 1957 年编印的《中国历代兵书目录》等等，也都是极重要的专科专题书目。又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目虽不属本书叙述范围，但其古代部分，有关科技史，这里略予简单的介绍。

清康熙时数学家梅文鼎尝选历学书六十二种、算学书二十六种，各撰提要，名曰《勿菴历算书目》，可以算是较早的自然科学书目。

清华世芳撰《近代畴人著述记》（附于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畴人传》之后），也是一本数学著述目录。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他多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全书内容包括我国有史以来的地理和历史情况（第一卷），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第二卷），数学、天文学、地学（第三卷），物理学、工程技术（第四卷），化学、化工（第五卷），生物学、农业、医药（第六卷），以及这些学科得到发展的社会背景（第七卷）。作者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对我国古代各门学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成就，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肯定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该书值得参考，其所引用文献目录，亦可视作科技史书目。

清末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初编》、交通大学图书馆《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初编》为一般自然科学目录，均可参考。解放后出版的科技书目，如《四部总录》天文编、医药编、算法编（丁福保、周云青编，商务印书馆 1956 年起分编出版），《中国农学书录》（王毓瑚编，中华书局 1958 年出版，农业出版社 1964 年修订本），《中国医籍考》（日本丹波元胤撰，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年出版），《宋以前医籍考》（日本冈西为人撰，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科学技术参考书提要》（赵继生编，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出版）等等，都可参考利用。

此外，各综合性书目也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图书在内，如《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即列有农家类、工艺类、医家类、历算类等子目可供查考。

## 七、按作者查考其著述

以上六项，皆以书名为主，介绍了查找图书的几种不同的途径。如果只知作者而书名不清楚的，还可按作者查考其著述。有些书名复杂，不管是从笔画还是号码法都不如查作者姓名简易，也可先查作者再查书。由于已往所

出版的目录书籍很多附有作者索引，如《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特别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三册中的第二索引是作者索引的大结集，因而先查作者，再查考其著述的方法是简易可行的。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郑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书，中华书局重印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都有作者索引可查。《中国丛书综录》第三册前面是子目索引，后面即是作者索引。

也有一些书目，一看便知可从作者查考其著述，例如《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历代中国画学著述目录》、《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国近代作家传记暨著述要目》，其中包括《郑樵著作考》、《汤显祖先生著述版本目》等等在内，都对我们从作者转查书籍提供了方便。

此外，多数图书馆均有著者卡可供我们查找各类图书时利用。

又查作者，一般按作者姓名笔画、号码等查找，但也可根据作者的时代线索去查，或按地域查地方文献书目（包括方志艺文志）；或按作者所从事的工作查有关专科书目。总之，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各种不同角度加以查找。

## 第二章 查考字词的工具书

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在我国出现较早，汉代所谓“小学”就是文字学，四部分类中的经部也有“小学”。《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分为训诂书、字书、韵书三大门。训诂书主要讲字义，字书主要讲字的形体结构，韵书主要讲音韵。现代编制的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可分为字典和词典两大类。字典以释字为主，词典以释词为主。实际上，古代的字书大都兼及音义，训诂书也讲字音，韵书也讲字义；现代的字典往往也兼收复词，词典也多以单字为词头，并释其音义，相互间既有区别，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工具体书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遇到查考字词时能选择使用，下面先简述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的源流，然后分门别类讲述查考字词的途径。

### 第一节 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 字词的工具体书的源流

#### 一、汉字的形体演变

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我国文字的发明创造，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化的一个贡献，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考古发现，半坡、姜寨、柳湾、大汶口和城子崖的陶器文字，当是我国文字的雏型，算来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开始具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特征，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秦始皇统一六国，“取史籀大篆”，“省改”、整理、规范成小篆，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统一文字的政策，既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中央政府的政令贯彻和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历史上是进步的。

秦始皇还命程邈对民间的简易书体——隶书，进行了整理，作为小篆的辅助字体。后人为了区别于汉隶，称它为古隶。因为这种字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容易写，到汉代就代替了小篆的地位，成为通用的主要字体。经过长期的使用和改造，汉末它就发展成“熹平一字石经”那样标准化的汉隶。汉代对这种字体还有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草书，又称章草，但基本上还是隶书的变体，与晋唐以来的今草、狂草迥然不同。顾炎武曾说：“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故也。”（《日知录·草书》）

魏晋之际又将汉隶进一步改进成楷书，但最初的形体还近于隶书，如魏锺繇、晋王羲之写的字，结体方扁，不同于现行楷书。唐代欧阳询、虞世南等所写的楷书就变成长方型，又经规范才成为“开成石经”那样的写法，楷书才有了定型。在楷书的使用过程中，经过游移和简化成为行书，这两种字体一直通行到现在。

我国文字的演变，就总体而言，其数量是由少到多，而字形则由复杂到简易，这种变化是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实现的。除秦代的“书同文”是由统治阶级领导进行的一次文字改革外，此后都是在广泛的实用过程中自行简化，以致约定俗成，改变字形的全貌。

直到本世纪初，才有了文字必需改革的呼声。如1904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表》发表，1907年劳乃宣加以整理，改编为《简字谱录》。此后四十多年，推行注音字母给汉字注音。

1951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8年，周恩来同志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规定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经过分批推行和广泛使用，至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共推行简化字二千二百三十八个。同时，通过废除异体字，更换部分生僻地名字等，共精简了一千一百多个汉字。1977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规定《草案》第一表的二百四十八个字，即在图书、报刊上试用；在试用一个短时期

后，接受群众意见，又停止试用。第二表的六百一十五个字，需经过广泛讨论，征求意见，再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此外，1957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还通过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推行。

文字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既要积极，又不能草率。

## 二、《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的发展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周宣王时，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书《史籀》，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仍取名《苍颉篇》。以后，陆续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不过，以上这些原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诸如《急就篇》，也是经唐人颜师古作注、宋王应麟补注，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还要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籀文，全书分为十四篇，收单字九千五百四十三个，用读若法注音，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六书”理论，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正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之，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晋朝吕忱的《字林》，是继承《说文解字》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在唐代以前，人们还把它和《说文解字》并称，可惜不久就失传了。据《封氏闻见记》，《字林》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较《说文》为多。《魏书·江式传》说，该书“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梁顾野王的《玉篇》，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今本《玉篇》虽非原本，但可知其对《说文解字》有所增订，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自隶书、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辽释行均的《龙龕手鑑》、宋郭忠恕的《佩觿》及李从周的《字通》。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还是有用的；其中《字通》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类篇》，它继承了《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

字（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讲古音、古训，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元戴侗撰《六书故》，改变了《说文解字》的部首编排，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按字义排列。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使人“不知制字之本”，所以他的《六书故》采用钟鼎文字，钟鼎文没有的字才用小篆。《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该书“非今非古，颇碍施行”。不过书中解释文字，也有精详的考证，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还是有用的，不能一笔抹杀。

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包括俗字，而僻字则一律不收，并把《说文解字》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四十个，均按笔画多少排列。注音方法是先反切，后直音。对字义的解释，也较为清楚。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后世多沿用。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正字通》。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玉书等奉命撰《康熙字典》，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该书继承了《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分为二百十四部，共收字四万七千三百三十五，用反切注音，释义旁征博引，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当然，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乾隆时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就对《康熙字典》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但因此冒犯了康熙“御定”的威严，又因该书没有“避讳”，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事见《掌故丛编》）！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奉皇帝之命，著《字典考证》，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显然，错误当不限于此。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这里从略。

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阮元的《经籍纂诂》，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

### 三、《尔雅》等训诂书的兴衰

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解释词义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当代普通话的词语说明古代词、方言词的意义，这叫“诂”；一是说明词的定义和应用范围以及它和同义词、近义词的分别，这叫“训”。

《尔雅》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我国古代训诂书的代表作。此书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大约

该书产生较早，春秋到汉初这一时期内，经过不少人的增补，到汉代才定型。今本《尔雅》按收录词汇的内容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等十九篇。它的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到古代的一般词汇，还涉及到古代社会的人事、天文、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部词典成书较早，不少内容若没有后人的解释，也难以看懂。汉代以来，为《尔雅》作注的不少，但大多已失传，现存晋郭璞的注和宋邢昺的疏，即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尔雅注疏》。此外，宋代还有陆佃的《尔雅新义》、郑樵的《尔雅注》，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更多，最著名的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尔雅》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列为儒家的经典，对后世训诂书的影响颇大。后世训诂书，有的补充《尔雅》内容，有的仿其体例，且多以“雅”字命名。其中旧题孔鲋的《小尔雅》，是最早的一部补充《尔雅》之作。此后有汉刘熙的《释名》，除对字词进行简单的释义外，并进一步探求语源。魏张揖的《广雅》，则博采群书，以补《尔雅》训诂之缺。宋代补《尔雅》之作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明代朱谋炜的《骈雅》，专门收录冷僻深奥的词汇；方以智的《通雅》，特点在于探讨语源。清代吴玉搢收录形音歧异而意义相同的词，撰为《别雅》；史梦兰集叠字，撰《叠雅》。总之，以上诸“雅”，都是收录古籍书面语言的词典。

我国第一部专门收编各地群众口头语言的词典，当推旧题扬雄撰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汉末至晋初的人都说此书是扬雄所作，如应劭的《风俗通义》和常璩的《华阳国志》。但是，《汉书》的《艺文志》和《扬雄传》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宋代洪迈便怀疑起来，以为扬雄作《方言》之说出于依托。《四库全书总目》断为“真伪皆无显据”。但该书自问世以后，研究它的名家，颇不乏其人，晋郭璞的《方言注》，更多所阐述，贡献较大，且流传至今，王国维在《书尔雅郭注后》、《书郭注方言后》曾给予分析、比较和肯定。清代学者为《方言》作校勘疏证工作的主要有：戴震的《方言疏证》，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但是，集大成之作，还是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科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续《方言》及收编方言俗语的专著还有不少，如：汉服虔的《通俗文》，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阙名的《释常谈》、龚颐正的《续释常谈》、李翊《俗呼小录》、明李实的《蜀语》等。

清代续《方言》的著作主要有：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考证一地方言的有：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专集诗词中方言的有：李调元的《方言藻》；专集常言俗语的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钱大昭的《迓言》等。

#### 四、《广韵》到《音韵阐微》的变化

我国古代韵书的编纂，是随着汉字音韵的发现和研究而出现的。魏李登的《声类》始分宫、商、角、徵、羽五声，晋吕静的《韵集》除按五声分卷外，又创立了韵部，这两书就是韵书的先驱。此后，齐梁间周顒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定汉字读音的平、上、去、入四声，为后代韵书奠定了基础。

隋文帝初年，鉴于各地方言中四声分歧较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而以前的韵书缺乏定韵标准，各有错误，于是陆法言与颜之推等在仁寿元年(601年)编成《切韵》。这是综合南北多种语言、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著作，为其后的《唐韵》甚至宋代的《广韵》所本，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残卷了。近几十年来，经过研究考证，《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韵目次序不及《广韵》整齐，字数较少，注亦简略。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孙愐据《切韵》增字加注，重加刊定，改名《唐韵》，但原书亦已亡佚。

《广韵》又称《大宋重修广韵》，是陈彭年、丘雍等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奉诏修，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增广《切韵》成书。全书分二百零六韵，收录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文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韵书。它保存了丰富的声韵学材料，文字训诂亦多可取，宋代知识分子即把它当作通用的字典，后人更常把《广韵》、《说文解字》和《尔雅》三书并称，作为我国古代字书中三大系统的代表。以后，丁度等又撰《集韵》，仍分二百零六韵目，韵目名称和次序稍有更动，收字比《广韵》多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为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韵书，注文虽不及《广韵》详细，但引证古书材料很可贵，且注重文字的形体和训诂，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此外，丁度等删取《切韵》编过一部《韵略》，后改名《礼部韵略》，毛晃再把它增补修订为《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即后来所称的《增韵》。

金元间，随着中古后期语言的逐渐发展变化，实际语音与《广韵》的二百零六韵越来越远。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年)王文郁撰《平水新刊韵略》，并为一百零六韵；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归并为一百零七韵；金韩道昭撰《五音集韵》，归并为一百六十韵。此后，元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阴时夫《韵府群玉》分别沿用刘、王韵目，直到明代官修《洪武正韵》，进一步归并为七十六韵。至于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以北音为正音，根据元代北曲用韵，首倡“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分十九部。由于该书是适应当时政治中心北移而专门研究北音的，所以也是研究近代以北音为主的普通话语音的重要资料。

清康熙时李光地、王兰生等奉诏撰《音韵阐微》，雍正时完成，全书韵



部仍分一百零六。该书《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于是改革以前韵书的反切方法，并根据当时北方官话来定字的音切。这种读音既非秦汉古音，也非《广韵》系统的中古音，而接近于今天的读音，给我们提供了读音上的方便。

## 五、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一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三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平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廿分册，装订成廿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 第二节查考字词的途径

一般来说，查考字词的工具体能告诉我们某字词的写法、读音、意义，或者还能指明某字词的用法、构造及其渊源变化，帮助阅读、写作时对字词的正确理解和应用。人们常把它誉为“无声的老师”。我们遇到字词上的疑难，既不能“不求甚解”，更不能“不懂装懂”，而要养成勤向这些“老师”求教的习惯。这是丰富语言文字知识，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基本训练方法之一。下面从实用角度出发，分为：一、查考常用字和冷僻字，二、查考虚字、避讳字，三、查考古文字，四、查考语词，五、查考成语、典故、方言，六、查考文学作品中的特殊语词，予以介绍。

### 一、查考常用字和冷僻字

查考常用字和冷僻字可使用：常见的《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收字较多的《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以讲文字形体为主的《说文解字》；专注古籍文字音义的《经典释文》、《经籍纂诂》；按音韵编排的《广韵》、《集韵》和《音韵阐微》等书。

(一) 一般查字，可使用《新华字典》。这是一本通俗常用的小字典，由新华辞书社编，1953年人民出版社初版，后又多次再版，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71年修订重排本”。全书收录单字八千五百左右(包括异体字)；字头用大字排印，异体字(包括繁体字)附在字头之后；注音以普通话读音为准，用汉语拼音字母标音，附注注音字母；释义明确易懂，观点比较正确。本书按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各种版本都附有几种检字表，查找方便。

还有《同音字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1956年初版。它收单字一万，稍多于《新华字典》，按音序编排。

(二) 若阅读古籍，上面这些小字典就不能适应需要了。在古籍中常会遇到现在已经不用的字，或者某个字虽然仍在用，而读音和意义却古今不同，从而要涉及某字的构造、本义以及音韵，这就应该使用下列字典：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该书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1979年9月出版。该字典收古汉语常用字三千七百余，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字头用大字，已简化的汉字用简体字，后面用括号注明繁体字和异体字；注音用汉语拼音字母和注音字母；一个字的多种意义，不论读音相同与否，都编排在一个字头下，分条释义。书前冠有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和部首检字。书后附录：(1) 难字表，另收难字二千六百余，只有注音和释义，没有例句。(2) 古汉语语法简介。(3) 我国历代纪元表。

《康熙字典》，清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敕编，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该字典继承了我国古代字书的传统，特别是因袭《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而又有所革新，是封建时代字书的高峰。长期以来，它受到人们的

重视，但毁誉不一。赞扬该书的主要有《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及近人张元济的《节本康熙字典序》；批评者有：（1）章炳麟《检论》卷四《清儒》。（2）蟫魂《书康熙字典后》（载《大中华》一卷五期）。（3）万国鼎《字典论略引》（载《图书馆学季刊》一卷一期）。（4）陆费逵《中华大字典序》。（5）黄云眉《清代纂修官书草率之一例——（康熙字典）》（原载《金陵学报》六卷二期，又收入所著《史学杂稿订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6）（日）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东京井田书店昭和十八年七月本。

解放后评论《康熙字典》的，主要有刘叶秋著《中国古代的字典》（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和张涤华的《论康熙字典》（见《江淮学刊》1962年创刊号和第二期）。张文认为，我们对《康熙字典》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正确地认识它的短长所在；如果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那就未免是一偏之见了。这种意见是公允的。

《康熙字典》用部首排列法，分成二百四十个部首。字头下先列历代主要反切，随即解释字义，并多引古书为证。《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一般查不到的冷僻字，在这部字典里多能查到。使用这部字典时，要先查前面的总目，有些一时难以辨明部首的字，则可利用检字表查阅。此外，王引之的《字典考证》，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两千五百多条，编排上与原书相同，读者应当注意。

《康熙字典》的版本较多，其善者有：商务印书馆1933年本，增《字典考证》、四角号码索引；世界书局1936年本，增笔划检字索引、篆字谱、《字典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本，增《字典考证》。

《中华大字典》，陆费逵、欧阳溥存主编，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该书按二百四十部首排列，收单字四万八千余，改正了《康熙字典》中的错误两千多条，且于字头之下兼列籀、古、省、俗、伪等体，还收进了近代方言和翻译字，是其优点。注音主要根据《集韵》，又标注同音字；释义分条解说，一条只注一义，只引一个例证，先释本义，后及引申义、假借义。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它还是一部较好的字典。尽管该书内容丰富，而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刘叶秋《中国古代的字典》等书中归纳为：任意删节引文，沿用错误的旧解，注释各自为说，抄袭旧字书的断语，引书名称前后不一，等等，这都是确实的。此外，该书上所打的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烙印也是深刻的，反动的观点也不乏其例，如1860年参与英法联军，一手抢劫焚烧圆明园，本人也直认不讳地供称“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的英国侵略强盗头目“戈登”，竟被说成是“英吉利大将名”，“从中国淮军历战有功”。这些都是应当注意并予以批判的。

《说文解字》，汉许慎撰。全书十五卷，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排列法；字体以篆书为主，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列为重文；字头之下的解释，先释义，再释形体构造，后

注读音。它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说文字的方法，对我国文字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被认作解说文字的“准绳”。但是，它的缺点、错误也还不少。宋文字学家徐铉就批评说它“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说文韵谱·序》）又如，“示”字，《苍颉篇》作“现也”，这种解释简单明了。而《说文解字》却故弄玄虚，说：“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就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唯心论说教。我们今天看待这部字书，既不可象前人那样无限崇拜，也不能一笔抹煞，而应当严加汰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说文解字》成书之后，辗转传写，加上解释的过于简单而又深奥，以及古今读音的变化，往往造成不同的理解，而使传本每多讹异。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徐铉等校定雕版，流传后世，一般称此为大徐本，即现在的通行本。徐铉弟锴作《说文系传》，一般称小徐本。大徐本校定《说文解字》，除纠正一些脱误外，又略有增改：（1）许书原分十四篇，加叙目一篇，一篇一卷，为十五卷。徐铉以其篇帙繁重，每卷分作上下两卷，共为三十卷。（2）每卷之首，增加标目。（3）字条之末，增加反切。（4）增加的注释皆题“臣铉等曰”，以示区别。（5）增加“新附字”于每部之后。徐铉定《说文解字》，徐锴编《说文系传》，对于保存和解释许慎原著是有功绩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二徐在研究《说文解字》上的缺点、错误。清代钱大昕曾指出：“二徐校刊《说文》，既不审古音之异于今音，而于相近声，全然不晓，故于从某某之语，往往妄有刊落。”（《十驾斋养新录·二徐私改谐声字》）这就给后人了解古今字音的变化带来了困难。《说文解字》的版本较多，中华书局1964年、1977年新印本以清陈昌治改刻清孙星衍本为底本（孙本据宋刻本）缩印，于字头篆字之前加楷体，卷末增编楷体笔划检字，颇便读者查阅。

《说文解字》问世一千八百多年来，专门从事研究者不下数百家，以清代学者的成就为大，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说文》）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先从原书的体例、后代字书的训释以及宋代以前古籍所引《说文解字》这三个方面，对二徐本进行校订，又用古书上的字义阐明许书的训释，并说明一个字的意义及其引申变化，对汉字的研究有较大贡献。但其中也有些意见武断，所以后来校订段注错误的书也不少。该书有嘉庆间原刻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影印本、世界书局1936年影印本（后附部首检字）。

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的名著很多。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征引古书以推寻《说文解字》说解的根源，资料丰富，并有所补正，但泛及词藻，体例不太严谨。该书有灵石杨氏连筠篹原刻本，同治间湖北崇文书局复刻本。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前书综合段氏《说文注》和桂氏《义证》及其他研究《说文解字》的专书，删繁举要，极便初学，后书说明

“六书”及《说文解字》的条例、体制，并列《说文解字》的一些疑问，附有“补正”，常用金石古文补正《说文解字》的形体和解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根据《说文解字》九千多字，又增附七千多字，从中分析形声声符一千一百三十七，再依古韵归并为十八部，即十八卷。它变更了《说文解字》的部首排列法，按古韵及形声声符排比，每个字头分楷书和小篆标出，再用小字标明韵部，各就字形构造考明本义，继以古书中通用之义，分列为“转注”、“假借”二目。他所说的“转注”，就是词义的引申；“假借”，则是通假字，含义不同于《说文解字》。这是一部查考古代汉语字义字音的重要工具书。但是，本书也沿用了《说文解字》中的一些错误解释，并为此而引证古书，错上加错。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金石文字补《说文解字》所录古籀之未备，这是以古文字订正《说文解字》的最早著作。

近人丁福保把研究《说文解字》的许多专著，包括上列各书，汇为一编，称《说文诂林》。正编由医学书局1928年影印出版，补遗于1936年出版。正、补编各有检字一册，均按部首排列，字下注明页码。这部书是把前人有关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拆散后，分别系于大徐本各字之下，使读者查一字而得各家之说。此外，丁氏还根据《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玉篇》等古代字书校勘大徐本，勘正脱句、脱字、衍字、误字等数百条。马叙伦所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初稿完成于1928年，又经修订，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影印手稿本。该书汇集各家说解，除清人研究成果外，增加近人论著，取材丰富，可供参考。

（三）阅读古籍，特别是先秦著作，还往往碰到有的字音与后代不同，字义的解释，也常有出入。虽然它们各有不少注疏，对某些字的读音和意义，进行了注释，但是，这些注疏，散见于群书，不容易一下子弄清它的所以然，因而要深入地研究古籍中的字音与字义，还可查考《经典释文》和《经籍纂诂》。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本书在唐初即已流行，清乾隆间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较佳，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即据以影印，并附卢氏《考证》。这是一部注释古籍字音，也兼及字义的专书。第一卷《序录》，包括陆德明的自序、《条例》及全书的总目等，其次是《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春秋公羊》一卷，《春秋谷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凡卅卷。它广泛采取各家的音切加以注音，兼辨字义，并考证诸书本文的异同，有的还加有按语。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汇集和保存了唐以前经书中文字的音读，特别是有的材料此后亡佚，仅赖本书的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它的注释是按原书的篇目和字句的先后次序编排的，查考或有所不便。

《经籍纂诂》，清阮元编，嘉庆三年（1798年）琅环仙馆原刻本，1936年世界书局影印本。王引之在序文中说它“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

书可识。”这是不错的。全书字头按《佩文韵府》编次，一百零六韵，分平上去入四声，《佩文韵府》未收的字，依《广韵》补入，《广韵》未收的字，据《集韵》补入。一个字有不同读音时，分别编入多韵。书中收录虽然仅限单字，但字下也罗列包括该字的复词解释，兼有字典和词典的作用。每一字头之后，先释义，再列出处，多义词一般是先举本义，后列引申义。此外，该书编成之后还修订过一次，修订的内容分别附于原字之后，所以不少字有两个字头，查考时应予注意。

总之，该书是我国古代训诂的材料汇编和索引，对于我们阅读古书，特别是阅读唐代以前的书，提供了查考字词的帮助。如“纯”字有四个音读，就分为四处收录，分别训诂，一见上平声十一真，二见上平声十三元，三见下平声一先，四见上声十一轸。问世以来，很受知识界的重视。臧镛堂在该书后序中说它“可谓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渊藪，取之不竭，用之无穷者矣”。这虽是过誉了，但阮元等汇集古书中有关字义的训诂为一书，有些解释还是一般字书中没有的，给读者查考及研究古代字词提供了便利，还是应当肯定的。当然编者那种尊孔读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观点在书中的反映，以及书中的训诂不乏附会、杜撰之处，这是读者应当注意的。

原书按韵部排列，查检不便，1936年阮刻影印本增编了《目录索引》，按笔画排列，对不熟悉音韵的读者提供了寻检之便。但是，这个索引也有错误。有人在《诗经》中读到了“松柏丸丸”，不理解“丸丸”的意思，就按《目录索引》提供的页码，去找“丸”字，没有找到，仔细一看，该页全收上平声冬韵字，而“丸”字属寒韵，按韵寻检才找到了“丸”，原因是页码有误。

（四）阅读古籍，遇到不认识的字，除了使用以上工具书外，还可查考《广韵》、《集韵》、《音韵阐微》等韵书。这些书既讲音韵，也讲文字的形体和意义，具备现代字典的功能，它的优点还在于字头按韵排列，类似同音字典。如遇到冷僻字，在一般字典中虽然查到了，但还不能正确发音，不妨查一查韵书，只要找出同韵中的一个常见字，即能推知这个冷僻字的读音。使用韵书查字，对不熟悉音韵的读者来说，会发生不知所查的字属于哪一声和什么韵的困难，这可先从《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旧版《辞源》和《辞海》中查得某字的声韵，再按声韵寻检即可。

《广韵》，宋陈彭年编，历来版本较多，周祖谟以泽存堂刊本为底本，作了精细的校勘，定名《广韵校本》，是最好的本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于1951、1960年影印。全书的编排以四声为纲，韵目为纬。平声字分上、下两卷，上、去、入三声各一卷。收录单字两万六千一百九十，分为二百零六韵，其中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所收字都是先释义，后注音，并把同音字（同声母）排在一个字头之下，作为一条；音有异读的，个别注明；字有异体的，附在字头之下。《广韵》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魏晋唐宋间的语言，不仅把《说文解字》、《字林》、

《玉篇》等古代字书的文字音义收录无遗，而且有所增补，是研究汉语史的主要参考书。

《集韵》，宋丁度等撰，后由司马光续编成书。全书分平声四卷，上去入三声各一卷，除了对《广韵》的韵部有改并外，编排上也不相同：本字后附异体字，再注音，后释义。全书保存了古代大量文字的音义，在释义方面一般较《广韵》为简，但有时也互有详略。清方成珪编《集韵考正》，对原书有所订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把二书汇印在一起，有便读者。

《音韵阐微》，清李光地、王兰生编，光绪年间淮南书局本较为常见。该书分平声三十韵，上声三十韵，去声二十九韵，入声十七韵，附载《广韵》韵目，使读者知其分合。全书按照《广韵》、《集韵》的体例，把同音字编成一组，用反切注音；每字之下先列《广韵》、《集韵》的反切，后注该书的反切，用“合声”或“今用”、“协用”、“借用”标明。它的特点是在反切上有重大革新，反切上字不用带鼻声韵尾的字，下字尽可能不用带声母的字，使切音时减少阻碍，急读即成一音。

## 二、查考虚字、避讳字

### （一）查考虚字

远在汉代人们已经注意到虚字的解释，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提出虚字的用法，清马建忠《文通》为虚字下了定义，杨树达在《文通刊误》中对马氏的说法有所纠正，而王力的说法似乎更可取：“凡本身能表示一种概念者叫实词，凡本身不能表示一种概念，但为语言的结构工具叫虚词。”（《中国语法理论》）

在古代汉语中，之、乎、也、者、已、焉、哉这类虚字，用法较广，变化复杂，若得不到准确的理解，甚至会弄错原文的意义。例如古代汉语中常用的“焉”，就可举出十多种用法，它在各句中的地位和意味都不相同：（1）“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史记·秦始皇本纪》）（2）“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山海经·大荒南经》）（3）“今谷赚未报，鼎焉为出哉？”（《汉书·郊祀志》）（4）“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智哉？”（《墨子·尚贤》）（5）“犹有晋在，焉得定功？”（《左传·宣公十二年》）（6）“人莫大焉，无亲戚、君臣上下。”（《孟子·尽心》）（7）“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荀子·议兵》）以上七个例句中的“焉”，在句中是什么词类，各作何解，就不一定都回答得出。但是，一般字典中对这一类的字收集较少，因而遇到虚字的疑难，应求助于以下的工具书。

搜集虚字，阐释其意义，分析其用法的专书，首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今传有明嘉靖年间刊《奚囊广要》丛书本和万历间胡文焕编的《格致丛书》



本。此后，清刘淇著《助字辨略》。该书从先秦至宋元的经传、诸子、诗词、小说中搜集了虚字四百七十六个，用正训、反训、通训、转训等方法进行解释，释义明确，征引丰富，奠定了汉语虚字研究的基础。该书初刻于清康熙五十年，后多次重刊，1939年开明书店据长沙杨氏刻本标点排印，略加校注，在书眉上标出各字的解释，增编笔画索引以便检查；中华书局1954年据开明版重印。清代研究虚字的还有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该书搜集周秦两汉古书中的虚字一百六十个，对各字先说用法，再引例证，追溯原始，明其演变，在解释虚字的特殊用法上，超越前人，但对一般用法谈得较少。补充该书者有清孙经世的《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1956年中华书局合刊三书，定名《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并在王氏书后附录有关该书综述及辨证之文三篇，予以标点，并改编目录，注明正文页码，以便查考。另有清吴昌莹的《经词衍释》，也是一部补充《经传释词》的著作。著者说：“既续其援引所未详，又于其释之所未及而实为义应有者，博稽而推广之；释之所可通而本义实别有者，征引而并存之……至所略而未释词，则补遗于卷末。”这本书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长期来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中华书局1956年本。

近人研究虚字的著作有《词诠》和《古书虚字集释》。

《词诠》，杨树达著，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解放后有重印本。著者一方面继承了我国训诂学的传统，一一训释所收字的意义；另一方面结合现代语法学，指出其在辞句结构中的作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对虚字进行研究，是我国研究虚字的一大进步。该书收录古书中常用虚字约五百三十个，“首别其词类，次说明其义训，终举例以明之”。

《古书虚字集释》，裴学海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其价值主要在于收录周秦两汉书中前人阐释不完备的虚字二百九十个，补充以前诸家关于虚字研究的遗漏、不足和纠正错误。但是，排列方法按唐释守温的三十六字母为序，解放后重印时，也没有增编辅助检字法，对一般不明古韵的读者来说，查找颇为不便。

收编常用虚字，可供查考之用者则有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开明书店1944年初版，解放后多次重印，版本较多。本书取文言里最常用的虚字二十几个，充分举例，详加分析，说明它在语法上的作用，并尽可能和现代语比较，以便读者领会和查考。所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除了介绍文言的性质、语音、词汇和语法知识外，又有虚字一节，录常用文言虚字二百余，按它的意义分别举例说明，可补正文的不足。

此外还有《常用虚词例释》，顾巴彦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文言虚词》，杨伯峻著，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常用文言虚词》，赣南师专中文科1977年编印。《文言虚词浅释》，天津师院中文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专供查考现代汉语虚词的有《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北京大学中文系汉

语专业编，湖南湘潭地区教师输导站 1976 年印行。该书收录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七百七十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书前有笔画索引，寻检方便。

## （二）查考避讳字

所谓避讳，是我国古代对最高统治者和家庭里的长辈以及最尊崇的人的名字，在写作和讲话时，避而不用，表示不敢、不能或不愿直呼其名的意思。《礼记·曲礼》载“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左传》也有“周人以讳事神”，总之，在古代，避讳的限制原来还比较宽，如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诗经》中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等句；孔子母名征在，《论语》有“足则吾能征之矣”、“某在斯”的记载。到后世，避讳有所严格，如 1974 年马王堆出土帛书《经法》避刘邦讳，“邦”作“国”；唐代李贺考中了进士，同贺争名的人说“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总之，历代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尊严，巩固自己的地位，把避讳愈限愈严，不仅当代的人在口头和文字上不准触犯忌讳，而且进一步追改古书，给后世读者也带来了困难。宋代的避讳最严，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此外，历代都有避讳的规定，不得触犯。如清乾隆时的《字贯》案，就是王锡侯在该书的凡例中没有避讳，提到了康、雍两朝庙讳及乾隆御名，被视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照大逆律问拟”，以致满门抄斩。

我国历史悠久，古书浩如烟海，由于各书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避讳字也不相同，于是各种专名以及一般文句的更改，很不一致，有的还一改再改，使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古书中，往往有的字用另外的字代替，有的字缺了笔画，有的空位不书或作空围。这就容易给一些读者增添疑难，或带来理解上的错误，如现在有人解释《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句中的“荆”，说是轻蔑楚国之词，实际上“荆”在《说文》释“楚木也”，并无轻蔑之意，而张守节的《正义》也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

对历代避讳的研究，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楙的《野客丛书》、王观国的《学林》、周密的《齐东野语》，都已略述。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王昶的《金石萃编》，都有专门的考证，特别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运用讳例解释史书中的疑难较多。嘉庆间，周广业曾著《经史避名汇考》，但只在《蓬庐文钞》中刊了一小部分，全书并未刊行。研究避讳的专著，现在通行的有：清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清刘长华《汉晋迄明谥汇考》、《皇朝谥讳考》、黄本骥《避讳录》、周桀《廿二史讳略》、张惟骥《历代讳字谱》。

对历代避讳问题，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前人成果的专著有陈垣的《史讳举例》，1928年初版，后经刘迺龢校订，科学出版社1958年重印。《史讳举例》分为八卷：第一卷讲避讳的方法，包括改字、空字、缺笔、改音例；第二卷讲避讳的种类，包括改姓、改名、辞官、改官名、改地名、改干支、改经传文、改常语、改诸名、改物名、文人避家讳、外戚讳、宋辽金夏互避讳、宋金避孔子讳、宋禁人名寓意僭窃、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恶意避讳例；第三卷讲避讳改史实，包括改前人姓、名、谥例和改前代官名、地名、书名例以及改前朝年号例；第四卷讲因避讳而生之讹异，包括改字、缺笔致误例，改字而原义不明、空字而注家误作他人、空字而后人连写遂脱一字例，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连入正文例，一人二史异名、一人一史前后异名、一人数名、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一地误为二地或二地误为一地、一书误为二书例，改前代官名、地名而遗却本名例；第五卷讲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包括避嫌名、二名偏讳、已祧不讳、已废不讳、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经后人回改未尽、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第六卷是不讲避讳学之贻误，包括不知避讳而致疑、致误，妄改前代官名、妄改前代地名例，非避讳而以为避讳、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以为避讳回改而致误例；第七卷讲避讳学之利用，包括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知有小注误入正文、知有他书补入、知书有补版例，因避讳断定时代、断定二人为一人例，因犯讳断定讹谬、知有衍文脱文例，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据避讳推定而讹误例，避讳存古谊古音例；第八卷是历朝讳例，分别介绍秦汉以至明清历朝讳制，并列出生朝的世次、帝号、所出、名讳、代字以及避讳举例，以便查考。

### 三、查考古文字

我国的古文字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陶文、玺印文、货币文和简书、帛书以及盟书等等。但是，专供查考以上各种文字的字典还没有，所以下面列查考甲骨文、金石文、陶文和盟书四类，分别介绍。关于查考篆、隶、草、楷等书体的字典，概入金石文字类。

（一）查考甲骨文。甲骨文因刻在龟甲兽骨上而得名，其中有商、周甲骨文之分。商代的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周代的甲骨文是1976年在陕西周原地区发现的，现在既没有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专门的工具书，故而从略。以下仅介绍商代的甲骨文。

已发见的商代甲骨文，大都是商王朝用来占卜吉凶以及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故又称“卜辞”；还因为它是刻在龟甲兽骨上，被称为“契文”或“龟甲兽骨文字”。

1903年刘铁云选所得甲骨中字迹完好者千余片，拓印成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铁云藏龟》。接着，孙诒让据该书，于1904年著《契文举例》，是谓第一部研究甲骨文字的专著。此后，罗振玉编印《殷虚书契》、《殷虚

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殷虚文字甲、乙、丙编》，对甲骨文字和商史乃至古代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八十年来，国内外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和著录，不断发展，材料著录百多种，研究论著上千种。五十年代我国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曾把编印《甲骨文合集》列为重要项目之一。经过多年的集体努力，这一部大型合集已于1979年起陆续出版。本书是把1899年以来先后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十余万片甲骨文资料，选出四万多片，分期分类编排，编纂成册。全书分图版、释文、索引三个组成部分。图版为八大开，四万多片约六千幅，分为十三个分册，其中拓片为十二个分册，依原大制版，以胶版纸珂罗双面版印刷；摹本为一个分册。书前有彩色图版十幅。图版部分有必要的附录。释文和各类索引随后另行编纂。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由中华书局出版。

至于甲骨文字典，始于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待问编》，后商承祚加以补充，辑成《殷虚文字类编》，1933年朱芳圃编《甲骨学文字编》，1934年孙海波复辑《甲骨文编》。现今查考甲骨文，可使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

新的《甲骨文编》是旧本的改订本，利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收甲骨文四千六百余字，其中可识字九百余，均按原文摹写，以《说文解字》次序分部编排，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明的解说，书末附楷书笔划检字，查考方便。但是，该书成书较早，改订时未能全部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这都是应当注意的。

散见于图书报刊考释甲骨文的论著较多，以下介绍三种有关目录，供参考。（1）《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编，中华书局1952年出版。（2）《甲骨文论著简目》，载陈梦家著《殷虚卜辞综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3）《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4年），商代史部分的甲骨文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1976年编印。

（二）查考金石文。金文又称“钟鼎文”，即铸、刻在古代铜器上的铭文。《国语》、《左传》已记有鼎铭，《礼记·祭统篇》则论述过鼎铭的体例，汉代许慎更把鼎铭作为编纂《说文解字》的参考材料。至于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是秦国的“石鼓文”。到宋代，“金石学”成为专门学问，已有著录和研究金石文字的专著；清代中叶以后，考释金石文字者不下数十家，向人们提供了研究古代文史的重要资料。查考金石文字，包括篆、隶、草、楷等书体，除了有关专著外，可找下列各书：

《金文编》，容庚编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影印本。原书初版于1925年，1939年修订再版，这次重印又经撰者增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校订。全书根据历代出土商周铜器中三千多件的铭文

拓本或影印本临摹，收一万八千余条，其中可识字一千八百九十四，重文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不可识或有疑义的字列入附录，有一千一百九十九字，重文九百八十五字。所收字大体按《说文解字》次序编排，各字上注篆文，重文列每字之下，均注明出处。书末附《采用彝器目录引用书目》、《采用彝器目录》和楷书笔划检字。

《金文续编》，容庚编著，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出版。该书根据秦器八十六，汉器七百四十九，收字九百五十一，重文六千八百三十三，附录三十三，重文十四。书末附采用各器铭文及楷书笔画检字。

《金文诂林》，周法高主编，张日升、徐藏仪、林洁明编纂，香港中文大学 1974—1975 年出版十六册。该书以容庚增订三版《金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为据，罗列诸家之说于每字之下。书名仿丁福保《说文诂林》而体例稍异：第一，丁书剪贴原书影印，此书则因字条多采自殷周铜器铭文考释，故不得不摘抄；又因《金文编》及我国新出版书籍中简体字颇多，故抄写时一一改为繁体。第二，《说文诂林》近万字，异体甚少，《金文诂林》则收字才四千，据《金文编》每条下列举原句文句，约一万八千条，《金文编》未收者，复列举于每字下，约得二万条，作用与殷周金文索引相同。第三，《说文诂林》汇聚群言，不著己见，本书间有按语。第四，书末附采用彝器目录及释文，方便参稽。另有李孝定的《金文诂林补编》，于 1977 年出版。

《石刻篆文编》，商承祚编著，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初版。该书采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吴、晋各代石刻，品类以碑刻、碑额、题字为主，收篆文二千九百二十一字，按《说文解字》次序编排。每字从拓本双钩下来，标以楷书，注明出自何种石刻，并录入与该字有关的原句。书前有《采用石刻目》，并附《伪石刻目》，书后有楷书笔划检字，是一部研究汉字形体演变，查考石刻篆文的重要字汇。

查考篆文还有清佟世男的《篆字汇》、清毕弘的《重订篆字汇》，均可参考。

《隶辨》，清顾藹吉著，扫叶山房 1915 年仿原本重印。这部书钩摹汉代的隶书碑文，按《礼部韵略》分韵编次，每字之下分别注出碑名，并引包括该字的碑文，以《说文解字》辨其正、变、省、加等写法。又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也依《说文解字》次第。附碑考二卷，列所采碑目，考其碑文、时代和所在地。该书纠正了宋代娄机《汉隶字源》的谬误，补其未备，是一部研究汉字形体演变，查考隶书的重要字汇。当然，书中亦有因袭舛错处，需要注意。

《增订碑别字》，罗振铎、罗振玉编，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出版。该书收集汉朝以来碑拓所见而字书不载的各种异体字，按韵序编排，每字的各异体字并列，后注楷书，再按先后一一注明出处。书前有全书收编异体字目录，可供查考。

《草字汇》，清石梁编，上海古籍书店 1978 年影印本。该书集录汉章帝至明朱学古八十七家所书草书法帖，逐字摹写，按《字汇》偏旁编排，同一字兼录各家不同异体，偶及行书，旁注书家名号，字头旁标明楷书。书前有《历代草圣》，按时代排列。

《楷书溯源》，清潘存辑、杨守敬编，光绪三年杨守敬刊本。该书收编魏晋至五代楷体碑帖，按原字摹刻，依《说文解字》次序排列，每字均注明出处，书前并有帖目、碑目各一卷，是一部较为完善的楷书字汇。《凡例》详论楷法，有独到之见，可供研究楷法者参考。

查考古文字的工具书，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兼及甲骨文和金石文的《古籀汇编》；以金石文字命名的《金石大字典》；以书体命名的《正草隶篆四体大字典》、《中国书法大字典》，也是颇有价值的专书。

《古籀汇编》，徐文镜编，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出版。该书收集散见于：汪立名《钟鼎字源》、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容庚《金文编》、罗福颐《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等书里的古文字，以篆字为字头，按《说文解字》次序排列，每字下首注楷体字，次注出处和各家考释。书前有楷书笔划检字。

《金石大字典》，汪仁寿编，求古斋书局 1926 年刊本。该书收录金石各体文字，上自籀古，下及碑印，均分别搜集；每字先列楷书，下录金石等文字，皆注明出处。全书按部首排列，书前有笔划检字，查考方便。

《正草隶篆四体大字典》，陈猷祥编，上海扫叶山房 1926 年石印本。该书按部首排列，用楷书为字头，用直音或反切注音，标明四声，有简明的释义。每字后列正草隶篆四体字，正楷采自碑帖，草书采自名人墨迹，隶书采自汉碑，篆书采自《说文解字》和古器，并一一注明出处。书前有论述字体演变的《文字源流考》，以及《部首检字表》、《难字检查表》。另附《名人墨迹》、《名人楹联》、《太史石鼓》、《钟鼎文》各一册，正草隶篆四体字俱备，可供参考。

《中国书法大字典》，主编林宏元，副主编欧洋、白金，香港中外出版社 1976 年出版。该书采用中国历代著名书法家三百六十人所写碑碣法帖三百多部，收录首字四千三百九十二，重文四万七千四百三十余，剪贴墨迹影印，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全书以楷、行、草为主体，兼及章草、隶书、篆书、古文。每字下皆注明朝代、书写人，大部分还有出处。书前冠有《本书汇集历代书法家一览》、《本书汇集碑碣法帖等一览》和笔划检字表，查考方便。

（三）查考陶文。我国古代陶器上的文字，可上推到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陶钵口沿外部的刻划符号，它可能是作记数或记事之用，或为我国原始文字的萌芽。此外，商周以后陶器上的文字发现更多。考释陶文最早者是清末吴大澂所著《古匋文字释》；著录陶文的专书，则始于刘鹗的《铁云藏匋》。查考古陶文字，可使用顾廷龙所编《古匋文彙录》，有 1936

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文字史料丛编本。该书收录古陶文字可识者五百余，按《说文解字》次序编排，《说文解字》未收字附列各部之后，字头下注楷体字或异文重文，每字均注明出处，考释列在各字之下。陶文多为单字，有两字以上者，均录全句。不认识的字，收入附录。本书采录周进藏《古匍文字拓本》、潘承厚藏《古匍文字拓本》、刘鹗辑《铁云藏匍》、日本太田寿太郎辑《梦庵藏匍》、黄宾虹辑《陶匍文字合证》，是一本重要的古陶文字汇编。

（四）查考盟书。“盟书”在历史文献中也称“载书”，是我国古代天子和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诸侯和大夫之间，为了在政治利益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策上的载辞。春秋时代，盟誓之风盛行，《春秋》、《左传》中，关于盟誓的记载很多，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的二百五十四年中，诸侯国之间的盟誓就有近二百次，其他没有记载下来的更不知有多少。

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散见于铜器、陶器、货币、玺印以及竹简、帛书。1965—1966年在山西省侯马市的春秋战国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玉石文书，即侯马盟书。据研究，这批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的六卿之一赵鞅在晋国都城——新田主盟宣誓的官方文书。它们用毛笔书写，书法熟练，当出自祝、史一类官吏之手。这一批盟书，为研究秦统一六国前我国古汉字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宝贵的资料。盟书中的字体，有些仍然保持着殷商西周文字的形态；它们内容基本相同，用字也多重复，却有一些异体字，再加上一部分假借通用字，就显得甚为繁杂。遇到盟书中不认识的字，可查考《侯马盟书字表》，见《侯马盟书》，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该字表由六百五十六件侯马盟书摹本汇集整理而成，分单字、合文、存疑字、残字四个部分。单字部分首列本体字，异体字则依字形不同特点附列于后，计收本体三百八十一字，异体一千二百七十四字，依本体楷释笔画多少顺序编次；单字及合文部分，每一本体字下均注明盟书中使用的辞例。为了便于同《侯马盟书》中的图版、摹本相对照，每字下均注明盟书编号。存疑字部分收录四十六字，残字部分收录一百二字，皆按盟书编号编次。本字表后附《单字、合文检字》，分别按笔划多少编排，查考方便。

#### 四、查考语词

（一）一般查考语词，可使用常见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商务印书馆1950年初版，后经多次修订再版，以“1977年修订重排本”为最新。新本共收常用单音字九千多个，复音语词一万五千余条；注音以普通话读音为准，用拼音字母和注音字母标音，附注同音汉字；字头按四角号码排列；书前有四角号码查字法和新旧四角号码对照表，书后附音序检字表和部首检字表。它是一部查考便利，释义简明，观点较为正确的词典。但是，这部词典

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收录的语词又有限，只可供一般查考之用。《汉语小词典》，汉语小词典编写组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该书以现代汉语为主，兼收一部分专科词目，共收单字和复词一六二九八条（其中单字七一九七个，复词成语七一九六条，百科名词术语一九五条）。单字按汉语拼音音节排列，标明声调，并加注汉字直音。复词、成语或释文中的异读字和难字酌注汉语拼音。另附《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和《笔画检字表》备查。复词成语等根据第一字列于相应的单字之后，并按字数顺序排列，同字头的按笔画先后。复词、成语或复义中难读的字、词，酌加注释。

《辞海》（语词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出版。本册收录词目三万八千六百余条（其中单字一万五千六百余条），包括一般词语（复词、词组和成语），古籍中常见的专科词语，少数习用的专科词语。字头按部首排列，同一单字起首的词目列于单字之后。单字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标明声调（轻声不标），比较冷僻的字加注直音，复词和成语一般不注音。释义主要收列现代通用义和古籍中比较通用的古义，书证一般都注出篇名。本书上册正文前有《辞海部首表》、《部首查字法说明》、《部首调整情况表》、《新旧字型对照举例》、《笔画查字表》，下册正文后收有《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索引》，查考方便。

《汉语词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原名《国语辞典》，全书八册，商务印书馆 1936—1945 年出版，1947 年再版时合订四册，1957 年出版简本，改名《汉语词典》，精装一册。原书收词汇约十万条，按注音字母注音，创复词全部注音之例。主编黎锦熙在序言中指出该辞典的用处有六：正音，定词，释义，小孩子作文查汉字，习熟了注音字母的人查汉字，外国人懂得汉语的人进修汉语。这是不错的。本书的特点还在于，收集了宋元以来白话文学作品里的词汇，以及北京话的口语词汇。注音方面，初步确定了词儿连写，对轻声、儿化音作了明确规定。但是，解释较为简单，引文只举书名，不便查对，是其不足处。《汉语词典》是《国语辞典》的删节本，只保留作为原书特点的北京话词汇和有翻检必要的古汉语材料，专备语文研究、教学上参考之用，而非全面收罗词汇，供一般应用的。删节后存词汇七万多条，加注直音，并增编了部首检字表。

上面介绍的《辞海》语词分册、《国语辞典》、《汉语词典》，内容虽比一些小词典要丰富得多，但一些专门的条目，还应当求助于其他词典。

（二）查考百科语词，可使用《辞海》（1979 年版），《中文大辞典》，旧的《辞源》和《辞海》，以及日本人编的《大汉和辞典》，苏联人编的《苏联百科辞典》。旧的《辞源》、《辞海》，已作过介绍，这里从略。现在只介绍其他几部辞典。

《辞海》（1979 年版），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这是一部百科辞书，共收单字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二个，词目九万一千七百零七条。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



织，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等。所收词目，以解决一般读者学习、工作中质疑问难的需要为主，兼顾各学科的固有体系，释文主要介绍基本知识，力求简明扼要，并注意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全书的编制是以单字带词目，单字按部首分部排列，同部首的字按笔画顺序排列，同笔画字按起笔排列。字体以《简化字总表》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字形以《印刷通用的字形表》为准，人名、地名、书名、篇名以及古籍文句，一般用简化字，可能引起误会的，则保留原来的繁体或异体。单字的注音用汉语拼音字母，标明声调（轻声不标），冷僻字加注直音，同义异读的，原则上根据《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表初稿》注音。全书装订成上、中、下三册，各册前冠有辞海部首表；上册前还编有部首查字法说明，包括部首调整情况表、新旧字形对照举例、辞海部分部首名称表、辞海部首笔画笔形索引、辞海部首笔形索引和笔画查字表；下册后编有汉语拼音索引和其他附录。

《中文大辞典》，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文化研究所 1962 年出版第一册，至 1968 年出齐四十册，1972 年出版修订普及本，合为十册。全书收单字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八个，辞汇三十七万一千二百三十一条，是一部收录单字和辞汇最多的中文大辞典。本书注意中国文字的源流，对于字形和字音，依时代先后为次；字义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顺序排列。单字的采录，包括正体、或体、古字、略字及俗字、后起字，其来源以《康熙字典》为主，并参考古代各种字书。辞汇的采录，以成语、术语、格言、叠字、诗词语、人名、地名、职官名、年号、书名、动植物名、名物制度等为主，来源以经、史、子、集文献为主，参考类书和辞书。字义的解释，主要说明构造与本意，各种训义之渊源，形音义三者之关系，及其疑义异说。字形，上溯甲骨、金文，以及篆隶楷草之变化，依其时代先后为次。字音，先注该字本义之反切，次列该字见于平水韵的韵目，后用普通话与拉丁字母注音。全书的编制是以单字带辞汇，单字原则上按《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再依字形起笔为序。第一至卅八册为辞典本文；第卅九册和第四十册为索引，包括部首检字表、笔画检字表和部首、笔画索引。

《大汉和辞典》，日本诸桥辙次编著，大修馆书店 1955—1960 年出版，精装十二册，索引一册。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九百个，附有篆文一万零一百个。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但加收了我国其他字书的字和一些日本字。全书的编制是以单字带复词、成语，单字按部首排列，其下复词按日语字母音序排列。单字的注音：包括日语拼音，《集韵》等韵书的反切、韵部，注音符号和拉丁字母拼音；有几种音义的字，注音分列几项，和释义相对应。字头之下还列有小篆、古文等书体。此外有“名乘”、“解字”、“参考”。“名乘”专门注出日本人用这个汉字作为名字时的特殊读法。“解字”主要就象形、指示、会意三方面说明该字的结构和本义，并阐述各种训义发生的经过。“参考”说明字形、字音、字义的疑义或异说等等，除补充本字释义之未尽，并举出字形参似的字，指出其同异之所在。这是一部现在世界上收

录汉语字词最多的辞典之一，原为日本人学习汉语而编，它以汉字为词头，征引材料大都是汉语，凡一般词典查不到的字词，包括人名、别号、地名、年号、官名、书名、称谓、成语、典故、格言、俗语以及普通词语、专科术语等等，不妨用此查考。但是，使用这部大辞典时，除应注意其立场观点外，也不能忽略它征引材料方面的缺点、错误。例如，该书对地名区划的解释，只根据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以明代的十三司为单位，而很少涉及清代，更不要说解放前后的变化了。遇到这种问题，查考新版《辞海》就好得多，这也是应当注意的。

此外，查考百科语词还可参考《苏联百科辞典》，（苏） .A.符维金斯基等编，时代出版社 1958 年据俄文第一版翻译出版。全书收编词目四万条，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但使用这本辞典，一定要注意其中的错误，特别是编者老沙皇侵略行径辩护的反动观点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歪曲。

（三）查考现代语词，可使用《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 1965 年初版，1977 年重印。本书是以收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共约五万三千条。全书条目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全用汉语拼音注音；释义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不详列古义，解释较为精确，是一部查考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词典。各条目所用汉字形体以通行的为标准，异体字（包括繁体），加括号列在正体之后。书前冠有《新旧字型对照表》、《部首检字》、《四角号码检字》，以便寻检。

此外，尚有《新名词辞典》、《新知识词典》，亦可参考。

（四）查考古籍中的语词，可使用《辞源》修订本和《尔雅》之属的古词书。

《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根据同《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该书确定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对象，同时也作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用书。全书分为四册，预计 1981 年出齐。修订本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增补了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也删除了少数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目。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广韵》或其他韵书的反切与声纽；有几个读音的，分别注音。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演变；多义的单字，其解释一般以本义、引申、通假为先后。书证都注有作者、篇目和卷次。全书仍用繁体字，加新式标点。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大约汉初学者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补而成。今本《尔雅》是晋郭璞的注本，全书按内容分为十九篇。第一篇《释诂》、第二篇《释言》、第三篇《释训》所收为一般词语，将古书中同义词分别归并为各条，每条用一个通用词作解释。以下十六篇是关于各种名物的解释，分别为《释亲》（亲属）、《释宫》（宫室）、《释器》（器物）、

《释乐》（音乐、乐器）、《释天》（天文、气象、祭祀、狩猎等）、《释地》（地理、物产）、《释丘》（丘陵）、《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尔雅》虽保存了先秦训诂的重要资料，但是，作为一部词典而言，它的编制还很原始，如果没有后人的注释，是很难读通的。

汉晋至唐，为《尔雅》作注者甚多，只有晋郭璞的注传到现在，它以晋语释古语，在语言学上有重大贡献；宋邢昺据郭注作疏，即现在通行十三经注疏本《尔雅注疏》。查找《尔雅》中的词语，可使用《尔雅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出版。该书以1926年上海锦章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十三经注疏本为准，按字或辞标目。但为节省篇幅，凡虚字不立目，如“密、康，静也”一句，密、康、静皆立目，也字不立目。每目之下皆缀原句及该句所在处。字词按“中国字度撷法”排列，并有笔画检字、拼音检字，查找方便。

清代学者为补正邢昺的不足，另撰新的疏解，其著名的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此外，王念孙的《尔雅郝注刊误》（见罗振玉刊《殷礼在斯堂丛书》）也应参考。

《广雅》，魏张揖撰。据张揖上《广雅》表，该书原分上中下三卷，凡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字。后因辗转传写，分为四卷，又析为十卷，再并为三卷，今本则仍为十卷，但文字已不足原数。本书为补充《尔雅》之作，编制也仿《尔雅》，分为十九篇，凡周秦两汉古书之训诂，为《尔雅》所未载的，尽量收录。但是，该书也和《尔雅》一样，解释简略难懂。隋曹宪为《广雅》作音义，并避炀帝讳，改名《博雅》，曹宪的音义本就被称为《博雅音》。清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对原书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次序错乱者一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都一一作了校补。王氏晚年还撰《疏证补正》一书，又补正五百零一条。《广雅疏证》有《四部备要》本，据王氏家刻本排印；《丛书集成》本，据《畿辅丛书》本影印。此外，《广雅释诂疏证拾遗》、《广雅疏证拾遗》、《广雅疏证补正》、《广雅补疏》，均可补疏证之遗，有参考价值。

《释名》，又名《雅》，相传是汉末刘熙撰。该书体例仿《尔雅》，但解释词义完全采用音训，即用同音字或近音字解释词义。其编纂目的在于探讨字词得名的由来，因此，除了简单解释字词意义外，还指出这个词得名的原因。书按名物分类为释天、地、山、水等二十七篇，共计一千五百零二条。清代关于此书的研究也不少，主要有：毕沅著《释名疏证》和《释名补遗》、《续释名》，以及王先谦与王启原等著《释名疏证补》。《疏证》有《经训堂丛书》本，《丛书集成》据以影印；《疏证补》有长沙思贤书局本、《万有文库》本。

专供查考古代语词的工具书很多，若要作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

(五) 查考联绵字，可使用《辞通》、《联绵字典》。

联绵字是指由两个音节联缀成义而不能分割的词。它或有双声、迭韵的关系，如“玲珑”（双声）、“徘徊”（迭韵）；或没有这样的关系，如“蜈蚣”！或同音相重复，如“匆匆”。而且，这种联绵词，在长期书写过程中，还形成了声同音近相假借和义同通用的规律，使得一个词往往有不同的写法，如“罪罪”作“菲菲”、“ ”、“翻翻”，“侏儒”作“朱儒”、“株孺”、“株拘”、“櫛儒”等。这往往会给阅读古籍、理解文意带来一定的困难。

查考联绵字的工具书，可以上溯《尔雅》释训篇，宋代张有的《复古编》，则已标出联绵字目。专辑联绵字的工具书在明代有朱谋 的《骈雅》、清代吴玉搢有《别雅》，但这些书只是按类排比联绵字的材料。对联绵字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使读者因声求义，掌握同声相假的原则，通晓古汉语词汇的形体、读音、意义的异同，当推《辞通》和《联绵字典》。

《辞通》，朱起凤编，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编者在“自序”中谈到，清光绪末在家乡教书时，因为不知道“首施两端”和“首鼠两端”实为一语，受到学生的指责和讥笑，于是发愤读书，辛勤摘录，积三十多年而编成此书，初名《蠡测编》，又名《读书通》、《新读书通》。

全书收录合成词四万条，按平上去入四声，取词的尾字韵分别编次；基本上以常见词列在最前，注明读音和意义；把和这个词意相同而形体相异的词附于其后；每词列举例证，注明书名和篇名；有的还加按语，指出音近假借、义同通用、字形讹误等项。如“五岭逶迤腾细浪”句中的“逶迤”，翻开《辞通》，不仅可以查到作什么解释，而且可以看到有威夷、透夷、痿、委蛇、透裨、裨、透随、委佗、委它等二十多种同义异文，并一一注明出处。卷首有《辞通检韵》，按韵寻检；卷末有《辞通索引》，按四角号码寻检。又附《笔划索引》，供不熟悉上述两种查法者，按笔画查检四角号码。

《联绵字典》，符定一编，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正文十册，又索引一册。该书收录唐以前古书中的双声、迭韵、迭音及其他联绵词，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音，作简单解释，再旁引书证，有的还加按语。有些词有不同的写法，或与他词相通，则分条注明。

(六) 查考语词，还可利用专科性词典。所谓专科性词典，是相对百科词典而言。凡专门收编某一学科语词者，都可称专科性词典。如《辞海》的各分册本（已附在百科词典中介绍）、《诗词曲语辞汇释》、《小说词语汇释》（归入后面“专查文艺作品的惯用语词”介绍），都是属于专科性辞典。下面就现有哲学、语言学、新闻学、教育学、图书馆学及音乐、电影等方面的几部专科性词典作些介绍。

《简明哲学辞典》，（苏）罗森塔尔、尤金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初版，1958年据俄文第四版翻译出版中文第二版，1973年三联书店重印。全书收词目六百一十条，按笔画排列，文中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处，都注

明中译本的卷次页码，较便读者。但是，该书中也有错误。毛泽东同志 1957 年《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 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选集》五卷，第 347—348 页）

《新闻学小辞典》（初稿），复旦大学 1976 年编印。收录词目约一千条，按内容分为：无产阶级新闻学主要著作，通用词汇，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电影，新闻工作者、政论家、新闻学者、专栏作家，新闻界两条路线斗争、新闻批判，中国新闻事业，外国新闻事业，资产阶级新闻学等。

《教育大辞书》，唐钺等编，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出版。

《图书馆学辞典》，卢震京编，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出版。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 1940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大辞典》的改编本，有的部分虽有扩充，但总的来说，内容大为减缩。《简明音乐辞典》，（苏）多尔然斯基编，上海音乐学院编辑室译，音乐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电影术语词典》，洪深编，上海天马书店 1935 年出版。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 1921 年初版，1939 年四版。本书采辑佛学书籍中的专门名词、人名、书名等等加以解释，全书约三百万言，收词目三万余条，按笔画排列，每词之下，先注明其为术语或书名、人名、经名，然后解释，这是我国佛学辞典中较为浩博的一部。本书虽为佛学专科词典，但因汉语中佛学语词较多，如出自佛经的“世界”、“因果”、“宗派”、“偶像”、“佛”、“塔”等，已成为汉语的基本词，由此而派生的更多，所以，这部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可供一般参考之用。

另有《实用佛学辞典》，佛学书局 1934 年编辑、出版。

《佛学小辞典》，孙祖烈编，医学书局 1919 年出版。均可查考。

《圣经辞典》，上海广学会译，广学会发行，1916 年出版。

《世界知识辞典》，世界知识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出版，有国际事件、国际文献、国际组织、国际事务用语及各国重要政党、群众团体、人名、地名、报刊、通讯社、垄断组织、种族、语言、宗教等类，共三千五百余条，选材一般截止 1959 年 6 月。查考这方面的词语，还可参考《各国概况》、《世界知识年鉴》、《联合国手册》等书。

《外来语词典》，胡行之编，上海天马书店 1936 年出版。该书汇集古今外来语三千多条，按首字笔画排列，每条大都附有原文，可供参考。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名凯、刘正琰著，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年出版。这是一本研究现代汉语外来词的专著，全书收编外来词一千五百多条，按其来源不同，分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

语和我国少数民族语八类排列，可供参考。

## 五、查考成语、典故、方言、俗语

成语、典故、方言、俗语不仅见于口头，在书报中也常常碰到。如果运用得当，确能收到使文字简炼、生动活泼、寓意深刻的效果，但也往往会给理解文义带来一定的困难。遇到这种情况，应查考有关的工具书。

查考成语、典故、方言、俗语，一般可使用下面几种工具书：（1）《汉语成语小词典》和《汉语成语词典》。前书原由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语言班编，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初版、1972 年出版“第三次修订本”，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全书共收成语三千三十条，收编范围除一般成语外，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类似成语或正向成语方向发展的词组，也酌予收入。全书对所收成语均用汉语拼音注其音读，释义注意它的现实意义，如有出处、典故，也酌情引述。书中条目按首字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附序表、条目笔划索引，以供查检。后书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年 8 月出版。该书收录成语五千五百条（包括少量熟语），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附有音序表和按笔画排列的条目索引，成语中的每个单字均注明音读，容易读错、写错或错解的字词，以“辨误”标出正确的字音、字形和意义，释义简单明了，并注出成语的出处，较前书有所提高，是一本较重要的成语小词典。另有《成语辨析》，倪宝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出版。书中收经常容易用混、用错的成语三百七十个，分为一百七十五组。放在一组辨析的成语，相互间有以下几种情况：意义相近，形体相似，语素相同而次序不同，同出一源，有意义上的交叉关系。书中对各组成语，先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再辨析含义的相近、差异，并举出“病例”和正确的例句。全书按各组成语首字的音序编排，书末附音序索引。（2）《现代汉语成语词典》，范方莲等编，商务印书馆 1959 年出版。该书收录现代汉语成语三千二百多条，亦可查考。（3）《汉语方言词汇》和《汉语方言字汇》，均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分别于 1964 年、1962 年出版。前书是一本汉语比较方言词汇，共收普通词目九百五十条，每条下列出全国十八个方言点的同义词，并用国际音标注其音读。书前有各方言点声韵调系统表和分类词目，书后有音序词目索引，以便查考。后书是北京话和全国十七个方言点的字音对照表，收二千七百余字，可与前书参照使用。

以上三书都是常用的成语小词典，收编的内容有限，若要专门查考古代的成语、典故、方言，还应使用下列各书：

《通俗编》附《直语补证》。《通俗编》，清翟灏编，该书收录汉语中的俗语、方言、语词五千多条，按内容分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等三十八类，条目下征引众说，凡经传子史、诗文词曲小说以及诗话、艺谈、

佛道典籍中的材料，无所不取，有的还能探索语源，说明演变，颇有参考价值。该书的特点还在于所收不少词语在今天还活在群众的语言中，如“坐井观天”、“含血喷人”、“沾沾自喜”、“锦上添花”，而作者都曾引经据典考证其出处。此外对若干简笔字下了考订工夫，如“伪字”条下说：“字有省笔者，却未得尽斥为伪，如‘萬’之为‘万’、‘禮’之为‘礼’、‘從’之为‘从’、‘處’之为‘处’，多属《说文》本字，或见于经传大典，士君子所不避也。”但是，该书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错误，如类目烦琐，或分类不当，以至个别条目引用书证有误，等等。

清梁同书把翟氏书中所遗，或举一语而征引不同者，汇为《直语补证》，录词语四百余条，可作为《通俗编》的补编使用。

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出版以上二书的汇编本，并增《通俗编·直语补证索引》，按词头四角号码排列，查找方便。

《恒言录·恒言广证》，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汇印本。

《恒言录》，清钱大昕撰。该书收录汉语中的成语、方言，又经张鉴、阮常生补注，内容益加详密。全书分为十九类，共计八百多条，各考其源流，对汉语词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体例虽然类似《通俗编》，但分类较为简明，有胜前书。《恒言广证》，清陈鱣著，对《恒言录》和张、阮两家补注又有所补充，1958年商务印书馆据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陈鱣手稿排印。以上两书均分吉祥、人身、交际、毁誉、常语、单字、叠字、亲属称谓等十九类，汇印本更增编四角号码索引，查找方便。

《迓言等五种》，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该书包括清钱大昭著《迓言》、清平步青著《释谚》、清胡式钰著《语囊》、清郑志鸿著《常语寻源》、罗振玉著《俗说》等书，并增编《迓言等五种综合索引》，按词头四角号码排列，附于书后，查检便利。

《方言校笺及通检》，周祖谟校笺，吴晓铃编通检，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汉代扬雄撰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全书按照词的内容分为十六类，凡六百六十九条，共一万二千九百余字，以当时的方言释古语，以通行语释方言。晋代郭璞用当时的口语为《方言》作注，多所阐述。周祖谟的《方言校笺》是以四部丛刊影印宋本郭注《方言》为底本，参考了历代有关《方言》的研究，为一部集大成的善本。吴晓铃的《通检》，对《方言》及其注里的字词均列为条目，按笔划编排，查检颇便。

《新方言》，章炳麟著，收在《章氏丛书》内，浙江图书馆1917年校刊本。全书收方言八百条，按内容分为《释词》、《释言》、《释亲属》等十一篇，附《岭外三州语》一篇，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话词语。他鉴于前人有关方言研究中的弱点，在《新方言》中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从时间和地域两方面出发，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说明方言词的变化，这原是一大进步，但他又硬要把“笔札常文所不能悉”的现代方言中的难通之语，都上溯一、二千年，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中找“本

字”，就不免发生穿凿附会的情况了。此外，他直接以近代方言和周秦汉魏的古语相比较，跳过了唐宋元明间语言的发展变化，也给他的方言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该书对古今语言的研究还是有贡献的。

查考一地方言的还有清吴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胡朴安的《泾县方言考证》、杨树达的《长沙方言考》等等。至于专供查考文艺作品中方言的工具书，将另外介绍，这里从略。

查考歌谣、谚语，可使用下列各书：

《古谣谚》，清杜文澜辑，有清咸丰十一年曼陀罗华阁丛书本，光绪十八年扫叶山房本，中华书局 1958 年校点排印本。该书收编清代以前古书中的歌谣谚语及一些格言、成语、典故等，采录范围较广，是一部古代谣谚总集。全书分经、史、子、集，以时代为序排列，每条拟有标题，注明出处，并引录原书上下文，以便理解。书后附明杨慎《古今风谣》、《古今谚》、清曾廷枚《古谚闲谈》以及《谣谚集说》。

《中国谚语资料》，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资料室主编，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五五级民间文学小组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年出版。该书收谚语四万五千八百十四条，上、中册是一般谚语，下册是农谚。另有歇后语三千八百 五条，附在一般谚语之后。收集范围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谚语，有些条目后还注明流行地区。

供查考语句出处和词章典故的工具书，如《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类书，入“查考古代事物的工具书”介绍；《十三经索引》、《杜诗引得》等专书索引，入“查考专书字词文句出处的工具书”介绍。

## 六、查考文艺作品的惯用语词

诗词、戏曲、变文、小说等文艺作品中的惯用语词，丰富多采，五光十色，其中有流行一时的口语，局限一地的方言，民间习用的俗语，江湖上的黑话，以及经文人推敲锤炼之词，往往含意特殊，读之费解。但是，旧的词书和新的词典对这些词语的收录，注意较少，需得查考专门工具书，才能找到满意的解答。这方面的工具书也不少，已有《诗词曲语辞汇释》、《金元戏曲方言考》、《元剧俗语方言例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小说词语汇释》、《方言词释例》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查考诗词戏曲中的惯用语词，可使用《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著，中华书局 1957 年初版，1977 年重印。全书选录唐宋诗词、金元杂剧中流行的特殊语词，包括单字和短语。这里所谓特殊语辞，大部分是虚词，也有一些是实词，不过其意义复杂难解，或容易弄错。前人对这类语词做过一些研究工作，而全面系统地研究，著为专书，当属《诗词曲语辞汇释》。本书收录的语词中，每个语辞有不同含义的，一一分条解释，各举数例，细致地辨别情味、语义的差异；有些条目，还由词义的解释推及语源的探讨和文



法的分析。由于著者采用了诗词曲三者自证和互证这种办法，又从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五项来分析一个语辞，因此解释颇多可取，不仅可供阅读诗词曲时查考之用，而且为研究诗词曲汇集了大量可贵的资料。

当然，此书也非尽善尽美之作，解释不当或不够之处，间有存在，需要注意。卷首列词条总目，卷末附笔画索引，查找方便。

专供查考诗词中方言的，还有清代李调元的《方言藻》，有《丛书集成》本。

专供查考金元戏曲方言的有：《金元戏曲方言考》，徐嘉瑞著，商务印书馆 1948 年初版，1956 年修订本。《元剧俗语方言例释》，朱居易著，商务印书馆 1956 年初版。前书是近人研究戏曲方言的第一部专著，但由于草创和当时所见材料的限制，既举例不广，证据薄弱，又不免产生一些错误。初版收词语六百条，修订本补充了原有一些词条的例证，并增加新条目一百五十条。后书内容较为充实，收词语一千余条，其中有前书和《诗词曲语词汇释》未收的条目二百余条，还有二百余条虽见于二书，而举例和解释则不尽相同。因此，查考金元戏曲方言时，上述三书可参照使用。

（二）查考变文字义。变文是流行于唐五代时的民间文学，其形式是诗、文间用，有说有唱。内容以故事为主，大多取材于史书和民间传说，也有取材于宗教经典的。敦煌所出的变文，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汇为《敦煌变文集》，所收变文七十八篇，是自有变文专辑以来最为丰富的一部。由于变文中用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而且假借字和本字并列，简体字和俗体字杂出，声音的转变，以及和古今词义的差异，往往增加今天阅读上的困难。遇到这种问题可查考《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蒋礼鸿著，中华书局 1962 年修订第三版。全书分为：释称谓、容体、名物、事为、情貌、虚字八篇。附录一“变文字义待质录”，为变文中不能解释的词。附录二“敦煌词校议”，为著者校勘敦煌词的意见。这是一部研究变文的重要著作，作者参考了不少有关材料，在整理、归纳变文语词上下了工夫，对变文中某些现已不易理解的难词加以考证和解释，有助于今天研究变文，如变文中忽然、忽尔、忽而、忽如、忽其、忽都作“倘或”解，奴、孛、阿奴作第一人称代词，和“我”相同，男女尊卑都可用，一查该书，就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三）查考古典小说惯用的语词，可使用《小说词语汇释》，陆澹安编著，中华书局 1964 年本、上海古籍书店 1979 年本。该书收录的语词采自清末以前的通俗小说，计逐一加上解释的八千条，还有不需注释的成语二千余条，另辑《小说成语汇纂》附录于后。如《西游记》第十八回的“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还要家怀哩”，这里的“家怀”怎么讲，一般词典是查不到的，翻开《小说词语汇释》，按笔画寻检，即可得知，“家怀”是不客气的意思。

此外，旧小说中还往往有一些俗体字，或者不识，可查《宋元以来俗字谱》，刘复、李家瑞编，1930 年初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重印。这本

书从宋刊《古列女传》、元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明刊《薛仁贵征东白袍记》、清刊《岭南逸史》等十二种书中摘取俗字编成，虽然包罗不了宋元以来的全部俗字，但也十不离九。全书按部首排列，以表格形式上书楷字，下列俗字，分别注明出处；书前有《宋元以来俗字谱检目》，以便查考。

（四）现代文艺作品中的方言，虽然较易懂，但也不是个个都如此，如“二大流”、“斗阵”等，应怎样理解，一般词典也不一定能提供帮助。因此，遇到这一类问题，可使用《方言词释》，傅朝阳编，通俗出版社 1957 年出版。该书从二百多部现代文艺作品中，摘录方言词三千多条，按拉丁语字母排列，每一词条先释义，再引例句，最后注明例句所出书名的代号，按代号查书前的《例句来源表》，即得该文艺作品的书名和作者。书后有词条的《笔划索引》，以便寻检。

### 第三章查考专书中字、词和句子出处的工具书

查考专书中字、词和句子出处的工具书，指那些把某种书籍中的字、词或句子列为条目，按一定的方法进行编排，注明卷次、篇章、页码等项，以便了解字、词或句子出处的引得、通检、索引。

#### 第一节 专书引得、通检、索引的编制

我国古代，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以及知识分子治学时强调遇到疑难“要于腹中检得”，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没有产生查考专书中字、词和句子出处的引得、通检、索引。

“引得”是英语“index”的音译词，意即“指点”，原出拉丁语“Indiae”，日本人译为“索引”，我国沿用该名。此外，我国古代曾有“通检”之名，原出《金史·世宗纪》：大定四年（1164 年）“命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检请路物力”，但显然不同今义。以“通检”为书名，始于清代黎永椿的《说文通检》。该书把《说文解字》的字头篆书改成楷书，按笔画编排，下注原书卷部，提供了查考原书之便。明代傅山的《两汉书姓名韵》，清代汪辉祖的《史姓韵编》，分别摘取正史列传中的人名，分姓汇录，依韵编次，注明出处，以及清代陶冶元的《皇清经解编目》、蔡启盛的《皇清经解检目》等，可以说都已具有专书索引的性质，但是，专书索引的编纂体例的进一步改善及其大量出版，则是本世纪卅年代的事。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于 1931 年开始出版《引得特刊》第一号和《引得》第一号。《引得特刊》收录原书，予以标点校订，再加引得，至 1950 年共出版二十三号；《引得》不录原书，仅有引得，至 1950 年共出版四十一号。四部要籍中的群经诸子、前四史、各史艺文志和食货志、宋辽金元明清传记、太平御览、佛道藏子目、文选、杜诗等书，均被包罗而编制了引得。另有《引得说》，讲编纂引得的原理和方法。

中法汉学研究所于 1943—1947 年，先后编辑出版《吕氏春秋》、《论衡》等的“通检”八部；1948 年到 1950 年，又以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的名义，出版《山海经》、《辍耕录》等书的“通检”六部。

解放以前编印的专书索引，较早的还有蔡耀堂的《老解老》。这是《老子》一书的逐字索引，1922 年印刷，没有公开发行，今已难得。此后，则有顾颉刚的《尚书通检》等的逐字索引，商务印书馆的《十通索引》等的词条索引，叶绍钧的《十三经索引》等的句子索引，以及王重民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等，都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

解放以来新编的专书索引还不多，主要有：《方言校笺及通检》，吴晓铃编通检，科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中华书局 1965 年编辑、出版；《史记人名索引》，锺华编，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后汉书人名索引》，李裕民编，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三国志人名录》，王祖彝编，商务印书馆 1956 年出版；《晋书人名索引》，张忱石编，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隋书人名索引》，邓经元编，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此外，还重印了一些解放前编制的专书索引。

日本、香港也编制了一些我国的专书索引，具有使用价值，亦可参考。

专书索引按取材对象，可分为下列八类：一、专书逐字索引。这种索引的特点是把某一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列为目，按一定的方法进行了编排，后缀原书中包含该字的句子，并标明出处。它是专书索引中最为详细的一种，查一字，即可知该字出现在何处，出现过多少次。二、专书字词索引。这种索引不同于前者的是，以原书一定的字或词列为条目，它虽然没有逐字索引那样详细，但作用较相近，仍然是一种用途较大的索引。三、专书词条索引。这种索引的特点是，摘取某书中的重要词语，列为条目，一般以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为主，也收录一些普通语词，加以综合编排。它虽然没有前面两类索引那样详细，但对查考原书的内容，也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四、专书句子索引。前述三类索引都可查考句子，但是，还有一种仅以一种或几种书的句子列为条目，按每句首字笔划进行编排，专供查考句子出处的。这种索引，用处也不小。五、专书专名索引。这种索引只收录一书或若干书中的某种专有名词，如某某书的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六、专书篇目索引。它是把某类书的篇名列为目的索引，如《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七、专书引书索引。它是把某书中引用过的书名列为目的的索引，如《尔雅注疏引书引得》。八、专书作者索引。它是把某方面或某些书中的作者列为目的的索引，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

以上八类索引中，按其内容所及，有些已分入本书其他章节，如《方言校笺及通检》入“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四十七种传记综合引得》入“查考人物的工具体书”，《中国地名索引》入“查考地名的工具体书”，《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入“查考书籍的工具体书”，《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入“查

考古诗文的工具书”，《十通索引》入“查考古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太平御览引得》入“查考古代事物的工具书”，其余在下一节具体介绍。

## 第二节 怎样查找专书中字、词或文句的出处

查找某书中字、词或文句的出处，是学术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解决这种问题，可以翻阅原著，也可以利用辞典和类书查考，但是，前一种方法太浪费时间，若没有其他辅助条件，或对原著的内容不十分熟悉，就很难查得；后者虽有查检之便，但它收录的内容，多限常见的字、词和文句，有时还有引证上的差错，或出处不大具体等缺点。因此，如果明确所要查考的内容限于某书时，就应使用专书索引。例如《十三经索引》就是一部较为常用的句子索引。现在报刊上有一些不注明出处的古书引文往往出于《十三经》，如“仁者见之谓仁，智者见之谓智”，出于《周易·系辞》，“殷鉴不远”，出于《诗经·大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出于《孟子·公孙丑》，一查《十三经索引》就能立即知道它们的出处。《十三经》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部儒家经典。《十三经索引》于1934年由开明书店初版，当时附《十三经经文》一册，1957年中华书局重印，删去经文，并改正了旧本的一些错误。索引以诵读时一停顿为一条，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分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条。各条按首字笔画排列，每条之下注明出自某书、某篇、某章；一篇复分若干节者，以阿拉伯数码识之。书前有笔画《检字》、《篇目简称》，查找方便。

如要查考其他专书中的字、词和文句，或要查句中的某个字词，就要找别的专书索引。下面把有关的专书索引，按性质分别予以介绍。

### 一、哲学、政治思想著作

关于哲学、政治思想著作的专书索引。这类索引较多，编制方式也多样，如《周易引得》是逐字索引，《论语引得》、《孟子引得》等书是字词索引，《周礼引得》、《吕氏春秋通检》等书是词条索引，这是首先应当了解的。

《周易引得》附标校经文，燕京大学1935年出版。《周易》是儒家经典之一，内容分为经、传两大部分，经包括六十四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辞；传是经的注释和论述，通称十翼。引得和标校经文，以上海锦章书局1926年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准。

引得以一句为主，逐字均列为目，只要查某句中任何一字，均可得知原句。加《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句，在引得各处作如下排列：（以下句中“ ”代表各目字）

73383 霜  
履 坚冰至  
76370 至  
履霜坚冰  
84373 坚  
履霜 冰至  
82243 履  
霜坚冰至  
01260 冰  
履霜坚 至

引得还一一标明各句的出处，如一百六十八页目字“绳”下。

66816 绳

作结 而为罔罟 45/系下/2；

上古结 而治 46/系下/2；

为 直 51/说/13

以上“ ”代表“绳”字，各句后面，第一斜线前的数字指引得所附标校经文的页码，第二斜线前指某篇，第二斜线后的数字指篇的节数。从而可知，“作结绳而为罔罟”句出于所附经文第四十五页《系辞下》第二节。余类推。

引得按中国字度撷编排，附有笔划及拼音检字，查考便利。

《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燕京大学 1940 年出版。《周礼》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又称《周官》或《周官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引得》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岳氏刊本为准，摘取原书重要字词列目，下引包含该目的句子，后标该句出现的卷、页、面。各目按中国字度撷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又附《各版周礼卷页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所附注疏引书引得，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周礼引得》。

《仪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燕京大学 1932 年出版。《仪礼》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又称《礼经》或《士礼》，简称《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引得》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徐氏复宋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周礼引得》。所附注疏引书引得，编纂体例亦同前书。

《礼记引得》，引得编纂处编，燕京大学 1937 年出版。《礼记》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又被称作《小戴记》、《小戴礼记》。引得以上海锦章书局 1926 年影印江西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的文字为准，凡名词及较重要的动词、形容词皆列为目，下引含有该目的句子，句后标明篇、节。各目按中国字度撷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又附《礼记篇次、节数表》和《开明版礼记节数与他版礼记页数互推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论语引得》附标校经文，燕京大学 1940 年出版。引得和标校经文均

以上海锦章书局 1926 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为准。引得以原书一句为主，逐字或词排列，字或词下皆缀原句，句后皆标页次、篇次。引得按中国字度撷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方便。

《孝经引得》附标校经文，燕京大学 1950 年出版。《孝经》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引得和标校经文均以渭南严氏重刻唐玄宗御注宋相台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

《孟子引得》附标校经文，燕京大学 1941 年出版。引得和标校经文均以上海锦章书局 1926 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

《荀子引得》附标校原文，燕京大学 1950 年出版。引得和标校原文均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

《庄子引得》附标校原文，燕京大学 1947 年出版。引得和标校原文均以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

《墨子引得》附标校原文，燕京大学 1948 年出版。引得和标校原文均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

《吕氏春秋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3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本为准，以词列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词目按首字笔划编排，一词多见的，则按原书卷、页顺序排列。如七划五十三页：

“伯乐学相马 9/10a

—，得十良马不若得一， 24/3a

—相马 25/6b ”

以上“伯乐”为目，“学相马”、“得十良马不若得一”、“相马”均为注，斜线前的“9”、“24”、“25”指原书卷数，斜线后的“10”、“3”、“6”指原书页码，“a”指上面、“b”指下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应读：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其他两句均按字顺读。

通检前有各目首字的法文英文拼音检字，以便不习惯用汉字笔划检字者；又附《各版吕氏春秋卷页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春秋繁露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4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抱经堂校定》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淮南子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4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丛刊》本为准，并参考 1923 年商务印书馆的刘文典《淮南鸿烈集释》，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论衡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3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丛刊》本为准，参考黄晖《论衡校释》，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白虎通引得》，燕京大学 1931 年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影印元大德本为准，并参考卢文弨校刻《抱经堂丛书》本，条目按中国字度撷排列，其余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申鉴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7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丛

刊》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潜夫论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5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备要》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此外，日本也编辑、出版有几部专书索引，因资料的限制，仅列一书目供参考。

书名	编辑出版者	出版时间
四书索引	森木阁藏、经书索引刊行所	1921
五经索引	森木阁藏、东京日黑书局	1935
大戴礼索引	全国书局	1945
列子索引	武库川女子大学	1960
孙子索引	东北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	1971
韩非子索引		
论衡事类索引	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	1960
论衡固有名词索引	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	1960
理惑论索引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66
二程遗书索引	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	1973
二程外书粹言索引	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	1974

## 二、关于文学著作

供查考文学著作中字、词和句子出处的专书索引，我国主要有《毛诗引得》、《杜诗引得》、《说苑引得》、《新序通检》、《世说新语引得》、《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日本人在这方面编制的索引较多，亦可查考。

《毛诗引得》附标校经文，燕京大学 1934 年出版。《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经典之一。

引得和标校经文以上海锦章书局 1926 年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准。标校经文逐篇皆用号码标明，第一篇为《关雎》，第二篇为《葛覃》，……第三百五篇为《殷武》。每篇分数章者，亦逐一用号码标明。引得以句为主，逐字分列，每字之下皆缀原句，后注页、篇、章。引得按中国字度撷编排，书前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

《杜诗引得》，燕京大学 1940 年出版。该引得以嘉庆间翻宋刻《九家注杜诗》为底本，补遗据扫叶山房 1921 年石印仇兆鳌《杜诗详注》增入。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是序、叙例、笔划检字、拼音检字、中国字度撷、杜诗各本编次表、杜诗各本逐卷章次起迄表。第二册是《九家注杜诗》全文和补遗，每题依次用数码标明，诗句亦依次编号。第三册是引得（附补遗引得于后），逐字或词排列，字词后皆缀原句，句后标明出处，即见于第二册的卷、页、行次；诗前有序，仅作人名、地名引得，其他从略。引得按中国字

度撷编排，有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

《说苑引得》，燕京大学 1931 年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本为准，并参考了卢文弨《群书拾补》中的《说苑》校勘记。这是一部词条引得，即摘取原书中的重要词语列目，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全书按中国字度撷编排，附有笔划和拼音检字以助查检，又附《各版说苑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新序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6 年编辑、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本为准，通检按笔划编排，其他体例同前《说苑引得》。

《世说新语引得》，燕京大学 1933 年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说苑引得》。

《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编辑、出版。

此外，日本、香港编辑、出版的专书索引，主要有下列数种。

书名	编者、出版者	出版时间
世说新语索引	广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	1959
文心雕龙索引	广岛文理科大学汉文学研究室	1950
中国古典戏曲语汇索引	名古屋采华书林	1970
董西厢语汇引得	饭田吉郎	1951
还魂记语汇引得	东京文理大学汉文学研究室	1951
水浒全传语汇索引	名古屋采华书林	1973
金瓶梅语汇索引		
儒林外史语汇索引	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	1971
红楼梦语汇索引	名古屋采华书林	1973
儿女英雄传语汇索引		
老残游记语汇注释索引	清末文学言语研究会	1963
瓶外卮语汇索引	天理大学中国学科研究室	1960

### 三、关于史地及其他著作

史地及其他著作的专书索引较多，其中只有《尚书通检》是逐字索引，《春秋经传引得》是字词索引，其他全属词条索引。此外，日本、香港出版的有关索引，亦可使用。

《尚书通检》，顾颉刚主编，燕京学社 1936 年出版。《尚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原称《书》，又称《书经》。它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西汉初，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在孔子故居壁中得《古文尚书》，后佚。东晋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



的合编本。清孙星衍采辑汉魏隋唐旧注及清人研究成果，撰《尚书今古文注疏》，是《尚书》注释本较完备的一种。

通检以江南书局翻刻相台本《尚书孔传》为底本，把原书所有的字列为条目，按笔画次序，后注包括该字的句子，这些句子又按篇、字先后排列。

如按笔画检得十二画的“堯”字，在第一百九十三页：

堯（六字）

010001 典

0008 若稽古帝

170676 予弗克俾厥后惟 舜

510006 昔在帝

0024 作 典

0030 闻之聪明

以上表示“堯”字在《尚书》中出现六次：第一篇第一字和第八字，第十七篇第六百七十六字，第五十一篇第六字、第二十四字和第三十字。

此外，该书还附有中国字度撮法、四角号码、拼音三种检字，查检方便。

《春秋经传引得》附标校经传全文，燕京大学 1937 年出版。《春秋》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终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解释《春秋》的书称为“传”，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春秋》本文则称为“经”。

引得和标校经传全文，以上海锦章书局 1926 年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准，全书分为四册。第一册是经过标校的经传全文，依鲁十二公分为十二篇，每篇又按年为章，章内分段，段皆用数码标明。经传文的排列，首经文，次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经传文异于校勘记的，另列异文。第二、三、四册是引得，以经传文的一句为主，逐字或词列目，字词下皆缀原句，句后标明见于标校经传文的页码，以及篇、章、节，节后则别以经、公、谷、左。全书按中国字度撮编排，附有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

《战国策通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 1948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士礼居仿宋本、即朱姚弘校正本为准，摘取原书中的重要词语列目，按笔划编排，后注包含该词的句子，再标明见于原书的卷、章、页、面。附有法文、英文拼音检字，以助查检；又附《五种战国策卷页对照表》，方便查找其他版本。

《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燕京大学 1947 年出版。引得依据 1903 年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它包括了有名的三家注，即刘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此外，还收录了日本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

这是一部词条引得，它摘取《史记》及上述注释中的人名、地名等重要词语列为目，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句后标明出处。各目按中国字度撮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又附《各版史记卷页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燕京大学 1940 年出版。后人注《汉书》的不下数十家，但唐以前的注本都已不传，现在通行的是唐颜师古根据服虔、应劭、晋灼、臣瓚、蔡谟五家名注，取长补短，加工润色所成的注本。清末王先谦又综合有清一代研究成果，撰成《汉书补注》，这是迄今最好的注本。引得所用《汉书》本文、颜注及考证，据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补注则据光绪间长沙虚受堂校刊本，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燕京大学 1949 年出版。《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刘宋范曄撰，唐李贤注！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引得依据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包括了《后汉书》的原文及以上各注，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清代学者对《后汉书》做了许多补表、补志和补注，其中，清末王先谦以惠栋《后汉书补注》为基础，撰成《后汉书集解》，是一部重要的注本，本引得未予收入，是一大缺点。

《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燕京大学 1938 年出版。《三国志》，晋陈寿撰，全书六十五卷，分《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没有一般纪传体史书中的表、志。刘宋裴松之因原书过于简略，采辑群书一百四十余种为之作注，注文多于原书三倍，而且一反过去注释家的传统方法，重点不是训诂，而是增广异闻，订伪补缺，其价值不亚原书。引得根据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包括了《三国志》原文及裴注，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燕京大学 1938 年出版，中华书局 1960 年重印。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是我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经济史，继《史记》而作的《汉书》以下的纪传史，大都仿其体例，把经济列为专题记述，可是改名《食货志》，不再称《平准书》。这里的《食货志》十五种，即《史记·平准书》以及《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中的《食货志》。引得中《新元史》用 1930 年重刻本，《清史稿》用 1927 年排印本，其余用上海五洲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引得以十五种《食货志》中的人名、地名、货物名、制度、事件等名词为目，其他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山海经通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 1948 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嘉庆间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为底本，摘取书中的重要词语列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句后标明见于原书的卷、页、面。各目按笔划编排。附英文、法文拼音检字及《各版山海经卷页推算法》，方便查检。

《风俗通义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3 年编辑、出版。本书分为两册，上册是《风俗通义》原文及佚文。原文十一卷据《四部丛刊》本排印；佚文六卷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六至四十一，并参酌卢文弨《群书拾补》中的《风俗通义》逸文排印，其中后两卷还根据张澍

《风俗通·姓氏篇》（《二酉堂丛书》本）予以增补。下册是通检，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水经注引得》，郑德坤编，燕京大学 1935 年出版。引得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为本，以水名、山名、地名、人名列目，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刊误引得》，侯毅编，燕京大学 1934 年出版。《刊误》，唐李涪撰，原书五十篇，今存四十九篇，有关唐代典制及社会风俗。引得以《榕园丛书》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苏氏演义引得》，侯毅编，燕京大学 1933 年出版。《苏氏演义》，唐苏鹞撰，今本从《永乐大典》辑出，仅二卷，为考证名物之作，引得以《榕园丛书》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燕京大学 1933 年出版。引得以光绪二十年皖南洪氏重刊本为据，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考古质疑引得》，燕京大学 1931 年出版。《考古质疑》，宋叶大庆撰，原书早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七十四条，定为六卷。其书从六经诸史到宋代著述，各为抉摘其疑义，详为考证，颇多前人所未发。引得依据《海山仙馆丛书》本，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契丹国志通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 1949 年编辑、出版。《契丹国志》，南宋叶隆礼撰。通检依据嘉庆扫叶山房《四朝别史》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辍耕录通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 1950 年编辑、出版。《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元末陶宗仪撰。通检依据 1922 年武进陶湘逸园覆元刊本，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大金国志通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 1949 年编辑出版。《大金国志》，传为南宋时金遗臣宇文懋昭撰。通检以嘉庆扫叶山房《四朝别史》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诸史然疑校订附引得》，燕京大学 1932 年出版。《诸史然疑》，清杭世骏撰。校订以《杭氏七种》本为主，校以《知不足斋丛书》本、《昭代丛书》本、《道古堂外集十二种》本。引得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崔东壁著有《考信录》，是清代一部有关古史辨伪的专著，内容包括有《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等。其书初为陈履和刊行，又收入《畿辅丛书》，但杂著未能全刊。以后顾颉刚搜罗发现崔氏遗稿多种，汇为《崔东壁遗书》，由亚东书局于 1936 年出版，附有引得一册。1937 年燕京大学出版《崔东壁遗书引得》单行本。引得以重要词列目，注该词所在句子，最后标明见于原书的出处。

《六艺之一录目录附引得》，燕京大学 1940 年出版。《六艺之一录》，

清倪涛撰，凡二编，正编六集：金器款识，石刻文字，法帖论述，古今书体，历朝书论，历朝书谱。续编八类：金器题跋，石刻题跋，金石题跋，法帖题跋，续书体论，六书疏略，书论，书谱及书谱续编。目录据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编辑，首列总目，下列细目，目下皆注该卷所在之册数。引得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此外，日本、香港编辑出版的专书索引，主要有下列数种：

#### 第四章 查找古诗文的工具书

我国古代，诗文集的数量丰富，名目繁多，按“四部分类”，“集部”有“别集”、“总集”之称。前者指一个人的诗文集；后者指几个人或许多人的作品合集、选本。同时，“经部”还收编有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以及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近代、现代以来，还再版和新编了一些古诗文集。若要在这浩如烟海的诗文中找一篇或一组需要的诗文，往往颇费工夫。为了收事半功倍之效，就应使用专供查检古诗文的篇目或作者索引。当然，这种索引的数量有限，编制方法也有还不够完善的，远不能满足各方面查检的需要。但是为了帮助解决一些查检上的困难，下面第一节介绍古诗文集的产生、发展及其索引的编制，第二节介绍怎样查找古诗文。

#### 第一节 古诗文集的产生、发展及其索引的编制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可推《尚书》。《汉书·艺文志》载：孔子纂《尚书》“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后人多疑其说。总之，《尚书》诸篇涉及时间较长，非一时一人之作，但它保存了商周时代的一些重要记事、文告、讲话，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春秋时代，旧说为孔子所删定，但后人也疑其说。郭沫若认为，删诗“虽然不一定是孔子，也不一定是孔子一个人，但《诗经》是经过删改的东西，这形式音韵的统一是它的内证”。这种说法较为合适。

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随着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发展，出现了先秦诸子的著作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楚辞》为西汉刘向辑，收编了从屈原、宋玉以至东方朔、刘向自己等的辞赋十六篇，《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为总集之祖”。

汉代的诗文得到进一步发展，既出现了“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或“不歌而诵”的汉赋，又有了《史记》那样的传记文学和流传于社会而后被收入并称做“乐府”的诗歌。其中不少作品反映出较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道路。据《汉书·艺文志》统计，“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

十八篇”，可见当时诗文创作的概况。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晋杜预和挚虞首先分别选辑列代诗文成《善文》和《文章流别集》两部总集。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前书为五十卷，后书为四十一卷。以后，关于诗文总集之作，据《隋书·经籍志》所录，尚有《文章流别本》、《续文章流别》、《集苑》、《集林》等，这些书虽已散佚，但不难由此想见晋宋齐梁间编选诗文总集的盛况。

梁萧统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集。萧统是梁武帝的太子，卒谥昭明，故又称该书为《昭明文选》。它收编了周代到梁初的诗文一百三十余家，成书三十卷，分为三十八类，所列名目与刘勰《文心雕龙》的分类很近似。该书问世以后，历来受到重视，唐代就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从唐宋到明清一千二百多年均被作为诗文的范本，广泛流传，影响很大。由于该书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的标准，故所选骈文较多，今天作为查考之用，则嫌收录文章太少。

该书唐代有两种注本，一是显庆年间的李善注，一是开元年间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诂、吕向、李周翰）注。南宋以后合上述两种注本为一书，名为《六臣注文选》。李善注以胡克家本（附顾广圻考异）十卷为善，有商务印书馆1959年《国学基本丛书》本。六臣注以《四部丛刊》本为佳。此外有敦煌卷子本《文选》、《文选音》等残卷，分别收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及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集印唐钞本第三—一九集中。

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一说此书撰在梁朝，署名是后人所加），是《诗经》、《楚辞》以后我国最早的诗总集。全书十卷，收汉至梁诗歌作品，多绮罗脂粉之词，范围较窄，但也有表现真挚爱情和妇女痛苦遭遇之作，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一名篇即首见此书。清代纪容舒撰《玉台新咏考异》十卷，举不同版本之差别，证其是非，可供参考。

《隋书·经籍志》总结了这一时期的著作和当时所存古籍，著录“别集”四百七十三部，“总集”一百零七部。唐代的进士考试着重文学辞章，更推动了唐代诗文的发展。清代所编《全唐诗》计收两千余家，录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这在诗歌史上是空前的，清代所编《全唐文》，录文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四篇，作者也有三千零四十二人之多。而且，上述数字显然并不是唐代诗文的全数，散佚者当还不少。

我国的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古体或律绝，长篇或短制，都到达成熟阶段。与此同时，还产生了诗歌的新形式——词。词的萌芽可上溯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七曲，而隋炀帝杨广的《夜饮朝眠曲》则已具备词的形式，到了唐代就逐步繁荣起来。唐代作词最早，在艺术上有较大成就的当推诗人李白。南宋黄升编撰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以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冠其首，称“百代词曲之祖”

唐代编纂的诗文总集，流传至今者主要有唐高宗时许敬宗等的《文馆词

林》。原书一千卷，分类纂集先秦至唐代诗文，北宋时散佚。日本保存此书残本约数十卷，复传入我国一部分，乃有《丛书集成》本等。其中所收诗文，有的可补明冯惟讷《诗纪》和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缺。又有《古文苑》二十卷，不著编者姓名，宋代孙洙于佛寺经龕中得唐人所藏，淳熙间韩元吉编为九卷，绍兴间章樵注释分为二十一卷，录东周至南齐诗赋杂文二百六十篇，都是史传和《文选》未收的作品。此书收于《守山阁丛书》，有《丛书集成》影印本。

后蜀广政三年（940年），赵崇祚编的《花间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收晚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只是内容大都写上层阶级的腐朽生活，对后代词风有消极影响。当时南唐也是词坛重心，但因为没有人象《花间集》那样的编者去收集、保存，所以流传下来的只有李煜、冯延巳和李煜的作品。

宋代的诗文继承了前代的成就，特别是词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流传到现在的宋代诗文汇编，主要有：宋吕祖谦编的《宋文鉴》，以及后世编的《南宋文范》、《宋诗钞》、《全宋词》。此外，宋李昉等的《文苑英华》，上续《昭明文选》，起南朝萧梁，迄晚唐五代，选录两千二百家，诗文近两万篇。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则辑录了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歌谣。

金朝元好问在蒙古族灭金以后，编纂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书，收录金代诗文较多，但所选限于当时已逝世人的作品。元代房祺所辑《河汾诸老诗集》，收金之遗老曹之谦等八家诗，可补元书之缺。此外，尚有反映辽、金两朝诗文概貌的《辽文汇》、《金文最》、《全金诗》等书。

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又名《元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选收元初至延祐间诗文，分为四十三类。元傅习采集、孙存吾编《元风雅》，分前后二集，前集十二卷，收刘因等一百十四家，后集十二卷，收邓文原等一百十六家。又有元朝野诗集二册，亦题《元风雅》，编者不详，体例不同前书，传写多误，参差失序，几至不可句读，盖断烂不全之书。但是，二书同出元代，名又相混，而元代诗文传世较少，所以后书也可参考。

明代诗文在数量上不亚于唐宋，然而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创新，诗文的精神也有逊于前代。但是，一些条陈时弊的奏疏和文章，却颇有史料价值。收录明朝诗文的主要有《明文衡》，明代程敏政编，录洪武以后至成化以前的作品。清代黄宗羲编《明文海》，卷帙浩繁，未经刊行，但明代文章赖以保存者颇多。明代还有一种经世文编，如陈九德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以及崇祯年间陈子龙等编的《皇明经世文编》，都保存了不少史料价值较高的作品。

清代知识分子在文化高压政策下，逃避现实，大都把心思才力集中于学术园地，于是朴学大为昌盛，无论经学、史学、小学以及地理、金石、辨伪、校勘、辑佚等等都取得一定的成就。至于诗词散文，虽然在元明之上，终赶

不上唐宋。收编有清一代诗文的主要有：《清文汇》，清沈粹芬编，选清初至光绪间文章一千三百余家，一万余篇，在同类书中收集最广，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选清初至同治间作品。清代的经世文编最初有陆耀之《切问斋文钞》三十卷，继有题名贺昌龄、实为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此后这方面的汇编较多，不再列举。此外，清代对旧诗文的整理，也有成绩，如编集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全金诗》等。

本世纪在古诗文方面，除新编了一些诗文集外，还整理、校订、再版了几种价值较大或传本较少的诗文总集，同时还为一些诗文总集补编了篇目、作者索引，提供了阅读、查检之便。这在下一节还要详细介绍，这里从略。

## 第二节 怎样查找古诗文

为了给读者提供查找古诗文的途径，本节分为：一、查找古代一般诗文，二、查上古至隋代诗文，三、查唐至元代诗文，四、查明代诗文，五、查清代诗文。

### 一、查找古代一般诗文

这里所谓一般诗文，指的是较为常见或具有代表性的篇章。查找这些诗文，可使用选材范围较广，涉及时间较长的作品选集。如《中华活叶文选》，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有1962年合订本，查找较便。《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中华书局1962—1964年出版，原计划中的元明清部分未出版。《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中华书局1962—1963年出版。《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合编，中华书局1962—1963年出版。

以上各书都是解放后编辑、出版的，选收诗文多能考虑到题材的广泛性和风格的多样性，多为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各书对选文都进行了标点，有的还有题解或译文以及作者生平简介，所以，它们既是欣赏、阅读古诗文的选本，又可供查检一般古诗文之用。

专门收编历代歌谣和农民问题文学资料的有下列两书，颇具特色。

《中国歌谣资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该书第一册收上古到五四前的歌谣一千二百九十八首，资料来源主要是元代以后的笔记、地方志、诗文集、通俗小说、戏曲等一千多种古书，凡《诗经》、《乐府诗集》、《古谣谚》里已收的作品则不再选入。《古谣谚》，清杜文澜辑，收录上古到明代歌谣、谚语也较完备，中华书局1958年有断句排印本。

《中国历代农民问题文学资料》，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室资料组

编，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该书收编我国有关农民问题的诗文，按时代先后编排。书中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本事，作了一些题解，可供研究古典文学和古代史者参考。

清代编纂的《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和《续古文辞类纂》等，均可供一般查检之用，因为多数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都收了。当然，这些都是选集，所收的诗文到底有限，因此，有时还需要按时代顺序，使用以下的工具书。

## 二、查找上古至隋代诗文

上古至隋，一则由于书写和印刷条件的限制，二则由于年代久远，图书散失，所以相对说来，传世的作品较少。查找这一时期的诗文，可使用下列各种诗文总集及其索引。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 1958 年据广雅书局本复制重印，分四册。该书编成之后，因卷帙浩繁，没有刊行，到光绪五年曾由蒋壑父子刻《编目》一百三十卷，至光绪十八年（1892 年）王毓藻始刻印全书。书后是《韵编全文姓氏》五卷，原缺，当为严氏未及编成而后补的。全书按时代先后，分编十五集，共七百四十六卷，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五人，撰有小传，文章备载出处，收编可谓宏富。

不过，该书虽名曰“全”，实际上并不完备，不仅道光以后发现文物（包括甲骨、铜器、简牍、石刻和书籍等）上的六朝前的诗文，不可能收录，就是当时可以收入者，也有失之眉睫的。《余嘉锡论学杂著·读已见书斋随笔》曾举出“全三国文”和“全晋文”的失收例，可供参考。此外，也有重复和考订欠佳的，应当注意。

该书旧题严可均编，中华书局 1958 年版《出版说明》也根据严可均自序予以肯定，似乎没有疑问。其实不然。经傅增湘（《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跋》，载《藏园群书题记》卷八）和毅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的作者是谁》，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2 年第六号）先后考订，这部书的编者除严可均外，还有孙星衍、孙星衡、李兆洛等七人，而严可均还不见得就是主编，旧题抹杀其他编者之功，是不公允的。

查检此书的工具书有：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引得》和中华书局 1965 年编辑、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其中以后书为善，它采用中华书局 1958 年本为底本，分为《篇名目录》和《作者索引》两部分。《篇名目录》以朝代为顺序，分：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宋、齐、梁、陈、后魏、后周、隋、唐。每个朝代下以作者为纲，下列篇名，后注原书总页码及上、下面。《作者索引》，按四角号码编排；作者姓名后注明朝代和见于原书的卷次、总页码。另附索引字头笔画检字，后注四角号码，以便不熟悉四角号码者寻检。如要



查阅著名的《出师表》，就可在《篇名目录》的《三国文》找到诸葛亮的名字，下即列有《出师表》，并注明见于原书的总页码“1369”。若从《作者索引》查找，则按“诸”字的四角号码，也能一检即得。

《诗纪》，又名《古诗纪》，明冯惟讷编。全书一百五十六卷，分前集十卷，录先秦古诗；正集一百三十卷，录汉至隋诗；外集四卷，录古小说、笔记中所传仙鬼诗；别集十二卷，选录前人关于古诗的评论。《四库全书总目》称：“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别求。”不过，《总目》也指出其不足，“时代绵长，采摭繁富，其中真伪错杂，以及抵牾舛漏，所不能无，故冯舒作《诗纪匡谬》，以纠其失”。《诗纪匡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可供参看。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清严可均等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下接《全唐文》，颇受欢迎，丁福保仿该书，以明代冯惟讷的《诗纪》为底本，加以增删，并采录清代冯舒《诗纪匡谬》编成。凡汉魏至陈隋的诗和乐府多收集在内，按朝代编次，分为全汉诗、全三国诗、全晋诗、全宋诗、全齐诗、全梁诗、全陈诗、全北魏诗、全北齐诗、全北周诗、全隋诗。中华书局1958年版《出版者说明》指出该书存在的缺点为：第一、各诗沿《诗纪》之例，没有注明出处，并且连自己的案语，也没有说明根据。第二、删去了《诗纪》中汉以前的歌谣、逸诗，不是从先秦开始。第三、诗篇作者考证、绪言及注中的观点，都有不当之处。此外，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样的一部“总集”重排出版，不编制助检的索引，也是一个缺点。但是，该书能把汉至隋代八百多年间的诗篇汇为一集，提供了阅读、查检之便，其功不可灭。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蔡金重编，燕京大学1941年出版。该引得根据1916年无锡丁氏校印《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为底本而编，以全书的作者列为条目，按中国字度撷法进行编排，作者后注明朝代及其所在卷数。条目中除帝王用朝代庙号、公主用封号外，余均以姓名为主，括其字、号、封、谥诸异名于后。另附笔画和拼音检字，以便不熟悉中国字度撷法者寻检。如要查找刘邦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还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按该书的编排法直接查得，也可从笔画或拼音检字中先查得汉高帝的“汉”字，后注“01393”，再按此码查得“汉高帝（刘邦）汉1/1a”（表明刘邦诗见《全汉诗》一卷、一页、a栏）即得《大风歌》全文。

查检上古至隋代诗文还可使用《尚书》、《文选》和《文选注引书引得》中的《文选篇目及著者引得》以及《诗经》、《玉台新咏》、《乐府诗集》、《汉魏乐府风笺》等书。

### 三、查唐至元代诗文

唐宋诗文，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脍炙人口，因此，常有需要查考。

就目前来说，《全唐文》、《全唐诗》、《文苑英华》、《宋文鉴》、《南宋文范》、《宋诗钞》等是查考唐宋诗文的主要书籍；《辽文汇》、《金文最》、《全金诗》、《元文类》、《元诗选》等是查考辽、金、元三朝诗文的重要书籍；另有《彊村丛书》、《历代诗余》、《词综》、《花间集》、《全宋词》等书，可用来查考唐至元代的词。以上书籍大都没有编制过索引，只能直接查找各书的目录。下面分三部份介绍：（一）查唐宋诗文，（二）查辽、金、元诗文，（三）查唐至元代词三个部分。

（一）查唐宋诗文可使用下列各书。

《全唐文》一千卷，序例一卷，总目三卷，姓氏韵编一卷，清嘉庆间董诰等奉敕编，有嘉庆十三年（1808年）扬州刊本，十九年内府刊本，光绪间广雅书局刊本。该书根据清内府所藏旧抄“唐文”以及《文苑英华》、《唐文粹》、《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书，辑录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四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并附小传。全书的文章按诸帝后妃、宗室诸王、公主、臣工、释道、闺彦至宦官次序排列，收录较为完备，是一部重要的总集。清陆心源有《唐文拾遗》七十二卷、目录八卷，又《续编》十六卷，收入陆刻《潜园丛书》，可补《全唐文》不足。

《全唐诗》，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敕编，入局参校者有彭定求、杨中讷等十人。该书以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代季振宜《全唐诗》为底本，并用内府所藏唐人诗集参校，“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四库全书总目》），共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多人，各附小传，中华书局1960年据扬州诗局刻本断句排印，分为十二册，每册前增编篇目，全书末增编作者索引。全书除断句外，也改正了某些明显的错误，并在《校点说明》中指出了原书编辑工作上的缺点，如（1）误收、漏收，（2）作品作家重出，（3）小传、小注舛误，（4）编次不当等。此外，还附录了日本上毛河世宁纂辑的《全唐诗逸》三卷（据知不足斋丛书本）。

《全唐诗文作者引得合编》，林斯德编，山东大学图书馆1931年出版。该引得将《全唐诗》、《全唐文》的作者制为引得，按笔画编排，甚便检查，但其中颇有遗漏，如卷一五六漏去高若思。又《全唐文作者姓名索引》，李之勤编，西北大学教务处1964年油印本。该索引据《全唐文·总目》编制，按作者姓名笔画排列，注明见于原书的卷次，书前有姓名首字笔画检字。

王重民根据敦煌残卷编《补全唐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凡增入唐诗一百零四首，作者五十人，其中三十一人已见《全唐诗》，亦可参考。

查找唐代诗文的工具书，还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4年出版的《唐代的散文作家》，该书是《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部作家的姓名索引，作品系于作者之后。此后，该所还出版有《唐代的散

文作品》、《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等书，均可供查找唐代诗文之用。

《文苑英华》（全六册），宋代李昉等编，中华书局 1966 年主要据宋刊本影印。该书接续《文选》，起南朝萧梁，迄晚唐五代，选录作家二千二百人，作品近两万篇，共达一千卷，分成赋、诗、歌行、杂文等卅八类。其中唐代作品约占十分之九。原刻卷首有一个分类目录，但检查不便。中华书局影印时另编新的篇名总目，列于各册之前；另据篇名总目编《作者姓名索引》，按原书所收作者姓名第一字四角号码编排，第一字号码相同者，按第二、三字编排。作者姓名下列原书所收作品篇目，按书中收录次序先后排列。索引前冠有“索引字头笔划检字”，以便寻检。卷末印入南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和劳格《文苑英华辨证拾遗》，指明原书编纂中的各种错误，论断精确，可供查稽。

《宋文鉴》，原名《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南宋吕祖谦编，有四部丛刊影宋本。该书仿《文选》体例，分为赋、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杂体、骚、诏等六十个类别；选录断自中兴以前，反映了北宋一代的文学面貌和当时的政治情况，后人与《唐文粹》、《元文类》并称，是查找北宋诗文的重要总集。

《南宋文范》七十卷，附外编四卷，作者考二卷，清代庄仲方编，有道光十四年木活字本，苏州局本。全书分五十五类，收诗只选古体，收文以论说文为主，多数作品反映了南宋的政治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宋诗钞》，清代吴之振、吴自牧、吕留良编，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国学基本丛书本。该书原定一六卷，收一百家，刻本只有九十四卷，八十四家，附作者小传。书中有录无诗者有：刘弇、邓肃、黄榦、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裘万顷、谢枋得、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十六家。清代有管廷芬、蒋光煦辑《宋诗钞补》，曹廷栋辑《宋百家诗存》，可补该书之缺。

（二）查辽、金、元诗文，还没有专门的索引，现选五部总集以便读者查阅。

《辽文汇》，陈述编，科学院 1953 年铅印本。辽亡以后文籍散乱，清末曾有缪荃孙辑《辽文存》、王仁俊辑《辽文萃》、罗福颐辑《辽文续拾》。该书后出，收录较为完备，全书按时代先后编排，打破了《文选》系统的分类旧例。

《金文最》一百二十卷，清张金吾编，广州局刻本。元代以后，金人著作流传较少，此书除依据专集外，还广采史传、地志、佛藏、道藏和高丽史等，收录金代骈文、散文，较为完备。全书分为四十二类。

《全金诗》，又名《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御定全金诗》，清郭元釭编，扬州书局本。该书以元好问《中州集》为基础，又广泛采集《归潜志》、《金史》及诸家文集、诗篇，收录亦较完备。

《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元苏天爵编，元统二年刊，另有四部丛刊影元至正本，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国学基本丛书本。该书收编元初至延祐间的散文，分为四十二类，选录精严。但所收止于元中叶，终元之世无人续此书。

《元诗选》，清顾嗣立编，康熙间长洲顾氏秀野草堂刊本。该书共有三集，先后成书，每集再以十天干分甲、乙、丙、丁……十集，其中癸集未完成，因为按照体例，甲集至壬集是分编有别集的作者的诗篇，而癸集则拟收集散见的“零章断什”，更费时间。初、二、三集各录元诗一百家，每家前列小传，后附原集之名。嘉庆时，席世臣补刻《元诗选癸集》，可并看。

### （三）查唐至元代词。

唐代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普遍发展时代，不仅诗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被人们称为诗余的词。词兴起于唐代，是同随着城市经济和中西交通的发展而繁荣的音乐联系在一起，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这种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词的发展。但是，词作为一种既适于歌唱，又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诗体，并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律，还在中晚唐。晚唐五代时期，词得到发展，至宋代达到极盛时期。后人往往把唐诗和宋词并称为我国文坛上的奇葩，这是有理由的。查找唐至元代的词，也没有专门的工具书，主要有下列五种总集可供查阅。

《彊村丛书》，朱孝臧（号彊村）辑，1922 年朱氏刻本。该书收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九种，材料丰富，校勘精密，是一部研究词学的重要资料。

《历代诗余》，又名《御定历代诗余》，清沈辰垣等编，有上海蟬隐庐影印内府刻本。该书辑唐至明词，凡一千五百四十调，九千余首，收录较为广博。

《词综》，清朱彝尊编、汪森辑，中华书局 1975 年曾据康熙三十年裘杼楼刊本断句影印出版。该书收唐至元代五百余家词，计一千九百余首，按时代顺序排列，后附作者笔画索引，以便查阅。

《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 1965 年据 1940 年本改编增补再版。该书旨在汇辑宋代词作，所以网罗散失，虽断句零章，亦加摭拾，计录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各系小传，词作一万九千九百余首，残篇五百三十余首。书前冠有全书（一至五册）目次，按时代先后为序，以人系词，标明篇名和见于该书的页码。后附《作者索引》，按姓名笔画排列。

## 四、查明代诗文

查找明代诗文，除了《明文衡》、《明文海》、《明文在》三部总集外，还可使用《明经世文编》以及收编明代诗词较为完备的《明诗综》、《明词综》。

《明文衡》，原名《皇明文衡》，明代程敏政编，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该书选录洪武至成化前的辞赋、奏议、论说、传记、碑铭及乐府、琴操，只是不收古、近体诗，内容较为芜杂。

《明文海》，清黄宗羲编。该书四百八十二卷，可称卷帙浩繁，惜未经刊行。据《四库全书总目》载，该书“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赋之目至十有六，书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记之目至十有七，传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这虽然有点烦琐，但兼收并采，不少明代人的作品赖此保存下来。胡玉缙、王欣夫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记载了该书的稿本收藏和曾欲刊行的情况，可供参考。

《明文在》，清代薛熙编，有倪霏写刻本，苏州刻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明经世文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卷，补遗四卷，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辑，定稿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刻印成书已接近明亡时期。全书采集明代各家文集中有关议论军事、时政、边防、礼仪、赋役、刑法、农事、海运、水利、财政、科举等方面的奏疏和文章而成，对研究明史有重要价值。清朝列为禁书，乾隆时曾多次禁毁，故成为稀有的珍本，中华书局1962年曾据云间平露堂等刊本影印。原书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编排。书前冠有方岳贡等八篇序言、鉴定名公姓氏、凡例、姓氏爵里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增补了“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和“明经世文编作者姓名索引”，甚便检索。

《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按文章的性质分为政治、文教、武备、皇室四个大类。（1）政治类的子目分为：总论、礼乐、历法、用人、荐举、铨政、职官、谏诤、弹劾、封赠、理财、钱币、赋役、农政、救荒、仓储、漕运、驿递、盐课、茶课、商税、市舶、矿政、户政、刑法、营造、水利、地方行政、外交。（2）文教类的子目分为：太学、武学、科举、国史、舆地、著作、对策、歌颂、纪恩、杂文。（3）武备类的子目分为：军政、将帅、军伍、粮草、军器、马政、城堡、屯田、京营、边防、治安、海防。（4）皇室类的子目分为：修省、讲学、制诰、巡幸、宫闱附外戚、承祧、宗藩、郊祀、坟庙、内供、皇庄、宦官。每个子目之下列出有关文章的篇名和作者，后注明该文见于原书的册、页。

《明诗综》，清朱彝尊编，有康熙四十四年刻本。该书一百卷，录存明代诗人三千四百多家作品，并略述各家生平及有关评论，品评较客观。

《明词综》，清代王昶得朱彝尊遗稿增补而成，选明词作三百八十家，分为十二卷，有明一代词人杰作大致已尽于此，有四部备要本。

## 五、查清代诗文

清代的诗文虽然数量较多，但可供查检的工具书也较具备。首先有《清

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又有《清代经世文编总目录、索引》；收编清诗较多的《清诗铎》，在新版时也编制了《作者索引》。因此，现在仅查词作还要使用《国朝词综》。

《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王重民、杨殿珣等编，前北平图书馆 1935 年出版，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这部索引收录了清人别集四百二十九种，总集十二种，按文章的性质分为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部，书前冠有文集目录、文集提要、著者姓氏索引。

学术文这个部，分经史子集四类，部前冠有详目以便寻检。如要查找清人文集中关于《明史》的论述，先从学术文目录中找到“明史”条，即知有关文章索引在第一百五十八页，再翻到该页，则列有《书明史后》、《明史提要》等五十三篇有关文章，并一一注明作者、出处，甚便检阅。

传记文这个部，分为：碑传、赠序、寿序、哀祭、赞颂、杂类。文中姓氏见于原文标题者，补注其别号、籍贯，按笔划编排，列姓名于目。赠序、寿序、哀诔、铭赞有不能推其名者，仅著其姓。释道亦按名号笔划为次，列于后。另冠传记文目录和传记文姓氏笔划检字，可便查阅。

杂文这个部，分为：书启、碑记、赋、杂文四类。书启一类，内容广泛，有关经史者分别摘出，互见于学术文之部，这里则按原集目次，以作者为纲，依年代排列。碑记一类又分城垣衙署、宫室园亭、祠庙学校、会社义庄、动植物器等。凡以赋名者入赋类，其余则概入杂文类。

此书是现在查找有清一代文章的重要工具书，缺点是它收编的清代文集并不完备，需要注意。

《清朝经世文编总目录、索引》，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 1956 年 8 月编。全书分为《经世文编总目录》和《经世文编总目录索引》两部分。前者按所收经世文编分别编次，实际上只是原书的目录；后者分为《姓氏索引》和《书名·官署名索引》，均按日本五十音图顺序编排，书前冠有日本五十音序人名索引表，中国音序姓氏索引表。这一部目录、索引收编了下列各书：

-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
- 张鹏飞编《皇朝经世文编补》；
- 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
- 葛士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
- 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
- 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
- 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
- 何良栋编《皇朝经世文四编》；
- 求是斋编《皇朝经世文五编》；
- 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

(11) 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

(12) 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

- (13) 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时务续编》；
- (14) 宜今室编《皇朝经济文新编》；
- (15) 于鹄庄编《皇朝蓄艾文编》；
- (16) 王延熙、王树敏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
- (17) 经世文社编译部编《民国经世文编》。

这部目录索引的收编范围虽然较为广泛，但还有以下诸书并未收入：

- 管窥居士编《皇朝经世文续编》；
- 三画堂主人编《皇朝时务经世文编》；
- 求自强斋主人编《皇朝经济文编》。

此外，该目录索引还把《皇清道咸同光奏议》编入，若按此例，同类的书远不止这一种；同时又把《民国经世文编》编入，显得编例混乱，名实不符。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中华书局 1960 年用同治八年永康应氏秀芝堂刻本断句排印，并补编作者索引，按姓名笔划排列，附于书末。本书是一部清诗选集，所收作品起自清初，包括明末遗民，下迄同治年间，附存编者的作品。书前附有《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全书按作品类别编排，分为岁时、舆地、总论政术等一百五十类。本书收进了一些反映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作品，有一定史料价值。《作者索引》，按诗人姓名笔画编排，标明有关出处。

《国朝词综》四十八卷、《国朝词综二集》八卷，清王昶编，有四部备要本。该书辑清初至嘉庆初词作七百余家。又清黄燮清辑《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丁绍仪辑《国朝词综续编五十八卷续补八卷》，可并看。1978 年中华书局香港分店出版的叶恭绰编的《全清词钞》，是清词最重要的汇集，更应重视。

查找上古至清代诗文，除了使用以上总集和有关索引外，历代作家的别集也可供查阅。历代别集的数量繁多，至今还没有专供查找别集的篇名、作者索引，我们也就不再赘述。

## 第五章 查考年代、月份、日期 和大事的工具书

查考年代、月份、日期的工具书和查考大事的工具书，是学术研究工作上经常要用的。为了使同志们对这种工具书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遇到疑难时能选择使用，下面首先简述历法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源流，再具体介绍怎样查考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

### 第一节 历法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源流

#### 一、历法的产生和发展

古代各国家、民族，主要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进行了长期的精密的观察、记录，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整理，于是有了历法。但由于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一年的日数不是一个月的整倍数，也不能用十二除尽，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各种历法。概括而言，古今中外的历法可分为：阴历、阳历、阴阳历三大类别。

阴历又称太阴历，以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作为根据。回历（又称伊斯兰教历）中供历史纪年和宗教祭祀用的“太阴年”，就是一种阴历（另有“太阳年”供农业生产用，是阳历），平年 354 天，闰年 355 天，每年十二个月。回历元年一月一日，以所谓穆罕默德迁至麦地那（Medina）的次日（622 年 7 月 16 日）算起，纪年称希吉来（Hejira），原意是迁移，中国回民通称回历纪元为至圣迁都元年。这种历法现在通行于阿拉伯国家。

阳历又称太阳历，以地球绕太阳的运行作为根据。公历就是一种阳历，它的前身是儒略历（或称旧历）。儒略历是公元前 46 年罗马的儒略·凯撒参考了古埃及的太阳历把罗马的太阴历加以改变而成，他规定  $365\frac{1}{4}$  日为一年，平年 365 日，四年一闰，闰年 366 日；每年分为 12 个月，单月 31 日，双月 30 日，平年的 2 月为 29 日，闰年的 2 月为 30 日。后来继任者奥古斯都大帝从 2 月减去一日加到 8 月，又把 9、11 月改为小月，10、12 月改为大月。因该历的历年较回归年长 11 分 14 秒，久经使用后发生了历日和季节变移，所以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于 1582 年 10 月 4 日下令，以次日即 10 月 5 日为 15 日。改革后的新历叫格里历，或称新太阳历，平年 365 日，闰年 366 日，每年 12 个月。公历纪元按传说中的耶稣诞生年定为公元元年。公元又称西元，常以 A.D.（拉丁语 Anno Domini 的缩写，原义是我主降生年）表之。它始行于公元六世纪，后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故称公元。公元前，或以 B.C. 表示，是拉丁语 Before Christ 的缩写，原义是耶稣之前。

阴阳历是调整阴历和阳历的一种历法。我国的旧历就是阴阳历，它既重视月相盈亏的变化，又照顾寒暑节气，年、月长度都依据天象。历月的平均值大致等于朔望月，又用十九年置七个闰月的办法使历年的平均值大致等于回归年。

夏代历法的确切情况虽然还说不清楚，但商代的历法已规定了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闰月置于年末（或年中）。据郭沫若研究，《殷虚书契后编》所载两个月的干支表，就是当时历法的部分抄本。周代的历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尚书·尧典》就记载着“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就是阴阳历并用的确证。由于对天象的观测已相当精确，这时的历法已具备传统历法中气、朔、闰三个基本要素。关于《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其人以及三代的关系我们不去考证，但这些历法包含着先秦时代积累起来的历法知识，并在不同地区曾经使用过，当没有多少疑问。等分回归年为立春、



雨水、惊蛰等廿四节气的名称虽然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完整提出，但《尚书》中已有提及。先秦时代我国的历法并不统一，但据对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秦简《编年记》等的研究，秦在统一六国前，至少在昭王时，上限在孝公之后，已采用《颛顼轨》，以十月为岁首，未改夏正月名次序（见黄盛璋：《云梦秦简 编年记 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一期）。

汉武帝时，因古历和天象不合，令邓平、落下闳造新历，元封七年（前104年）造成，规定了 $365\frac{1}{4}$ 天为一年，精确度与儒略历相同，但比它早五十多年。汉武帝令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施行新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初历》，也是我国史志所载最早最完整的历法。此后，我国的历法又经过不断改革，出现过不少优秀的治历家。从《史记》、《汉书》记载《太初历》以后，我国正史都分别记载了有关朝代的历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从事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其主要者有东汉编訢、李梵的《四分历》，汉末刘洪的《乾象历》，刘宋何承天的《元嘉历》，至祖冲之的《大明历》，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晋朝虞喜发现的“岁差”，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历法的精密度。以后，隋朝刘焯的《皇极历》，唐代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僧一行的《大衍历》，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是有名的历法。宋代沈括提出过改革历法的重要意见，定一年为十二个月，立春为一月的头一天，惊蛰之日做二月的开始，这样依次类推，不管月亮的朔望，只管时令节气，去掉闰月，彻底实行阳历，故亦称《十二气历》。虽然它合乎农事的需要，但未被采用。直到七百年之后，英国气象局提出同样计划，并实行至今。南宋杨忠辅造《统天历》，定一年为365.2425日，只比回归年差26秒，这种精密度和公历相当，但比它早383年。元代郭守敬等总结旧历经验，并根据实测，造《授时历》，是我国历法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明代《大统历》，实际上是《授时历》的改名，使用二百多年；一直到明末清初才吸收了西洋历法，更造《时宪历》。

辛亥革命的次年（1912年），我国采用公历，但纪年用中华民国年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但为了照顾群众的习惯，旧的夏历仍然通行。

## 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编制

由于历法、纪年法不同，造成了记录时间的复杂化。为了统一不同历法、纪年法的时间顺序，为了查考年代或换算不同记载的年代、月份、日期，为了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以明确的时间概念，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现象，远在周代就产生了记载古代帝王年代的牒记，汉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十表，创造了涉及范围较广的历

史年表体制。《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前 841 年），按年代编次，使我国历史从那时开始有了可靠的年代世系，是一个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共和一词的解释虽然存在着分歧，但从共和元年起到现在，连续二千八百多年，我国的历史有准确的年代，在世界上还是罕有的大事。西汉后期刘歆造《世经》，使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期，都用《三统历》推算并得到说明，虽然它的准确性还不大，但对古史年代的探求作出了贡献，创立了我国的年代学。晋杜预的《春秋长历》则是专门厘定史日之作。

唐宋以后，查考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的工具书有了发展，但因多失时效，故多散佚。如唐封演的《古今年号录》，宋晁公迈的《历代纪年》，钱大昕在清初已看不到全本（见《十驾斋养新录》）。刘羲叟的《长历》仅存于《通鉴目录》之中，原书面目也不可不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有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吕祖谦的《大事记》、王应麟的《历代年号》。元察罕编、明黄谏重订《帝王纪年纂要》，明黄宗羲的《历代甲子考》等书。

清代这种工具书进一步发达。主要有万斯同的《纪元彙攷》、王之枢的《历代纪事年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叶维庚《纪元通考》、李兆洛《历代纪元编》、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

随着近代、现代科学的进步和中外关系的发展，旧有的基本上局限于查考中国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的工具书，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产生了编制更为精密，内容包括中外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的工具书。辛亥革命至 1949 年主要产生了史襄哉、夏云奇的《纪元通谱》，傅运森的《世界大事年表》，刘大白的《五十世纪中国纪年表》，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万国鼎的《中西对照历代纪元图表》，薛仲三、欧阳颐的《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等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新编辑出版这类工具书的同时，还修订再版了几部有价值的旧著。新书的特点是立场观点较为正确，对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给了一定的地位，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前的错误有所纠正。这些工具书在下面一节里还要详细介绍，这里从略。

### 三、年、月、日的别称及其记录方法的变化

第一，我国古代对年的称谓，据《尔雅·释天》：“夏日岁，商曰祀。”唐玄宗天宝三年（744 年），改年为载；到唐肃宗三载（758 年）改元乾元元年，又改载为年。此外，历代王朝一般均称年。古代对月的称谓也不一致，如正月称孟陬，见于《楚辞》；四月称除、十月称阳，见于《诗经》；九月称玄，见于《国语》；《尔雅》还记载着十二个月的别名，《礼记》把十二乐律与十二个月联系起来，分别代表月名。此外还有一些节日名，如元旦、人日、上元等等，不仅在古代作品中累见不鲜，就是近代、现代人的著作中有时也会出现，而我们往往感到生疏。为提供查考之便，特列《月份别名表》、

《古代其他节日在夏历的日期表》作为本章的附录。

第二，干支纪年、月、日。我国用干支纪年的最早记载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但西汉时这种方法还不通行，到东汉元和二年（85年）政府才下令在全国实行，至今没有中断。由此向上逆推，才知道上古某年的干支，一般历史年表所见西汉以前干支，是后人逆推附加上去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干支，就是如此，这一点读史时应该注意。干支纪月在《史记·历书》中已经应用，但此法未甚通行。从甲骨文可知，商代已用干支纪日。通过对春秋日食的研究，证明从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前720年2月10日）起，我国的干支纪日一直连续不断，而且成为通例，这一点也应注意。否则在阅读古籍时，不仅容易把时间弄错，甚至会影响断句和文意。如对《史记》研究有一定贡献的日本人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中，就因为缺乏细心考查干支纪日这种通例，把“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错误地断成“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以《秦始皇本纪》为证，凡是纪日都用干支，数字与日连用总是说多少天，而不是某一天。中华书局新标点本《史记》，在这里就较为仔细。

所谓干支，就是天干、地支的简称。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把十天干的单数和十二地支的单数、十天干的复数和十二地支的复数，按次序相配，可构成六十组合，周而复始，分别用来记录年月日的次序，叫做干支纪年、纪月、纪日。

六十干支表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第三，我国古代曾实行用王、公、侯在位的年代纪年，如前841年为西周共和元年、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燕惠侯二十四年，并以在位年次递增，不在中途改元。但也有例外，如战国时魏惠王初立之年称元年，至三

十六年称王之时又改称元年（前 334 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采上古“帝”位号，曰“始皇帝”，帝号为后世所沿用并以纪年。如汉文帝在位廿三年，纪年分“元”、“后元”；汉景帝在位十六年，纪年分“元”、“中元”、“后元”。汉武帝正式创立年号纪年，此后新君即位绝大多数都更换年号，重新纪元，并有一帝多次改元，或一年内一再改元者。如汉武帝就用过建元、元光、元朔等十一个年号。一年之内一再改元者例如 189 年，汉少帝改元光熹、昭宁，同年汉献帝改元永汉，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复称中平。明清两朝采用一帝一元制。此外，我国农民起义军有时也建立年号，如元代红巾军徐寿辉改元治平、大平、天启。

封建帝王对年号颇为重视，选用的都是些吉祥字，而且追求前所未用。如宋太祖赵匡胤建“乾德”，以为自古未有，后于宫中发现铜镜，上书“乾德四年”字样，以问夔仪，仪奏曰，前蜀少主（王衍）年号（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五《年号重袭》）。这位“稍逊风骚”的最高统治者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唐初农民起义领袖辅公祐也曾用此年号。此外，清人笔记中，考订有关年号问题者不少，而且涉及方面较广，不乏精辟之见，如避讳改年号，地名用年号，钱文书年号，或订史书年号之误者，等等。其中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还载唐以前年号必全书，至宋始有连书从省例，取上一字者有政、宣，建、绍；取下一字者有祐、圣，泰、禧；取上下各一者有熙、丰。明代亦用洪、永，化、治。除此以外，清代以来还有康、雍，乾、嘉，同、光之称，我们均应注意。

## 第二节 怎样查考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

### 一、年代的查考、换算

从事学术研究时，常要换算公元和我国古代的年代，而我国古代的年代又有年号纪年、干支纪年、星岁纪年、黄帝纪年的不同；有时还要查考帝王的姓名、帝号、尊号、庙号、谥号以及日本的年代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使用下面的几种纪年表。

《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编辑、出版。该表是《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的修订本。由于出版较晚，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改正了他种纪年表的错误，内容简要，使用方便，是同类纪年表中较好的一部。全书分为九部分：一、《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包括原始社会及夏、商、周至清各代的起迄年代。二、《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表》，包括春秋时期到清代义和团起义的年代、领导人姓名和建立的年号。三、《旧石器时代表》，包括距今六十万年的蓝田猿人到距今一万年的资阳人的年代和考古发现的年代、地点。四、《新石器时代表》则以仰韶、龙山、青莲岗、良渚、屈家岭细石器文化为纲，包括了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半坡遗址到公元前 1725±95 的齐家文化等，一一注明发现时间、分布地点、“碳 14 断代”。五、《夏世系表》。六、《商世系表》。七、《周世系表》。

(共和以前)。八、《西周共和以后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按时代分为十二诸侯(周、春秋)纪年表、战国纪年表(附周代诸侯兴亡表)、秦纪年表……清纪年表等十四种。九、按笔划编排的《年号索引》。

现录该表八中之一页，略予说明，以见一般。

(续表)

上表的第一栏为公元纪年。

第二栏为干支纪年。

第三栏为王朝。其中的哀帝、平帝等为帝号”( )”内注明其姓名，永始、元延等为年号，后面的阿拉伯数码为该年号年次。“(哀帝④)”表示哀帝于绥和二年四月即位，以后则表示逾年改元建平，建平二年六月改元太初元将，八月又复称建平。公元元年、辛酉后的⑤表示公元元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当于元始元年十一月廿八日。

《中国历史纪年表》，万国鼎编，商务印书馆 1956 年 3 月出版，中华书局 1978 年重版。本表分为上、下编。上编包括历史年代总表和公元前 841 年(西周共和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两千七百九十年的公元甲子纪年表，表中还注明朝代、帝王姓名、庙号和年号纪年。下编包括夏、商、周年代简表、东周诸侯年表、两周诸侯存亡表、秦以后主要朝代年表、十六国年表、十国年表、中日对照年表、公元甲子检查表、太岁纪年表以及该书所载年号的笔划索引。

《中国历史纪年》，荣孟源编，三联书店 1956 年 8 月出版。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历代建元谱。起于公元前 206 年(汉高帝元年)，止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年代顺序把历代帝王姓名、年号、庙号、谥号、尊号汇集而成，便于查某朝、某帝的年号与年数。第二编历代纪年表。起于公元前 841 年，止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时间顺序编排，表中标明公元纪年、干支纪年、年号(包括帝号)纪年。

《中国历史中西历对照年表》，李佩钧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8 月出版。基本内容同上述年表，但每一朝代均注明国都所在地，为其他年表所没有。

以上四种纪年表中虽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为善，但是也不能完全代替，后三表也还各有特色。如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的中日对照年表，包括日本上自神武，下迄昭和二千多年间的天皇和年号以及统治年数，并注明各年号相应的日本纪元、公元年代、中国年代。这是同类纪年表中少有的。荣孟源的《中国历史纪年》中有《历代建元谱》，对查找我国历代帝王的姓名、籍贯、世系、帝号、年号、庙号和统治时间一目了然。李佩钧的《中国历史中西历对照年表》还可查找历朝国都所在地。

查考年代的工具书，还有《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 1973 年出版）。该表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全书分为《年代简表》和《年号通检》。前者以公元纪年和历史纪年逐年对照，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序，列出帝王称号、姓名、年号以及逐年干支。后者按笔划排列年号，列出所属朝代、帝王、使用年限。

此外，新出版的中国通史和断代史，也多附录有关纪年表，这种纪年表的编制往往较为精确，应予以重视。有关历史纪年的专著和考古发现更应随时留意。

假若我们要把公元年代换算成干支或年号纪年，这种问题比较简单，现在通行的纪年表都有中西纪年对照，按时间顺序查到公元年代，后面即注明干支、年号。

用年号纪年换算公元纪年或干支，如这个年号在历史上只使用过一次，换算时较为容易，翻开纪年表中的年号索引，再按索引提供的该年号元年公元纪年或页码，翻到某年，即可得知该年的公元纪年或干支。但是有的年号多次被使用，例如建元曾为汉武帝、汉（前赵）刘聪、晋康帝、前秦苻坚、南朝齐高帝先后使用过五次。在这种情况下，年号要与所属帝王连系在一起，才能确定它的公元或干支。如我们知悉汉武帝建元元年，才能在纪年表中查出这一年是辛丑年或公元前 140 年，而南朝齐高帝建元元年是己未年，即公元 479 年。

用干支纪年换算公元、年号纪年，就需要有其他辅助条件。干支纪年是六十年一个周期，超过六十年同一干支就要重复出现，仅明朝一代的洪武元年、宣德元年、弘治元年、嘉靖廿七年、万历卅六年都是戊申年。因此用干支换算公元、年号纪年时，要知道朝代、帝王名称，但这个朝代或帝王统治时间若超过六十年，辅助条件还得进一步具体，如要知道这个干支是某朝代、帝王的早、中、晚期，才能换算出公元、年号纪年。像清康熙壬寅年就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元年（1662 年），一个是他的六十一年（1722 年）。

在进行年代换算时，我们还要尽可能掌握简便的方法，如把中华民国纪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时，只要在该年数上加“11”，再冠以本世纪数，就是本世纪内的中华民国公元纪年数，如中华民国二年加“11”，等于“13”，再冠以“19”，即是 1913 年，这就是中华民国二年的公元纪年，余类推。又如把日本现行的昭和纪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方法同上，所加数改为“25”即可。

进行中西历年代换算时，还要注意中西历岁首、岁末的差异。大体上说，公元 1977 年是我国农历丁巳年，实际上 1977 年元旦是丙辰年（1976 年）十一月十二日，1977 年 12 月 31 日是丁巳年十一月廿一日，这种岁首、岁末的差异古今都有，少者十几天，多者有五十多天，有的纪年表注明了中西历岁首岁末的差异，有的则不注明。

查考年代的工具书，除了上述几种查考公元、干支和年号纪年的以外，

我们还应当了解查考岁星纪年、太岁纪年或称星岁纪年的工具书，否则遇到这种纪年法就会弄不清楚。刘坦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是一部研究这种纪年法的专著，颇有价值，可供参考。该书中还编制了一个传说中的唐尧元年至汉光武中元二年共 2359 年的纪年表，内容包括三统历上元积年、星次、岁次、历代纪年、鲁公纪年、公元纪年，可供查考之用。

前面说过，我国古代纪年一般用王公在位年次。到战国时代，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星岁纪年法，行于秦汉间，新莽亡后不再使用。但是，这种纪年法的地位，并不因之而消失。尤其是我国古代的年代问题，有的还是悬而未决，所以星岁纪年法还具有校正其他纪年的作用。

岁星就是木星，古人认为它绕天一周的时间是十二年，把它运行的轨道由西向东分为十二次（现称十二宫），分别命名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周而复始用来纪年，叫岁星纪年。《国语·晋语》“岁在大火”就是使用这种纪年法的一例。

后因十二次的方向由西向东，与人们熟悉的十二辰方向背道而驰，用来纪年颇为不便，所以又假设了一个岁星，这个岁星在《史记·天官书》称岁阴，《汉书·天文志》称太岁，《淮南子·天文训》称太阴，让它的方向由东向西，与十二辰一致，用来纪年，叫太岁纪年。据《汉书·天文志》所载战国时代的天象记录，某年岁星在星纪，太岁便在析木，这一年就是太岁在寅；第二年岁星运行到玄枵，太岁便运行到大火，这一年就是太岁在卯，其余由此类推。战国中期进一步取了十二个太岁年名，与十二辰相配如下：

摄提格	单阏	执徐	大荒落	敦牂	协洽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涓滩	作鄂	掩茂	大渊献	困敦	赤奋若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上表据《淮南子·天文训》。落，《史记·天官书》作骆。协，《史记·天官书》作叶。鄂，《汉书·天文志》作噩，《开元占经》作愕，《尔雅·释天》作噩。掩，《史记·天官书》作阏。

例如屈原在《离骚》中说他的出生年月日是“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其中的摄提就是使用太岁纪年法，即寅年的意思。

西汉时代又把十岁阳名与十干相配如下：

阏逢	旃蒙	柔兆	强圉	著雍
甲	乙	丙	丁	戊
庚维	上章	重光	玄默	昭阳
己	庚	辛	壬	癸

上表据《淮南子·天文训》、《尔雅·释天》。《史记·历书》十岁阳名和顺序是：焉逢、端蒙、游兆、彊梧、徒维、祝犁、商横、昭阳、横艾、尚章。

用十二岁阴名配十岁阳名，就组成阏逢摄提格、旃蒙单阏、柔兆执徐……等六十组合，周而复始。若用六十干支来代替，前者即甲寅年，次即乙卯年，再次为丙辰年，余类推。后世使用这种纪年法，是根据当年的干支对照推算出来的，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陈纪》注曰：“起阏逢执徐，尽著雍涪滩，凡五年。”是说从甲辰到戊申共五年。又如鲁迅《祭书神文》一诗，所题写作年代是“上章困敦”，因而今天还需要对这种纪年法有一定的了解。前几年有一本正式出版的鲁迅作品集，在注释“上章困敦”时说是“干支纪年中一种岁阳岁阴的名称”，这种讲法就不大确切。一般说干支纪年指的是用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干支纪年，星岁纪年才包括“上章困敦”等岁阳、岁阴名称。尽管岁阳岁阴名称可用干支来代替，二者之间有连系；尽管星岁纪年早已不通用，鲁迅所书“上章困敦”是根据当年的干支推算出来的，但二者不能等同，不能把“上章困敦”径释成是干支纪年中一种岁阳岁阴的名称。

假若我们要知道“上章困敦”这一年是什么干支，从上述两表中一查即知是庚子年。假若还要把庚子年换算成公元纪年，可参考前述干支与公元的换算，在知道了鲁迅的生卒年代这一辅助条件下，就容易从一般的纪年表中查出这一年是1900年。

此外，还有查考黄帝纪年以及佛、儒、耶、道、回纪年的。《黄帝纪元表》（储学铎编，1938年刻本）。该表上起黄帝元年，下迄黄帝纪元4621年（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每六十年标明黄帝纪元累计数，注明相应的朝代名及其起迄干支、年数、帝王人数、帝王名、统治年数、年号、干支。此外还注明相应的佛、儒、耶、道、回纪年——这是分别以如来、孔子、耶稣、道陵、穆罕默德的所谓生年作为元年，以年递增的纪年法。该表的确切年代，不大可靠，但遇到上述纪年时，可作参考。

## 二、中西回史日、月、年代的查考、换算

查考、换算中西回史的日月年代，主要有涉及时间较长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公元干支纪日速算盘》、《史日长编》、《回历西历对照表》。

《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二书均为陈垣著，解放后修订，中华书局1962年重版。二书均以中西回历对照，这是我国历表的创举，对研究中外关系，查考年月日期提供了方便。前书包括的时间从公元元年到二千年，全书以阳历为纲，注明相应的中、回历年月日。中国纪年包括帝王年号、年代和干支，并注明改元时间。西历在公元1582年以前用儒略历，以



后用格里历；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还注明罗马纪年。回历纪年从回历元年（公元622年）开始。书后附日曜表，供查考星期；干支表供换算日的干支；年号表供检查中国年号，每年号之后注明元年相应的西历纪年。现抄录该历之半页，加以说明，以见一般。

后页表以西历为衡，中历为权，每页分上下栏。

上栏为西历纪年、干支纪年和中国历代纪元。阿拉伯数码为回历纪年。

下栏阿拉伯数码为西历日序，其中的黑体字为月序，并代表其月之首日。日序右旁的汉字数目字为中历之月序，

武癸六	元三金西	武壬六	武辛六													
德未二	年日曜历	德午二	德巳二													
六三	一癸日七	五二	四一													
	月丑中月															
	一为历十															
	日回六六															
	历月日															
2		1														
20	21	22	22	23	23	24	25	25	26	26	27	25	26	27	27	28
21	22	23	23	24	24	25	26	26	27	27	28	26	27	28	28	29
22	23	24	24	25	25	26	27	27	28	28	29	27	28	29	29	30
23	24	25	25	26	26	27	28	28	29	29	30	28	29	30	30	31
24	25	26	26	27	27	28	29	29	30	30	31	3	30	31	12	11
25	26	27	27	28	28	29	30	30	31	5	4	2	31	1	2	2
26	27	28	28	29	29	30	31	7	6	2	2	3	2	2	3	3
27	28	29	29	30	30	31	8	2	2	3	3	4	2	3	4	4
28	29	30	30	31	10	9	2	3	3	4	4	5	3	4	5	5
3	30	31	12	11	2	2	3	4	4	5	5	6	4	5	6	6
2	31	1	2	2	3	3	4	5	5	6	6	7	5	6	7	7

3	2	2	3	3	4	4	5	6	6	7	7	8	6			
4	2	3	4	4	5	5	6	7	7	8	8	9	7			
5	3	4	5	5	6	6	7	8	8	9	9	10	8			
6	4	5	6	6	7	7	8	9	9	10	10	11	9			
7	二	五正	六十	七十	7	8	8	9	10	10	11	11	12	10		
8	6	7二	8一	8	9	9	10	11	11	12	12	13	11			
9	⑨	7	8	9	九十	10九	10	11	12	12	13	13	14	12		
10	8	⑧	9	⑦	10	10	11	11八	12七	13	13	14	14	15	13	
11	9	10	11	⑥	11	⑤	12	12	13	14六	14	15	15	16	14	
12	10	11	12	12	13	④	13	③	14	15	15五	16四	16三	17	15	
13	11	12	13	13	14	14	15	②	16	①	16	①	17	17	18二	16
14	12	13	14	14	15	15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17	17
15	13	14	15	15	16	16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18	18
16	14	15	16	16	17	17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19	19
17	15	16	17	17	18	18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0	20
18	16	17	18	18	19	19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1	21
19	17	18	19	19	20	20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2	22
20	18	19	20	20	21	21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3	23
21	19	20	21	21	22	22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4	24

阿拉伯数码为回历月序，并各示其月之首日在西历之某日。冬字是“冬至”。

《二十史朔闰表》包括的年代较《中西回史日历》多公元以前的二百零六年（即汉高祖元年到汉哀帝元寿二年）。该书以中历为纲，自汉至清各依本历著其朔闰，另附三国南北朝朔闰表。汉元始元年起，加入西历，以中历的月朔，求西历之月日。西历在 1582 年以前用儒略历，后用格里历。唐武德五年起加入回历，以回历每年的一月一日，求中历的月日。书前冠有中国年号通检，书后附有日曜表。书中对古籍记载的错误和清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有不少纠正。

使用《二十史朔闰表》时务必注意，该表对西汉太初以前朔闰的推算是错误的。据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汉元光元年历谱”的研究，可知汉太初以前用《颛顼历》。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采用宋刘羲舆《长历》之说，认为汉初用《殷历》，或《颛顼历》，清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认为“以史文考之，似殷术为合”。陈垣沿前人之失，进一步推出朔闰表，更是错误，当待再版时订正。因此，今天查考汉高祖元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这一时期的朔闰，应以 1974 年第三期《文物》所载《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陈久金、陈美东著）一文的附表为准，见本章附录（四）。

《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薛仲三、欧阳颐编，商务印书馆 1940 年初版，三联书店 1956 年修订本。本书是中英文对照的历表，包括年代从公元元年到公元 2000 年，所用阳历在 1582 年以前是儒略历，以后是格里历。全表以阴历为纲，注明相对应的阳历、干支、星期。正表每面包括阴历五年整，分为年序、阴历月序、阴历日序、星期和干支五栏。年序栏内列有朝代、帝号以及年号、干支、公元纪年。阴历月序栏内列有月份数，第一月份旁注明本月份的干支系数，以供在附表中查明各月的干支。阴历月序下加横线者，表示当时以该月为岁首，旁加“〕〔”号者，表示改元月份。阴历日序栏内排列 1—30 日的数码，下列相对应的阳历日序，在其每月一日旁标明阴历月序，其中的“O”、“N”、“D”分别代表着“October”（十月）、“November”（十一月）、“December”（十二月）。星期栏内注明星期系数——星期系数加阴历日序，如果不超过 7，就等于星期数。如果超过 7，用 7 除之，余数就是星期数。干支栏内注明干支系数，供通过附表查明干支之用。附表：1—12 是西蜀、东吴、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辽、金、元、清的朔闰与西历对照表，13 是黄伯禄、陈垣二历表异点考校，14—15 是历代帝系，16 是历代年号笔划索引，17 是二十四节气在西历上之约数，18 是六十干支与其序数。

《公元干支纪日速算盘》，1976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李天赐创制。该盘的用途有五：已知公元年代求其干支。已知年号及干支求其公元。已知年号及其年数求其公元。已知公元年月日求其年月日干支。已知年号纪年以及月日求其公元年月日。该盘另有使用说明，介绍具体使用法；此外有《闰月定月表》、《年号简表》，以助查检。

《史日长编》，高平子编，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专刊第一号，天文研究所 1932 年印行。本编为推求中国史上所记年月日与儒略日那一天相当而作。儒略日与儒略历全属两事，不可混同，它是十六世纪法国史迦利日（Josephus Justus Scaliger）所造，是一种脱离年、月的长期纪日法，经推定公元前 4713 年儒略历一月一日为儒略日之元日，凡某日距元日之积日叫做儒略日。本编的正表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开始到公元 1929 年，每表包括中国年代、干支和每月朔日的儒略日数，并注明公元纪年等项。另有别表五种，附表八种，可用来查考儒略日、换算历史年月日的儒略日，用儒略日求史志年月日，用儒略日求公历年月日及星期。本书较为陈旧，时间下限截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故遇到查考此以后的日期这种问题，还应参考《1821—2020 年二百年历表》。该表注明相应时间每个月末一天的儒略日数。

查考回历则可使用《回历西历对照表》，马坚编译（见《回历纲要》一书，中华书局 1955 年出版）。本表从回历元年（公元 622 年）起，到 1470 年（公元 2047 年）止，均有回西历对照，另有五十二年回历月首表。

查考我国古代的月份，还要注意古代历法中的“三正”。所谓“三正”，

指的是我国古代历法中“夏历”以建寅之月（相当于现今“夏历”正月）的朔日为岁首，称夏正；“殷历”以建丑之月（相当于现今“夏历”十二月）的朔日为岁首，称殷正；“周历”以建子之月（相当于现今“夏历”的十一月）的朔日为岁首，称周正，所以叫做“三正”。这就使我们知道夏历的正月是殷历的二月，也是周历的三月，余类推。

了解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先秦古籍所据历法较为混乱。一般说，《春秋》、《孟子》多用周历，《楚辞》、《吕氏春秋》用夏历，《诗经》要看具体诗篇而定。若不了解这种情况，而以现行夏历的时间概念去阅读古籍，有时就难以理解某些记载，或者会怀疑古人搞错了时间。如《春秋·成公八年》记载着“二月无冰”这一现象，因为该书用周历，二月即夏历的十二月，是最冷的月份，无冰在当时是罕见的，因而才载入史册。

从汉武帝推行太初历到我国使用公历近两千年，我国的旧历基本上都是夏正，即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但也有几个例外情况。例如：王莽改用殷正，即以西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为其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的正月，故初始元年没有十二月。到西汉淮阳王复夏正，即以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十一月为其更始元年的十月，故这一年有两个十月。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改用殷正，即以是年的三月为四月，故是年无三月。到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十二月复夏正，故是年有两个十二月。武则天改用周正，即以其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十一月为其载初元年的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正月为一月，故永昌元年只有十个月。到其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十月复夏正，故是年有两个十一月及十二月。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九月去年号，称元年，改用周正，以建子月为岁首，以十二辰为月名；至建巳月又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复夏正，即仍以建寅月为岁首。代宗即位不改元，是年有两个十一月及十二月。

查考日月年代的工具书，除上述涉及时间较长者外，还有下面介绍的涉及时间较短，编制更为细密的历表，可供选择使用。

《殷历谱》，董作宾著，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印行。该历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四卷，殷历鸟瞰，历谱之编制，祀与年，殷之年代各为一卷；下编有十卷，分列十谱，卷一年历谱，是十谱的总纲，列举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这一时期的朔闰，内有王名、王年、干支纪年、公元前年数、月建、月份、月之大小、朔日干支、儒略历日、与殷历月朔相当的公历月日、与儒略历元旦相当的殷历月日，卷二祀谱，卷三交食谱，卷四日至谱，卷五闰谱，卷六朔谱，卷七月谱，卷八旬谱，卷九日谱，卷十夕谱。

《晚殷长历》，刘朝阳著，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乙种第三册，1945年出版。该书分为历谱和纪事两部分，历谱包括小乙八祀到纣五十祀每月初、月末和朔日的干支，纪事即大事表，可供研究商代史参考。

《春秋朔闰表》，清顾栋高著，收入《春秋大事表》。本表以鲁国纪年为纲，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列举鲁公纪年及其干支，每月大小及

其朔、晦干支，并注明相应的周天子和其他诸侯纪年，是查考春秋时代年月日的重要工具书。

《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郑鹤声编，前国立编译馆 1936 年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该表包括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到中华民国三十年共计 426 年间的中西历日对照，凡查考年月日星期干支和节气，一检即得，使用方便。书前冠有 426 年间的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年号与公元、干支对照表，书后附有太平天国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

《中国近代史历表》，孟荣源编，三联书店 1958 年出版。本表从 1830 年 1 月 25 日（道光十年正月初一）起到 1949 年 9 月 30 日为止，以公历为主，每年一表，注明相对应的中历年、月、日、干支、节气。附录太平天国历简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韵目代日表。

《1821 年—2020 年二百年历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科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本表以公历为纲，包括二百年间公历、中历、星期、干支、节气以及日月蚀等项，并注明月末一天的儒略日数。附录太平天国历表、世界日蚀路线图、中国日蚀路线图、太阳出没时刻表等。1965 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简编《二百年历表简编》亦可查考。

《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罗尔纲著，收入《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一书，三联书店 1955 年出版。本表专供查考太平天国天历之用。

《120 年阴阳历对照表》，吴古玉编，本表原名《一百年阴阳历对照表》，增订改今名，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 年出版。本表主要供按习惯虚数计算实足年龄和生肖之用，全书包括 1851—1970 年 120 年间的阴阳历对照表、出生年份对照表、星期检查表、阳历年度之日数与阴历首末日和二十四节气表以及实足年龄计算法等项。

### 三、儒略历与格里历的换算

儒略历与格里历的换算，也是我们常会遇到的一种问题。本来两历相接并不发生年代问题，但由于世界各国采用格里历的时间不一，就给历日的换算带来了麻烦。前面已经说过，格里历颁布时与儒略历只相差十天，但到十七世纪时就相差十一天，十八世纪相差十二天，十九世纪相差十三天。如帝俄时代采用儒略历，十月革命爆发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在 1918 年 1 月 25 日签署了一项命令，采用格里历，把该年的 2 月 1 日当作 2 月 14 日，中间跳过十三天，按格里历计算，儒略历的 10 月 25 日是 11 月 7 日，所以庆祝十月革命节一直在 11 月 7 日。以上只是说明两历换算的一般情况，实际上因两历本身的差异，换算时绝不能以上述的 10、11、12、13 等数字类推，而应使用下表。

儒略历与格里历换算表：

（续表）

儒略历日期	儒略历与格里历相差天数
公元 1300 年 2 月 22 日——公元 1400 年 2 月 20 日	+ 8 天
公元 1400 年 2 月 21 日——公元 1500 年 2 月 19 日	+ 9 天
公元 1500 年 2 月 20 日——公元 1700 年 2 月 18 日	+ 10 天
公元 1700 年 2 月 19 日——公元 1800 年 2 月 17 日	+ 11 天
公元 1800 年 2 月 18 日——公元 1900 年 2 月 16 日	+ 12 天
公元 1900 年 2 月 17 日——公元 2100 年 2 月 15 日	+ 13 天

该表可换算儒略历——格里历的日期。如要把儒略历 1600 年 9 月 10 日换算成格里历的日期，在上表找出包括 1600 年 9 月 10 日在内的儒略历日期（1500 年 5 月 20 日——1700 年 2 月 18 日），再在其后找出两历相差天数是“+10 天”。用 1600 年 9 月 10 日+10 天，即成 1600 年 9 月 20 日，这就是格里历的年月日数。（该表据李天赐《公元干支纪日速算盘使用说明附表》）

#### 四、查考大事的途径

查考史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查考某事发生的确切时间；二是要对某事本身有确切的了解。要解决这种问题，可供查考的书籍很多，如我国古代事系于人的纪传体史书，事系于时的编年体史书，以事标题、各详起迄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及近代、现代的某些专著等都是，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下面仅就按时间编排的大事表（包括学术年表）这种工具书作一定的说明，以供参考选择。

（一）查考中外大事，一般可使用《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 5000 年—公元 1918 年），翦伯赞等编，三联书店 1958 年出版。该年表按年月叙述了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 1918 年的中外大事，每年分为中国、外国两部分。中国部分若有并立年号者分别叙述；外国部分则分国叙述。对于历史事件的选录，该书注意：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重要法令的颁行，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要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国际间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可以说是同类年表中观点比较正确，材料较为丰富的一种。但是，它的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杜汉鼎的《评中外历史年表》（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八期）一文，纠正了该表的具体错误五十多条，并对选材、体例、方法的不善也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可参考。

三联书店 1959 年还出版了《中外历史年表》的续编，叙述 1919—1957 年底的大事，编者和体例同前书。

(二) 查考中国大事，一般可使用《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1975 年编印。这一本大事纪年按年代叙述了远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大事，全书分为两部分：一、中国古代史大事纪年，包括六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二、中国近代史大事纪年，包括 1840—1919 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 1919—1949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附录：中国原始社会主要文化遗存简表，中国历史朝代简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简表，中国历史朝代世系表（夏至清），中国历史朝代纪年表（春秋至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权首脑更迭表，中国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历代度量衡比较简表，中国重要历史地名今释索引。全书在选材方面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制度的叙述较详，其他内容较简。大事纪年一律采用公历，必要时标出旧史纪年，古代史所标月、日沿用旧历，近代史所标年、月、日均为公历。

查考中国史事，还可参考：《中国通史大事年表》，中国人民大学 1951 年编印；《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东北师范大学 1955 年编印；《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华东师范大学 1956 年编印。

查考中国史事，除了上述涉及时间较长的大事表外，还有以断代为书的大事月表和史事日志。这类工具书主要有以下几种：

《春秋大事表》，清顾栋高著，有乾隆十三年原刻本，《皇清经解》本。该书是查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的重要工具，全书分为：时令表、朔闰表、长历拾遗表、列国疆域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列国犬牙相错表、列国郡邑表、列国山川表、列国险要表、列国官制表等五十表。

《中国近代史事记》，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政治事件为主，旁及经济、文化，起于 1839 年，止于 1919 年，同时选录了 1514—1839 年与近代史关系较大的事件列为简表。所记事件按年月日排列，以公历为主，注明我国旧历年月日及其干支，1852—1868 年间并注明太平天国之天历。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下册），郭廷以著，商务印书馆 1947 年出版。

中华民国《大事记》（见《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征求意见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 1977 年开始分辑出版）。该书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日不清者附于月末，月不清者附于年末，年不清者不记。全书的《大事记序编》收 1902 年（清光绪廿八年）至 1911 年（清宣统三年）十月间的大事。第一辑收编 1911 年（清宣统三年）10 月 10 日至 1912 年（中华民国元年）12 月 31 日间的大事。第二辑收编 1913 年（中华民国二年）全年大事。第三辑收编 1914 年（中华民国三年）1 月 1 日至 1916 年（中华民国五年）12 月 31 日间的大事。以后按年分辑出版。

《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1866—1928 年），半粟编，上海太平洋书店 1929 年增订本。

《大事史料长编草稿》，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系 1961 年编印。该书包括 1919 年 1 月至 1926 年 12 月间的大事，每月一册，各分政治、经济、军事、群众运动、文化、外交、国际等部分，然后按日记事。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吴民、萧枫编，新潮书店 1951 年出版。

《中国现代政治史大事月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印。本表包括 1928 年 1 月—1949 年 9 月期间的政治史大事，每年分为 1—4 册，每月之下分政治、经济、军事（红军军事、反动军事）、文化、外交、国际、群众运动或其他等项，每项之下按日期顺序记录事件，是同类大事表中较为详细的一部，可供专业工作者查考之用。

（三）查考史事的工具书，除以上所述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大事记、学术年表以及现代国际问题的大事纪要。这些工具书虽不象《中外历史年表》和《中国历史大事纪年》那样常用，但就某地方或某学科来说，其内容的更加充实，非上述大事表所能代替，故多为专业工作者所爱用。但是，这种工具书还不多，有的只附录在各种专书之中，现略予介绍如下：

地方性的大事表主要有：（1）《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该书是《湖南省志》第一卷，叙述了湖南省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 8 月间一百九年的大事，分为近代与现代两部分。每一部分之下，又以大事标题分为若干小段落。关于大事的系年，一般按时间先后为序，各立专题，但又不同一般大事年表，对某些不便分述的连续性事件，大都并为一题，作综合叙述。（2）《百年来广东人民革命大事记》，广东革命史料编纂委员会 1950 年编印。（3）《西藏大事记》（1949—1959），郭兹文编，民族出版社 1959 年出版。（4）《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 1961 年编印。（5）《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朱绣编，1925 年出版。（6）江苏省《大事志》，见《江苏省通志稿》，缪荃荪等编，江苏省政府 1945 年出版。叙述江苏省自周初至清末大事。

学术年表主要有：（1）《甲骨年表》，董作宾、胡厚宣编，商务印书馆 1937 年出版。该书按年代叙述了商代甲骨文字的有关事项，表中每页均分为三栏：纪年，始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迄于 1936 年 8 月；每年均标中国年代、甲子、公元纪年。纪事，略记甲骨文字的发现始末、流传情形及研究之经过。撰者，备列关于商代甲骨文字的中、外文专著及论文（外文有中译文者，仅收译文），其中有尚未出版，但据他书称引而知其确已撰成者，亦酌量收录。书后有《论著分类索引》、《撰人索引》。该年表的编例严密，材料丰富。记载精确，又附二种索引，以助查检，颇便读者，是一本查考商代甲骨文字有关事项的重要年表。但因成书较早，没有近四十年的材料。（2）《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刘汝霖编，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



(3)《明清之际西算输入中国年表》，李俨编，见《中算史论丛》第三集，科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编年》，钱穆编，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出版。(5)《中国近七十年教育纪事》，丁致聘编，前国立编译所 1935 年出版。(6)《中国现代出版大事编年》，张静庐编，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 1957 年出版。(7)《中国目录学年表》，姚名达编，商务印书馆 1940 年出版。(8)《中国文艺年表》，孙俚工编，见《文艺辞典续编》，上海民智书局 1931 年出版。(9)《中国美术年表》，傅抱石编，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出版。(10)《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北京大学物理系该书编写小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7 年出版。(11)《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该书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出版。

现代国际问题大事纪要主要有：(1)《亚洲和平与安全问题大事纪要》(1945—1954)，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编辑、出版。(2)《印度支那问题大事纪要》(1940—1954)，编辑、出版者同上。(3)《朝鲜问题大事纪要》(1945—1954)，编辑、出版者同上。(4)《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大事年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出版。(5)《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大事简记》，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6)《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美)威廉·兰格主编，高望之等译，三联书店 1978 年出版。该手册是美国《世界史百科全书》1972 年第五版现代部分的中译本，内容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1970 年为止。

附录：

(一)廿四节气在公历、夏历约期表：

## 第六章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种类很多，目前常用的有人名辞典、人名索引（包括生卒年表）与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等等。人名辞典比较简明扼要地介绍人物的小传；人名索引或是提供查找人物的线索，或是解决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等问题；传记资料汇编则较详细地收录人物的原始材料，供研究参考，可说各有各的用处。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着重于编纂人物的传记资料，后来鉴于这类著作极为繁富，所收人物日渐加多，故又从事于人名索引和人名辞典的编辑。下面，就这类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方法，分别予以介绍。

### 第一节 查考人物工具书的源流

#### 一、正史和地方志中关于人物列传的编纂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有着悠久的渊源。我国先秦时代的古书如《禹本纪》，周朝的《牒记》，《世本》中的“帝系”、“世家”、“氏姓”诸篇，都是较早出现的记述人物的著作。西汉司马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编写《史记》一书。《史记》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述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另有“书”“表”统系年代、世系、人物和典章制度的原委等等，这是继编年体史书之后又开创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即专详社会变化尤其注重人事活动的纪传体史书，成为后代编写“正史”的典范。

《史记》从黄帝起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是一部划时代的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它除了写帝王将相和文人学士以外，还注意到社会的下层，抒写的面十分广泛。总之，《史记》把许多古代人物事迹汇为一编，是我们今天查考上古至西汉初期的历史人物所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东汉班固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体裁，截取西汉一代的事迹，编成了《汉书》。《汉书》断代为史，此后纪传体的史书，都采取班固的办法，基本上一个朝代写一部历史，有所谓“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二十六史”等名称。所有这些正史和《史记》一样，系统地叙写了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材料，是我们查考古人事迹的重要资料来源。当然，由于这些史书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编写的，从观点到史料本身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分析鉴别。

班固的《汉书》，除本纪、列传以外，更创立《古今人表》以备查考远古至楚汉之际人名之用。由于《汉书》断代为史，《人表》则纵贯古代而不及西汉，故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批评班氏自乱体例；此外，班固站在儒家的立

场，以孔子“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为准绳，把历史人物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这种做法也有些荒谬，但是，今天从查考古人姓名的角度，还是有用处，不可一笔抹煞。

以上主要就正史而言。我国古代还留下大量的地方志，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自宋代开始，方志特别注重人物事迹的搜集和编纂，往往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应予特别重视。（关于方志的作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 二、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资料汇编

西汉末年刘向在皇室校书时，根据他所接触的材料，选辑《列女传》、《列士传》、《高士传》等书，这是按专题把许多人物传记汇编成独立专书的开始，给予后世影响也不小。这种人物总传，和上述史书列传以及后面要介绍的碑传集等等，都是属于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的性质，是我们今天查考古代人物的又一项重要资料。

两汉以后，关于人物传记的著作日益增多。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各类传记约有二百多种，而经清人章宗源、姚振宗等考证，实际多达四百余种；其中总记历代人物的，有魏明帝的《海内先贤传》、李氏的《四海耆旧传》，颇为著名。这种总括历代或一代人物的总传，唐宋以后更为发展，如明代李贽的《藏书》收编了大约八百人的历代传记材料，而《续藏书》又专记明代的历史人物；至清代阮元等编写的《畴人传》，则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家列传。在传记体史籍中，尚有碑传集的编纂，它专收历史人物的神道碑、墓志铭、别传、行状、行述等类文字，自成系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墓碑最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由唐及宋，撰述弥繁。但把这类材料搜集起来汇编成书，却始于南宋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由于这类文字多出当时人之手，一般说来史料比较详实可靠，而编纂时又进行细致的分类，也便于检查，所以使用价值很高。当然，如唐代韩愈乐于替人家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其载笔“不乏谀言”，其他文人也有这种弊病，这又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明徐弘《明名臣琬琰录》，都是有名的著作；清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和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在同类著作中尤为著名。

## 三、专传和年谱的产生与发展

除正史和方志列传、人物总传以外，尚有用一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的专书，梁启超称之为“专传”。这种专传，据隋志有《曹参传》、《东方朔传》等十余种，今天已全部散佚。目前存留的著作，以唐释慧立所撰《慈恩三藏法师传》为最古。有的书目把《穆天子传》和《晏子春秋》也列为传记，

则此类著作的起源可上推至春秋战国。

又有年谱，亦系统地叙述人物一生的活动，并严格地按年月顺序加以编排，对于查考人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年谱约于唐末兴起，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日见发达，在史学界占有重要位置。现在留传下来的作品，以北宋吕大防所撰杜甫、韩愈二人的年谱为最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年谱二千二百余种，这也是极可宝贵的史料。

#### 四、家谱和姓氏书籍的兴衰

由于东汉以来大地主阶级长期把持政权，形成了许多官僚世家大族，魏文帝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更加强了官僚地主的门第声势，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是很好的写照。当时只要出身高门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就有种种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有关姓氏、家谱之类的所谓“谱牒之学”特别发达。隋文帝开皇年间，宣布废除九品中正制，大业时建立了科举制，唐太宗修《氏族志》，规定凭官爵高低定等级，武则天又下令修《姓氏录》，列武氏为第一等，凡五品官都升为“士流”，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此后谱牒之学与魏晋相比，显然衰落。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自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其学不传”。这与隋、唐废九品中正制和科学取士有极大关系。谱牒记一姓一族的氏族来源、世代的系统、人物传记以及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种史料还是有一定的用处。如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方腊，一般史书多说他家有漆园，出身于富户，而《文物》1974年第十一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冠倬《关于方腊的出身和历史——介绍浙江淳安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几条史料》一文，根据北京图书馆藏1911年木活字本《桂林方氏宗谱》所收宋元人的记载，方腊实出身雇工，有力地纠正了史书的谬误就是一例。此类著作，据隋志起源于《世本》，汉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有挚虞的《族姓昭穆记》，“齐梁间，其书转广”。当时有皇帝家谱、大姓家谱、地方诸姓谱、百家谱、氏姓考等多种类型。唐以后它虽由盛转衰，但仍延续至近代。而东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唐林宝《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同姓氏书辨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则是有关姓氏（也包括人物小传）方面的名著。

#### 五、人名索引与人名辞典的编制

《汉书古今人表》、梁武帝《古今同姓名录》可算是早期的人名索引或人名辞典。清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三史同姓名录》、《史姓韵编》专供查检史传人名及同姓名者之用，其中《史姓韵编》尤为著名。1935年开明书店刊印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和1936年中华书局刊印梁启雄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盖受汪氏《史姓韵编》的启发而编成。

近代以来，人名辞典、人名索引之类专供检索人名或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大量出现。其取材范围，基本上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正史、方志中的人物列传，人物总传，专传，年谱，碑传等等。了解目前这类工具书大致有多少，哪些特别重要，它们的性能或作用如何？这对我们能否迅速找到我们所要查考的人名或人物传记资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此，这类工具书将在下一节作专门介绍。

## 第二节 怎样查考人物

查考人名或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既然很多，查考的方法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现概括介绍如下：

### 一、查几种最常用的工具书

查考人物，可以首先查检几种最常用的工具书，如臧励龢等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彭作楨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姜亮夫编、陶秋英校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杭州大学图书馆编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等等。

1. 要了解一个人的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及其简单的生平，可查《中国人名大辞典》。该书内容丰富，共收上古至清末四万多人。自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后，至1949年已印至九版，1958年又予重新影印，可见很有使用价值。但它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观点陈旧，没有注明人物的生卒年代和传记的出处，以及部分材料失实等，这些都值得使用时注意。

由于大辞典按姓氏笔划编排，而同姓者太多，查检时颇感不便，故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又编四角号码《中国人名大辞典索引》附于书后，也有单行本，读者可加以使用。

此外，有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辞海》也可以查到。

2. 中国历史很长，出现了许多同名同姓的人物，读书时容易混淆，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查彭作楨编、1934年北平好望书店出版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该书根据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余寅《同姓名录》、陈棻《同姓名谱》、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而编成。收五万六千七百人，依姓氏笔划编排。

哈佛燕京社1931年为清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编制一部专门索引：《历代同姓名录引得》，可供迅速查找刘书所录人名之用。

3. 如果你主要想知道人物的生卒年代，可查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是书原名《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收材料包括钱大昕的《疑年录》、吴修《续疑年录》、钱椒《补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张鸣珂《疑年赅录》、闵尔昌《五续疑年录》和作者自编《六续疑年录》，以及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张惟骧《疑年录汇编》中多于上述七种疑年录的人物和大量的碑传资料。解放后经作者订正错误、补充脱略、删汰芜杂和增补若干新的碑传材料，1959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并改今名。全书收春秋末期至1919年以前去世的人物约一万二千余名，按人物的生年顺序排列，末附人名笔划索引。由于该书引用资料不尽可靠，某些人物的生卒、里第有脱漏和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本有用的工具书。又旧的《总表》收有名僧，再版时已删去，因此，若查佛教徒的生卒年代，可查陈垣的《释氏疑年录》（中华书局1964

年版)。此书根据七百余种佛教典籍、僧传、语录，参考诸家文集、方志和金石碑拓等材料而编成，计收晋至清初有年可考者二千八百人，书末有僧人法名通检，是查考历代僧人事迹，包括名号、籍贯、生卒年月等等的重要工具书。

4. 研究历史人物，需要查找较详细的传记材料，《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备考”栏注明了人物传记的出处，尽管也有错误和遗漏之处，还是可根据这个线索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另外，可以通过《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查阅史书列传。

清人汪辉祖把二十四史中的人名编成《史姓韵编》，曾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但因所收只限二十四史，而且不载帝王后妃及外国诸传人名，又依旧有韵目编排，查检甚不方便，所以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搜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二十五部正史中全部列传及附见的人名，编成四角号码索引，人名下注明见于某史某卷和开明版二十五史总页数及栏数。又中华书局 1936 年出版梁启雄等编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也可以利用，不过此书不及《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方便。

5. 关于人物一生的活动，最详尽的记载莫过于年谱。

哪些人物有年谱可供阅读？一般说来各大图书馆都有书目可查。解放后作为单独的书目出版的有杭州大学的《历代人物谱集目》。该书于 1962 年铅印，收录年谱约一千八百余种，可以作为参考。但据赵国璋《语文工具书使用法》称，汪闳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综录》（稿本），收有年谱二二一四种，可见杭大书目失收尚多。此外，李士涛《年谱目录》（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梁廷灿《年谱考略》（载 1929 年 7—11 月《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至五号），可以参考。

## 二、按时代或地域查考人物

除了查上述常用的几种工具书外，也可确定人物的时代和地域范围，利用另外一些工具书试加搜寻。

1. 先秦人物，可查《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燕大引得第 40 号，1947 年出版）、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和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

《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中有关人名的部分，可供查检先秦至西汉初期人名之用。《史记人名索引》系根据 1959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校点本编制，以姓名或曾用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别名、字、号、封号、谥号、

绰号等附注于后，并一律作为参见条目，可以从不同名称进行翻检，是专查《史记》人名，也即查先秦至汉初人物极为重要的工具书。

清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蔡云《人表考补》、翟云升《校正古今人表考》，可供查阅《汉书古今人表》时作参考。又日本重泽俊郎的《左传人名地名索引》（弘文馆 1935 年版），也可查找见于《左传》的先秦人物。

2. 两汉人物，可查明傅山《东西汉书姓名韵》（山西铅印本）、庄鼎彝《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前书是两汉书的传记索引，后书辑录两汉书中没有专传而散见于纪表或他人列传中提到的人名。另有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的《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也都有人名可查。

最近，李裕民编著的《后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已于 1979 年出版。该书系据 1965 年出版的《后汉书》点校本编制，收录两汉及三国（魏蜀吴）、两晋的人名。两汉以前的人名，凡属纪传追述世系或有重要价值者，也予收录。这是查找汉代人物尤为重要的工具书。由于此书与前面提到的《史记人名索引》以及下面要介绍的《晋书人名索引》、《隋书人名索引》等等是根据新点校本二十四史编制的，使用较方便，希特别留意。

3. 三国、两晋和隋代人物，可查王祖彝编《三国志人名录》（商务印书馆 1956 年版）、张忱石编《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77 年版）和邓经元编《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于《吴书·吕蒙传》“近者破樊本屯，救鄱，逆为孙规所破”句下，用小字加注：“或曰，此语不可解，疑有脱误。”《三国志选》、新标点本《三国志》出于误解，于孙规均不作人名标注。而《中国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又查无孙规其人，读书至此，就不知“孙规”究作何解？一查《三国志人名录》，才知孙规实是人名，除《吕蒙传》外，还见于《孙权传》。该传下有“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等语，一看便知孙规是东吴将领，所以《三国志选》、新标点本《三国志》于此均作人名标点。可见《吕蒙传》不作人名标注，显系因卢注而产生的偶然疏忽。《三国志人名录》因是索引，在编制过程中很自然地将两处关于孙规的条目合并起来，就可避免上述差错。

通过这一番周折，再读一下《三国志人名录》的出版说明，就进一步了解这部工具书的重要性。原来《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三国部分仅以陈寿《三国志》为限，且只收列传及附见人物；《三国志人名录》除了列传及附见人物外，还把文章中提到的人名，甚至裴松之注解中的人名全部收录，而裴注文字要多出陈书数倍，所以查三国时代的人物，一定要知道利用《三国志人名录》。旧燕大编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把陈书及裴注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综合排比，收录的人物极多，关于孙规也有两个出处，可见其用处和《三国志人名录》一样，甚至更为广泛。由此也可以推知前面提到的有关史、



汉的三种引得用处，它们所收的人名同样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值得加以重视。

《晋书人名索引》据 1974 年 11 月出版的《晋书》点校本编制，收晋代（包括十六国）、三国（魏蜀吴）及由晋入刘宋的人名。但关系到晋代人物世系的古代人名，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本索引以姓名或常用的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字、号、小名、绰号、官名、爵名、谥号等，附注于后。为了方便于从各种名称进行翻检，主目后面附注的所有异称，另立参见条目。全书按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后附笔画检字表，极便查阅。

《隋书人名索引》，据 1973 年出版的《隋书》点校本编制。该书收录隋代、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北齐北周）以及入唐的人名。纪传中上溯隋代人物世系的人名，不受此限，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但《隋书·经籍志》中的作者名，一概全收。

另有《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排印中，不久将出版发行。以上二书，为查考隋代及五代人物提供了便利。

4. 宋辽金元人物，主要的可查旧燕京大学编、中华书局 1959 年影印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

《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都提供搜寻古代人物传记资料的重要线索。由于宋辽金元四朝时间上是交叉的，有些见于宋代传记引得的人物，在辽金元传记引得里也能够查到，这两部书有相互补充的作用。宋代和辽金元的两种引得采用了一些不属于传记性质的书，前者如《桐阴话旧》、《万柳溪边旧话》、《宋诗钞》、《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后者如《辽辽纪事》、《辽大臣年表》、《辽方镇年表》、《元诗选》、《元行省平章政事年表》等，或为史表，或为诗选、诗话。从体例上说有问题，但从查考人物来说，资料愈多愈好，这并不算是太大的缺点；相反，诗文集和笔记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人物的记载，传记引得为了体例的关系又没有采用这类的书，因此我们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还不能以引得里所指出的线索为满足。日本梅原郁、衣川强从一三二种宋代文集中收录三千二百人的传记资料（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传），按笔划顺序编成《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72 年版），朱士嘉则从三十三种宋元方志中搜集三九四九人的传记资料编成《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中华书局 1963 年版），正好弥补上述不足，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而且，正史和许多传记资料汇编收录的人物，一般都是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它们不予收录的人物，文集和地方志中往往可以找到。这里着重讲一下方志的作用。如李贽《焚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赞刘谐》，《中国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查无刘谐其人，而近年来根据李贽生前的活动范围，终于从《麻城县志》中找到了刘谐是隆庆辛未年进士，做过余干知县，“喜奖

寒士，抗上而不慢下”。又如有人整理和研究林则徐的史料，看到有一个名叫李芸渠的人，与林书信往还，甚为相契，但只知此人曾在云南做官，要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查《中国人名大辞典》、《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清代碑传文通检》等都查不到，一查《云南通志》才知李是江西南城人，原名熙龄，芸渠是其字，曾任云南澂江府及广南府知府，主编过《广南府志》、《澂江府志》、《普洱府志》等书。若是根据这个线索再去查有关的府志县志，当有更详尽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

宋元方志较少，已有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可查。明代有方志八百多部，清代有五千多部，民国一千多部，要编制传记或其它专题索引，规模太大，恐一时难以办到。所以要从明清以来的方志中查找人物，目前只能通过了解人物的出生地（包括生前主要活动地区）而后查阅有关方志。又据朱士嘉介绍，《吴县志列传人名索引》（1939年版），是我国第一部方志人名索引；1934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河北、山东、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各省通志的时候，书后都附有四角号码索引，人名当然也包括在内，故查考上述地区的人物，可加以利用。

再附带说一下，按地域查考人物，也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之一。除了查考省志、府州县志乃至镇志、村志以外，尚有备查地方人物的专书，如河北省，可查清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河南省，可查孙奇逢《中州人物考》；浙江省，可查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广东省，可查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又日本梅原郁编《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索引》（京都同朋会1978年版），若城久治郎编《辽史索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版），小野川秀美编《金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0年版），田村实造编《元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部1961年版），也可以查辽金元之人物。

#### 5. 明清人物。

明代，可查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清代，工具书较多，而以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和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最为重要。

明清两种引得是查考明清两代人物的重要工具书。明代传记引得在排列上偶有疏忽；清代引得只录本名，不列字号，与前几种引得不同，是很大的缺点。

《清代碑传文通检》收有关文集一千零二十五种，分列碑传主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代和碑传文的作者及所载书名、卷数，依碑传主姓名笔划排列。凡明朝人死在1644年（崇祯17年）以后及现代人生在1911年（宣统三年）以前的人，一律收入。一人两名或更改姓名的，在附录中作“异名考”；一人数传，而所载生卒互异的，作“生卒考异”。总之，这是一本研究清代史料和查考清代人物的极有用的参考工具书，可与《三十三种

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参照使用。

此外，如蔡丐因编、世界书局 1937 年版《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可以直接查找人物小传的工具书也还不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6. 近代以来至解放初，可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的人物传记、人名辞典。人物传记约收一千人，人名辞典拟收四五千入，另有若干人物表。

徐州师范学院郑云波、魏云卿编《中国近代作家传记暨著述要目》（1964 年铅印本），将近代作家 239 人的传记资料出处和他们的生平著作汇集在一起，甚便检索。另有杨家骆编、1937 年辞典馆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日本桥川时雄编、1940 年中华法令编印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任嘉尧编、1947 年东方书店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辞典》，樊荫南编、1931 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香港《周末报》编辑委员会编、1950 年永发印务有限公司印行的《新中国人物志》亦可查考。

### 三、按身份、职业查考人物

按身份、职业等查考人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如查帝王、大臣、科举出身人物的工具书，主要有李子文编《历代帝王系统表》（1954 年上海新亚书店出版），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四部备要本），吴廷燮编《历代方镇年表》（辽海书社排印线装本），燕大引得编纂处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1934 年版），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1965 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1959 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清季新设职官年表》（1961 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1966 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燕大引得编纂处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1941 年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 1963 年编印的《中国驻外使领年表》（1912—1949）等等。

另一类是查考一些学者、艺术家等等的工具书，主要有潘念之编《思想家大辞典》（1933 年世界书局出版），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934 年蔚文印书局出版），北京语言学院 1978 年编印《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一分册），邓元鼎和王默君编《宋元学案人名索引》（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明仁编《四朝学案人名索引》（1936 年世界书局出版），支伟成编《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925 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阮元、罗士林、诸可宝、华世芳等编《畴人传四十六卷续编六卷三编七卷近代畴人著述记 1 卷》（1955 年三联书店）出版），黄钟骏编《畴人传四编 11 卷》（195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鼐公编《中国画家人名辞典》（1944 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朱铸禹编《唐前画家人名辞典》（1961 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和《唐宋画家人名辞典》（1958 年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洪业辑、

1934年北平哈佛燕京社印行《清画传辑佚三种附引得》，曹惆生编《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等。另有郭味蕓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徐邦达编《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傅抱石编《中国美术年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学术年表，也可查有关人物。

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列述有明一代十九个学派和二百多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学术思想史。继《明儒学案》后，他又撰述《宋元学案》，每个学案列有一“表”，对于师友的渊源，各派的支流，了如指掌；每案之后又编有“附录”，把时人及后人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广加搜罗，比《明儒学案》的编写似又有所改进。可惜此书没有完成，黄宗羲就去世了。其后由其子百家续写一部分，而主要由全祖望续成。全书一百卷，列有九十一个学案，叙述的学者多达两千余人。清江藩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人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合称《清儒学案》。《清儒学案》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又合称《四朝学案》。这是查考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学术家的重要参考材料，读者尤需注意。《四朝学案》目前通行的平装书有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两种本子。鉴于《明儒学案》已收入《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清儒学案》已入《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故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又出版邓元鼎、王默君编的《宋元学案人名索引》，读者可分别加以利用。另外，世界书局本第四册附有张明仁编制的《四朝学案人名索引》，共收二百多卷书中所载有传及附传学者三千余人，按姓氏笔划排列，亦于1936年出版，更便检索。

《畴人传》收有我国从上古传说时代起到清末止天文数学家四百人（附录西人五十二人）的传记。另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第一机床厂编的《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外科学家小传》编写组所撰《中外科学家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书，都是查考科学家传记的有用工具书。

凡是中华书局重印的宋代、辽金元、明、清四种传记引得已收录的人物传记（见前表），本章不再单独介绍，以免重复。

又蔡金重编、1937年燕京哈佛社印行的《藏书纪事诗引得》，是查考历代藏书家资料的有用工具书。

《藏书纪事诗》，叶昌炽著，共辑录五代至清的藏书家一千余人的材料。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则是叶书的续辑。《引得》将以上二书中的有关条目按中国字度撷法混合编排，以人名等为主目，下注朝代、字号、籍贯、室名、印鉴及著述选辑校刻诸书名，再注出处；以字号、室名等为见目，只注其所属的主目，不注出处。不会查中国字度撷法者，另有笔画索引可查。

蔡金重编、哈佛燕京社1941年印《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

李书春编、1934年印《唐诗纪事著者引得》，林斯德编、1931年山东大学图书馆出版《全唐诗文作者引得合编》，燕大引得编纂处1934年出版《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元诗纪事著者引得》，以及中华书局1965年编辑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也都是查考古代文学家的有用工具书。

#### 四、从字号、笔名等转查人物本名

中国人的名号最繁：有名，有字，有号，有别名，有别号，有室名，近代作家更有各种各样的笔名，而且多有以字号或笔名闻世而本名转被忽略者。一般工具书多数是以姓名为主，下附字号，难以直接查找，这样就非要有以字号、笔名等为主目倒过来转查人物本名的工具书不可。因此，陈德芸编、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1937年出版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7年重印的《室名别号索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7年编辑出版的《民国以来人名字号别号索引》，蔡金重编、燕京大学1934年出版的《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商承祚和黄华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蒋星煜编、燎原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作家笔名索引》，袁涌进编、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以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1959年编印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都成为极其有用的工具书。

又唐人喜以行第（排行）相称，如“白二十二”即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元九”即元稹。岑仲勉著《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是查考唐人行第的有用工具书。

此外，还有专查谥号、庙号、尊号、史讳的工具书。在封建时代，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一个称号，以示褒贬，叫做谥号。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谥号有一些按照地主阶级观点赋予特定涵义的字，如“经纬天地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杀戮无辜曰厉”、“好内远礼曰炀”、“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等等。东汉开始又有私谥，如夏恭卒，诸儒私谥曰宣明君；陈寔卒，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共谥为文范先生。

从汉代起，帝王又有庙号，如某祖、某宗等等。有些帝王后世即以庙号相称，如“汉高祖”、“唐太宗”。唐代起皇帝还有尊号，或生前所加，或死后追加，全是尊崇褒美之词，如清代那拉氏为皇太后，尊号累积有慈禧等十六字之多。

另外，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者不敢直称其名，需要避讳。避讳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三种：一、因讳改字；二、空字；三、缺笔。由于避讳而更改人名、地名、官名等等，造成文献资料上一些混乱现象，需要参考一些专讲史讳的书籍以了解这方面的常识。

清刘长华编《历代名臣谥法汇考》（光绪刊本），雷廷寿编《清谥法考》（1924年铅印本），沈炳震编《廿一史四谱》（1936年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陆费墀编《历代帝王庙谥年诿谱》（道光本），陈垣《史诿举例》（195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等等，是查考谥号、庙号、尊号和史诿方面的工具书，其中《史诿举例》尤为重要。

## 五、查外国人

查考外国人物，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963年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图书资料研究室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苏联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965年出版的《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胡湛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上下册）等书。

《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内容丰富，极为重要。该书资料全部选译自1950—1958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58年版《英国大百科全书》、1959年版和1961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美国出版的1941—1954年各卷和1959年卷《当代人物传记》、美国出版的1930—1935年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和日本出版的1953—1955年版《大人名辞典》。收集范围以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家和学者为主，同时酌量收录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以及少数和我国近代、现代史有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人、外交人员和传教士等。所收人物以卒于1870年及以后者为限（即卒于1870年以前的都不收），大体上上及整个十九世纪，下迄当代。全书共收人名约七千五百条。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所收欧洲和北美洲人物大大多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物，已经去世的人物大大多于当代的人物；同时，因取材于各种不同来源，所以资料的立场观点不一，着重点和详略也都不一，使用时宜注意。

解放前出版的几种工具书，如唐敬泉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现代外国人名辞典》，潘念之和金溟若编译、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世界人名大辞典》，刘炳黎等编、中华书局1940年版《中外人名辞典》，也可查考。

另外，辛华编、外文书店1970年版《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1970年版《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1970年版《拉美常用缩写手册》、1970年版《日本姓氏手册》，张竞干、黄竟成、王鉴明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日本姓名译名手册》，史群编《日本姓名词典》，计分拉丁序、汉字序、和名序三册，商务印书馆已于1979年出版拉丁序本，其余二册亦即将出版。以上工具书，可供翻译

## 工作者参考。第七章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目前有地名辞典，地名索引，地图，地理沿革表等等。但由于我国古代的疆域分合和地名演化极为复杂，单靠辞典、索引之类的工具书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正史地理志、方志和其它地理专著，仍然是今天查考地名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我国最早出现的记述与地名有关的文献，是古地图和《山海经》、《禹贡》等古地理著作，而后出现以地区为中心的方志以及记述疆域政区的正史地理志。地名辞典、地名索引等等的编制，乃是晚近的事。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查考地名的工具书的概况，以便进一步熟悉和掌握这些工具书，这里先介绍一下我国地理学史上的有关问题，重点是讲地图发展史、沿革地理和方志等方面的常识，简单地提一下清代以来编制地理沿革表和地名辞典的经过，然后较具体地介绍查考地名的各类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

### 第一节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之源流

#### 一、地图发展小史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有关记述地名的书籍，如古地图和古地理著作，正史地理志和方志等等，为数很多。早在商周时代遗留下的甲骨金文中，就有不少地名可见，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知识的积累，就进一步导致地图与其他地理著作的出现。

《尚书·洛诰》记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建筑洛阳城的事迹，其中有“佻来以图及献卜”一句，王国维等认为此“图”字当作“谋”解，但多数学者、特别是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同志认为非图谋之图，而是地图，即营建洛邑时画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图。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制图事业大为发达。

《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管子·地图篇》：“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轳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

据考证，其中有少数几篇可能写成较晚，但学术界尚无定论。

从《周礼》、《管子》二书关于疆域地图和军事地图的论述，联系《战国策·赵策》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和《史记》、《战国策》所载荆轲刺秦王、“献督亢地图于秦”的故事，可以想见当时地图的绘制已很普遍，且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古代地图与军政关系密切而必须藏之官府，又由于古地图的摹绘和保存都要比书籍难，所以流传存世的机会也远比古籍为少。长期以来传世的我国古地图，以南宋时期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刻于石碑上的《禹迹图》、《华夷图》（现藏西安陕西省博物馆，旧称西安碑林）为最古。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两幅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以前绘在帛上的地图碎片，经故宫博物院等许多单位整理拼复，考订研究，暂定名为《地形图》和《驻军图》，并由文物出版社于1977年影印出版。这两幅埋藏地下二千一百多年的古地图的发现，是地图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谭其骧指出，它至少有四大特点：（1）时代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地图《华夷图》、《禹迹图》早了一千三百多年，为地图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2）准确性很高，从而推翻了晋朝裴秀“汉氏舆图”“皆不精审”的旧说，为我国地图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3）图的内容既准确又详细，可据以窥见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深平防区）的政治经济概貌，解决若干历史地理上的问题；（4）该图注记用的字体，测绘的方法、技术及其所用的工具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值得加以深入的研究。（见《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原载《文物》1975年2期，又收入《古地图论文集》。）

晋代裴秀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已失传，仅其序文幸存。但正是从《禹贡地域图序》开始，我国历史上才有明确的记载绘制地图的方法，使地图学在理论上有了准则可循。序文指出制图之体有六：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制图六体”今天看来极为平凡，但距今一千七百年前的裴秀，除了还不知地球经纬度外，能提出这些符合近代科学制图的原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卓越的贡献。另据唐虞世南《北堂书钞》，裴秀还发明了方格缩制地图的办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把一幅用缣八十匹的旧“天下大图”，裁减为方丈图，这也是了不起的创造。

唐代极其重视地图的绘制。据《唐六典》、《唐会要》和《唐书·职官



志》的记载，当时规定全国州府三年（后或改五年）一造地图，交兵部职方掌管；中央又依据州府所上地图综合编制成一统的总舆图《十道图》。

德宗时，宰相贾耽绘制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在地图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贾耽在制图技术上，基本上承袭裴氏的“制图六体”，但也有创新：“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以颜色分注古今地名，这是沿革地图以朱墨分注古今地名的最初记载。据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史纲》的意见，宋代传世的著名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受贾耽《华夷图》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即是贾图的缩绘本。

又《南史》及《宋书》记载，刘宋诗人谢庄曾制成木方丈图，可以自由拆并，所谓“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尝自述制作木图的经过，南宋黄裳等亦曾制作木图。这种木图，有人认为是一种活动地图，有人认为是地形模型，无论怎么说，都与地图有关，而且是一种发明创造，值得一提。

元代朱思本为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朱氏“周游天下”，遍访四方使臣，参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及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元《一统志》等，积十年之功力，绘制《舆地图》二卷。朱图计里画方，在比例、方位、距离上都用过功夫，惜原图已失传。不过，明罗洪先依朱图增广而成《广舆图》四卷，今可据以略知朱图概要，而明清舆图，自此多受其影响。

我国早从隋代开始已有刘焯建议测量纬度，以后，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曾实测子午线，元代则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进行了大规模的纬度测量，但都没有运用到绘制地图方面来。只是随着阿拉伯天文地理学的输入，由札马鲁丁造过一架画着经纬度的地球仪，然亦未曾广泛传播。明神宗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澳门等地传教，把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或称《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献给中国的士大夫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使我国对于世界地理和用经纬度绘图的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但仍局限于少数人，影响也不太大。利玛窦之后直到清朝初年，都有传教士相继绘制世界地图，如西班牙人庞迪我的《海外舆地全说》（未刻，有传写本），意大利人艾儒略的《万国全图》（见《职方外纪》），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兰西人蒋友仁各有《坤舆全图》等，其影响更远在利氏之下。

1707年开始，在清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由法兰西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十人分组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经纬度和三角测量，而于1717—18年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图》的编绘工作。这份康熙朝的《皇舆全图》，1929年由沈阳故宫博物馆石印出版，计41幅，图上包括西经40°以东、北纬55°以南地区，题作《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乾隆朝在康熙图的基础上，扩大改制成《乾隆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地图》或《乾隆皇舆图》、《清一统地图》；原题乾隆二十五年铜铸，实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开雕。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发现此图铜板104幅，1932年重印，

题称《重印乾隆内府舆图》；1966年台北又据以重印，比例尺改缩为二百万分之一，题作《清一统舆图》。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大规模的测绘全国地图，在世界测绘史上也可算一件大事。因为，一、康熙规定以二百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1800尺，每尺合经线千分之一秒，这种以经线弧长决定长度标准，比法国以赤道长度规定公尺长为早；二、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沿北京中央经线曾测量霸州至交河的直线距离，1710年又在东北地区测定了北纬40°—47°间的经线长度，发现纬度愈高则经线一度的距离愈长，这是第一次实测地球为扁圆形的重要证明材料；三、新疆罗布泊的位置，经过实测画在北纬40°40′，后来这个湖泊迁移到北纬40°以南，这成了地理学界研究自然历史变迁的著名例证。此外，测绘了位于西藏边境的世界第一高峰，并命名为“珠穆朗玛峰”，也是大有意义的。可惜的是此图绘成，即深藏内府，虽有李兆洛、董祐诚据以复制，但流传也不广，直到同治年间胡林翼根据康、乾两朝内府图并参考了李兆洛图攻编成《大清一统舆图》，才广为流布。

自清末至1933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编《中华民国新地图》（又称《申报馆地图》）这一世界著名的中国地图集问世，坊间所流行的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清初的测绘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英明领导下，地图科学欣欣向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以及各种精确的专科地图大批涌现，举不胜举。

前面提到的裴秀《禹贡地域图》，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贾耽图以颜色分注古今地名，乃是沿革地图的一个创举。宋税安礼《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统贯古今的地理沿革图（今存明翻刻本及何镗编《修攘通考》本）。清顾栋高《春秋舆图》、李兆洛《历代地理沿革图》亦为有名的作品，而清末杨守敬所编《历代舆地全图》、《水经注图》，尤为历史地图中的空前杰作。解放后于1955年除了顾颉刚、章巽编和谭其骧校的最新的沿革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的出版外，在毛主席亲自提议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等单位具体负责，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以及杨氏《历代舆地全图》与近现代大量地图，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分八册，于1974年开始陆续发行。这部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的历史地图集的问世，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 二、沿革地理浅说

我国的古地理著作，以《山海经》《禹贡》等为代表，比地图出现的时代略晚，但更能反映古代地理知识的发展水平。《山海经》、《禹贡》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都是从全国范围来进行复杂的地理上的描述，《山海经》

更多地承袭着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多少带有一种结集的性质，《禹贡》则概括地叙述了全国各地区的地理特点以及山岳河流的分布概况。这两部书不但是我国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的文献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管子·地员篇》和《周礼·职方》，也是先秦有名的地理著作。

司马迁《史记》一书中的《货殖列传》、《河渠书》和有关民族的列传，记载了经济地理和域外地理的丰富史料，具有相当大的地理价值。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汉志》是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前此的《山海经》、《禹贡》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不注重疆域政区；《汉志》以行政区划为纲来叙述全国疆域、政区、人口、物产、建置沿革以及山川和地方风俗等等，开创了疆域地理志的体制，成为后世撰写地理书籍的典范。另外，《汉志》所记不限于西汉一代的地理，它把汉以前古籍里所记载的很多地名，用汉地予以注释，使后人能比较正确地知道部分先秦地名的位置，所以它同时又是一部很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

古今地名，极为纷歧，或同地而异名，或同名而异地，其分合废置，一代之中，每有变迁，故自宋代开始，有专讲历代疆域、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的所谓“沿革地理”。这门学问，实际上《汉志》已发其端，并且成为沿革地理的学者们着重研究的对象。

《汉志》以后，《续汉书》有《郡国志》，《晋书》有《地理志》，《宋书》、《齐书》有《州郡志》，《魏书》有《地形志》，《隋书》、新旧《唐书》有《地理志》，《旧五代史》有《郡县志》，宋、辽、金、元、明、清诸史均有《地理志》。这些后出的地理志虽然多数赶不上《汉志》全面、详实和扼要，但把这十五种地理志和《汉志》联缀起来，便是较完整的沿革地理的材料。北宋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如吴澥编《历代疆域志》十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即是依据宋以前各地理志的材料组织而成的历代地理通考。南宋郑樵《通志》中的《地理略》和《都邑略》，是极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其中《地理略》中的《历代封畛考》，通考历代疆域沿革，《开元十道图考》专考唐代疆域，而《都邑考》又别创新例，都是很有用的材料。至于王应麟撰《通鉴地理考》一百卷，实为沿革地理的巨著，可惜已经佚失。他的《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借“通鉴”的名词表达贯通古今的意思，另有《诗地理考》六卷，同样用“诗”的名义，通过三百篇所举地名，考证三代疆域地理，都是沿革地理的专著，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清代学者于沿革地理用力甚勤。顾炎武从二十一史、一统志及府州县志、历代奏疏、文集和明代实录等文献中收集大量材料，编写成两部书，一叫《肇域志》，专讲地理；一是《天下郡国利病书》，考究地方利弊得失，成为历史政治地理的专著。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详细叙写疆域形势，

以及山川险隘和关塞攻守，偏重于历史军事地理的阐发，尤为沿革地理的巨制。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杨杰复的《舆地沿革表》、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都是考寻地名沿革的有用工具书。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出现，代表了我国古代综合性地理著作的另一种形式，成为独创一格的地理专著，同时也是东汉、魏、晋以来我国古地理研究的总结。

大约三国时候有人写成《水经》，记述中国河流水道共计一三七条，到了郦道元为之作注，补充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一二五二条，注释的文字二十倍于原书。《水经注》不但详述大小河系的源流和支脉，而且把每条河流所经行的地方，诸如建置沿革、城镇兴衰、水利开发、土地物产以及自然地理的各种现象，一一加以记载，内容丰富多彩，为后代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

以上是我国地图史和沿革地理的简单脉络，下面再谈谈方志的演变。

### 三、古代方志的演变

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风土、物产、人文等资料的著作，是为地方志书，简称方志。这类书，早在先秦就有，而魏晋以降，日益增多，内容转繁，论其名目：有异物志，如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物志》是其类；有风土记，晋周处的《风土记》、宋盛弘之的《荆州记》是其类；有山水图记，宋谢灵运的《游名山志》、南齐宗测的《衡山记》是其类；有州郡地记，吴顾启期的《娄地记》、宋刘澄之的《永初山川古今记》是其类；有图志图经，南齐王遂之《广陵郡图经》和不著撰人的各州郡图经是其类。此外，尚有记外国的，如晋法显的《佛国记》一卷，记寺观的，如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五卷，都极为有名，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晋挚虞的《畿服经》和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则是在魏晋方志的发展基础上，完成了全国性的和集大成的地理总志的编纂工作，影响极为深远。

据《隋书·经籍志》：“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这些地志，显然多是私家著述。

随着隋唐大帝国的建立，开始由官方主编地方志。据《隋志》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方志和全国总地志，十九已经亡佚。其流传到今天的

代表作，首推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宋代开始失附图，故略称《元和郡县志》）。这不仅是现存最古而且也是编写得较好的一部地理总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体例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所以，它对于后世总志的编纂实有很大的影响。宋代开始，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地方志的编纂更趋发达，其编制体例也日趋完备和标准化，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其流传至今的著名总志，北宋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十卷、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南宋有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二百卷、祝穆的《方輿胜览》七十卷。著名方志流传至今的也有几十种，如宋敏求的《长安志》十卷、《河南志》二十卷，元潜的《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范成大的《吴郡志》五十卷，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罗愿的《新安志》十卷，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四十卷，施宿的《嘉泰会稽志》二十卷等。此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十卷、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十卷等专讲风俗地理的著作，亦享有盛名。

元明清三朝，都有一统志的纂修，其中乾隆朝所修的《大清一统志》有四百二十四卷，嘉庆朝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有五百六十卷，内容尤为丰富，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小地名搜罗较多，对于查考古代地名用处极大。商务印书馆曾为此书编有四角号码索引，颇便检索。至于方志，更是日渐增多，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58年增订本）的统计，现存方志约有七千余种，其中以清代的数量为最大，约有五千多种。这是数量极为可观的文化遗产，不仅对于查考地名有用，就是在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也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 四、地理沿革表和地名辞典的编制

前面已经讲过，古代的地理著作如正史地理志、方志乃至《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名著，主要供人阅读而不便查检。所以清代学者采用表格式的方法编制地理沿革表，如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段长基《历代疆域表》和《历代沿革表》各三卷、杨丕复《舆地沿革表》四十卷，或内容丰富，或条例清晰，成为查考地名历代沿革的有用工具书。

李兆洛及其门人六承如等自道光二年至道光十七年阅时十六年编成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收录了《汉书》、《续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十四部正史地理志所载郡县之名，按下一字分一六韵排列，分别时代，条其同异，并注明清代所在之处，南北朝侨置州郡及唐宋金元明镇堡羁縻州郡长官司有实地可考者，并列之。这是广录历代地名编为辞典专备寻检的创始，提供极大便利，

但也有不少缺点，如取材狭窄，关于地名建置沿革的叙说有错误，而按韵编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仍有不便。

1930年北平研究院出版刘钧仁编辑的《中国地名大辞典》，所录地名除史志郡县名外，兼及城镇堡塞关隘并各种小地名，共二万余条，以地名首字为准，分部编排，寻检方便，主要缺点是省区名及山水名不录。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臧励龢等编辑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地名约近四万条，按地名笔划编排，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所以此书一出，前两种书的作用显然大为下降。但也还有缺点，即见于正史地志及《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书的地名未为全部采录。1963年此书曾重印。

稍后，1933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了青山定男编的：《读史方輿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博综古今，收录地名在三万以上，然卷帙浩繁，难以检索，故青山定男编为此书，于每一地名下注明原书卷数及所隶府州县，并说明现今方位所在，名为索引，实兼辞典性质。然青山此书以《纪要》的范围为范围，以《纪要》的解说为解说，遗漏和舛误实多。（可参看谭其骧：《中国历代地名辞典四种》，载《方志月刊》1934年4月第七卷第三期）

## 第二节 怎样查考地名

我国的地名极为复杂：或同名而异地，或同地而异名；有些地名除了有简称、别称、雅称等等以外，有时还有合称或因避讳而改名；而县以上的地名（或地区名），其古今方位、政区级别以及辖境等等也常有变动。例如北京，就曾有幽州、蓟城、范阳、燕京、中京、大都、北平等古名，辖境也出入很大。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不同的名称，这是同地异名的例证之一。与之相反，刘钧仁《中国地名大辞典》收录以“安阳”为名的地方有42个，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则有50个；以“太平”为名的地方，前书共收61个，后者多达81个，这都是同名异地的明显例子。而历史上曾拥有“北京”这一称号的就有六地：（1）唐代和五代唐、晋、汉三代都曾以它的发祥地太原府为北京，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2）宋以大名府为北京，地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3）金曾一度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故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波罗城；（4）金又改大定府为北京，即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大明城；（5）明初尝建开封府为北京，即今河南开封市；（6）明成祖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即今北京市。（见《辞海》）

地名之有别称或简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上海之称沪、申，天津之称津或津门，南京之称金陵、白下、白门，苏州之称姑苏、吴门，宁波之称甬，福州称榕，开封称汴或汴梁，广州称穗，成都称蓉，重庆称渝，贵阳称筑，以及各省也有简称或别称，如河北称冀，山西称晋，安徽称皖，广东称粤，江西称赣等等。

此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指出的“地名从省”例，也值得注意，如《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和《朱治传》合称零陵、桂阳为零桂；《晋书·伏滔传》称庐江、九江为庐九；潘岳《西征赋》称棘门、霸上为棘霸；左思《蜀都赋》称犍为、牂柯为犍瓠；常璩《华阳国志》称犍为、广汉为犍广；《陈书·萧乾传》称建安、晋安为建晋；《褚王介传》称会稽、山阴为稽阴；《南史·梁宗室传论》称河间、东平为间平等。至于因避讳而改郡县名，如汉文帝名恒，改恒山郡曰常山；光武帝叔父赵王名良，改寿良曰寿张等等，历代多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里再简单一提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由于历史地名往往反映该地当时的地理环境、面貌，反映取这些地名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以及反映取这些地名的是什么人、使用什么语言，所以，研究历史地名有助于研究历史。

(1) 古代取地名，山南曰阳，山北曰阴；水北曰阳，水南曰阴。如陕西之山阳县在秦岭南，山西之山阴县在恒山山脉北麓；古之池阳县、汝阳县因在池水和汝水之北而得名，而江阴县、淮阴县则分别在长江和淮河南岸等等。又位于河流上源的地名往往取名“源”，位于河流下游或湖泊出口处往往取名“门”或“口”，位于河流沿岸往往取名临、浦、皋等等。山的位置较固定，水道常有变动和改道，因此研究取名阴、阳、门、口等等地名与水道位置相印证，对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水道变迁很有用。

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江东也叫江左，江西叫江右，山左即山东省的别称，山右即山西省的别称，这也是应该知道的常识。

另外，先秦时以“丘”、“陵”、“阜”命名的地方很多，说明当时因黄河下游的地貌起伏不平，洪水时常泛滥，人们喜欢择高地居住，而这些地方，后代可能不复存在丘陵，说明因黄河或其它河流漫流，已为洪水所夹泥沙淤平等。这些也无疑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好材料。

(2) 春秋地名称“氏”、“父”者甚多，可能是指氏族居地，虽然不是春秋时是氏族社会，但说明当时可能还存在氏族组织的残余，并且一氏居一地的情况还较普遍。两汉以“乡”、“亭”、“聚”命地名，反映了当时的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工事有关。唐中叶后内地有“镇”、“集”、“市”等相继兴起，反映了唐以后经济发达，小商业城市兴起；而“场”、“务”等地名则反映官手工业的发达。凡此种种，都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材料。

(3) 古代的地名往往跟着部族的迁徙而迁徙，可根据地名的迁徙看出当时民族由何处迁向何处及其移动路线，又可看出一个时期的民族分布，如汉代许多县都直接以所居族名为名。又古代渤海湾一带地名前常带“不”字，应是古代分布在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从汉代北方许多带“奴”字的地名的语源上，可研究匈奴与这些地区的关系以及证明匈奴与狄系同族；今浙江

地方多以“句”、“於”、“姑”、“余”、“无”、“乌”等为地名，与古代吴越语的发音音有关，可根据它研究古代吴越族的分布、经济状况以及吴与越两国的关系。这无疑是民族史和人类学应注意研究的史料(可参考《谭其骧论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载《文汇报》1962年2月2日)。

下面具体的讲一讲查考地名的方法。查考地名，主要是从一些常用的工具书入手，然后根据需要，深入一步查考有关专著。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从狭义的讲有地名辞典，地名索引，地理图、表等等，从广义的讲，则正史地理志、方志和其他地理专著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下面根据具体情况，根据实际需要作综合的介绍，就不再一一区别了。

## 一、两种查考古今中外地名的辞典

我们查考地名，或是想知道它的确切方位，或是想知道它的历史演变，若是政区名，还要详细地了解它的分合置废或隶属关系、辖区范围等等。目前这方面的各类工具书很多，可根据需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去查找。这里先介绍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辞海》(试行本)第九分册《地理》和葛绥成等编、中华书局1948年再版的《最新中外地名辞典》，这是两种综合性的地名辞典，古今中外地名都可以查。

前一种辞典所收词目包括地理一般(六二二条)、中国地理(四七二七条)、历史地理(二九七四条)、外国地理(二三四八条)等四类，共一六七一条。凡习见的地理一般名词术语、国家、行政区划、主要山脉、河流、海洋、湖泊、港湾、岛屿、地形区等，以及我国历史上比较习见的区划、都邑、城镇、山川、道路、水利工程等，均可查阅。这是我们今天查考地名首先值得参考的工具书，因为该书反映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水平收词一万余条，一般较为重要的地名均可查到。当然，也难免有缺点和问题，如三国时著名的赤壁鏖战之“赤壁”，该书是这样写的：

“赤壁(一)山名。(1)在今湖北旧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兵用火攻大破曹军于此。(2)在湖北黄冈县城外，一名‘赤鼻矶’。宋苏轼泛舟游此，作赤壁赋，误为‘火烧赤壁，大败曹军’之处。(二)古地名。在今山西旧河津西北。公元318年刘曜即帝位于此。”

丁力的《赤壁究竟在何处》对此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赤壁山在原嘉鱼县西南(现划归蒲圻县)，并指出“东北”说乃是沿袭《辞源》之误。(见《光明日报》1977年10月6日)

我们核实了一下，发现《辞源》(初版于1915年)、《最新中外地名辞典》(初版于1924年)、《古今地名辞典》(初版于1931年)和《辞海》都说在旧嘉鱼县东北长江南岸。如果这是确实搞错了，那就说明有些工具书的编制，没有从原始材料入手，而是转相征引，这就很容易以讹传讹。所以



我们查考地名时，就要多查几种不同类型的工具书，如查辞典和查地图相对照，甚至再查较早的文献资料，多方面加以核实。我们手边恰好有一本《申报馆地图》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打开一看，赤壁山是在嘉鱼县西南。所以，1976年开始，《辞海》重新修订，原《地理》分册又分为三册，其中《中国地理》分册即已把赤壁山改写入今蒲圻县境。但问题并不就此解决。吴应寿根据郦道元《水经注》、盛弘之《荆州记》、《文选》李善注以及王象之《舆地纪胜》等文献记载和对三国时的军事形势的分析研究，又否定了丁力的意见，确认古赤壁应是武昌县西南的赤矾山，山在旧嘉鱼县东北、今武昌县境。（见《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5日《也谈赤壁在何处》）而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全图》和最近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赤壁均画入今武昌县境。由此可见，有些古地名比较复杂，不能随便看到某种说法就深信不疑，这是应该注意的。

北宋苏轼的《前赤壁赋》有这样几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这上面提到的夏口、武昌都是古地名，绝不能和今地混淆，不能用今天的地图查对。按古夏口即今汉口，武昌即今鄂城，所以东坡在黄冈赤壁，可以“西望夏口，东望武昌”。若以古武昌为今武昌，再讲“东望武昌”就南辕北辙了。所以碰到古地名一定要查历史地图，如杨守敬《历代舆地全图》，顾颉刚、章巽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以及主要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等单位负责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或者查几种叙述地名历史沿革的辞典。因此，前面讲的用《申报馆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查赤壁，从方法上说也是错误的。这又是我们查考地名时要注意的。

又李兆洛《历代地理沿革图》谓：“操诗云，‘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则操军实驻黄州。”这是把东坡的追述误认为是曹操的诗句，因此推论黄冈赤壁即三国赤壁。李是清代有名的学者，所编《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大清一统舆图》等都是专门查考地名的有用工具书，尚且会有这样的疏忽，这就提醒我们查考工具书、引用资料务必加以鉴别，不要盲从。

后一种辞典即葛绥成等编《最新中外地名辞典》，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1940年出版增订本，1948年又再版。共收中外地名二万五千多条，其中本国地名占十分之六，外国地名约占十分之四。收录地名以现代为主，但为便利读者了解近代沿革建置，本国地名自元、明、清以来之州、府、道、县等，以及外国历史上之重要地名，亦均加叙述；大至洲名、国名，小而市镇、关隘、盐场之名，以及名山、大川、矿区、铁路等等，无不择要辑录。末附六表：（1）中国行政区域表，（2）中国省市面积人口表，（3）中国商业都市表，（4）世界面积人口表，（5）英译中国重要地名表，（6）西中地名对照索引。此书地名按笔划编排，对于查考古今中外地名，甚为便利，所收词目也较前者为多，只是观点和材料方面略嫌陈旧。

以上两种辞典，优点是古今中外地名都可查考，主要缺点是收录地名毕竟有限，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后者错误较多，所以还必须从不同角度试查其他类型的工具书以作参考。

## 二、中国古代地名的查考方法

上面介绍的两种辞典可以查考中国古代地名。《辞海》的《地理》分册1976年修订后分三册出版，其中《历史地理》分册当然更是专门查考中国古代地名的工具书。但是它们收的地名太少，查考中国古代地名不能以此为限。为此，这里再分三个方面加以具体介绍：

### (1) 查考中国历代地名的辞典、地图和索引

我们在源流一节的第四部分介绍查考中国地名的四种辞典，特别是后两种即《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读史方輿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是查考中国古代地名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书。前者收录地名近四万条，后者也在三万以上，在新的地名大辞典没有编出来之前，可以说这是我们查考古代地名的主要工具书，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则尤为重要。

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偏详于疆域形势的叙述，是历史地理方面的空前巨著，清初著名地理学家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誉为“千古绝作”，魏源为此书作序，亦称之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可略见其价值。许鸿磐编《读史方輿纪要考证》，对顾氏书有所补充。日本青山定男为顾书编制索引，又一一注明今天的方位，使之成为索引兼辞典的性质，便于检索，功不可没。

和《读史方輿纪要》一样，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是有名的地理总志，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集大成的著作。《纪要》地名只收到明代为止，此书收至清代，其内容之丰富，地名之众多，远远超过《纪要》，其功用当然在《纪要》之上。《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帙多至560卷，1934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另附有目录索引，凡书中所有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人物、流寓、烈女、仙释，以及图、表、疆域、分野、形势、风俗、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土产、建置沿革等名目均按四角号码编排，极便检查。

除上述工具书外，历史地图也是查考中国古代地名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清末杨守敬所编《历代輿地全图》三十四册，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年）杨氏观海堂木刻朱墨套印本。这是历史地图中空前的杰作，但也存在不少错误，特别是在边境各地大都是一片空白，水道迁移也往往有不准确的地方。它可供专业工作者参考，初学则不一定查考此图，而宜查下面两种历史地图：

一、顾颉刚、章巽编，谭其骧校，地图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内容包

括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分布图，以及夏商周至清鸦片战争以前各朝代的政区划分、起义、战争、交通、四邻等地图三十一幅，附图十六幅，另有附注及地名索引。不过，在处理国界和少数民族地区方面，此图集存在若干问题，查阅时应注意。

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等单位协作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大册，地图出版社 1974 年起陆续出版。这八册的次序是：（1）原始社会、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2）秦、西汉、东汉时期；（3）三国、两晋时期，（4）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5）隋、唐、五代十国时期；（6）宋、辽、金时期；（7）元、明时期；（8）清时期。此书有对开大本（包括精装本和散装本）、十六开缩印本。今后还准备续编（9）、（10）即清代鸦片战争以后及民国时期的图幅两册。这是体制庞大、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的历代政区地图集，也是我们今天查考古代地名的最为有用的工具书。

此外，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段长基《历代疆域表》和《历代沿革表》，杨丕复《舆地沿革表》等等，将历代地名列为表格，颇类地名索引，亦可检查，但总不及前面介绍的地名辞典、地名索引和历史地图方便可靠。

最后，还有三部书值得我们查考地名和研究历史地理时加以重视，这里简单提一提。第一，即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是一部时代较早而有丰富历史地理内容的重要著作，是考证古代地名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则可以作辅佐。另有《水经注引得》（燕大引得 17 号），郑德坤编，1934 年 5 月出版，分上下两册，以水名、山名、地名、人为目，目下有注，后注卷叶数，方便查检。第二，南宋末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玉海》附刻，或丛书集成本）。第三，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和《释义辨误》虽然不是研究沿革地理的专书，但其中所释地理部分颇为精审，和《通鉴地理通释》一样，对于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本荒木敏一、米田贤次郎等编，同朋舍出版部 1976 年出版的《资治通鉴胡注地名索引》，可帮助我们查找《通鉴》胡注地名。

以上三书，一般查考地名不一定用到，但碰到疑难问题需作进一步考证时，应注意利用。

## （2）顺时序查考古代地名

如果从上面介绍的辞典、地图和索引等等，仍然找不到少数地名，或解答不清楚，还可以试从时间顺序或按地域查考有关工具书和部分地理专著。这里先依时序作简单的介绍。

《甲骨地名通检》，曾毅公编，齐鲁大学线装一册。此书可查商代地名。

《左传人名地名索引》，日本重泽俊郎编，弘文馆 1935 年版。《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包括地理的很重要的参考书。此索引使我们易于查找《左传》地名，了解《左传》关于这些地名的记载和描述，对查考先秦地名很有帮助。

由于时代久远，记载疏略，先秦地名很难确指今日方位。因此，王应麟的《诗地理考》、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程廷祚《春秋地名辨异》、沈淑《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程恩泽《国策地名考》、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等等专著，对于查考先秦地名也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两汉以后，主要有详载历代政区沿革的正史地理志可以参考。这些地理志，可查新标点本《二十四史》，也可查清罗汝南辑、光绪二十四年广东集古书屋刊印的《历代地理志汇编》。

有些正史没有地理志，清代以来学者多有补志之撰述。又诸史地理志往往有不少遗漏和错误，后人或有辨析和考订。这些补志或考订文字，多数收入上海开明书店 1936—37 年排印的《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 1957 年又据原版重印），部分收入《历代地理志汇编》和其他丛书中。现将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的这方面著作列表如下，以资参考：

(续表)

书 名	卷数	撰 者
魏书地形志校录	3	(清)温日鉴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	9	(民国)杨守敬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	28	(清)徐文范
五代地理考	1	(清)练恕
宋史地理志考异	1	聂崇岐
辽史地理志考	5	(清)李慎儒

从唐代开始，除了正史地理志以外，还留存下一些著名的地理总志可供我们查考地名时参考。

《元和郡县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是书以唐宪宗元和八年（813 年）为限，把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四至八到、山川、贡赋和古迹等，依次作了叙述，并有附图四十七幅，置于有关各卷的卷首，称《元和郡县图志》。宋时图已亡佚，故略称今名。这是今天保留下来最古也是编写得最好的一部地理总志。原书佚十九、二十、二三、二四、三五、三六共六卷，另有三卷各佚其半。清严观《元和郡县补志》依原书体例为之补足，有蒲卢学舍刊本及光绪六年金陵书局刊本。又畿辅丛书本有孙星衍辑逸文十卷，张驹贤撰考证三十四卷。另有缪荃孙辑《元和郡县志缺卷逸文》，收入《藕香零拾》。其中，严书和缪书较有价值。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宋乐史编著，约成书于太平兴国时期（976—983 年），有嘉庆八年刊本，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此书叙述范围始自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终于“四夷”，大致因袭唐代志书的体例，以当时所分十道为标准，增加风俗、姓氏、人物、土产等门，着重经济文化纪述，丰

富了我国地理总志的著述内容，是继往开来性质的北宋地理名著。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又此书多载唐以前地志佚文，可补史籍缺略。《四库全书》著录原书佚七卷，《古逸丛书》刊有杨守敬从日本辑回的残存五卷半，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收入《丛书集成》。又光绪宣统间湘西陈氏刊《麓山精舍丛书》中有陈运溶辑《拾遗》七卷及其所著《辨伪》六卷。《拾遗》可以参考，《辨伪》否定杨氏自日本辑回的残卷似不可据。

《元丰九域志》十卷，宋王存等编，有德聚堂冯氏刊本，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本。这是北宋元丰年间（1066—1085年）的地理书，内容较《寰宇记》简略。其记本朝事，叙述四至八到和各地里数，详备细致，为《寰宇记》所不及。日嶋居一康编《元丰九域志索引》（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可以利用。不过，原书篇幅不大，目录简明，索引的用处也不是很大。

北宋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也可参考。但这些书，偏重史实和人物，从地理方面来说意义较小。又元明清三朝都有一统志的纂修，其中元一统志已佚，今有赵万里校辑、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元一统志》上下两册。原书一千三百卷，规模宏大，然多转引《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和其他宋、元旧志材料，辑本作十卷。据说《关中丛书》等有关《元一统志》的材料，仍为辑本所遗漏。《明一统志》九十卷，李贤等奉敕编，有天顺五年刊本，弘治十八年慎独斋刊本。《大清一统志》前面已重点介绍，从略。

### （3）按地域查考古代地名

上述各类工具书查不到的地名，可按地域查找各地区的方志。据朱士嘉统计，我国现存方志约有七四一三种，这是极为可贵的文化遗产。一般说来，方志都是当地人纂修，对本地区的沿革，特别是有关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和村寨的记载，比较详备可靠，值得加以重视。若以全国方志收录的地名和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或地名辞典相比，那真不知要多上多少倍，确是我们查考地名极其丰富的知识宝库。

凡是能预先确知某地名大致属某省或某府州县的，可先查省志或直接查有关府州县志，部分地区甚至有乡志、镇志或村志可供查阅。

全国究竟有多少地方志？这些方志藏在哪里？可以查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1958年修订重版）。这部书的优点是著录的方志比较完备，又注明全国二十多个大型图书馆收藏方志的情况，具有联合目录的功用，缺点是有些书的纂修人和卷数著录有错误，藏书情况也不够准确，有待进一步修订。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也可参考。另外，关于边疆地名，可利用邓衍林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的《中国边疆图籍录》等工具书转查有关书籍。如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

域记》、宋赵汝适的《诸蕃志》等等，凡涉及边陲和四域的地理专著，皆为是书所收录。

### 三、中国近现代地名的查考方法

中国的版图、行政区划以及全国的山川、村镇的定名，到了清代可以说基本上已稳定。因此，查考清代地名的工具书如赵泉澄的《清代地理沿革表》以及前面介绍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大清一统志》等等，也都可以查考近现代地名，因为这方面时间上的界线本来很难划分。

凡既可查古代地名，又可查近现代地名的工具书，前面讲过了，这里就从略。现就几种专查近现代地名的工具书，略予介绍。

《辞海》1976年修订本《中国地理》分册，除了查地理学科的一般名词术语外，主要是供查考中国近现代地名之用，这是首先要查的工具书。

《中华民国新地图》（又称《申报馆地图》），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上海申报馆1934年4月初版。本地图集的绘制，采用了1,000多个经纬点，参考了实地测量的中外地图八千多幅，是当时出版的最精确的地图。图分总图和分图两种：总图是一些全国的专门性质的地图，如政区总图、地文总图、交通总图以及气象图、语言区域图、矿产分布图、农产分布图等。分图依经纬线分为二二幅，每幅两部，一是人文图，表示省区的划分，居民点的分布，交通的路线等；一是地文图，用分层设色法详示地形高下及河流、海岸等。后附地名索引，按部首排列，另附四角号码及汉语罗马字拼音检字。总之，这是一部非常详细而又比较精确的地图集，收录地名极多，是查考近代地名极有用的工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编印，并多次修订，其中以1972年本最为详细，收录地名极多，是查考现代地名的重要工具书。又有1974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实即72年本的删简，其特点是图面清晰，地名易找，但不及72年本详备。图后附地名索引，极便检索。到目前，这本地图集的最新版本为1976年版。另有严地的《汉语拼音中国常见地名表（汉、英、法、西对照）》（测绘出版社1977年版）、地图出版社1978年编辑出版的《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地名索引》，也可加利用。

以上地图，大至省区名称，小至山水、村镇、道路，都可以查找。下面再介绍几种专查县级以上地名的工具书，即《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来荷初的《中国地名索引》和严地的《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

《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内政部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11版。是书所列行政区域，截至1947年6月底为止。除凡例外，前有《中国行政区域概述》，后有《全国行政区域系统表》、《各省所辖行政区域一览表》、《全国院辖市一览表》、《全国行政区域地名索引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50—1953年，每年刊载于《大公报》；自1954年起由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编，地图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1961年本由国务院秘书厅编。文化大革命初停了几年，后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内容主要是全国县、市以上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人民委员会驻地、区划变动情况、各级行政区划统计数字和县、市以上单位地名索引。下列1977年本（资料收至1976年底）分类目录，以见一斑：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表。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一览表。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和市一览表。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一览表。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地名索引检字表。
-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地名索引。

附录、1977年1月1日至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变动。

《中国地名索引》，来荷初编，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该书收全国市、县和相当于县级的旗、宗、自治区，以及新设工矿区、省辖区、镇等基层行政单位。所收地名依笔划编排，注明所属省区、经纬度和变动情况。这是我国现代地名索引，作用略同于前述行政区域表。

《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严地编，测绘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修订。收录全国县级以上的地名，以及一些自然地物和居民地的名称，共计三千四百多条。

此外，清代以来编纂的地方志仍然是查考近现代地名的重要工具书。

#### 四、查考外国地名的中文工具书

我们开头曾介绍过的两种查考古今中外地名的辞典，对于外国地名自然也可以查考。另外，《辞海》重新修订后，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理》分册，单独成书，专供查考外国地名使用。可惜的是所收词目只有二一六条，反比1961年《地理》分册少收三十二条。但其优点是改正了前几稿较为明显的错误，资料一般较新，大都截止至1975年底，个别条目截止至1976年8月，极为有用。

《世界地图集》，地图出版社出版。解放后不断修订，目前以1978年第二版本为最新最完备。这是和《辞海·外国地理》分册同样重要的工具书。就地名而论，远远超过《辞海》。

《（汉俄英对照）常用外国地名参考资料》，地图出版社1959年编印。这是一本对照地名字汇，共分五个部分：（1）国家地区全简称对照表，（2）常用外国地名汉俄英对照表，（3）俄汉地名对照表，（4）英汉地名对照表，（5）译音表，又分俄、英、德、法、意、西、南七表。

《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出版，内部发行。

该手册汇编了外国报刊中常见的世界各国（地区）地名约五万个，并附《世界各国（地区）首都（首府）和行政区划名称》、《地名性专名（建筑物、广场、街道、名胜古迹等）》、《常见地理通名》。全部地名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方括弧内注明国家归属。

以上两种工具书，因无具体方位、历史演变以及现状等等介绍，只可供一般参照使用。另有地图出版社 1960 年编纂的《外国地名手册》（汉俄英对照）、1962 年出版的《外国地名手册补编》（汉俄英对照），共收地名四万条左右，也是有用的工具书。

《世界古代史地图集》，苏联博克沙宁著，韩亦琦译，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教研室审订，地图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本图集包括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四世纪地图二十五幅，书后附录译名（包括原名），按音序排列，一一注明图次和位置。

《世界中世史地图》，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世史教研室编译，历史系绘图室绘制，该校函授教育处 1957 年出版。图集包括《四——五世纪的罗马帝国和蛮族》到《中世后期的东南亚诸国》等六十九幅中世纪史地图。

《世界近代史地图》上册，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编绘，沈阳师院 1956 年出版。本图编绘 1640 年到 1870 年地图三十八幅，按历史年代顺序排列，第一幅是《1648—1714 年的西欧》，最后一幅是《1870 年的世界》。其中第二十五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1818—1871 年）生活与工作主要地点》，标绘了两位革命导师居留的地方与年代。书后附地名索引，甚便检索。

以上地图，可供我们查考外国历史地名之用。

需要顺便说一下，有些老的地图，今天来说使用价值已很小，已被更为科学、更为详细而精审的地图所代替，除了写地图史需加以研究外，一般很少有人想到查考，然而偶然需要，也可聊备查考。如 1975 年江西省新发现明朝宋应星的《谈天》、《野议》等著作，其中提到地名“玛八作”和乌斯藏的“亚大腊山”。查遍各种常用工具书都找不到这两个地名，查明末清初的地图和一些地理专著也没有找到，但在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却可以发见，玛八作似在南美阿根廷境内，亚大腊实即北非横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阿特拉斯山脉。所以我们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一些较为常用的大型工具书，象利氏地图以及其他专门性的或规模较小的工具书不可能一一加以介绍，读者应充分认识这一点，千万不要以我们的介绍为局限。

#### 第八章 查考 古代典章制度 的工具书

查古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主要有《十通》和会要、会典等典志体史书。封建时代的图书分类法，把这些书基本上归入史部政书类（郑樵的《通志》



入别史类)。

典志体史书是极为重要的旧的史书体裁之一。它广泛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经过编纂者的融会贯通和重新组织，然后分门别类系统地论述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与类书只是排比资料、述而不作颇有区别。

今天，无论是了解古代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的变化，稽查古今典籍的聚散、学术源流的演化或学校的兴废，还是研究礼、乐、兵、刑以及赋税、选举等等制度的沿革，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类著作，或者和二十四史中的志、书互为补充并参照使用。

## 第一节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专史的产生和发展

### 一、从《史记》八书到《通典》的编撰

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我国典章制度的原委。班固的《汉书》，乃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合并、增补而改写成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十志，使记载更趋详备。刘宋范曄撰《后汉书》，写完纪、传之后因事被杀，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把晋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八志补入范书；司马彪的《续汉书》早已失传，八志却因《后汉书》得存。晋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精简，有纪传而无志表。晋书、宋书、齐书、魏书、隋书均有志，但有的并不全，如宋书缺食货、艺文二志，齐书缺食货、艺文、刑法等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和南史、北史则无志。其中宋志叙事往往追溯三代及秦汉，而特详于魏晋，虽与断代为史的体例不合，然而材料丰富并有完整的体系，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所未备，唐初修晋书诸志即取材于此。《隋书》十志原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而作，实统括了南北朝的典章文物，值得特别重视。但志书均断代为之，缺乏古今会通之意，欲纵观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仍然很不方便。

根据时代的需要，在纪传体志书的基础上，唐杜佑撰成《通典》一书，成为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史，为后来典志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通典》的产生，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汉书》的精华在十

志。《史记》八书取法于儒经，十志又取法于八书。十志规模宏大，记事比八书丰富。律历志合并《史记》的律和历两书，礼乐志合并《史记》的礼和乐两书，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郊祀志补充《史记》的封禅书，天文志补充《史记》的天官书，沟洫志补充《史记》的河渠书，此外又增立《史记》所无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十志比八书详备，显然可见。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大大发展了志书体。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藉志书得以保存，八书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又说：“《通典》之作，虽源于‘正史’的书、志，但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本书所载，上自黄帝，下迄天宝，肃、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尔后发展为三通、十通，蔚为大观。”

《通典》之前，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曾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杜佑于代宗大历间得刘秩《政典》，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入开元时代所编礼乐书等材料，开始编纂《通典》，至德宗贞元时方成书，共二百卷，前后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通典》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天宝，肃、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李翰《通典序》谓《通典》分八门；杜氏自序亦谓“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将兵刑合一称之谓刑，共为八门。然而实际分类时又将兵、刑分开，故多一门而为九门，即：（1）食货典十二卷；（2）选举典六卷；（3）职官典二十二卷；（4）礼典一百卷；（5）乐典七卷；（6）兵典十五卷；（7）刑典八卷；（8）州郡典十四卷；（9）边防典十六卷。

《通典》是我国史学中最早的一部有系统、有门类、专详历代典章制度的辉煌巨著，为后代典志体史书的编写开创了优良的先例，同时为我们今天查考古代制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 二、《通典》以后的续作

继《通典》之后，纵论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有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此前宋郑樵的《通志》虽是另一类型的通史著作，历来只有二十略受到重视，而二十略又是专叙历代制度并有所发明创新，所以不能不先介绍一下《通志》。

据厦门大学历史系调查研究，郑樵的著作多达八十四种，现存的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以及一些零散的遗文而已。其中《通志》二百卷则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关于郑氏生年卒年和《通志》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说法，可参看《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所载杨国桢《郑樵年代考索二题》。）

前人评论《通志》，认为他要创作一部伟大的通史，达到“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目的，那是完全失败的。因为《通志》所归纳的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没有突破传统的旧史格式，而其纪传和载记等部分又都是抄录旧史略予增删而已。《四库提要》谓《通志》纪传部分“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

《通志》的精华在于二十略。梁代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郑樵《通志》总序亦说：“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所以郑樵用心修订志书部分——二十略：（1）氏族略；（2）六书略；（3）七音略；（4）天文略；（5）地理略；（6）都邑略；（7）礼略；（8）谥略；（9）器服略；（10）乐略；（11）职官略；（12）选举略；（13）刑法略；（14）食货略；（15）艺文略；（16）校讎略；（17）图谱略；（18）金石略；（19）灾祥略；（20）昆虫草木略。

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加以分门别类探求其发展的过程，不仅大量收集整理文献资料，而且郑樵还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精心研究，或多或少有所创新，其中氏族、都邑、六书、七音、昆虫草木等略，为旧史所无，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尤其值得重视。《四库提要》尽管对《通志》全书包括二十略有所批评，但其结论不得不说：“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使典志体史书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马端临非常赞赏司马迁的《史记》和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但可惜一限于汉前，一限于唐、五代，不能集著述之大成。他认为，杜佑的《通典》记上古至唐代制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凡历代因革，粲然可考，司马光的《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都是很好的著作，可是《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通典》则节目未为明备，都有一定的缺陷。因此，他就着手编纂他的《文献通考》。

他的编著原则，自序说得很清楚：“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采、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等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

则续而成之”。另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通典》原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虽简严不及《通典》，然材料丰富，分类详细，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典》和《通志》二十略之上。

《四库提要》对《文献通考》各门疏略均有具体批评，指出：“如田赋考，载唐租庸调之制，而据《唐会要》，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其法屡改；载五代田赋之制，而据《五代会要》，尚有成化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乃一概略之。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亦伙不载。”但总论该书时仍指出：“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文献通考》旧入史部政书类，《通志》另入别史类。后人于《通志》只看重二十略，故与杜氏、马氏之书相配，称之为《三通》。

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四库馆臣讥其“体例揉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论者病焉”。康熙时朱奇龄又撰《续文献通考补》四十八卷，补充王书，但为钞本，未尝刊行。乾隆时特设三通馆，奉敕续编三书，先编《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后编《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为《九通》。朱次琦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读《九通》，是谓不通。”说明朱氏极为看重此类著作。后刘锦藻以一人之力，经过二十八年的辛勤劳动，将乾隆五十一年至清末的材料搜集整理，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遂使《九通》而增为《十通》。刘氏之书材料极为丰富，其中四裔考和新增加的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尤为可贵。

《十通》可分为《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各自的续编三个系统。今天从研究历史和分门查考古代典章制度来看，以《文献通考》及其三部续作这一系统最为完备有用，刘氏只续《通考》，不续《通典》、《通志》，也最为得体。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通典》、《通志》二十略的重要性。

### 三、会要、会典的纂修

唐德宗时，苏冕首先编次唐高祖以后九朝事为《会要》四十卷，唐宣宗时诏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四十卷；苏、杨之书已佚，但开创会要这一史书体裁，不为无功。宋王溥据此二书并补充唐宣宗至唐末事而成《唐会要》一百卷，又另撰《五代会要》三十卷，会要的体裁至此而完成。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部较为完备的会要著作。会要是断代的文化专史，它搜罗的材料颇为丰富，可补正史之不足，极便于查考各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但一般说来，它只是罗列史实而缺乏见解，在史学史上的地

位，远不能与《通典》、《文献通考》等著作相比拟。今天，从查考古代制度的角度看，《通典》、《通考》纵论历代制度，会要和后来的会典横叙一代史实，各有各的用处，二者不能偏废。

自《唐会要》、《五代会要》于北宋开国之初编成之后，会要体史书遂与编年体之实录、纪传体之正史鼎足而峙，后来仿效此种体裁的著作日益增多。首先是赵宋一代专门设立会要所，前后十次大规模地纂修会要，成书二千二百余卷，原书于明代毁于火灾，幸明初修《永乐大典》将《宋会要》史事分隶于各韵，清初《永乐大典》已佚去一千余册，然所存尚得十之八九，嘉庆时徐松即从《永乐大典》辑出二百册计五六百卷，即今影印本《宋会要辑稿》之前身。它是研究宋代制度最详实的材料。

南宋徐天麟著《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唐会要》不分门，只标出五 四目；《五代会要》也不分门，标二五六目。《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则分为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前者共 367 目，后者 384 目。徐氏的分类，足可代表这一类著作，便于查检。

元虞集、欧阳玄等著《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也可说是元朝是会要；明董说著《七国考》十四卷，相当于战国的会要。此后，清龙文彬著《明会要》八十卷，孙楷著《秦会要》二十六卷，杨晨著《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姚彦渠著《春秋会要》四卷，差不多历朝会要逐渐补齐，分类大多数从徐天麟的十五门，或略有增减。

宋李攸《宋朝事实》二十卷、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虽不取会要之名，而实际上也是分门别类详述当代典章制度，与会要无异。又明清官修的会典，不以门类分隶材料，而以吏、礼、兵、工、户、刑六部为纲，注重于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与会要略异，如《明会典》、《大清会典》等等。此类著作盖导源于《大唐六典》，亦与制度有关，然而价值不及会要。但查考明清制度时，亦可将会要、会典合看。

## 第二节 怎样查考古代典章制度

根据以上介绍的典志体史书的实际情况，怎样查古代典章制度，问题看来比较简单明了。概括说来，即可从三方面入手：一、了解历代制度的沿革，主要可查《十通》；二、查一代制度，可利用会要、会典；三、作较深入的研究，就必须核对史志和参考其他专著。当然，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能截然分开，如纵的利用《十通》查各类制度的历史因革，可以参考会要、会典，横的利用会要、会典查一代史实，也可参考《十通》。一般情况下，查了《十通》、会要也就够了。但是，由于《十通》、会要等主要取材于史志、实录、奏疏等等，已是第二手材料，所以查出的结论要加以引用时，最好与原始材料核实一下；而作较深入的研究时，更应该和原始材料参照使用。另外，还应该参考关于各种制度的专门著作。

唐以前的史志编纂已简述如前，唐以后各史基本上都撰有志书，清代以来学者更有补志之作，一补史之缺志，二补史志所不详备，三则为考证和纠谬。这些补志较集中的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编印，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希读者注意。此乃考史者所必备，应知利用。又类书中往往收集了部分关于典章制度的资料，有时也可翻翻，不过总不及《十通》、会要详备。

### 一、利用《十通》查历代制度

《十通》有多种版本，目前最通行的是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影印精装本，连索引共计二十一册。

这个本子一则比翻阅线装书方便，二则编有索引易于检查，故较受欢迎。

为避免重复和节省篇幅起见，关于《十通》的书名、卷数、作者、内容和时代起迄，这里不一一介绍，仅录《十通索引》所制《十通一览表》于下，以供参考：

读者如熟悉《十通》各书的大体内容和分类情况，可以直接翻阅《十通》，而不一定要先查《十通索引》。例如春秋末期实行“初税亩”，这是田赋制度的一大变革，也是确立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标志。翻开《通典》卷四《食货·赋税上》和《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一》，即可查得“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等材料。

《十通索引》分为二种：

其一为四角号码检字索引，系将《十通》中所载之制度名物，篇章节目，凡成一名词，或可特立为一条目者，都用四角号码法编码排列，下注其所隶之书，所见之页，及所始之栏。如欲知“兵部尚书”之沿革者，则按“兵”字之四角号码7280即可检得兵部尚书 典 137 中兵部尚书（续）典 1287 中

兵部尚书(清)典 2170 中由此可于《通典》137 页中栏,《续通典》1287 页中栏,及《清朝通典》2170 页中栏等处检到之。又如欲知“籍田”之断代史料者,则于“籍”字之四角号码 8896 下可见籍田——周至唐典 264 上籍田——唐至明典 1429 上籍田——清 典 2270 上这里,所注“周至唐”、“唐至明”及“清”等字样,即指该段文字所包含之时代,读者只须根据需要,按页数检之,即可索得。

未曾熟习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可先查所附《单字笔画检查表》。

此种索引为专查某一特殊事物,或任何人名、地名者而设。若欲知某种史料之大概,某一制度之内涵,或某一时代之人物地理者,则可利用第二种索引。

第二种索引为分类详细目录。因三通典、三通志、四通考间内容各异之故,它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混合三通典之详细目录,按《通典》原有各门,分为八类:一、食货类 二、选举类 三、职官类 四、乐类 五、兵类 六、刑类七、州郡类 八、边防类。

第二编为混合三通志之详细目录,亦按原书之二十略及本纪、列传等,分为下列各类:

一、本纪 二、年谱 三、世家 四、列传 五、氏族略 六、六书略 七、七音略 八、天文略 九、地理略 十、都邑略 十一、礼略 十二、谥略 十三、器服略 十四、乐略 十五、职官略 十六、选举略 十七、刑法略 十八、食货略 十九、艺文略 二十、校讎略二十一、图谱略 二十二、金石略 二十三、灾祥略 二十四、昆虫草木略。

第三编为混合四通考之详细目录,亦按《通考》原有各门分为下列各类:

一、田赋考 二、钱币考 三、户口考 四、职役考五、征榷考 六、市余考 七、土贡考 八、国用考九、选举考 十、学校考 十一、职官考 十二、郊社考(群祀考附)十三、宗庙考(群庙考附) 十四、王礼考十五、乐考 十六、兵考 十七、刑考 十八、经籍考十九、帝系考 二十、封建考 二十一、象纬考 二十二、物异考 二十三、輿地考 二十四、四裔考 二十五、外交考 二十六、邮传考 二十七、实业考 二十八、宪政考。

又《十通》各书之序跋考证等项,无类可归者,列诸篇首,曰总类。

此项索引,系将《十通》原有之十种简单目录,化为三种详细之目录。每一编中,各按原书之门类节目,把从各书中所摘出之详目,分类排次,注明页数起讫。这样,凡同类之文字,其目均并列于一处,可以一览了然。

以上二种索引,前一种便于特索,后一种利于类推,读者可因所检之不同,而参用之。

## 二、利用会要、会典查一代制度

会要、会典中的材料极为丰富，查一代制度，应知利用。如唐德宗时宰相杨炎创立两税法，在《文献通考·田赋考》虽可以查到其大致内容，但《四库提要》曾指出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文献通考》佚而不载，是一大疏略。然而查一查《唐会要》，于卷八三《租税上》即见该奏疏全文，可知会要之极为有用。又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讲究《春秋》笔法，而于典章制度疏漏较多，有赖《五代会要》“得以收放失之旧闻”和订正欧史之谬。《宋会要辑稿》对于查考赵宋一代制度，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其他会要，对查该朝典章制度，都不失为史料的重要宝库，值得加以重视。

现将会要、会典的作者、卷数、版本及其分类开列于后，以供参考。

《春秋会要》四卷，清姚彦渠撰，中华书局 1955 年校点本。卷一为世系、后夫人妃，卷二为吉礼，卷三凶礼，卷四宾礼、嘉礼，计六门、九十八事。

校点时曾取原书所本“三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原文及有关书籍校勘，并加新式标点，是目前通行的较好版本。

《七国考》十四卷，明董说撰，中华书局 1956 年校点本。记战国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的典章制度，分为十四门：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

校点时以守山阁丛书本为主，以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参校。

《秦会要订补》二十六卷，清孙楷撰会要，徐复订补，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分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十四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书对秦制与山东诸侯递相仿效之有显例可见者，亦详著于编，以明秦制并非完全独创而无因革可寻。

《西汉会要》七十卷，宋徐天麟撰，有中华书局 1955 年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本和 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校点本。

计十五门、三六七事。十五门是：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其他会要所分门类大都仿此，或略有增减改动。

校点本据清江苏书局翻刻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了中华书局 1975 年第三次印刷的《汉书》校点本，校正了原书若干错误。

《东汉会要》四十卷，宋徐天麟撰，有中华书局 1955 年重印本和 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

此书亦分十五门，计三八四事。新版以清江苏书局翻刻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了中华书局 1973 年第二次印刷的《后汉书》标点本，校正了某些原书的错误。

《三国会要》二十二卷，清杨晨撰，中华书局 1956 年校点本。分为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十五门。



是书旁搜博引，引书在一五五种以上，极有参考价值。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中华书局 1955 年重印。

此书不分门，凡五一四目，“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该”，为现存最早的一部会要。

《五代会要》三十卷，宋王溥撰，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凡二七九目。编者从五代历朝实录中引录了不少奏章、诏令，所记颇有史料价值，可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相互补充。

校点本以清江苏书局本为底本，同时参校武英殿本、沈镇本和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藏传钞本，以及《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等，附有校记。

《宋会要辑稿》二百卷，中华书局 1957 年影印本，精装八册。

此书为宋代官修，清徐松辑，北京图书馆 1936 年影印，共二百册，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十七门。此书材料丰富，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宋李攸撰《宋朝事实》二十卷（中华书局 1955 年据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1937 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亦为查考宋代典章制度的有用参考书。

《明会要》八十卷，清龙文彬撰，中华书局 1956 年出版，精装二册。

分为十五门，系以子目四九八事。十五门为：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

《西汉会要》、《五代会要》都是不加论断的。《唐会要》则有苏冕的《駁议》；《东汉会要》间附按语及杂引他说。此书录有《辑览御批》、《三编发明》及其他论列。

此外，如《明会典》，万历重修二百二十八卷本，1936 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四十册，《大清会典》一百卷，清乾隆时官修，嘉庆、光绪时重修，亦可参考。

### 三、参考其他有关专著

《通典》八门、《通志》二十略、《文献通考》二十四考等等，其中不少门类都有一些相应的专门论著可供参考，这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不能忽视的。这里仅以“职官”为例，作一说明，希读者特别注意！

历史上各种职官的名称、建置、职掌、品级、员额极为复杂，不仅代有因革，就是一代之中也往往废置不常。虽然二十四史中对每代官制多数撰有专志述其大要，《十通》和会要、会典等也有专章论叙，“但或则断代为书，不便检阅，或则疏略不全，难裨实用，因而就有职官专书的出现”。

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历代职官表》七十二卷，成书较晚，搜采亦较完

备。其书以清代官制为纲，每类先列表，把上古至明的职官名称排比对照，以便知道清代某官相当于前代何官。表后是考证，援引古书说明历代官制之沿革置废。有殿刻原本，四部备要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卷目如下：

1 宗人府 2—4 内阁 5 吏部 6 户部 7 户部三库 8 户部仓场衙门 9 礼部 10 乐部 11 礼部会同四译馆 12 兵部 13 刑部 14—15 工部 16 户工二部钱局 17 理藩院 18—19 都察院 20 五城 21 通政使司 22 大理寺 23 翰林院 24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 25 文渊阁阁职 26 詹事部 27 太常寺 28 坛庙各官 29 陵寝各官 30 光禄寺 31 太仆寺 32 顺天府 33 鸿胪寺 34 国子监 35 钦天监 36 太医院 37—41 内务府 42 銮仪卫 43 领侍卫内大臣 44 八旗都统 45 前锋护军统领 46 步军统领 47 火器健锐虎枪各营 48 盛京将军等官 49 盛京五部等官 50 总督巡抚 51 学政 52 司道 53—54 知府知县等官 55 各省驻防将军 56 提督 57 总兵副将 58 参将游击 59 河道各官 60 漕运各官 61 盐政 62 关税各官 63 各处驻劄大臣 64 宗室封爵 65 世爵世职 66 圣贤后裔 67 师傅保加衔 68 文武官阶 69 王府各官 70 新疆各官 71 藩属各官 72 土司各官

全书头绪纷繁，又无索引，查检颇为不便。道光年间，黄本骥删去释文，仅存诸表及简略的清代官制说明，约为六卷，仍称之为《历代职官表》。黄编本虽较简略，但对一般研究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使用上也较方便，中华书局 1965 年排印时，予以仔细校勘，纠正了不少错误，改进了表中官名的排列，并加新式标点，又请瞿兑园撰写《历代官制概述》，通论历代官制沿革情况，刊于表前，以便读者对历代官制先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另有《历代职官简释》以解释表文，附于表后。全书之后又编有索引，极便参考。

此外，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7 年编印的《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常识》，亦可参考。

又中华书局 1965 年出版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和《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1961 年版），可供研究清代官制之用；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1966 年版），可供查 1912—1928 年职官之用。

### 第九章 查考古代事物的工具书

魏文帝命王象、刘劭等编纂《皇览》一书，为我国见诸记载的第一部类书。类书把古代事物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等等分为若干门类（或部），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然后采集群书中有关资料“随类相从”，分别附录于各门类及其子目之下，以供人们查考。这种采用所谓“述而不作”的编制方法辑成的类书，完全是资料类编的性质，而不是什么学术著作。它和现代百科全书也不同，但就其规模和作用来说，实与百科全书很相近，是我们查考古代事物和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我们径称之为古代的百科全

书，亦未尝不可。下面就类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怎样利用类书查考古代事物，分别作简单的介绍。

## 第一节类书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的类书，发端于古代杂家著作特别是《淮南子》一书。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五：“《淮南鸿烈》者，淮南王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瑰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

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卷下：“类书之端，造于《淮南子》。古者著书，各道其自得耳，无有裒集群言，纳于部类者。秦之吕不韦，始聚能文之士，著为《吕览》；而其言则自成一家，且多他书所未载，非徒涉猎也。至《淮南》一书，乃博采群说，分诸部类，大旨宗老、庄而非儒、墨。虽泛滥庞杂，醇疵互见，而大气浩汗，故能融会无迹，则探索之力亦深矣。”

“博采群说，分诸部类”，这和类书的编制完全相近；至于“融会无迹”，则又和类书照录原文、标明出处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淮南子》不是类书，仅仅是类书的发端而已。这个意见，较为可取。

又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的杂史和汉赋，近似类书，在类书正式产生之前也起到了类书的作用。

李宗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沈阳师院 1957 年编印）说：“刘向的《说苑》，班固的《白虎通义》，应劭的《风俗通义》，都是分类的编述史事，就有类书的形式。”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说：“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和《南都赋》等，取材广博，按事类排比，在类书未出以前，这种大赋实际上起着类书的作用，因之文学价值虽不高，流传却很广。”

清袁枚《历代赋话序》早有相同的看法：“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遐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

汉末魏晋之际，随着骈体文的兴起，文章讲究对偶，尤重词藻典故，喜欢以“征事”、“策事”为测量学问浅深的标准。“征者，共举一物，各疏见闻，多者为胜”；“策者，暗举所知，令人射复，中者为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九）那时荀悦、曹植、孔融、王粲等人，皆以博闻强识，为时所称；而多数文士则不得不求助于资料类编，以为临文备查之用。这就促使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的正式产生。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

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据《魏志·杨俊传》注，《皇览》一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合八百余万字”。可见其内容很丰富，可惜唐代已经散失，今天无法考见其面目了。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取名《皇览》，顾名思义，是编给帝王浏览的。所以类书自产生之日起，它的编制目的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点，比起其他书籍就更为明显。

自《皇览》以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喜欢委派臣下依据皇家藏书纂修巨型类书。齐、梁、唐、宋和清初，此风尤盛，其中也有不少属于私家撰修。

据《类书流别》：晋有陆机《要览》；宋有何承天、徐爱《合皇览》；齐有东观学士奉敕撰《史林》，萧子良集学士撰《四部要略》；梁有萧琛《皇览钞》，刘峻《类苑》，徐勉等奉敕撰《华林遍略》，刘杳《寿光书苑》，陆罩等奉敕撰《法宝联璧》，陶宏景《学苑》，张缵《鸿宝》，朱澹远《语对》，《语丽》；陈有张式《书图泉海》；北魏有《帝王集要》；北齐有祖珽等奉敕撰《修文殿御览》等等。

估计六朝人所撰类书，总数在三千卷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成书于齐梁之间，可惜已全部失传。

隋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杜公瞻《编珠》五卷，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七十四卷（今本一百六十卷）。

前二书已佚。《编珠》今本二卷，题杜公瞻撰；《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清高士奇辑。《四库提要》疑今本为明人伪托。《书钞》存，详见第二节。

唐代类书近万卷，大部分出自初唐人之手，可以想见类书编纂事业在当时极为发达。这些类书多数已经失传，其中有名的类书如欧阳询等奉敕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徐坚等撰《初学记》三十卷，白居易撰《六帖》三十卷却一直流传至今，为我们保留了古代大量文献资料，值得重视。

据欧阳询《艺文类聚》序，古代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如《流别》、《文选》，专取其文，是为总集；《皇览》、《徧略》，直书其事，是为类书。自《艺文类聚》开始，合事和文为一编，这是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一大变革。故《四库提要》称“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

类书“随类相从”，以事物分类编制为常例，如《艺文类聚》分天、地、人、事、物等四十六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其他类书，多仿其体例。唐颜真卿撰《韵海镜源》，分韵而隶事，这是唐代类书编制体例上的又一创新，在巨型类书门类至多至烦的情况下，提供读者按字检索之便。

又类书主要应上层统治阶级首先是封建帝王的需要而编纂。魏文帝敕编《皇览》，已如前述。《初学记》，乃为唐玄宗诸皇子作文参考而纂修。《大唐新语》九记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

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于是编了这部《初学记》。再如宋初敕撰《太平编类》一千卷，太宗每日阅三卷，一年读毕，赐名《太平御览》。唐五代时出现供民间阅读的《兔园册》，这也可以算是类书编纂事业中又一个特色。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云：“《兔园策》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丽之语。是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故有遗下《兔园》之谑。”

《新五代史·刘岳传》：“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策》尔’。《兔园策》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谑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岳时为吏部侍郎）。”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称唐杜嗣先撰《兔园册府》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同），冯道《兔园策》即指此。

《兔园策》已佚，《兔园册府》仅存写本残序一页（见《鸣沙石室佚书》），已不能考见其眉目。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谓：“题名之异，盖由纂集本非一人，无足为怪，独其卷数不同耳。”则又认为二书实一书。

五代十国类书不多，并且已全部散亡。宋代类书的编制，又出现新的高潮，除官修大部头类书以外，私家著述亦复不少。这和当时的文风以及科举取士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现存宋代类书，比较著名的有吴淑《事类赋》三十卷，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王钦若等奉敕撰《册府元龟》一千卷，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刘应李《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潘自牧《记纂渊海》一百卷，王应麟《玉海》二百卷、《小学紺珠》十卷，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外集各二卷，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等等。其中百科性的类书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最为有名；不仅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而且编排体例也较为完备。《事林广记》和唐代《兔园册》一样，也是供民间用的综合性类书，而且流传至今，别具特色。此外，《太平广记》专收小说，《事物纪原》考事物起源，《全芳备祖》收植物，都是有名的专科性类书。《韵府群玉》二十卷，元阴时夫编，是现存以韵隶事的最古类书，为清《佩文韵府》所本。《四库提要》曾指出，昔颜真卿编《韵海镜源》，为以韵隶事之祖，然其书不传。又说，押韵之书，盛于元初，而元代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

明代由于时代稍晚，又由于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达，类书的数量亦不少，且留存下来的多于佚失的。但明人编书，往往粗制滥造，或任意增删，或引文不注出处，少有可称道者。唯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敕编纂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录宋元以前的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郭沫若认为它“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见1959年《影印 永乐大典 序》）此书编成后，因卷帙过多，始终未能刻板。嘉靖时又写正副本各一。原本副本明末被焚毁，正本于清代初中期略有散失，而大部分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毁劫一空。

俞安期《唐类函》二百卷，为康熙时敕撰《渊鉴类函》所本，颇为康熙帝所推重。

另有陈耀文《天中记》六十卷，徐元太《喻林》一百二十卷，亦颇有名。

清代初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类书之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编纂的类书，如敕撰《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子史精华》一百六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无论从数量质量来说，都超过前代。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即网罗人才，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刘壘《隐居通议》卷十三）其实，唐宋初期之纂修类书，明成祖之敕修《永乐大典》，均是此意，不独康、雍为然。此后政权已自稳固，又加上乾、嘉时代朴学兴起，士大夫均以类书为鄙陋之学，因而类书编纂事业，从此便一落千丈。

类书的编制虽然主要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倡，但是却因此保留了我国古代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们辑佚、校勘古书，查考典故和其他事物的出处，以及研究古代文学、艺术、历史、应用科学各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四库提要》谓“此体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如果因为类书提供了不少便利，封建士子遂舍本逐末，只想走捷径以邀取一官半职，不再博览群书扎扎实实做学问，那是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陷，而不能归罪于类书。所以，《提要》的批评不完全对。

最后，必须指出类书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如有的书引文不详出处；或作任意删削；或转抄他书，不按原著摘录，致使以讹传讹，如此等等，读者引用时要尽可能核对原始材料。又类书多半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所编纂，无论从标题到摘取的资料内容，都存在不少封建性糟粕，尤需加以注意。

## 怎样利用类书查考古代事物

类书把古书中有关字句、片断甚至整部书（如《永乐大典》）都抄录下

来，为我们收集和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它的用处是多方面的。例如，被类书征引过的古书，因战乱或水火灾害等原因，好多已经失传了，但从现存类书中却可以辑录和使之还原一部分，这是类书的重要功用之一。清代辑佚的风气很盛，如纂修《四库全书》、《全唐文》时，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中以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宋会要》等最为有名。此外，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共辑录古佚书六百余种，黄奭的《汉学堂辑佚书》，辑录古书二百余种，都是较为著名的辑佚专著。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也大都取材于《艺文类聚》等类书。有些古书虽未失传，但因年代久远，在文字方面或经后人改动，或传抄脱误，也可以用类书征引过的文句、片断进行校勘。鲁迅就用《北堂书钞》（陈禹谟刻本）、《艺文类聚》（胡缙宗刻本）、《初学记》（无锡人安国刻本）、《太平御览》（鲍崇城刻本）等等类书校勘过《嵇康集》。

类书按内容可分为百科性和专科性两种。它们的编制形式，通常都是分类编排，只有少数以字韵编排。

分类编制的百科性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专科性类书如《太平广记》、《全芳备祖》，都可以按所分门类查找古代事物。

以字韵编制的类书也可分齐句首字、齐句尾字两种。唐颜真卿《韵海镜源》（佚），首创分韵隶事即齐句尾这一体裁。此类著作，可以清康熙时敕撰《佩文韵府》为代表。清康熙时又敕撰的《骈字类编》一书，另创齐句首这一体裁，可与《佩文韵府》“互为经纬，相辅而行”。这些类书可按字、韵查找古代事物。

今就现存重要类书，参照上述不同的编制形式，分别介绍查找古代事物（包括词藻典故）的途径：即一、按门类查百科性类书；二、查专科性类书；三、查以字、韵编制的类书。

## 一、按门类查百科性类书

按照门类编制的百科性类书，可以说是现存类书的主体。查找古代事物，主要应查这一类书籍。这种类书的特点是卷帙浩繁，分类不一定科学，但大致还是有规律可循。如《艺文类聚》分事物为四十六部，《太平御览》为五十五部，《古今图书集成》为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归纳起来，总跳不出天文、地理、人事、器物等范围。若是新印的类书附有索引，则更便使用。

如有人以为“载舟之水可覆舟”的比喻始自唐太宗。其实查一下《艺文类聚》、《渊鉴类函》等百科性类书的“舟车部”或“舟部”，便能知道这话原出《孙卿子》即《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见《王制篇》）

又如魏文帝曹丕尝逼其弟曹植七步成章，这也是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然而翻遍《三国志》，不见记载。到哪里去查？不妨查类书。《初学记》卷十帝戚部分王、公主、驸马三个子目，植是帝戚并封王，故于王字目下可见“七步”这一小标题。该题下引《世说》曰：“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成诗，不成将行大法。遂作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惭色。”即知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现将重要的百科性类书分别介绍如下：

《北堂书钞》一六卷，虞世南在隋任秘书郎时所编。《四库提要》称《唐志》作一七三卷，晁公武《读书志》因之；《中兴书目》作一六卷，《宋史·艺文志》因之。今本卷帙与《中兴书目》同，其地部至泥沙石而毕，度非完帙。岂原书在宋已有亡佚耶？王应麟《玉海》云：“二馆旧阙《书钞》，惟赵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手诏褒美，盖已甚珍其书矣。”

明陈禹谟校刻此书，多所删改增补，清孙星衍得明影宋钞本，凡五十五卷，与严可均共校之，曾刊三十八卷。稿本后为南海孔广陶所得，孔又加校订，于光绪十四年刊行（即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本），分装二十册，略复原本面目，即今通行本。它共分十九部，八百五十二类。每类之下，摘录古书中句子加以排比。由于此书引文首尾不完备，又是线装本，使用价值不及《艺文类聚》等书，但因成书较早，所引材料较可贵，仍应加以重视。

《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精装三册。

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类书之一。参与其事的共十余人，除领修人欧阳询外，今可考知者尚有令狐德棻、陈叔达、裴矩、赵宏智、袁朗等人。

《四库提要》称“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全书分为四十六部，每部又分细目，共计子目七百二十七个，约一百万字。兹摘录四十六部卷目如下：

天部（1—2），岁时部（3—5），地部、州部、郡部（6），山部（7—8），水部（8—9），符命部（10），帝王部（11—14），后妃部（15），储宫部（16），人部（17—37），礼部（38—40），乐部（41—44），职官部（45—50），封爵部（51），治政部（52—53），刑法部（54），杂文部（55—58），武部（59），军器部（60），居处部（61—64），产业部（65—66），衣冠部（67），仪饰部（68），服饰部（69—70），舟车部（71），食物部（72），杂器物部（73），巧艺部（74），方术部（75），内典部（76—77），灵异部（78—79），火部（80），药、香、草部（81—82），宝玉部（83—84），百谷部、布帛部（85），果部（86—87），木部（88—89），鸟部（90—92），兽部（93—95），鳞介部（96—97），祥瑞部（98—99），灾异部（100）。

部下详分细目，细目下所引条文分为两类，先罗列古书关于天地人事等



基本概念的记载，即所谓“事居于前”，然后再加以进一步的训释；未附有关之作品，如诗、文、赋、颂之类，所谓“文列于后”，便于读者寻检资料和探索前代文献。据近人研究，《艺文类聚》引用唐以前古书共计一四三一种，其中流传至今者不足十分之一，所以除查考事物外，可据以校勘和辑录古书，用处甚大。

本书通行的是明刻本。1959年上海图书馆得南宋绍兴间刻本，可订正明刻本的错误，中华书局曾据以影印（线装十六册）。

《四库提要》曾批评《艺文类聚》在类目结构上还存在着许多安排不当的地方，因涉及按门类查找事物的实际问题，特地把它引录下来，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其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读阙一；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载高齐；储宫部公主附太子，而诸王别入职官；杂文部附纸、笔、砚，而武部外又别出刀、匕首等为军器一门；道路宜入地部，坛宜入礼部，而列之居处；鍼宜入器物，钱宜入宝玉，而列之产业；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类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饰；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术；梦、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灵异；以及茱萸、黄连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鸿之外又别出雁，蚌之外又别出蛤，鹤之外别出黄鹤，马之外别出騊駼，如斯之类，皆不免丛脞少绪。”

批评不一定全对，但可供参考。其他类书也有类似情形，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编，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平装三册。

是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个子目。其体例先为叙事，次为事对，最后是诗文，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叙事摘录古书记载；事对取古代故事或文句熔铸成对偶，与叙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诗、文、表、箴等则根据叙事而采录。《四库提要》认为它“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

二十三部卷目如下：

天部（1—2），岁时部（3—4），地部（5—7），州郡部（8），帝王部（9），中宫部（10），储宫部（10），帝戚部（10），职官部（11—12），礼部（13—14），乐部（15—16），人部（17—19），政理部（20），文部（21），武部（22），道释部（23），居处部（24），器物部（25—26），宝器部（花草附）（27），果木部（28），兽部（29），鸟部、鳞介部、虫部（30）。

《初学记》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十年（1513年）安国的桂坡馆刻本，比较通行的是清朝的古香斋袖珍本。中华书局以古香斋本为底本，参照严可均、陆心源等人的校本重新点校出版，甚便使用。

《太平御览》一千卷，宋李昉等奉敕编，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四部丛刊本，精装四册。

是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开始编纂，至七年而编成。原为《太平总类》一千卷，后改名《太平御览》。据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太平御览》引书达二五七九种之多，内容极其丰富，历来被学者广泛利用。阮元《仿宋刻太平御览叙》：“《太平御览》一书，成于太平兴国八年。北宋初，古籍未亡，其所引秦、汉以来之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考其书传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则存《御览》一书，即存秦、汉以来佚书千余种矣。”（载鲍崇城刻本卷首，亦见《擘经室三集》卷五）但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指出，《御览》曾根据前代类书如《修文殿御览》（佚）、《艺文类聚》、《文思博要》（佚）而编纂，并非全部出于原本，故“北宋初，古籍未亡”这话不完全对。又《御览》引书不及《艺文类聚》谨严，引用时务须核对原文。

《太平御览》共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今将五十五部卷目开列如下：

天部（1—15），时序部（16—35），地部（36—75），皇王部（76—116），偏霸部（117—134），皇亲部（135—154），州郡部（155—172），居处部（173—197），封建部（198—202），职官部（203—269），兵部（270—359），人事部（360—500），逸民部（501—510），宗亲部（511—521），礼仪部（522—562），乐部（563—584），文部（585—606），学部（607—619），治道部（620—634），刑法部（635—652），释部（653—658），道部（659—679），仪式部（680—683），服章部（684—698），服用部（699—719），方术部（720—737），疾病部（738—743），工艺部（744—755），器物部（756—765），杂物部（766—767），舟部（768—771），车部（772—776），奉使部（777—779），四夷部（780—801），珍宝部（802—813），布帛部（814—820），资产部（821—836），百谷部（837—842），饮食部（843—867），火部（868—871），休征部（872—873），咎征部（874—880），神鬼部（881—884），妖异部（885—888），兽部（889—913），羽族部（914—928），鳞介部（929—943），虫豸部（944—951），木部（952—960），竹部（961—963），果部（964—975），菜部（976—980），香部（981—983），药部（984—993），百卉部（994—1000）。

钱亚新编《太平御览索引》，原载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五卷一期，1934 年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可资参考。

由于《太平御览》引书比较完整，多整篇整段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所以比唐代类书割裂文义、摘录词句更为有用。

《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王钦若等奉敕编，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明黄国琦刊本，精装十二册。

此书虽然也是一千卷，但数量比《太平御览》多一倍。二者同是类书，

前人重视《御览》而轻视《册府》，除了引文不便征引外，它本身的内容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只采正史，间及经、子，不采说部，故《枫窗小牋》谓其“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覩异闻，不为艺林所重”。

《册府》采摭范围虽不及《御览》广泛，然而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共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书，皆北宋以前古本，所引五代诏令奏议等文献史料皆已不传，而它又是整篇整节照录原文，可借以校史或补史，故清中叶以后渐为人注意，近来研究隋唐史的学者更予重视。

日本宇都宫清吉等编、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册府元龟奉使部、外臣部索引》，吕绍虞、于震寰编《册府元龟索引》（铅印本）、陈鸿飞编《册府元龟引得》（铅印本），以及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所附《类目索引》，都是翻检《册府元龟》的有用工具。陈垣《影印明本 册府元龟 序》，对《册府元龟》的内容、流传经过以及史料价值和版本等等，作了概括的阐述，值得参考。

《玉海》二百卷，南宋王应麟编。“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见《四库提要》）全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分别排比材料，极便检索。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称此书：“纂次详备，博而有要，体例与他类书迥殊。考宋时博学宏词科，是书实后进资藉。而其中源流条贯，包蕴弘深，无所不有。引用一事，必录书名，制作更改，并详月日，期于开卷井然，易为检核。”

本书元至元六年始刊行，清代有嘉庆十一年江宁藩库重刊本，四川刻小字本，光绪九年浙江书局重刊本。

《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总目四十卷，清康熙时陈梦雷编，雍正时蒋廷锡奉敕重编。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附考证二十四卷，线装八百册。

这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大的类书。全书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六汇编是（1）历象，（2）方輿，（3）明伦，（4）博物，（5）理学，（6）经济，这是其他类书所没有的。汇编下分典：汇编一包括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汇编二包括坤輿、职方、山川、边裔四典；汇编三包括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汇编四包括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汇编五包括经籍、学行、文学、字学四典；汇编六包括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合共三十二典。每典都有一个总部；总部与分部均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包括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参加此书编纂的多为博学之士，其材料之丰富、分类之详细、编排之得体，在类书中实在首屈一指。其中如职方、山川、边裔、食货、考工诸典，尤为有用。

《古今图书集成》前有总目录，多少弥补了卷帙太多不易翻检的困难；日本人泷泽俊亮编《图书集成分类索引》（1934年印），亦便翻检。又该书引文错误较多，须查对原文。胡道静《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作用》（载《图书馆》1962年1期），可资参考。据统计，全书约一万万字，较最巨之《大英百科全书》约多三、四倍。

《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清康熙四十九年张英等奉敕编。有康熙内府原刊本，古香斋刊巾箱本，光绪九年点石斋影印原本，同文书局影印本，1932年扫叶山房影印同文本。

此书为扩充俞安期《唐类函》而成。俞安期是明朝人，所编《唐类函》仅载唐代诸书，《渊鉴类函》则博采广收，自唐以后至明嘉靖年间止，所有类书及二十一史子集稗编，咸与搜罗，依例编入。俞书分四十三部，今扩充为四十五部，部下再分类。各类之中，《唐类函》引文以书为次，《艺文类聚》居一，《初学记》居二，《北堂书钞》居三，《白帖》等书居四，而以诗文殿后，此书改以释名总论沿革缘起居一，典故居二，对偶居三，摘句居四，诗文居五。释名总论中以《释名》、《说文》、《尔雅》等书居前，经史子集次之；典故以朝代为次序；对偶不拘朝代，但取工致、华瞻以备观览；诗文亦各以体类补入。此书原来主要供写作诗文时查检资料之用，现在亦可以为我们找古代各种事例提供方便。

《渊鉴类函》所分四十五部如下：

天部（1—11），岁时部（12—22），地部（23—39），帝王部（40—56），后妃部（57—58），储宫部（59），帝戚部（60），设官部（61—117），封爵部（118—121），政术部（122—153），礼仪部（154—183），乐部（184—191），文学部（192—205），武功部（206—229），边塞部（230—241），人部（242—315），释教部（316—317），道部（318—319），灵异部（320—321），方术部（322—323），巧艺部（324—331），京邑部（332—333），州郡部（334—339），居处部（340—354），产业部（355—358），火部（359—360），珍宝部（361—364），布帛部（365—366），仪饰部（367—369），服饰部（370—381），器物部（382—385），舟部（386），车部（387），食物部（388—393），五谷部（394—395），药部（396—397），菜蔬部（398），果部（399—404），花部（405—407），草部（408—411），木部（412—417），鸟部（418—428），兽部（429—436），鳞介部（437—444），虫豸部（445—450）。

综合性的类书，除以上所介绍外，尚有《白孔六帖》（唐白居易编、宋孔传续编）、《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宋人编）、《事文类聚》（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宋祝穆编；新集、外集，元富大用增撰；遗集，元祝渊撰）、《山堂考索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又名《群书考索》，宋章如愚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后集、续集，宋谢维新撰；别集、外集，宋虞载撰），亦可查考。

## 二、查专科性类书

《太平广记》，专收小说异闻；《元和姓纂》、《万姓统谱》之类，专收姓氏；《全芳备祖》、《植物名实图考》，专收植物；《事物纪原》、《格致镜原》，专考事物起源；《喻林》收古书中设譬之词；《子史精华》收子史两大部类书中名言隽句。这些都可以算作是专科性类书。

专科性类书的使用价值，往往超过一般类书，因为收编范围小，目标集中，易于查找。

多数专科性类书为私人编制，其中不乏精善之作，而粗制滥造者亦复不少，使用时应予以注意。

《太平广记》五百卷，宋李昉等奉敕编，有中华书局 1961 年平装十册。

这是宋初人编的大型类书之一，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因书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名之为《太平广记》。

此书旧刻本前列有引用书目，共三四三种，实际不止此数。据近人统计，其中有书目而书中没有的十五种，书目没有而书中实引的一百四十七种，合计引书四百七十五种（见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这些书半数以上都已散佚，就是存留的也有不少残阙和错讹之处，现在就只能依据《太平广记》来作辑佚和校勘了。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类目下引书多以人名作为标题，下注出处，不仅便于翻检，而且可以给研究小说史提供线索。其卷目如下：

神仙（1—55），女仙（56—70），道术（71—75），方士（76—80），异人（81—86），异僧（87—98），释证（99—101），报应（102—134），征应（135—145），定数（146—160），感应（161—162），讖应（163），名贤风谏附（164），廉俭吝啬附（165），气义（166—168），知人（169—170），精察（171—172），俊辩（173—174），幼敏（175），器量（176—177），贡举氏族附（178—184），铨选（185—186），职官（187），权倖（188），将帅（189—190），骁勇（191—192），豪侠（193—196），博物（197），文章（198—200），才名好尚附（201），儒行怜才、高逸附（202），乐（203—205），书（206—209），画（210—214），算术（215），卜筮（216—217），医（218—220），相（221—224），伎巧（225—227），博戏（228），器玩（229—232），酒酒量、嗜酒附（233），食能食、菲食附（234），交友（235），奢侈（236—237），诡诈（238），谄佞（239—241），谬误遗忘附（242），治生贪附（243），褊急（244），诙谐（245—252），嘲诮（253—257），鄙（258—262），无赖（263—264），轻薄（265—266），酷暴（267—269），妇人（270—273），情感（274），童仆奴婢（275），梦（276—282），巫厌咒附（283），幻术（284—287），

妖妄（288—290），神（291—315），鬼（316—355），夜叉（356—357），神魂（358），妖怪（359—367），精怪（368—373），灵异（374），再生（375—386），悟前生（387—388），冢墓（389—390），铭记（391—392），雷（393—395），雨风虹附（396），山溪附（397），石坡沙附（398），水井附（399），宝（400—405），草木（406—417），龙（418—425），虎（426—433），畜兽（434—446），狐（447—455），蛇（456—459），禽鸟（460—463），水族（464—472），昆虫（473—479），蛮夷（480—483），杂传记（484—492），杂录（493—500）。

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谓“此书成于宋初，征引载籍四百七十余种，古代佚文琐事，秘籍遗文，几咸在焉。虽多谈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唐宋以前书，世所不传者，断简残篇，尚间存其什一。其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尤足珍贵。……不特研究社会史料及风俗变迁者必当以是为总汇，即六代两唐，亦多足资考证。”

《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引得第十五号），邓嗣禹编，1934年燕京大学印。引得按中国字度撮法排列，分书名与题目二种：《书名引得》以书为主，而以各卷某条，及其题目列入之；《题目引得》以题为主，列入卷数条数，而不再列书名。读者应注意利用此引得。

《事物纪原》十卷，宋高承撰，后人曾不断增辑。有明刊本，格致丛书本，惜阴轩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郡斋读书志》谓此书“自天地生植，与夫礼乐刑政，经籍器用，下至博弈嬉戏之微，虫鱼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

据《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十卷，仅二百七十事。《郑堂读书记》称今本“虽为后人叠加增益，而体例无改其旧，且皆考索古书，求其缘起，间有未精审处，亦百中一二耳”。

丛书集成本即据惜阴轩丛书本排印。其卷目如下：卷一（凡七部，共一百七十事）

天地生植部第一（凡二十四事）

正朔历数部第二（凡二十八事）

帝王后妃部第三（凡二十六事）

嫔御命妇部第四（凡二十八事）

朝廷注措部第五（凡二十七事）

治理政体部第六（凡一十八事）

利源调度部第七（凡一十九事）

卷二（凡五部共一百九十事，应作一百八十九事）

公式姓讳部第八（凡三十六事）

礼祭郊祀部第九（凡三十八事）

崇奉褒册部第十（凡二十六事）

乐舞声歌部第十一（凡五十一事，应作五十事）

舆驾羽卫部第十二（凡三十九事）  
卷三（凡四部共一百六十七事）  
旗旒采章部第十三（凡四十事）  
冠冕首饰部第十四（凡三十九事）  
衣裘带服部第十五（凡四十四事）  
学校贡举部第十六（凡四十四事）  
卷四（凡五部共一百六十七事）  
经籍艺文部第十七（凡四十四事）  
官爵封建部第十八（凡二十八事）  
勋阶寄禄部第十九（凡三十事）  
师保辅相部第二十（凡二十九事）  
法从清望部第二十一（凡三十六事）  
卷五（凡六部共一百九十六事）  
三省纲辖部第二十二（凡四十八事）  
持宪储闱部第二十三（凡三十事）  
九寺卿少部第二十四（凡三十九事）  
秘殿掌贰部第二十五（凡二十六事）  
五监总率部第二十六（凡二十二事）  
环卫中贵部第二十七（凡三十一事）  
卷六（凡六部共一百七十六事，应作一百七十七事）  
横行武列部第二十八（凡二十一事）  
东西使班部第二十九（凡三十七事）  
节钺帅漕部第三十（凡三十三事，应作二十三事）  
抚字长民部第三十一（凡二十八事，应作三十八事）  
京邑馆阁部第三十二（凡三十二事）  
会府台司部第三十三（凡二十六事）  
卷七（凡六部共一百八十二事，应作一百七十六事）  
库务职局部第三十四（凡二十八事）  
州郡方域部第三十五（凡二十三事）  
真坛净社部第三十六（凡三十二事）  
灵宇庙貌部第三十七（凡二十六事）  
道释科教部第三十八（凡四十五事）  
技术医卜部第三十九（凡二十二事）  
卷八（凡五部共一百七十二事）  
舟车帷幄部第四十（凡三十六事）  
什物器用部第四十一（凡四十六事）  
岁时风俗部第四十二（凡四十三事）  
宫室居处部第四十三（凡二十三事）

城市藩御部第四十四（凡二十四事）  
卷九（凡六部共一百八十二事）  
农业陶渔部第四十五（凡二十六事）  
酒醴饮食部第四十六（凡二十九事）  
吉凶典制部第四十七（凡四十事）  
博弈嬉戏部第四十八（凡三十事）  
戎容兵械部第四十九（凡三十六事）  
战阵攻守部第五十（凡二十一事）  
卷十（凡五部共一百六十二事，应作一百六十九事）  
军伍名额部第五十一（凡四十五事）  
律令刑罚部第五十二（凡三十四事）  
布帛杂事部第五十三（凡三十七事）  
草木花果部第五十四（凡二十九事）  
虫鱼禽鲁部第五十五（凡二十四事）

以上统计事数七处有误，实际共为十卷、五十五部、一千七百六十五事。此书考论事物起源，不一定确切，只能供参考而已。

《格致镜原》一百卷，清陈元龙撰，有雍正时原刊本，江西刊本，苏州刊本。

此书仿《事物纪原》而编。《四库提要》谓“是编乃类事之书。其曰《格致镜原》者，自昔类书，大抵缕陈旧迹，与史传相参；或胪列典章，与会要相佐。此所采辑，分三十类：曰乾象，曰坤舆，曰身体，曰冠服，曰宫室，曰饮食，曰布帛，曰舟车，曰朝制，曰珍宝，曰文具，曰武备，曰礼器，曰乐器，曰耕织器物，曰日用器物，曰居处器物，曰香奁器物，曰燕赏器物，曰玩戏器物，曰谷，曰蔬，曰木，曰草，曰花，曰果，曰鸟，曰兽，曰水族，曰昆虫。皆博物之学，故曰‘格致’；又每物必溯其本始，略如《事物纪原》，故曰‘镜原’也。其采撷至博，而编次具有条理。又以明人类书，多不载原书之名，攘古自益。因各考订所出，必系以原书之名，虽所据或间出近代之本，不能尽泝其源，而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称精核矣”。

查考事物起源，主要可利用以上二书。而《格致镜原》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可以从中查到不少科学技术史的资 料，又属后来居上。此外，如清汪汲撰《事物原会》四十卷（清嘉庆二年古愚山房刻本），魏崧撰《壹是纪始》二十二卷、补遗一卷（有道光本及光绪年间刊本），厉荃原撰、关槐增辑《事物异名录》四十卷（乾隆刊本），以及明董斯张编《广博物志》五十卷（乾隆本、光绪本），亦可查考。

唐林宝《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等是汇辑姓氏的类书，专考得姓受氏之本原；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等是汇辑同姓名的类书，



参见本书《查考人物的工具书》一章，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喻林》一百二十卷，明徐元太编，明万历刻本。

据徐氏《自序》，此书专收六朝以上经史子集以及佛道诸书中语涉比喻者分类排比而成。计分十门，五百八十四子目。十门为：造化，人事，君道，臣术，德行，文章，学业，政治，性理，物宜。

但《四库提要》谓“其中随手摭拾，亦往往不得本始”。《郑堂读书记》更称其“所注出处，不得其本始者居多，间有时代舛迂，书名混淆，并明代伪书亦一概搜罗者，由其专务浩博，尚未能原原本本，粹然无疵瑕耳”。这在使用时应予注意。

### 三、查以字、韵编制的类书

按韵编排的类书，创始于颜真卿的《韵海镜源》。元阴时夫又编《韵府群玉》，为清修《佩文韵府》所本。明成祖时纂修的《永乐大典》，著录为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有目录凡例六十卷，合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计收宋元以前重要古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

《永乐大典》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载，即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虽然取韵缺乏一致的规律，体例比较紊乱，“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但却保存了我国宋元以前大量的文献资料，这是极可宝贵的。

《永乐大典》编成后原本先藏南京，后移置北京。嘉靖、隆庆间重录正副本，正本藏文渊阁，副本藏皇史宬，而把原本归置南京。明亡，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文渊阁正本则移至清翰林院。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已残缺二千四百余卷，后又颇有散失，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永乐大典》复遭浩劫，一部分被焚毁，未毁者几乎全被帝国主义强盗劫走。

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大典》现存于世者约近八百卷。中华书局1960年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影印，共得七百二十卷，其中保存有不少珍贵材料，可供学术界作科学研究的参考。如“虜”字下收有沈存中《使虜图经》，是重要的宋人行纪，过去少为人知，对于研究宋辽关系和宋代地理等均有参考价值。

清康熙时敕编的《佩文韵府》，是以韵系事的重要代表作。《佩文韵府》计四四四卷，清康熙中张玉书等奉敕编，附《韵府拾遗》一一二卷，有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精装六册，末附四角号码索引一册，最便检索。

这是专收词藻的类书，兼具韵书和辞书的性质和作用。今天，对于查找典故以及找查诗句、词句的出处仍然很有用。

全书按平水一六韵的平上去入四声排列。每字之下，先注音释义，次列韵藻，各引出处，后为对语、摘句。注音释义，略同于字书。“韵藻”以元阴时夫《韵府群玉》、明凌稚隆《五车韵瑞》所有者列于前，又博采群书别标“增”字列于后。“对语”是包含该单字的词汇之对仗；“摘句”是列举以该单字收尾之诗句。

由于《佩文韵府》按词条末字入韵，不懂声韵的人很难利用它，而商务印书馆编的索引能帮助读者解决这个难题。索引按《佩文韵府》原词首字编排，不懂声韵的人，可先按四角号码从索引查得词条所在页码。如《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篇有“是以先帝诛文成、五利等”一语。从字面看，“诛”文成、五利，则文成、五利似应是人名，但欲知究竟，查一般词典又不易查到。试查《佩文韵府索引》，按文成、五利两词首字“文”、“五”的四角号码，果然查到“文成”条，见商务本《佩文韵府》1166页，“五利”条见2372页。于是翻到有关页次，就知文成、五利事见《史记·封禅书》和《汉书·武帝本纪》。文成、五利原来是少翁、栾大两个方士的封号，少翁封文成将军，栾大封五利将军，后因骗术拆穿而为武帝所诛杀。由此可见，在阅读古籍碰到某些词语不能解释，一般字典、词典又查不到，或者碰到一些诗句、词句不知出处时，查《佩文韵府》很管用。

《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康熙时张廷玉等奉敕编，雍正四年告成，有内府原刊本，光绪十三年同文书局影印本。

全书分十三门：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彩色，器物，草木，鸟鲁，虫鱼，人事（作为补遗）。其中数目（以一、二、三、四等字标首）、方隅（以东、西、上、下、左、右等字标首）、彩色（以红、白、苍、朱等字标首）三门为双创部类。门下再分子目，子目下取古书中骈字（包括双音词及词组），按首字相同者排列，如天，后面就有天地、天日、天月、天风、天云等数千条，引文中搜集了经、史、子、集、杂文、诗、赋等大量原始材料，与《佩文韵府》可说是姊妹篇。

《佩文韵府》按句尾（即韵脚）排列；此书则按句首字排列，在《韵府》以外别创新例。《四库提要》谓二书可“互为经纬，相辅而行”，很有道理。可惜后者没有新的印本，不及《佩文韵府》方便。

以上二书和《渊鉴类函》以及《子史精华》等等，都是查找古代诗文语句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 第十章 查找报刊和论文资料的工具书

查找报刊和论文资料的工具书，既包括著录报刊名称、卷期、出版时间及收藏单位的报刊目录，也包括汇编论文资料的题目、作者和出处的报刊索引，前者供查找报刊的出版和馆藏，后者供查找报刊上的论文资料。这些工

具书不同于一般工具书，它不能直接提供解决疑难问题的资料，只能提供一个解决疑难问题的线索：某种报刊出版了多少卷期，编者是谁，哪个图书馆有收藏；对某种问题的论述有哪些论文资料，作者是谁，刊登在哪一报刊上，以便读者“按图索骥”，寻检查阅。

下面首先就报刊源流及其目录、索引的编制作一简述，再分别介绍怎样查找报刊和论文资料。

## 第一节 报刊源流及其目录、索引的编制

### 一、古代“邸报”的产生和流传

我国的“邸报”历史悠久。“邸报”是什么？先要知道什么是“邸”。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汉书》注也说：“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这说明“邸”是一种地方（郡国）驻京办事处，起着连系中央与地方的作用；页由“邸”中传抄一切诏令章奏以报于郡国（地方）者，即为“邸报”。汉代以后，“邸报”又有“杂报”、“朝报”、“条报”、“京报”等不同名称。

关于“邸报”，在唐代就有确切记载。据《全唐诗话》第三卷载，唐德宗初年，“韩翃久居家，一日夜将半，客扣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翃愕然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经纬集》中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也对邸报有所记载。但当时的邸报究竟是抄写，还是雕板印刷，不得而知。自孙毓修 1918 年在《中国雕板源流考》记述“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之后，有人遂以为据，肯定唐代邸报已用木板印刷。我们对此存疑，因为时至今日，所谓江陵杨氏，不知何许人，更没有第二人见到原物，真伪莫辨，有待进一步研究。

宋代的“邸报”，除了《宋史》不少人物传记有所记载外，宋本《王荆文公诗》第廿五卷有《读镇南邸报》篇，杨万里致周必大函中有“近读邸报得感事诗”，《东坡集》有“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等诗句，可知“邸报”的流行情况。

宋代除了“邸报”外，还有“小报”，它的内容是“邸报”还没有发表或不准备发表的一些官方文书和其他消息，如在抗金时期，“小报”就印发过主战派官员反对妥协投降、主张抗战的奏章，并报道过北方人民英勇抗金的事迹，统治者曾多次查禁，但仍风行一时。

明代开始允许民间私设报房，翻印一些“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并因这类报房多设北京，故称“京报”，有时亦仍称“邸报”。崇祯年间，“京报”普遍用活字印刷，印数增加，流传更广。

到清代，民间的报房有了发展，据统计，清末设在北京的报房就有集文、聚兴、聚升、聚恒等十家之多，“京报”于是流传各地。清末，清政府预备立宪，由政府刊行的“官报”代替了原来的“京报”。

## 二、近代报刊的发展

近代中文报刊的创办是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相联系的。自清嘉庆廿年（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后，1833年在广州出版了我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已近二百种，约占当时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报刊事业。这时期的报纸主要有：1861年创刊的《上海新报》，1872年创刊的《申报》，1882年创办的《沪报》，1886年创办的《时报》，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期刊主要有：1857年创刊的《六合丛谈》，1868年创刊的《教会新闻》（1875年改名《万国公报》），1872年创刊的《中西闻见录》，1878年创刊的《益闻录》。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开始创办报刊，宣传向西方学习，提倡变法维新。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我国第一份自办报纸《昭文新闻》，接着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甲午战后，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康有为等维新派于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次年一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又出版《强学报》。不久，强学会被查禁，两报因而停刊。1896年8月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是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机关报，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著名文章先后在该报发表，几个月内《时务报》的发行量激增到一万几千份，对宣传维新变法起了巨大作用。此后，维新派在各地创办的报刊相继出现，主要有澳门的《知新报》，唐才常和谭嗣同等在湖南创办的《湘学报》、《湘报》以及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严复翻译的那篇名著《天演论》，最早就发表在《国闻报》的每旬增刊《国闻汇编》上。

戊戌变法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登上历史舞台，并积极创办报刊，鼓吹革命。1900年1月，兴中会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最早的机关报，接着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宣传革命的报刊，主要有上海出版的《苏报》、《国民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其中以《苏报》的影响最大。此外，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先后创办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报刊。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在同保皇派机关刊物《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揭露了改良派，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以后，1907年秋瑾、宋教仁在上海相继创办《中国女报》、《民立报》，1911年3月，革命团体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在

武汉创刊。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也就被推翻了。

袁世凯窃取政权时期，一方面颁布“报纸条例”和“出版法”，滥肆查封不同政见的报刊，另一方面又收买报刊并创办《亚细亚日报》作御用工具，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直到“五四”运动，揭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我国报刊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报刊的产生是这个时期报刊发展的特点。一些重要的革命报刊，在解放后都出版了影印本，且有一些报刊目录、索引可供查阅，这里就不再赘述。

为了使读者对查找报刊的工具书先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下面简述报刊目录和论文索引的编制。

### 三、报刊目录和论文资料索引的编制

十九世纪末，我国出版的报刊已有数百种，为了读者查阅之便，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清议报》第一百号，刊载了《中国各报存佚表》，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目录。此后，各种报刊目录相继问世，编制馆藏报刊目录者有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等单位，1929年北平图书馆协会还出版过《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937年又有郑慧英等编的《中国杂志总目提要》。同时，《中国图书馆协会会报》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报刊目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报刊目录的编制进入了新阶段。三十年来不少图书馆都编制了馆藏目录，有的地区还编制了联合目录，更重要的是1961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组和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了《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1965年又编印了《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1919—1949）（未定稿）。上海图书馆也在1961年编印过《近代期刊简目》（1840—1918）。此外，1957年三联书店曾编辑出版《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和《新中华总目》，1958—1959年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至三集），1961年上海图书馆编印《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1965年上海图书馆编辑《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一），以及文学期刊等专题目录的编制，历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所附《全国报纸、期刊目录》，都向读者提供了查考之便。

随着报纸、期刊的广泛传播，不仅产生了上述报刊目录，报刊索引也应运而生，以便在“浩如烟海”的报刊中帮助查找需要的论文资料。

我国最早编印的报纸索引，是1926年《时报》元旦增刊所载的1925年《时报》索引；最早编印的杂志索引，是1930年2月上海人文月刊社创编并收进《人文杂志》的《最近杂志要目索引》。此后，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3年10月开始编印《期刊索引》（月报），1934年5月开始编印《日报索引》（月报）。岭南大学图书馆1935年编印《中文杂志索引》，收编清末至1929年出版的杂志。此外，还有《国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中国

地学论文索引》、《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等专题索引以及专供查找某种期刊论文的索引。

以上索引除《时报》索引仅收编 1924.12—1925.11 该报的篇目外，其余所收编报刊的时限都较长，提供了查找解放前报刊论文资料的便利，但是，也存在缺点，如分类编排上没有一致标准，也未录革命报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较早编制的综合性报刊论文资料索引有《报章杂志参考资料索引》，1949 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编印。接着，1951 年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编印《一九五一年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1951 年山东图书馆开始编印《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1955 年上海报刊图书馆编印《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和上海图书馆编印《全国报刊索引》。单种报纸的索引有《人民日报索引》、《解放军报索引》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不少报纸的索引。单种期刊的索引有《新华月报总目录》和《历史教学十年总目分类索引》等。专题索引在各学科里都有编印，但是正式出版的不多。如中国古代史论文索引，1957 年有牛继斌本，1958 年有江苏师院历史系本，1959 年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本和杭州大学历史系本，1960 年有华南师院历史系本，1976 年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资料室的合编本，但是还没有一本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他专题索引也有类似情况，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解放以来，还有为配合影印解放前革命报刊而编辑出版的《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新华日报索引》、《新中华报索引》、《解放日报索引》和《人民日报索引》。

总之，我国编印的报刊论文资料索引很多，这些索引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划分成许多类别，如按取材对象可分为：报纸索引，期刊索引，报刊索引；按版式可分为：书本式，期刊式，或附录于书刊的索引；按时间可分为解放前的索引和解放后的索引；按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索引和专题性索引，其中专题性索引还可按学科分成不同类别。但是，实际上各种类别也不是独立的，如《全国报刊索引》取材于报纸和杂志，可称为报刊索引；它的版式是按月出版的期刊，可称为期刊式索引，其内容兼包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技术科学，可称为综合性索引；从收编报刊的时间而言，还可称为解放后的索引。关于报刊索引的类别和名称，这里不作专门探讨，读者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了。

## 第二节怎样查找报刊和论文资料

怎样查找报刊和论文资料，可分为：查找图书馆收藏报刊，专题报刊目录的应用，查考报刊的出版情况，按时间查找论文资料，按专题查找论文资料，按报刊查找论文资料六个方面。现分别叙述如下。

### 一、查找图书馆收藏报刊

查找图书馆收藏报刊，应使用“馆藏报刊目录”和“报刊联合目录”，前者指某一图书馆的入藏报刊目录；后者指一个地区或全国图书馆入藏报刊目录。读者查找图书馆收藏报刊时，首先应使用馆藏报刊目录，或地区图书馆入藏报刊联合目录，因为从这种目录查到的报刊容易借到手，只有当这种目录查不到需要的报刊时，才可舍近求远，查考更大范围的报刊联合目录。

下面我们分查找报纸和期刊两类，分别选录几种馆藏丰富、收编完整、著录详细或具有特色的报刊目录予以介绍，一则使读者对报刊目录的著录事项有所了解，二则以便读者在一般的报刊目录中查不到需要的报刊时参考。

（一）查找报纸。我国编制的报纸目录较少，更没有一部全国图书馆收藏报纸的联合目录，这里主要选录北京地区部分图书馆的《解放前中文报纸联合目录草目》、《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报纸目录》、《徐家汇藏书楼所藏中文旧报纸目录初稿》和《上海图书馆藏中文旧报纸目录稿》四种。

《解放前中文报纸联合目录草目》（北京地区部分图书馆藏），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1967 年编印。该目录收编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图书馆入藏的解放前国内外出版中文报纸，分为解放区、国统区、港澳及海外地区三部分，各部分的报纸均按报名的笔划排列，著录项目有：报名、出版地及编辑单位，创刊停刊年月，注释，馆代号及馆藏年月。收录报纸共约一千多种，查找方便；未收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报纸，是这份联合目录的不足之处。

《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报纸目录》（1861—1958），上海市报刊图书馆 1958 年编印。解放初期，上海市的图书馆进行了一次调整，集中了一些图书馆所藏报刊，成立了专业性的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现并入上海图书馆）。该馆所藏报刊较多，基本上代表了上海市的报刊收藏。该目录收编 1861—1958 年近一百年间出版的中文报纸二千零八十五种，是目前国内收编中文报纸种数最多的一部馆藏报纸目录，著录项目包括：报名、出版地、馆藏年月，附录报纸创刊年月及报名、出版地变动情况，按报名笔划排列，目录前冠有报名首字检字表。

《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报纸目录初稿》，上海图书馆 1957 年编印。该目录收编中文报纸二百二十五种，数量虽然不多，但都是解放前的旧报纸，而

且绝大多数是清朝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和民国初年出版的报纸。如《申报》是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全国图书馆收藏完整者极少，该馆珍藏全份，是特色之一。利用该目录可查找出版较早、较为稀有和珍贵的报纸。

《上海图书馆藏中文旧报纸目录稿》，上海图书馆 1976 年 12 月复写稿本。该目录收编上海图书馆藏国内外二百二十八个地方出版的中文旧报纸二千六百八十一一种，不仅包括了上述两部目录中的旧报纸，而且增加了一些新收藏的旧报纸，是目前收编解放前旧报纸最多的一种目录，既可供查找上海图书馆收藏报纸，也可帮助读者了解中文旧报纸的出版概况。

(二) 查找期刊。可供查找期刊的目录较多，现主要介绍《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和北京、上海等地的几个馆藏目录。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 1961 年出版。该目录是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各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五十个馆藏丰富单位的联合目录，收编 1833—1949 年我国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出版的中文期刊一万九千一百十五种，著录项目包括：期刊名称、刊期、编辑、出版者和参加馆的“总藏”(指参加馆所藏某种期刊总数)及“馆藏”(指参加馆入藏某种期刊的具体卷数)。全目录按刊名笔画排列，另有刊名首字拼音检字表、笔画检字表，查找方便。这是我国收编旧中文期刊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对查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中文期刊有重要作用，只是要注意，(1) 它没有收录解放前的革命期刊；(2) 纯属反动宣传，黄色的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所办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期刊也不收录；(3) 敌伪时期期刊，除自然科学期刊外，均不收录。

《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1919—1949) 未定稿，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一九六五年编印。该目录收编全国九十个图书馆、档案室、资料室及个别个人所藏 1919—1949 年公开出版的革命期刊(凡属内部性质和当前不宜公开的革命期刊均未收入)一千六百五十八种。这些期刊包括党刊，团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革命团体、进步组织出版的期刊。全书按革命时期编排，著录项目包括刊名、刊期、编辑出版情况、存见卷期和馆藏(未定稿未列馆藏)，书末附有刊名笔画索引。这是我国收录革命、进步期刊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但内容还有待充实，所收期刊和存见卷期尚有疏漏。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期刊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6 年编印；《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1881—1949)，上海市报刊图书馆 1957 年编印。这两部目录收编期刊较为丰富，前者九千种，后者八千零三十七种，去其重复至少有一万多种，是查找中文旧期刊的重要目录。

《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1949—1956)，上海市报刊图书馆 1956 年编印；《解放后中文期刊目录》，北京图书馆 1955 年编印。这两部目录均收编 1949 年以来出版的期刊一千多种，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出



版期刊的情况。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广东杂志目录》（1949年以前），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一九五六年编印。该目录收编1949年以前广东出版杂志及部分华侨杂志约二千三百种，颇具收藏特色。

## 二、专题报刊目录的应用

以上介绍的馆藏报刊目录和报刊联合目录，一般说来都是综合性的，它除了收录的报刊范围广、种类多并著录馆藏情况外，在编排上则多以报刊名称的笔画为序，读者若要研究某种性质的报刊，在上述目录中查找就很难，而应使用专题报刊目录了。

专题报刊目录，是以特定的专题为核心，收编有关报刊而成，它不仅著录报刊的名称、编者、卷期、出版时间和出版地，间或还著录馆藏和篇目及内容提要，而且在编排上一般都按报刊的出版时间或性质归类，利于专题查考。例如，研究辛亥革命史，需要了解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翻开《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一检即得廿种有关报刊及各项著录，这是馆藏报刊目录和报刊联合目录难以提供的。

我国编制的专题报刊目录不多，目前主要有《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和关于文学期刊的目录。《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已在前面介绍，这里从略，下面介绍其他几种专题报刊目录。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上海图书馆1961年编印。

该目录只收编了辛亥革命时期我国留日青年在日本东京编辑出版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醒狮》、《复报》、《洞庭波》、《汉帜》、《云南》、《豫报》、《秦陇报》、《关陇》、《晋乘》、《粤西》、《河南》、《四川》、《国报》、《夏报》和《江西》二十种期刊。著录项目包括：刊名、编辑者、发行者、卷期、出版起讫年月以及各期刊的文章篇名、作者、译者等。

这一目录并不包括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出版的全部期刊，使用时应注意。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至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58.11—1959.12出版。全书共分三集：第一集收《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二十一种，第二集收《共产党》、《先驱》等刊物七十种；第三集收《新海丰》、《珠江评论》等刊物六十六种。每一集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期刊内容介绍，对错误言论、反动言论的批判，以及对刊物的编辑、出版、卷期、创刊、终刊事项的考订；第二部分是附录，收编各刊的发刊词、目录或分类索引。这是一部研究五四时期期刊的重要工具书。

我国的文学报刊在晚清已有出版，“五四”以后得到发展，据估计，截至1949年建国以前，出版的文学期刊约有数千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下列文学期刊专题目录可利用：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该目录收编1902—1949年出版的文学期刊一千五百九十四种，按照历史时期，又辅以地区，分为八个部分：（1）1902—1919年；（2）1919—1927年；（3）1927—1949年（革命根据地）；（4）1927—1937年（国统区）；（5）1937—1945年（国统区）；（6）1937—1941年（上海）；（7）1937—1945年（沦陷区）；（8）1945—1949年（国统区）。此外，附录国民党、敌伪等各类文学刊物，书末有刊名索引。著录项目包括：刊名、刊期、已知卷期、出版年月、编辑者、发行者、出版地点以及上海图书馆、中国作家协会馆藏、备注等十项。这是一部收编文学期刊较多，著录详细的专题目录。

《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初稿），刘华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该目录主要收编1919年至1949年出版的戏剧电影期刊，并著录有上海图书馆等十四个单位的馆藏。

《全国文学展览会目录（1902—1949）》，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主办，1956年印行。该目录收编1902—1949年出版的文学报刊及部分综合性期刊和少数党刊共六百八十八种，虽然种数不多，但都是较为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刊物。

《晚清以来文学期刊目录简编》（初稿），鲁深编，载《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这部目录收编1872—1949.7出版的纯文艺期刊和章回体及趣味性刊物一千零七十三种。

### 三、查找报刊的出版情况

上述各种馆藏报刊目录、报刊联合目录和专题性的报刊目录，当然也具有查考报刊出版情况的作用，应加以利用。下面再介绍几种主要供查考报刊出版情况的目录。

《中国杂志总目提要》（1815—1936），郑慧英编，载《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二卷第二—三期（1937年）。该目录原稿收编1815—1936年出版的中文期刊二千种，但因该季刊停刊，所以只发表了原稿的一部分，计著录期刊七百种。著录项目包括刊名，卷期，编者，出版处，定价，提要及当时北平、上海、广州、江西四省市二十九个图书馆的收藏情况。

《近代期刊简目（1840—1918）》，上海图书馆1961年编印。该简目收录1840—1918年间出版的期刊约一千二百种，著录项目包括刊名、出版地和上海图书馆收藏卷期。

可供查考解放前报刊出版情况的目录，还有收编于《中国近代出版史

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各编中的《清季重要报刊目录》、《民国初年的重要报刊》、《一九一九——九二七年全国杂志简目》、《一九三六年全国报刊统计》等等。

此外，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初版，三联书店1955年重印）也可参考。该书叙述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报刊发展的历史，详细介绍了每个时期重要报刊的名称、编者、创刊日期、出版处和内容，对查考那段历史时期报刊的出版情况很有用。

查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报刊出版情况，有《全国总书目》历年各册所附《全国报纸、期刊目录》可供查阅。

此外，在后面“按报刊查找论文资料”中将要介绍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编印）、《馆藏高等院校学报论文索引》（中国人民大学编印），也具有查找报刊出版情况的作用，读者可根据需要，灵活运用。

#### 四、按时间查找论文资料

按时间查找论文资料，应使用综合性的报刊索引。这种索引具有以下特点：收编报刊的种类较多，往往包括全国主要报刊；内容广泛，不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有的还包括自然科学；大都按月或季度连续出版，向读者提供了按时间查找论文资料的便利。例如《全国报刊索引》，就具有上述特点。下面介绍这方面的几种主要索引。

《中文杂志索引》（第一集上下卷），岭南大学图书馆1935年编辑出版。该索引收编清末至1929年冬出版的杂志一百零五种，按文章的内容分类编排，是查找1929年以前杂志文章的重要工具。卷首冠有所收杂志一览表，可供参考。

《最近杂志要目索引》，1930年上海《人文杂志》创刊号起按期编辑刊出，1935年8月开始还增收《申报》等七种报纸的重要文章篇目。1937年12月《人文杂志》因抗日战争休刊，至1947年5月复刊，其《最近杂志要目索引》更名《最近杂志日报索引》，仍按月编辑发表，直到1949年5月杂志停刊而止。该索引创刊时仅收编杂志一百多种，后陆续增加到五百多种报刊。每期索引均有所收杂志一览表，编排用《杜威分类法》，唯内容不及下述索引丰富。

《期刊索引》（月报），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中国图书服务社出版。该索引于1933年11月创刊，1934年1月起增收报纸的内容，同年5月又取消，至1936年10月停刊。该刊单独出版以前，还有四期附于《时事类编》之后。索引按内容分类编排，但是分类法曾有更动，前后不一。每期均附有收编杂志一览表，内容较上述索引丰富，是一部查找当时杂志文章的重要工具书。

《日报索引》（月报），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该索引创刊于1934年5

月，至 1937 年 7 月停刊。收编的报纸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武汉日报》、《大公报》、《北平晨报》、《香港工商日报》、《香港循环报》、《广州民国日报》、《西京日报》、《星洲日报》十二种。索引分为分类索引和著者索引两部分，在单独出版前，曾有四期合刊于《期刊索引》（月报）中。

《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人民日报图书馆编，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8 月出版。该索引收编 1954 年前后人民出版社影印十九种革命期刊全部文章的篇目，按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草案分类，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总论，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宗教，无神论，自然科学及综合性资料等十八个大类。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和各期刊的社论都两见，一集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综合性资料类，一按内容的性质分别入有关各类。书末附有作者、译者索引，按姓名笔划排列。

读者若要查找某一问题的文章，按类别即可查得；若要查找某人的文章，则应使用所附作者、译者索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综合性报刊索引，主要有下列各种：

《报章杂志参考资料索引》，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部资料室编，1949 年 10 月创刊，每半月一期，至 1950 年 6 月停刊。

《一九五 年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 1951 年编印。

《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山东省图书馆编，1951 年创刊，按季度出版，至 1955 年第二辑停刊。

《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上海图书馆编，1955 年创刊，每年出版六册。1956 年改名《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并于 7 月份起改为半月刊。1959 年开始又将“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和“自然技术科学”部分分开，按月出版，至 1966 年 10 月暂时停刊。1973 年 10 月改名《全国报刊索引》复刊。这一套索引汇编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出版的报纸、杂志篇目，内容丰富，每期均附有收编报纸、杂志一览表，对于查找建国以来的报刊论文资料提供了方便，是常用的工具书之一。其分类编排也曾不断改进，现在采用自编的《报刊资料分类简表》，有二十三个大类：

-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 B 中国共产党
- C 中国政治
- D 中国外交、对外关系
- E 中国军事
- F 中国经济
- G 中国农业
- H 中国工业、交通

J 中国财政、金融、贸易

K 中国科学文化

L 中国文学、艺术

M 中国教育、体育、卫生

N 世界各国、国际关系

Q 自然、技术科学总论

以下均为科学技术，从略。

该索引的著录事项包括：篇名、作者、报刊名称、出版年月日及期数。凡译文，篇名后标出\*号，以资识别。《教学参考资料索引》，山东师范学院政史系编印。该索引共计十四册，收编了 1966.6—1974. 国内主要报刊发表文章的篇目，每册的内容大致包括：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中国政治，三、教育革命，四、中国共产党史，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六、哲学，七、政治经济学，八、中国历史，九、文化艺术，十、体育、卫生，十一、世界历史，十二、国际资料，十三、自然科学等类别。著录项目包括篇名、作者、报刊名称及出版时间。第一册为 1966.6—1971.7 的资料，以后按年或半年或季度编印，分类编排上也有变动，以适应教学参考需要。前述的《全国报刊索引》曾有七年中断（1966.10—1973.10），此能聊补其缺。

## 五、按专题查找论文资料

专题索引是以特定的专题为核心，收录大量的有关论文资料编纂而成。如要查找建国以来报刊上关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论文资料，翻开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编印的《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中册，即可看到 1949 年至 1974 年国内发表过六十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原因、时间、性质、作用、进军路线以至陈胜生地等的论述和考证。显然，这种方便是其他索引不能提供的。但是，专题索引多为总结十年、廿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成果而编印，所以不能及时提供查阅，这是其局限性。下面就现有有关文史的专题索引分别作一介绍。

《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 1965 年出版。该索引收编 1900 年至 1949 年年底全国主要报纸、杂志及论文集所载有关论文篇目五千余条，按内容分为：语言和语言学，汉语，少数民族语言三大部分。书前冠有所收报纸、杂志、论文集一览，书后附录著者姓名索引。

《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 1959 年初版、商务印书馆 1978 年出版增订本。增订本收编 1950 年初至 1963 年年底全国主要报纸、杂志、论文集所载有关论文篇目七千余条，分类及著录项目同“甲编”。

《文学论文索引》（一至三编）：初编，陈壁如等编，中华图书馆协会 1932 年出版，收编 1905—1929 年底报刊一百卅二种。续编，刘修业编，1933 年出版，收编 1928—1933.5 间报刊一百卅九种。三编，刘修业编，1936 年出版，收编 1933.6—1935 年报刊二百廿种。

《史料·索引》，阿英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初版。该书是赵家璧主编的《新文学大系》第十集，收编 1935 年以前的新文学史资料，分为史料、索引两部分。

《全国报刊文学论文索引》，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索引收编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料篇目，按内容分为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三大部分。1960 年、1961 年各为一册，1964 年出双月刊，1965 年出季刊。以上各册均附有引用报刊一览表。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中华书局 1964 年出版。该索引收编 1949—1962 年底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篇目，按内容分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文学史分类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三大部分。后附引用报刊目录。

《中国古典文学评论资料索引》（正、续编），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组、资料室编，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0 年出版正编，1961 年出版续编。该索引两编收录 1949—1961.6 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料篇目，按内容分为：古典文学教学研究，文学史，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研究，作家作品四大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正、续编），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资料室编，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 年出版正编，1963 年出版续编。该索引两编收录 1949—1962 年底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现代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篇目，关于毛泽东同志和鲁迅的资料篇目放在最前，其他作家按笔划顺序排列。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索引》，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 1962 年编印。该索引收编 1949.10—1961.8 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专著和文学作品所附前言、后记。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作家项下，间亦收入解放前的重要论文、专著。全书按内容分为欧美文学，俄罗斯苏联文学，亚非文学三大部分。其中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先分时代，次分国家，再分作家先后；苏联文学、亚非文学则不分时代，而按国家及作家先后排列。

《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文物出版社 1978 年出版。该目录分为书目和报刊资料索引两部分，分别按大体一致的类项编排。书目部分，收中国考古学及有关论著五百三十七种，著录项目包括：书名、编著者、出版单位和出版年月，附载报刊发表的评介文章篇目。报刊资料索引部分，收有关文献七千余条，引用

期刊一百八十四种，报纸五十种，论文和资料集三十九种，著录项目包括：篇名、编著者、发表报刊的名称和年代、卷期。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下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6 月、12 月先后出版。该索引从清末至抗日战争开始（即约从 1900—1937.7）这个时期出版的期刊中，收编了有关中国史学的论文篇目三万余条，按内容分类编排。上编分为：中国历史，中国人物传记，中国目录学，中国考古学（古器物学）四大类。下编分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史、政治科学史，中国经济学史，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史，宗教史，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艺术史，中国历史地理、地理学史，中国自然科学史，中国农学史，中国医学史，中国工程技术史十三大类。书后附按笔划编排的人名、地名、朝代名、书名、物名、族名以及著名史实的辅助索引，另有外国人名汉译对照表。它为查检 1900—1937 年出版期刊中有关中国史学论文提供了方便。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上、下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该索引是前书的续编，收录 1937.7—1949.9 国内（包括抗日战争时的沦陷区）出版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史学论文篇目三万余条，分类体例与著录项目基本同上书。

《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1963 年开始改名《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该目录是中国、日本和欧美各国研究东方史的文献目录，自 1936 年开始编辑出版 1934 年的类目后，每年编辑出版前年的类目一册，按内容分类编排。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上、中、下、附共四册），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辑，1975 年出版上、中、下册，1978 年出版附册。上、中、下三册收编 1949—1974.12 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篇目三万余。全书分为总类和分类两大部分。总类部分按性质分为史学概论、社会性质、土地问题、农民战争、人物评价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专题。分类部分按时间顺序分为原始社会和石器文化、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五大段。全书在编排上以分类为主，即能用各历史时期断限的论文资料，概入分类有关项目，其他论文资料则入总类有关部分。该索引在分类之下设有“人物及其著作”一栏，罗列了这方面的各种资料，包括人物评价、有关事件、著作及后人对该著作的研究和评论。这于研究人物或其著作有不少便利。

附册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上、中、下三册范围内遗漏的论文资料目录；第二部分是全国主要报刊从 1976.10—1977.12 发表的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及其他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选编索引；第三部分是全书的“勘误表”。

《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吉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中国近代史教研室 1977 年 10 月编印。该索引收编 1949—1976.9 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

关篇目，按内容分为：一、马列主义经典论著，二、封建史学批判，三、通论，四、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五、中法、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时期，六、辛亥革命前后，七、人物评传，八、地方史和民族史，九、教学问题及其他。

该索引收编的时限较长是其优点，但是在分类体例上似不妥帖，相互间的界限不很明确，印刷上错字不少。

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 1976 年编印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篇目索引》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959 年、1973 年编印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正、续编），也有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1959—1963 年编印。全书分为五辑，收编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料篇目。收编时限，第一辑从 1949—1956.6，第二辑从 1956.7—1959.6，第三辑从 1959.7—1960.12，第四辑、第五辑分别收编 1961 年、1962 年的论文资料。

《世界史论文资料索引》，吉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975 年编印。该索引收编 1949.10—1974.12 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的论文资料篇目，按内容分类编排。

《世界古代、中世纪、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正、续编），357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964 年、1974 年编印。该索引收编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料篇目，按内容分类编排。正编是 1949.10—1963.9 的篇目，续编是 1963.10—1973.6 的篇目。

《世界现代史资料索引》，山东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 1962 年编印。该索引基本上以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书为限，收编了有关世界现代史的文献、专著、论文、重要新闻报道和其他资料；其中除文献和专著外，一般论文资料取材于《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新青年》等十九种革命期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全书分为五册，按内容分类编排。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目录提要》（河道水利部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1974 年编印。该目录共收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河道水利的论文资料三百一十篇，其中大部分发表于 1949—1974 年国内报刊上，少数为该室内部未刊稿或兄弟单位所赠交流资料。全书分为历代水道变迁、河口海岸、历代水利开发、海上交通四大类。每篇均著录篇名、作者、出处和内容提要。

《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王庸、茅乃文编，北平图书馆、北平师范大学 1934 年出版。该索引收编 1902—1933.6 出版期刊中的有关论文，内容不限于地理学，凡所述涉及中国地域性者，均在收编之列。全书分为：一、地志及游记，二、地文（附生物），三、民族，四、政治，五、交通，六、经济，七、历史，八、地理图书（附中国地理学与地学家）。书前冠有所收杂志一览，附录地名、著者两种索引。另有《续编》于 1936 年出版，收编 1933.6—1934.12 发表的论文，编排体例同上。



《解放前全国主要报刊有关哲学类论文索引选辑》，四川大学哲学系资料室 1977 年 12 月编印。该索引收编四川大学图书馆藏解放前人文科学杂志中的哲学论文篇目，按内容分为八类：一、哲学，收编自 1903—1949 年出版的杂志；二、中国哲学史，收编自 1902—1949 年出版的杂志；三、外国哲学史，收编自 1901—1949 年出版的杂志；四、心理学，收编自 1901—1949 年出版的杂志；五、逻辑学，收编自 1915—1949 年出版的杂志；六、伦理学，收编自 1918—1949 年出版的杂志；七、美学，收编自 1918—1947 年出版的杂志；八、宗教，收编自 1901—1948 年出版的杂志。

《二十四年来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3 年编印。该索引收编 1949.10—1973.8 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料，按内容分为中国哲学史总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明清、近代等部分。

《国学论文索引》（一至五编）。初编，王重民编，中华图书馆协会 1929 年 7 月出版，收编清末至 1928 年 7 月前杂志八十二种有关的文章共约三千篇，分为总论、群经、语言文字、考古学、史学、地学、诸子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音乐、艺术、图书目录学十七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续编，徐绪昌编，1931 年出版，补收初编未收期刊的文章，并增收报纸文章。三编，刘修业编，1934 年出版，收编 1928—1933.5 期刊中的有关文章。四编，刘修业编，1936 年出版，收编 1934.1—1935.12 期刊中的有关文章。五编，侯宗植于抗日战争前编就，北京图书馆 1955 年印行，收编 1937 年 6 月以前期刊中的有关文章。

《中文参考书指南》，何多源编著，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出版增订本，收录 1939 年以前编辑出版的旧专题索引较多，必要时可参考。

《中国近二十年文史哲论文分类索引》，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70 年初版、1976 年二版。该索引收编台湾国立图书馆所藏 1948—1968 年出版期刊中有关论文二万三千六百二十六条目，按内容分为：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专史、传记、考古学、民族学、图书目录学等十大类。著录项目有：编号、篇名、著译者、刊名、卷期、页次、出版年月等项，后有著者索引及收录期刊一览。

《中文报纸文史哲论文索引》，张锦郎编，台湾正中书局 1973 年印行。该索引第一册收录 1936—1971 年《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有关论文六千五百九十三篇。第二册收录 1936—1971 年《台湾新生报》、《台湾新闻报》、《中华日报》、《联合报》等廿种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五千五百三十四篇。两册索引均有分类索引、著者索引、标题索引，著录项目同前。

查找论文资料，除了使用以上索引外，还应知道从论文集查找。在有些情况下，论文集比以上索引更为方便有用，但是，有的读者却忽视这一点，一些工具书在这方面也往往因为体例所限，对论文集都略而不谈。我们觉得在介绍查找论文资料时，不必拘泥于论文集是不是工具书，只要其确能提供

查阅之便，就不妨予以注意，作为查找论文资料的补充途径。

论文集的目录其实即是一种索引，而更重要的是论文集能直接提供论文资料，省去辗转查阅之烦，而且它所收编的论文资料都是经过挑选的，一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一编在手，即能了解该学术领域的动态。

解放以来，我国编辑、出版的文史论文集较多，如《楚辞研究论文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等等，其数量尚无精确统计。关于论文集的篇目索引，现在仅见到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966 年 3 月编印的《学术论文集（史学部分）篇目分类索引》。该索引从 1949.10—1966.2 出版的二百七十一一种论文集中，选收了有关历史科学的文章三千八百余篇，按内容分类编排，一一注明作者、出处。书前附有采用论文集一览表，著录了书名、编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可供参考。

## 六、按报刊查找论文资料

按报刊查找论文资料，应使用专为某种报刊编制的索引（包括总目录）。报纸索引多按月连续出版，后来补编者多为年度本。期刊索引有时被称为总目录，多为汇编若干年内某一期刊的资料而成，如《历史教学十年总目分类索引》、《新华月报总目录》；有的为汇编若干年内某一类期刊的资料而成，如《文史资料选辑篇目分类索引》。这些索引和总目录都按内容分类编排。另有一些总目录，如《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东方杂志总目》，则按期刊的卷期顺序编排。这些索引（包括总目录）都向我们提供了按报刊查找论文资料的便利。下面分别介绍几种报纸和期刊的索引。

（一）报纸的索引主要有以下几种：

《新华日报索引》，北京图书馆 1963—1964 年出版。《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1938 年 1 月 11 日创刊于汉口，同年 10 月迁至重庆继续出版，1947 年 2 月 28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停刊。该索引分为九册，1938—1945 年各一册，1946—1947.2 合为一册，按内容分类编排，每册附录有人名索引，按姓名笔划排列。人名索引包括作者、译者和标题中提到的人名。

《新中华报索引》，人民日报图书馆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1965 年出版。这是《新中华报》（刷新版）的全部分类索引。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1939 年 2 月 7 日在延安创刊，至 1941 年 5 月 15 日与延安的《今日新闻》合并，改出《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索引》，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 1956 年编印。该索引包括的时限为 1941.5.16—1947.3.27，每年一册，按内容分类编排。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索引》，人民日报图书馆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1961 年出版。该索引收编的时限从 1946.5.15—1948.6.14，分上、中、下

三编，按内容分类编排，各编均附录作者索引。1948年6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出版《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索引》，1951年1月开始编印，每月一册。1960年还补出过1948年6月15日（创刊）至12月31日、1949年、1950年的索引，按年度分类编排，使用方便。

《人民日报社论索引》（1949—1958），人民日报国内资料组编，人民日报社1959年出版。该索引收编1949年至1958年人民日报的全部社论。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附录人民日报重要文章和人民日报刊载的新华社1949年到1950年的社论；第二部分按内容分类编排；第三部分按社论首字拼音顺序编排。

《解放军报索引》，1976年开始编印。

《光明日报索引》，1954年开始编印。此外，1956年还编印了该报专刊《文字改革双周刊简目索引》，1965年又编印了该报专刊《哲学专刊索引》、《文学遗产专刊索引》、《史学专刊索引》和《经济学专刊索引》。

解放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大都先后按月编印索引，间有按季度或月出版要目索引的。这些索引在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读者可根据需要按报纸查找。

（二）期刊论文资料索引（包括总目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编。该目录是我国近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中文期刊的篇目汇编。全书按各期刊创刊时间先后编排；原计划分三集出版，第一集收编1857—1899年出版的期刊，第二集收编1900—1911年出版的期刊，第三集收编1912—1918年出版的期刊。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收编期刊四十种，其中有代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万国公报》，有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学报》、《国闻汇编》、《清议报》，还有我国最早的一些专门性质的期刊，如《瀛寰琐记》（文学刊物）、《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女报·女学报》、《农学报》。其著录项目包括：（1）刊名；（2）创刊、停刊时间，刊期，编辑者，发行者，出版地点；（3）卷次，期次，出版年、月、日；（4）分栏标题；（5）篇名；（6）著、译者；（7）收藏单位。全书按期刊出版先后排列。第二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收编1900年至1903年出版的期刊四十余种，编排及著录项目同第一集。

《东方杂志总目》（1940年1月—1948年12月），三联书店1957年编辑、出版。

《国闻周报总目》（1924年8月—1937年12月），三联书店1957年编辑、出版。

《新中华总目》（1933年—1949年5月），三联书店1957年编辑、出版。

此外，还有《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编，燕京大学 1933 年出版。《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刘选民编，燕京大学 1940 年出版。

《新华月报总目录》，新华月报社 1963 年 3 月编辑、出版。该总目录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新华月报》总第一号至第七十四号（1949 年 11 月创刊号至 1955 年第十二号）的全部目录；下编收录《新华半月刊》总第七十五号至总第一百九十四号（1956 年第一号至 1960 年第廿四号）的全部目录。

《馆藏高等院校学报论文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1964 年编印。该索引收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解放以来高等学校出版的社会科学版学报七十种，收编时间一般从某一学报的创刊号起，截止 1963 年，按论文的内容分类编排。

《文史资料选辑篇目分类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973 年编印。该索引收编了全国政协、各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前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廿二种。全书按内容分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人物等大类，著录项目包括篇名、作者、出处、各《文史资料选辑》名、辑数、页码。书前附有廿二种《文史资料选辑》的名称和各辑数一览表，供了解出版情况。

《历史教学十年总目分类索引》，历史教学社 1961 年编印。

除此而外，有些学术性期刊每于年终编辑一年总目或篇目索引，附于当年最后一期或第二年的第一期，读者查检时可注意利用。第十一章查找文物图象的工具书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而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无数历史文化遗物（简称“文物”），就是“文明发达最早”和“优秀的历史遗产”具体生动的实物例证。

今天，要了解古代社会，研究历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当然要依靠古文献，但是，在某些时候，某种场合，其他文物资料往往比文献记载更加具有说服力。例如，我国境内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的相继发现，说明早在一百七十万年至四、五十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劳动、生息在祖国的土地上，给“中国人种西来说”以有力的反驳。又如，从黑龙江、新疆、西藏、台湾到南海诸岛发现原始社会以来的大量文物，充分证明所有这些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对霸权主义者和地区霸权主义者觊觎我国领土的种种谎言以沉重的打击。凡此种种，都说明我国历代文物的可贵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是，由于这些文物散处各地或珍藏内部，一般读者轻易不能看到，因此，有必要通过《文物图录》这类查找文物图象的工具书，间接地了解各类文物的外形与内涵，如确有需要，再根据这个线索进

一步查找实物研究。

为了使读者对这一类工具书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需要时查阅，下面首先简述历代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文物图录的编制，然后分别介绍怎样查找文物图象。

## 第一节 历代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文物图录的编制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古器物已受到相当的注意。相传孔子为了研究古代历史，深感文献不足，除了向杞、宋等地访求外，还到鲁国太庙中研究古器物。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不仅博采旁搜，引用了大量的书面史料，而且跋山涉水，走了许多地方，寻遗访古，作为叙事的根据。这在《史记》的不少篇章中都有所记载。如《蒙恬列传》载：“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留侯世家》则谈到司马迁自己见了张良的图像“状貌如妇人好女”，而改正了原以为其人“魁梧奇伟”的想像。许慎撰《说文解字》，也重视铜器铭文，其“叙”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许书所录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其中古籀为多，来源当系鼎彝铭文、古文经及《史籀篇》。

《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黄帝铭六篇》、《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当为记述古器物的较早的专书，可惜这些书都已失传，不知其确切情况。

晋郭璞注、蜀毋昭裔释音的《尔雅音图》，则是我国较古的一部百科名物图。

南北朝时期，文物图录的编制相当突出。梁元帝萧绎曾集录碑刻文著《碑英》，顾烜撰《钱谱》，二书虽失传，但不失为较早的金石专书。另有虞荔所撰《鼎录》，除第一鼎判为黄帝时器物外，录自汉景帝至王羲之共七十二器；陶宏景撰《古今刀剑录》，录自夏启至梁武帝共七十九器。以上二书虽经后人窜改，其中黄帝、夏启等器当然不可据，但其余大量器物还是可信的。北魏酈道元撰《水经注》，详细记载了我国河流沿岸的名胜古迹。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叙述了北魏盛时洛阳城内外佛教寺院（梵语伽蓝）及其兴隆景象。这些书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并且给我们今天的考古调查以很大的启发。

唐代关于文物的著述主要有：封演撰《续钱谱》，吴协撰《三代鼎器录》，徐浩撰《古迹记》等书。

在前人研究古器物的基础上，到宋代金石研究发展成专门学问，而且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拓墨法应用于彝器，更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据《宋史·刘敞传》“敞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他曾撰《先秦古器图》，描摹了每一器物的形制和刻辞，这是宋人研究金石

学的首创。此后，欧阳修搜罗西周至五代碑铭，为之跋尾，凡四百篇，成《集古录》。赵明诚仿其体例，撰《金石录》，其妻李清照在后序中说，该书“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吕大临的《考古图》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器物图，著录铜器二百一十一件，玉器十三件。该书体例严谨，先将器物按时代分开，同时代的按形制分类，一一画出器形，模写铭文，后附释文，注明器物大小容量、出土地点、收藏者，最后加以说明和考订。还有专录古器物铭文的书，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而由宋徽宗赵佶领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更是集大成之作，在器物分类和名称考订方面有较大贡献。此外，郑樵也很重视金石、图谱之学，他的《通志》中就有《金石略》和《图谱略》，分别著录了有关器物和图谱。

宋代的金石学，除以上所述外，还推及到一些更专门的器物研究，如洪适的《隶释》、《隶续》，是关于碑刻的专书；洪遵的《泉志》，是研究钱币的专书；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专门研究印章；岳珂的《古冢桴孟记》（载《程史》），是研究明器的专文。凡此，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为宋人所开拓的学术新园地。

总之，宋人在金石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当时著录的古器物，今天百不存一，唯有赖于这些图谱，才保存了一些古器物的形制和铭文，可供研究者参考。近人王国维在《古礼器略说·说兕觥》中曾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这里，一般的论述是不错的，但“其识则不可及也”，未免妄自菲薄。

元代迺贤撰《河朔访古记》、明代赵崡撰《石墨镌华》，仅是访古之作。明王圻与其子思义撰《三才图会》、章潢撰《图书编》，则为图谱方面的专书。此外，元明两代的地方志中，也著录了不少金石、古迹，也是不可忽视的材料。

乾隆时敕令梁诗正等人将皇家所藏古器，仿《宣和博古图》而撰《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八十种，计四千零七十四器，其中有文字的一千二百九十器。嘉庆时阮元等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专录器物铭文。以上著作，对有清一代金石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近代考古发掘方法以及照像、影印等技术也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于是突破了宋代以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在文物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绩，也编制了不少文物图录。但是，必须指出，也就是这段时期，帝国主义分子以探险考古为名，大肆盗掘和掠夺我国文物，

并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破坏，这是十分令人痛心而又愤慨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文物考古事业十分重视，制定了文物保护政策，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工作，至于文物图录的编制，可说也是旧中国所无法比拟的。第二节 怎样查找文物图象

我国历史悠久，并有着重视文物的传统，历代编制的文物图录较多，查找非易。下面从不同角度分别作些查找文物图象的简要介绍，备参考。

### 一、从综合性的文物图录查找文物图象

这里所谓综合性的文物图录，指的是收编文物种类较多，涉及时间较长，而又不限某地出土和某地所藏文物的图录。这是人们用得较多，也较为重要的文物图录。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郑振铎编，上海出版公司1947—1951年出齐。该图谱收编上古至清末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遗迹、名人图象、古代器物、重要文献、善本书影、墨迹，以及艺术珍品如雕刻、壁画、工艺品等各种图片共三千零四幅，按时代顺序分装二十四辑。第一辑上古，一一五图；第二辑殷商，一五图；第三、四辑春秋战国，二四八图；第五辑秦，八十六图；第六、七辑两汉三国，二五二图；第八、九辑两晋南北朝，一九五图；第十至十二辑隋唐五代，三七九图；第十三至十五辑宋代，三四八图；第十六、十七辑元，二一九图；第十八至二十辑明代，四五图；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辑清代，六七图。每辑有目录，并附有说明一册，介绍文物的时代背景及每幅图片的内容。

《简明中国历史图册》，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本书以大量的照片、绘画、图表和简炼的文字扼要地介绍了从中国原始社会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全书共分十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各一册，封建社会六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册。第一册原始社会，1978年出版。第三册封建社会（战国部分）和第九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1979年出版。其余各册也将陆续出版。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精装四册），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本图说收我国历代各类重要文物图片一千零二十二幅，共分四册：第一册著录铜器一百零八件；第二册著录瓷器三百五十二件；第三册著录书画一百七十五种；第四册是其他，著录了包括玉器、景泰蓝、织绣、剔红、摺扇、文具、珍本古书及家俱等在内，共三百八十七件。每类前面冠长篇序言，每一图象都有中英文说明。展品选自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河南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等所藏珍品，均为我国艺术品中的杰作，是研究中国

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线装二册），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6 年出版。解放后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发掘出来了大批文物，据估计，仅 1949—1954 年间出土的文物就有十四万件以上。1954 年 5 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出文物三千六百六十件。本图录是从展品中精选了二百五十六件珍贵文物编印而成，所选文物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日用器具，出土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陕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南、广东、四川等全国十八省市，时代则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十七世纪的明代。这些文物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情况，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考古收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 1961 年出版。这是一本介绍新中国成立到 1961 年期间我国考古方面重要收获的专书，共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部分。全书除文字部分外，还附有五十三幅插图和一百三十幅图版，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 1976 年出版。本书著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重要文物一百件，其中多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发现。时代从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起，到十四世纪元代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 1973 年出版。本书是我国在英国和法国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的选集，收录了展览会陈列重要展品的图片一百六十七幅，其中彩色图版四十六幅，时代从六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头骨化石到十四世纪元代的文物。

以上两书所收文物，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两书都附有英文图版说明。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文物出版社 1972 年出版。该辑收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北、湖南、陕西、湖北、北京、河南、安徽、新疆、山东、山西等十个省市自治区出土的历代重要文物的图版共二百七十三幅，其中彩色图版三十四幅。另附文字说明一册。这些文物中有不少是以前很少发现甚至是第一次发现的，如 1968 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绡的两座古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过去它只见于文献，这是第一次看到了实物；又如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 年）的手写本《论语》，是现在所见最早的抄本。无疑，这些历史文物是研究中国历代社会情况的宝贵资料。

《三才图会》一 六卷，明王圻、王思义父子合辑，明万历间槐荫草堂刊本。全书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类。每一事物都绘有图象，并有文字说



明，取材广泛，但在考证方面有不够确切处。此外，日本人以本书为基础编的《和汉三才图会》，也可参考。

《图书编》一二七卷，明章潢编，明万历四十一年新建万尚烈等刊本。本书辑古籍中有图有说的材料编成。全书分经义、天文、地理、人道四类，下再分细目。除易象类编和学诗多识二卷有说无图外，其他各卷都有图有说。本书考证比较精密，引证古今，条理分明。

以上两书取材广博，分类较细，是我国古代图谱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可供查找我国古代文物图象参考。

## 二、查找各时代的文物图象

查找文物图象的工具书，除了前述综合性图录外，还有一些是专为查考某一时代的文物图象而编印的。不过这类文物图录中，有些既可按时代断限，又可按文物的类别分类，如《殷周青铜器通论》，我们即把它归入后面“查找各种类别的文物图象”一节介绍。这里，仅就只可按时代断限而其收编内容不限于某一类文物的图录，作些简述。

《中国原始社会参考图集》，上海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参考图集》编辑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出版。该图集是根据中国考古工作历年来的丰富收获编辑而成。全书共三部分：一、原始群时代，二、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和发展，三、父系氏族公社的解体。

《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博物馆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出版。该图录收编 1958 年前浙江省五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主要发掘物，也挑选了一些其他地区采集的文物，共有图版九十六幅。附录有浙江全省七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存的分布图。

《楚文物图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出版。本集收 1952—1956 年长沙出土的春秋战国楚文物图片五十七幅。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 1973 年出版。1972 年在湖南长沙发掘了一座西汉古墓，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从丝织品、漆器、陶器到粮食、明器等有一千余件，墓主的尸体经二千余年仍保存完好。这大量实物资料和保存二千年的尸体对研究我国汉代的社会生产、文化艺术以及医学都有重大的价值。本书就是这次考古发掘成果的全面纪录和研究性的专集，共二册。上册是发掘纪录和研究报告，有插图；下册是图录，有图版二百九十二幅，其中彩色图版七十六幅。

《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北京历史博物馆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8 年出版。该图片集收编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有关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图片和统计资料，共分三册：上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集，包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形势、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下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图片的来源一部分选

自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各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另一部分选自外文书刊。全书有照片、美术作品、地图、统计表等二千多幅，是一本中国近代史教学上很有用的参考图片集。

《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5），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编辑委员会主编，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 1976 年出版。本书从数以百计的中外书刊、图籍中选出了一千七百多幅图片（包括照片、美术作品、地图和文物资料）。这些图片系统和形象地介绍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颇有参考价值。全书共分十六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太平天国运动，第三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失败，第四章洋务运动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五章中日甲午战争及列强瓜分中国，第六章戊戌维新，第七章义和团运动，第八章辛亥革命，第九章动荡不安的民国初年，第十章五四运动，第十一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十二章十年内战，第十三章抗日战争，第十四章国共内战时期，第十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六章台湾——尚待统一的领土，附录：中国近百年历史大事记。另附英文说明一册。

《中国近百年史图集》（1840—1978），中国近百年史图集编辑委员会主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79 年 6 月出版，本书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 1976 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史图集》（1840—1975）一书的增订本。内容补充了反映中国 1976—1978 年三年间的有关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图片一百多幅。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罗尔纲编，三联书店 1956 年出版。该图释分玉玺、碑刻、军事、土地、社会组织、工商业、钱币、艺术等七类，收有代表性的文物图象八十九幅，每件文物或同类几件文物后面都有跋文加以评价。本图释只收金石、建筑、印刷、凭照等文物；诏旨、谕檄、书翰等一般都不收，只有个别文书作为附录收入。这是一本研究太平天国文物的重要参考书。

《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正编，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上海出版公司 1952 年出版；续编，郭若愚编，上海出版公司 1953 年出版；补编，郭若愚编，群众书店 1955 年出版。正编是 1951 年华东文化部在上海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上展出珍贵文物的影印本，续编和补编所收文物是郭若愚在展览会后补辑的。全书内容丰富，基本上将 1955 年以前发现的太平天国重要文物都收编了进去。

### 三、查找各地区的文物图象

查找文物图象的工具书，还有一些是按省区编印的，它给我们提供了查找某一地区文物图象之便，现分别介绍如下：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出版。本书是一本考古论文集，反映了建国三十年来全国

各地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收获。收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的重要文物图版三十二幅，并有大量插图。

《新疆出土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 1975 年出版。本书着重介绍了新疆在元代以前各个时期的出土文物，如毛棉、丝织品、陶瓷、雕塑、印章、钱币、文书资料以及遗址遗迹等。这些文物雄辩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全书有图版一四一面，其中彩色图版五十七幅。

《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南京博物院等编，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本书收 1949—1962 年江苏省出土的文物，计有图版二二六幅。这些文物的年代约距今 5000 年前至公元 1644 年，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明代。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山东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合编，文物出版社 1959 年出版。山东省在 1957 年上半年曾展开了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收集的历史文物达二万三千九百七十八件。1958 年举办展览会展出文物二千三百多件。本选集是从展品中精选的，共有图版二百五十一幅。

《湖南省文物图录》，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4 年出版。本图录收新石器时代到宋代的古文物四百余件，其中楚文物为重点。

《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本书选录旧石器时代至明代的文物共一八八件。其中有东胡、匈奴、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及其他我国北方古代民族的文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出土文物》，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3 年出版。该书收录 1966 年到 1973 年陕西各地出土的各类重要文物。

《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五省出土文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 1958 年出版。本图录收陕西、江苏、热河、安徽、山西五省在 1958 年前出土的各种重要文物图版共一二一幅。这些文物选自陕西省西安半坡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五省的重要墓葬。书前有唐兰的序言，后附参考文献目录。

《西沙文物》，广东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 1974 年出版。该书是 1974 年 3 月至 5 月我国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在西沙考古发掘成果的选集。计有唐、宋时期的居住遗址，历代瓷器和铁器残片，宋代和明代的铜钱，明、清时期的庙宇建筑和佛像、碑刻等等遗址遗迹及大量遗物。这些文物有力地证明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全书有图版二十五面，彩色图版四幅。

《上海的光辉革命史迹图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年出版。该图集是一本介绍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的图片集。

#### 四、查找各类器物图象

我国的古器物主要有石器、玉器、陶器、铜器、瓷器。仅以铜器而论，还可分为：烹饪器、食器、水器、酒器、乐器、兵器、农器、度量衡等；其中的烹饪器还可分为：鼎、鬲、甗、釜、鍳、铜等等，确实是种类繁多，五光十色。读者要查找某一器物的图象，除了利用前面介绍的文物图录外，更有按器物类别编制的图录可供查阅。如查找宋代元祐年间所藏青铜器，可使用《考古图》；查找我国现存主要青铜器，可使用《中国古青铜器选》；查找钱币，可使用《古钱大辞典》；查找古尺，可使用《传世历代古尺图录》。以下对这一类图录分别介绍，以供参考。

《考古图》十卷，宋吕大临撰，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年），有明万历本、清乾隆本。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著录元祐年间所藏古代铜器、玉器二百二十四件，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出土地和收藏处可考者也予以说明。另有《续考古图》五卷，宋人佚名辑；《考古图释文》一卷，清人以为明代赵九成撰，今人考证亦为吕大临撰。

《宣和博古图》卅卷，又称《博古图》，宋王黼撰，一说王楚撰，有明万历刻本、清乾隆刻本。该书著录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所藏古铜器八百三十九件，是当时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廿类，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大小、容量、重量，并附考证，在分类和考订方面都有较大贡献，所定器名多为后世沿用。

《西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清梁诗正等编，有清乾隆内府刊本、光绪年间铜版本。该书著录清代乾隆时内府收藏古铜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体例仿《博古图》。《钱录》著录历代货币。全书所收伪器颇多，绘图和铭文有不少失真，考订亦不精审。另有《西清续鉴》甲、乙编，《宁寿鉴古》等书，均收清宫所藏铜器，亦可参考。

《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编，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影印本。该书著录清代热河行宫所藏彝器百件，为前述诸书所未收。

《中国古青铜器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编辑、出版。本书收商代到东汉重要青铜器图版九十六幅，并附有图版说明。这些青铜器选自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河南等二十个省市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所藏的珍品，其中多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现的，是研究中国青铜器和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编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这是一本研究殷周青铜器的专著。全书对青铜器的时代、发现、形制、类别、铭文和花纹等都有论述，并对历代著录青铜器的重要书籍也有评介。书中有插图一百多幅和附图三四幅。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八册，郭沫若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本书对两周的青铜器作了系统的整理，是

研究周代金文的一本重要著作。旧版 1935 年出版，图录与考释分别印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五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册。新版增订合印并改名，共八册，前五册为图录，后三册是考释。图录收二百五十三种青铜器图象。书前有作者增订序言。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出版。本书收录解放后陕西出土的从商代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共分六册。按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分地区编排，基本上保持出土的器物组合。第一册收录商代的青铜器和岐山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共有图版二七幅。其它各册也将陆续出版。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解放前的数十年间，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大量珍贵文物，青铜器是其中重要部份。本书所选录的八百四十五件青铜器，仅限于礼器或祭器的一部分。本书内容共三部分：一是器物的图象，共有照片一千余幅；二是器物铭文，共约五百余拓片；三是说明，记录各器的尺寸、铭文、年代、著录、流传经过和简略考释。

《海外吉金图录》三册，容庚编，考古社 1935 年印行。本图录收日本所藏中国青铜器一百五十八种。

《海外中国铜器录》第一辑，陈梦家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年影印本。本图录收欧美各国所藏中国古铜器一百五十件。

此外，还有一些专供查找某一类器物的工具书：

《古钱大辞典》，丁福保编纂，上海医学书局 1938 年出版。另有清代李佐贤等所编《古泉汇》、《续泉汇》，也是这方面有用的工具书。

《古镜图录》三卷附补遗，罗振玉编，上虞罗氏 1916 年影印本。

《古玉图考》，清吴大澂编，同文书局影印原稿本。

《古玉图考补正》，郑文焯编，1934 年艺海一勺本。

《传世历代古尺图录》，罗福颐编，文物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本书收商周至明清各代古尺，有图五十七幅。

《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后编一卷，罗振玉编，1914—1916 年影印《古丛编》本。

《古明器图录》四卷，罗振玉撰，1916 年上虞罗氏影印本。

《秦汉瓦当》，陕西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 1965 年 2 月出版。本书收有秦汉瓦当共一百三十五幅，秦代四十幅，其余属汉代，可供研究和欣赏。

《秦汉瓦当文字》，线装二册。上虞罗振玉 1914 年刻本。本书分五卷：卷一收宫阙殿署关仓屯冢等瓦，卷二、卷三收吉语瓦，卷四画瓦，卷五补遗。共有拓片三百余品。书前有罗振玉序，对秦汉瓦当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1954 年起由音乐出版社分辑出版，目前已出第一至九辑。该书收录古代和近代汉族与兄弟民族的乐器、音乐家肖像及手迹、演出情况、文献乐谱等的图片，供学

习中国音乐史时参考之用。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版。本书是上海博物馆所藏我国历代瓷器珍品的选集。收录商周到明清的珍贵瓷器图版一百幅。每图都有简要说明。介绍器物的形状、大小、出土的地方及其艺术价值。《选集》的前言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瓷器发展的历史。

## 五、查找版刻、绘画、雕塑

《中国版刻图录》一函八册，北京图书馆编，文物出版社 1960 年出版。本图录收历代善本书影和重要版画共五百五十种，图七百二十四幅，分三部分：一、刻版，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刻版书影四百六十种，图五百九十八幅；二、活字版，收明清两代活字版书影四十种，图五十幅；三、版画，收宋元明清四朝版画五十种，图七十六幅。这本图录所收都是我国现存版刻的精华，系统地反映了我国版刻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古书版本、版刻艺术的必备工具书。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共十二卷。线装四册。潘承弼、顾廷龙编著。开明书店 1941 年印行。本书是明代所刻书籍的版本书影。共有分代、监本、内版、藩府、书院、家刻、毛刻、书林、活字、套印、绘图、附录等十二卷。书末附有人名、书名、室名首字四角号码索引。这是一本研究明代图书版本的重要书籍。

《中国版画史图录》五辑二十册，又别集一辑四册，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社珂罗版印，1940—1949 年出版。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初编》五函四十四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中华书局 1959—1961 年出版。本丛刊原计划收宋至清各代的珍贵版画书籍三十六种，1959—1961 年出了十八种，其余未见出版。

以上两书所收版画丰富，是研究中国版画史的重要参考书，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

《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历代名画集》五卷，中国历代名画集编辑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 年第二版。本画集所收是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一部分，为古画中的精品，其中有一部分古画从未发表过。原件在解放前夕已被国民党劫运到台湾。全书共五卷：第一卷，唐、五代、宋，收画七六幅；第二卷，宋，收画一五幅；第三卷，元，收画一一幅；第四卷，明，收画一六一幅；第五卷，清，收画七三幅。书前有郑振铎长篇序言。本书第二版在内容上作了修改和补充。

《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东晋、隋唐、五代部分，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编辑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 年出版。《中国历代绘画》选编从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各时期绘画作品，分卷轴、壁画、版画、民间绘画等类别。《故宫博物院藏画集》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册收东晋、

隋、唐、五代的名画十九幅。附录有作品简介，题跋选印和历代著录三部分。

《中国古代绘画选集》，中国古代绘画选集编辑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年出版。本选集收了我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百多位画家的名画共一八幅，大体上包括各种风格流派。作品的创作年代，上起战国下迄清末。这些作品表现了我国从楚帛画开始两千年来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历代名画流散国外不少，这里所选的是国内各博物馆所藏珍品。书前有郑振铎序言。

《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选集》，文物出版社 1959 年编辑、出版。本书选印了故宫博物院、各省博物馆文管会、美术家协会、美术馆以及个人所藏中国近百年名画一七幅。书前有郑振铎的《近百年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一文。

《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郑振铎编，上海出版公司 1947 年出版。中国历代名画，由于帝国主义的劫掠和民族败类的盗卖，不少流散在国外。这本画集将许多散见于国外博物馆里的中国古画汇集起来，影印出版。全书分正、续两集，正集有：一、西域画上、中、下三册，二、魏晋六朝画一册，三、唐五代画一册，四、宋画一册，五、元画一册，六、明画上、中、下三册，七、明遗民画一册，八、明遗民画续一册。续集第一集宋画，第二集宋元画，第三集元明画，第四集清画。共收中国古代名画一千多幅。

《中国古代雕塑集》，刘开渠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5 年出版。本书是我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选集。收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所藏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陶、瓦当、石刻、泥塑等雕塑品的图版四十八幅。书前有编者写的《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一文，介绍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伟大成就。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上下册，郑振铎编，上海出版公司 1951 年出版。本图录介绍了我国历代重要的绘画、雕刻、陶瓷、刺绣及其他传统艺术作品。全书共十二辑，第一辑古代，三四图；第二辑两汉三国，三图；第三辑两晋南北朝，二二图；第四、五辑隋唐五代，二四图；第六、七辑宋辽金，二三图；第八辑元代，十二图；第九、十辑明代，三五图；第十一、十二辑清代，二八图。每辑前都有文字说明。本书所收大部分艺术品为帝国主义劫走，现藏于国外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故宫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 1974 年出版。本书从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工艺品中，选取玉、石、竹、木、漆、匏及牙、角、金银、珉瑯等工艺品共一百件，编印而成，全部为彩色图版。所选工艺品的时代从商代到清代。

## 六、查找外国文物图象

我国出版的外国文物图录极少，现只能介绍两种教学参考用的世界史参

考图集。

《古代世界史参考图集》，朱龙华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0 年出版。本图集收图片四九五幅，其中彩色图片二十五幅。图片编有顺序号，共分六部分：一、原始社会（1—35 号）；二、两河流域及西南亚洲其他地区之古代文明（36—119 号）；三、古代埃及（120—220 号）；四、爱琴文化（221—245 号）；五、古代希腊（246—390 号）；六、古代罗马（391—495 号）。图片内容包括生产工具及社会经济情况，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政治事件及历史人物图片，意识形态、主要是艺术，如建筑、雕刻、绘画和工艺美术等。每幅图片都有简要说明。书前有详细目录，查找方便。这是一本世界古代史教学上很有用的图集。

《世界史参考图片》（近代部分），北京市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组编，大众出版社 1954 年出版。这是一本供世界近代史教学参考用的图片集。后记

我们在长期的资料工作中，为适应本系师生质疑问难的需要，逐步积累了不少材料，至 1972 年整理成文，作为讲授“怎样使用工具书”的专题讲稿。197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我们把原稿改写成供年轻的文史工作者和高等院校文科学生使用的参考书。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几经增删，才写成《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一书。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诸位业师的支持和鼓励，又承吴杰先生提供宝贵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我们的水平不高，掌握的资料有限，缺点和错误定然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海内专家惠予批评指正。

王明根、吴浩坤、柏明（按姓氏笔画为序）

1980 年 3 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